

中国「左」祸

● 文革 著

● 朝华出版社



●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破四旧”大会，烧毁“封资修”书籍。

● 1966年10月，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破四旧”大会，烧毁“封资修”书籍。

● 1966年10月，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破四旧”大会，烧毁“封资修”书籍。

● 1966年10月，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破四旧”大会，烧毁“封资修”书籍。

● 1966年10月，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破四旧”大会，烧毁“封资修”书籍。

● 1966年10月，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破四旧”大会，烧毁“封资修”书籍。

● 1966年10月，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破四旧”大会，烧毁“封资修”书籍。

● 1966年10月，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破四旧”大会，烧毁“封资修”书籍。

● 1966年10月，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破四旧”大会，烧毁“封资修”书籍。

● 1966年10月，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破四旧”大会，烧毁“封资修”书籍。

史无前例的
中国正在经历
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



全景

实

2 020 5519 5

中国——左——祸

文 学 著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记 138 号

总策划:卢野

特约编辑:岳建一

章德宁

封面设计:旺忘望

内文版式:岳建一

中国“左”祸

文聿 著

*

朝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铁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18 字数 420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ISBN7—5054—0209—9/G·0045

定价:12.80元

前言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来自东方最古老的黑暗，来自星星之火，来自太阳色人和寓言般的苦难——中国共产党走出苍凉的僻野，前赴后继于腥风血雨，终于，步入了金属般的辉煌。

听风鸣雨啸

——那是一代求索者执著于信念的足音。

然而，天行有常，一同步入历史的，还有鱼龙混杂，得失参差，还有不堪回首又不能不回首的万千慨叹。

公元1927年，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酿成“左”祸。

公元1930年，李立三宣称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即将到来，总罢工，总暴动，致使仅上半年便有58500人被捕，6220人遭杀。

公元1931年，王明猝然成为中共领袖，“左”上加“左”，致使血流成河。红色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

公元1930至1934年，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冤假错案数以万计，无数红军与苏区创建人惨遭自己人屠戮。滥杀滥捕近似疯狂，乃至有的军团几乎没有党政干部了。

公元1942年，延安整风中开展“抢救运动”。一时“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托派”、“红旗党”、“坏人”，应有尽有。到处私立公堂，诱供逼供。康生称：来延安的党员干部，百分之七十、八十政治上靠不住。

公元1951年，口诛笔伐电影《武训传》。

公元1957年，55万余人被引“蛇”出河，打成右派，殃及者无数。

公元1958年，徐水县人声称进入了共产主义，轰动世界。从此，大跃进开始。一亿人砸锅扒房毁林，大炼钢铁。数亿人竟放高产“卫星”，亩产最高者竟称达824500余斤。万古荒唐，无人质疑。

公元1959年，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为民代言，招致罢官、军队整肃和重开反右杀戒，受株连者万人以上。

公元1959至1961年，大跃进造成大灾难，神州一片啼饥号寒，三年中“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4000余万，直接经济损失1200亿元。

公元1962年，小说《刘志丹》株连万人，思想、文化领域百花凋零。

公元1963年，杨献珍获罪哲学，株连十族以上，挨斗、降职、劳改、坐牢以至人头落地者，数以千计。

公元1964年，农村“四清”，无端受害者难以计数。

公元1966年，空前深刻、全面、惨酷的大浩劫开始，从布衣寒士，到民族精英、开国元勋、军事统帅，幸免于难者，寥若晨星。古有酷刑：墨、劓、剕、宫、大辟、笞杖、徒、流、髡、斩、绞、腰斩、梟

首、弃市、车裂、磔、焚、凌迟；更有法外酷刑：炮烙、活烹、抽筋、拉杀、杖毙、剥皮、气憋……然而，其花样翻新和对人身心的摧残，不及十年文革更甚。“左”祸势若崩浪，奔若山腾，直至肆虐成千古神话；直至生者失去灵魂，死者没有最卑微的尊严；直至七情肢解，六欲监禁，一切人性被抽象，灵与肉一贫如洗；直至每一天是一个新的受难日，自我毁灭与生存一样艰难，人成为人最惧怕的生物；直至人心寂灭，寻觅无望，深重的夜色中不见一缕星光；直至许诺即是背叛，告密意味忠诚；直至鲜血淹没了红色，泪水填凸了海；直至古大陆荒芜、颠狂、危机成东方的传说；直至浩浩的沉默中，人民不再沉默；直至博大的喧响在地下奔突运行。

公元1977年，“洋跃进”再次“超阶段”，两个“凡是”出笼。

——是备忘启示？

——是遗世警言？

——是深沉的觉醒诞生于最冷酷的孕育？

——是炎黄子孙无人而任其肆虐？

若言无人，回溯时光，何以这般兴败相倚？悲夫！

若说有人，风云开阖，何以如此物极不反？哀哉！

这就是拥有太多文明、史诗、赤子俊杰的民族吗？濡血的星空，升起多少没有命运的梦魇。苍白的大地，迷茫了多少志向高远者、励精图治者、心忧天下者、锐意进取者；身怀绝技者、明察秋毫者、运筹全局者、勇于开拓者、博巨灵藏者……毁谤、猜忌、迫害、贬滴、牢狱，委身草莽，流徙江湖，以至生存成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含冤赍恨，抑抑而终。遍地黄金失色，满目朽水生辉。虫蚁可以繁生，只有人材一文不值。当海外信息爆炸、知识更新、科技换代时，华裔俊杰独领风骚，称雄世界各地。仅在美国，12万一流科学家，华裔占去四分之一。而其故乡，苍天笑我无人。于是，人材积压而又奇缺，枯竭而又浪费惊人，直至外流。于是，脑

体倒挂，知识呻吟。于是，一个本该产生巨擘大师的时代，几乎一片空白。于是，煌煌中华，躲避不及历史的惩罚，人口危机、生态危机、公害危机、文明危机、信仰危机……相继而至。于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深化了。于是，几乎再铸了一个民族的不幸性格。于是，有了拒绝躬身自省，有了文过饰非，有了善于遗忘。于是，心如止水者、麻木不仁者、明言说论者、落井下石者、罗织罪名者、自诩先知多觉者……应有尽有。于是，当全人类的汉学家都在研究中国发生的事情时，我们的民族郁忿云散了，历史的顿悟不见了。那么，面向未来的觉醒又在哪里呢？

难怪极“左”横行而今，一再发难改革。

难怪人们余悸尚在，一再伤透了心。

浩瀚的羞惭，浩瀚的警钟，浩瀚的痛切。

是步出不幸的时候了。

是告别悲剧的时候了。

是正视“左”祸的时候了。

我们伫立在民族的伤口上，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极“左”是封建王国观念及策略的一种当代顽强表现。

极“左”的一切社会批判，带有小生产势力的特征。

极“左”在人们推翻“三座大山”的年代，多少可以理解为阶级斗争激烈化的表现之一，但自十年浩劫始，有了变化和发展，成为一些人争权夺利的谋略和压制不同意见的手段。他们轻薄浮躁而又老谋深算，不学无求而又不甘寂寞，自己活在自己的角色中，脸上的马克思主义粉霜一刮掉半斤，血红的长舌上永远是大话、假话、空话、废话、套话，一副卫道殉节的架式，灵魂深处却透布尘垢、蛛网和腐物。

极“左”中的不少人，是钻进共产党里寻找出路的小丑、痞子和政客，深悉“宁左勿右”的个中妙处，将一些理论简单化、概念



化、教条化、片面化、宗教化，然后奉为神明，以售其“左”，又暗藏杀机，弄得一些人类科学与文明的结晶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主义不像主义，学说不像学说，造成无数的误解与反感。

极“左”以人民的名义摧残人民，以信仰的名义摧残信仰，以科学的名义摧残科学，以法制的名义摧残法制，以民主的名义摧残民主，以社会的名义摧残社会，以改革的名义摧残改革。

极“左”像给马王堆的汉代老太植皮隆胸一样，论证和美化旧事物，以剥夺现实趋向未来的权利。

极“左”们理论保守，手段卑鄙，道德破碎，心系一己私利，以维护一种愚昧、简单、无效、内耗、不断重复错误的“社会主义”，让壮丽的山河为自己的权杖、尊荣和堕落付出代价。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害怕用实践检验真理的呼声，自改革以来，将一切新气象、新概念、新步骤、新思潮作为对立面，因此具有反动性。

极“左”貌似不食人间烟火，貌似活在神坻之上和凡俗以外，不仅自扮成人民的人，还要自扮着人民的指路人，庄严莫测，高度脸谱化，极端戏剧化，因此具有伪善性。

极“左”为渊驱鱼，为林驱雀，党同伐异，唯我独“左”，见有不同意见者，大小帽子乱扣，肥瘦棍棒齐下，无限上纲，不择手段，凶残面又专横，常常把人整得死去活来，因此具有排他性。

极“左”身陷四面楚歌，知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明瞭已是穷途末路，又不敢忏悔，于是背水一战，倚仗旧的习惯势力和整个封建传统文化的支持，进行垂死挣扎，因此具有顽固性。

极“左”积恶盈祸，众叛亲离，无论进出何处，都背负着一片片稠密的鄙视目光。他们人前昂首阔视，气壮如牛；人后目光散乱迷离，空空洞洞，凄凄惨惨切切，惊惧一切真实的言论和报道，没落悲观，绝望宿命，却又讳莫如深，环顾左右无一知己，像煞孤魂寡子，因此具有孤独性。

极“左”与繁文缛节、政令刻板、妄自尊大、公文旅行、形式主义、人浮于事、假公济私、文山会海……又都有深刻的或千丝万缕的联系。

极“左”思潮是当代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最主要内在根源！

感谢作者，不辞辛劳，日夜奔走，收集，核实，查阅，撰写此书，还“左”祸以过程，赋历史以真实，用深沉的责任感，在中国首次将这部40余万字的全景式长篇报告——《中国“左”祸》奉献给读者。虽然难免疏漏，却是直面历史，注重原形原态，形成了该书最本质的品格。唯其如此，才能使读者与我们一同，深入当时的真实处境，对“左”祸过程和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追求、迷误、痛楚、自身局限性，作史的探索，以自警自醒，以飨后人。作为特邀编辑，我们在每一章节前，拟就编者的话，以使本书更加完整。值此全部案头工作结束之时，难忘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助。特此鸣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纪委党风教育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专家和学者。

古人云：“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知得知失，可与为人；知存知亡，足别吉凶。”又云：“呜呼！福祸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倚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后傲，斯弗及已。”

没有自警，何谈自醒？

没有自重，何谈自强？

没有反思，何谈重振雄风？

没有高贵的人格，何谈高贵的命运？

没有骨骼中富有钙质，何谈与新世纪的太阳一同拱破地平线，还生命以生命，还人以人，还创造以创造，还精神以精神，崛起于纯金的喧嚣中。

为了思想不再放逐，灵魂不再扼杀，信仰不再泣血，希望不再绝望；为了曾经是孩子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灵与肉不再深陷

图围；为了十亿人的国度不被遗忘于太阳系这颗最壮丽的行星，让我们像山脉与山脉相挽，像星座与星座相连，踏过“左”祸，走向明天。

朋友，上路吧，野花由远及近，鲜艳而来。

朋友，上路吧，身后的风景会漂泊成新的风雨。

朋友，上路吧，抹去未干的凉泪。

——敬上以上话语，是为共勉，是为前言。

岳建一 章德宁

1993年1月6日深夜，于建国门。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前 言 岳建一 章德宁 1

第一章 “左”祸发端 1

●斯大林的一位老乡来到中国
●盲动主义的产生与工农总暴动
●“烧杀政策”及其恶果
●“政治纪律”与毛、周受处分

第二章 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 16

●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的指示信
●李立三头脑大发热
●红军各路兵马远征攻城
●追究周恩来责任与冒险总暴动
●反“左”英雄横遭打击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第三章 从三十万到三万 32

- 一名“学生娃”成为中共领袖
- 毛泽东被剥夺军权
- 反“罗明路线”与邓小平撤职挨整
- 两位德国人在江西的较量

第四章 左倾屠刀下的万千冤魂 51

- 整肃“AB团”大冤案
- 冤杀万人
- 富田事变
- 陈毅险遭杀害
- 闽西苏区肃“社党”大冤案
- 事出有因
- 滥杀无辜
- 恶果严重
- 湘鄂西肃“改组派”大冤案
- 四次大肃反
- 大开杀戒
- 幸存者不堪回首

第五章 残酷的同盟：抢救失足者运动 105

- 草木皆兵与反奸运动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 “特务”张克勤骑马戴红花
- 康生的恐怖报告○创伤深重●一桩悬了49年的冤案
- 王实味直言酿成杀身祸○漫长的平反昭雪●蒋南翔忘身进谏

第六章 掌上风云

151

- 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文坛狂飚○《武训传》骤起惊雷
- “小人物”征伐俞平伯●奇冤如梦命如丝○胡风“三十万言书”○怆然“别姬”○苦狱生涯
- “莎菲女士”的遭遇○丁玲泪对千人指○定案在先,对证于后○苦役无边●梁漱溟冒犯毛泽东○“以笔杀人者”○暴风雨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中的沉默

第七章 反右斗争和“国谋”

188

●毛泽东的“阳谋”、整党
与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灭
顶之灾●“共产党内就有右派”
○在劫难逃○首“恶”必办○战
果辉煌●一位右派作家的经历
○横祸难躲○“炮声”难躲○苦
役难躲●“小小右派”们的命运
○普通右派多如牛毛○十六岁
的小右派●不是“右派”的“右派
分子”○“祸从口出”还是“祸从
笔出”○“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
尔萨斯的马”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第八章 共和国的“大左”神话 231

●冒失的决策(小社并大社)○北戴河会议●遂平：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嵯峨山崛起人民公社)○应运而生，天下第一●理论“巨擘”的庄严鼓噪(陈伯达出口不凡)○当代“原始共产主义”蓝图(张春桥闻风而动)●毛泽东亲自巡视人民公社(徐水之行)○安国定县之行(七里营之行)○齐鲁之行●徐水：中国共产主义的试点(徐水的“毛泽东效应”)○《大同书》来到徐水(徐水的《共产主义规划》)○徐水人进入“共产主义”○徐水的“试验”轰动全世界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第九章 满天“卫星”满地灾

279

●毛泽东向全人类宣告：15年赶超英国○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大跃进针锋相对反冒进●周、陈、薄、李“大检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卫星人民公社的粮食“卫星”○农业协作会议○“卫星”越放越离奇○中央党校校长不堪回首的回首●蜂拥而上：一亿炼钢人○两年超英，十年赶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数百万土高炉●一错再错，跃进更跃进○新的跃进○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幻想与困境●惨重代价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第十章 庐山会议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326

●“神仙会”与反“左”○“神仙”八方来○“神仙”七嘴八舌○彭大将军上山来●“上疏”风波○天早晚要塌下来的○我为人民鼓与呼○毛泽东的反击●“军事俱乐部”○文臣与武将○晴天霹雳○致命打击●万鼓雷殷地，亿民伐右倾○只争朝夕○军队整肃

第十一章 哀哉 物极不反 359

●小说《刘志丹》祸及万人○左倾回潮○习仲勋受审 16 年●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鬼戏”招来“钟馗”○奇文今考●杨献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珍的“哲学罪”○自投罗网○
屠场森严○株连十族以上●
圣人的劫数○受尽凌辱：大
经济学家孙冶方坐牢八年○
含冤自尽：大历史学家翦伯
赞挨斗百余次●全面深挖农
村修正主义根子○社教：大
兵团作战○四清：决不姑息

第十二章 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403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
张大字报》○酝酿风暴○康生面
授机宜●红卫兵狂飚突进○“红
色恐怖万岁”○大串连：北上！南
下！西进！东征○老红卫兵小将
的反思●打倒一切当权派○万
炮齐轰：老干部们！老家伙们！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走资派们○张春桥喊：夺权！
夺权！把党权、政权、财权、文
权全部夺回来●中国正在进行
“武化大革命”○江、陈号
召“文攻武卫”○广西武斗日
志片断○湖南道县放出杀人
“卫星”●以“左”反右，越反
越“左”○极“左”情结○“反
击右倾翻案风”●劫难无所
不在○经济崩溃，势难阻挡
○教育战线，苦难无边○八
万军人惨遭迫害○四域无外
交○疯狂的文化围剿○谢富
治高喊：彻底砸烂公、检、法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第十三章 冤狱遍布中国

462

●“血统论”与遇罗克之死
●强者的怯懦○“文革”第一殉道者○魂断龙潭湖○一个以死抗争家庭的毁灭●囚后余生日，世上已千年○将军跳楼，九死一生○民可杀不可辱○谁来判他死刑●他们没有活着走出来○共和国第一要犯○被冤杀的警官○死不瞑目者●刑场上的枪声○张志新在黎明前死去○朱守中戴镣高歌去○老红军临刑前的仰天长叹●天大？冤大？○集团冤案连绵不断○欲笑无声：五百“反共救国军”



目 录

ZHONG GUO ZUO HUO

中国“左”祸

第十四章 不散的阴魂

511

●结束了?还是又在开始○

两个“凡是”出笼○邓小平的严正批评●神州“洋跃进”,天地终无情○日昏鼓声急○跃进!再跃进○顺天者兴,逆天者败●“姓资姓社”之争○张、姚是否再世○重温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书目

544

第一章

“左”祸发端

- 斯大林的一位老乡来到中国
- 盲动主义的产生与工农总暴动
- “烧杀政策”及其恶果
- “政治纪律”与毛、周受处分

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四月至七月。

时间凝固了，不再滑下瓦脊。

枪声远了又近，疏了再密。长江红了，浊浪排天，淌着中华民族史诗般的苦难和热血烫卷的绿叶，奔流不息。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进行“清党”，成千上万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失败。那些岁月，夜色深重，闪电也难以探入。历史沉默了，沉默成巨大的问号。

人们垂首在挽歌般凄厉的夜风里。

白色恐怖中，革命转入低潮。

然而，不是一切巴掌可以阻止大江的涵狂。不是一切子弹可以扼杀种子的力量。不是一切劫后余生者泯灭血性，弯曲了脊梁。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他们仍然坚定着主义和



信念。他们站立起来，耸成死难者的纪念碑。他们以血肉之躯进行着最悲壮的斗争。于是，历史深处，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风暴。

但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自身的弱点，也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开始出现“左”倾错误，它妨碍和损害着革命事业的前进和发展……

●斯大林的一位老乡来到中国

1927年7月23日，九省通衢之地汉口。

天气特别炎热，汉口是一个有名的“大火炉”，烤得人们心里直发慌。

大街上，人们行色匆匆。国民党的暗探、持枪荷弹的士兵在跟踪、搜捕“共党分子”。郊外，不时传来“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共产党万岁！”的呼喊，接着是一排排枪声，被五花大绑的“共党分子”和工会、农会骨干倒在血泊之中……

汽笛悲鸣，一艘客轮驶向汉口码头。下船的人流中，有两位外国的年轻旅客，一位是俄国人，一位是德国人。他们来到中国，负有重要使命。

俄国人叫罗明拉兹，是高加索格鲁吉亚人，可以说是斯大林地道的老乡。他生于1898年，比斯大林小近20岁。罗明拉兹于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他在青年团工作。在1922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在随后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因而深得斯大林器重。1926年4月，他作为青年国际代表被提拔，荣幸地进入

共产国际主席团。随后他又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议。并作为联共(布)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布鲁赛尔反帝代表大会。这次来中国时,他年仅29岁,却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授予全权“纠正过去所有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另一位德国人,名叫诺伊曼,1925年被德共任命为派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次来中国他年仅25岁,是协助罗明拉兹工作的。

他们来到中国的前夕,正值中国的大革命面临失败。共产国际认为这场革命的失败,主观原因完全是中共指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便决定对中共中央动手术,召回派居中国指导工作的鲍罗廷、罗易等代表,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由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的临时负责人。

瞿秋白,江苏人,学识渊深,才华横溢。1920年曾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写下了著名的《新俄国游记》一书。他精通俄语,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在苏联参加十月革命以后政治生活和从事共产国际活动的经历。《国际歌》歌词,正是由他首先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他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写了《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等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中国大革命时,他年仅28岁。

自1927年7月上旬始,共产国际便转变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作出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决议,提出了七条重大措施:一、中共应毫不迟延、毫不含糊地退出武汉政府;二、在采取这一步骤的同时,也要宣布自己的政治原则,并从武汉政府敌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行动来阐明这个原则。三、中国共产党人不要退出国民党。四、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加强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工作;五、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六、鉴于种种镇压和酷刑,应该建立起一个战斗的秘密党机构;七、共产国际执委号召中共全体党员对中共领导的机会主义偏

向进行坚决的斗争。

随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来电令，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定新政策。共产国际派罗明拉兹来中国，就是为了实行中国革命政策的转变。这些政策的主要点是结束国共合作局面，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个转变无疑是正确的。

在这个政策的转变过程中，罗明拉兹是积极组织者。经过近半个月的准备，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会议在汉口市原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的一座公寓式的房子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21人。当时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也出席了会议。罗明拉兹和其他两个俄国同志也出席了会议。由于环境险恶，中央有关方面花了三天时间，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会议之后又用了三天时间一个一个地带出会场。会议从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

会议上，共产国际罗明拉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许多同志在会上发言，批评党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错误。有的还坦率地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右倾错误。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重要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革命和战斗。这次会议在政治上使党有了新的出路，在组织上使党有了新的生命。它为挽救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

变。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也从这次会议开始发端。正如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面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份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

具体来说,八七会议在以下几个方面成为“左”倾错误的开端:

一、在对形势的估量上,看不到革命走向低潮,从而进行有计划的退却,反面认为革命形势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在制定暴动计划时,把目标放在夺取大城市上,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占长沙、武汉。这种估量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况状况。

二、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会议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罗明拉兹在会议上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同反对资产阶级相提并论,认为只有在打倒资产阶级以后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实际上,当时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产阶级有很大的矛盾,小资产阶级应当是革命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应当争取的对象。

三、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会议过份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工人成份的意义,从而造成了领导机关的混乱和宗派主义的出现。罗明拉兹认为:“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

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得正确。”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出现不信任知识分子，片面追求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做法，也就从此开始，后来竟演变为“唯成份论”。

四、在党内斗争问题上，开始了单纯追究个人责任的过火斗争的倾向。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缺乏具体分析，没能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参加，剥夺了他在会上申辩的权力。同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于陈独秀身上，不注意检讨自身的失误，这是后来党屡犯“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盲动主义”的产生与工农总暴动

八七会议之后，天气更加闷热异常，间隔两天，于8月9日又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由共产国际罗明拉兹提名，选出了由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组成的中共中央常委会。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随后，中共中央秘密迁往上海。与此同时，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向全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各地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先后发动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的武装暴动。党还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恢复并重建了党的组织，建立起了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党的工作和事业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

但是，党内的“左”倾错误也很快地发展起来，形成了“盲动

主义”。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人，除中央常委外，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以及江西、江苏、广东等省党组织的代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和刚从莫斯科赶来接替罗明拉兹工作的共产国际新代表米特凯维奇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由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瞿秋白起草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等文件。会议虽然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等方针，但会议却提出了许多“左”的错误观点。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罗明拉兹起草的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入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决议案还认为：“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观点，明显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大众取得政权之后，还必须经过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期。

在革命的形势问题上，罗明拉兹起草的决议案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不断地发展，因为统治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地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

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这种估计，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状况。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并无“直接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当时描绘革命低潮的形势时指出：“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

在革命的总策略方面，罗明拉兹起草的决议案也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总方针，要求“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决议案还强调要发动工人斗争，组织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罗明拉兹提出的这个革命“总策略”，就是让农民暴动配合城市工人暴动，以致占领城市。这种由城市而农村的做法，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

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上述一系列观点，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出现了“左”倾错误理论，它的影响深远，危害无以估价。

这次会议之后，党的总负责人瞿秋白又先后写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武装暴动问题》、《中国革命低落吗？》等三篇文章，对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左”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

根据这些“左”的理论观点，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

议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共中央先后布置了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了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

关于广州起义，它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一次英勇尝试，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广州起义虽然一度取得胜利，但要守住广州是难以做到的。当时党中央想保住这个胜利，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也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叶挺深知坚守广州不易，提出把队伍撤退到农村。诺伊曼勃然大怒，斥责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结果，本来是稳操胜券的一战，因为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血流成河，遍地陈尸。广州起义失败后，战功卓著的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指责他政治动摇，不予理睬，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执意阻挠。这位共产党的一代名将，北伐战场上曾经叱咤风云，每攻必克，威名远扬，此刻忧愤交加，去了德国，开豆腐店做生意。

关于武汉暴动，1927年10月爆发了宁汉之战，湖南军阀唐生智败走。湖北省委和长江局打算在武汉三镇举行暴动，中共长江局书记认为举事不宜，便取消了暴动计划。但是，共青团湖北省委的一些同志，竟指责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认为如果利用这次时机，“在武汉我们不仅可以推翻敌人的政权，而且可以把革命的政权建立三至五天之久”，随后又向中央控告罗亦农等人“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据此，中央派了一个三人特别委员会前往湖北查处。特委到湖北后，采取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对武汉暴动问题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后被纠正）。

关于长沙暴动,中共湖南省委根据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于1927年11月24日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总动员通知。12月1日,决定长沙暴动,计划于7日至10日为暴动日期。但届期暴动并未发动起来。10日中午,在省委委员伍桐亲自指挥下,铁路工人才开始罢工。晚七时,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卫戍司令部。结果只破坏了电灯公司。当晚,敌人调来一个师,暴动很快镇压下去。

上海以及北方顺直等地的暴动,虽有行动,但很快惨遭失败,有的则根本发动不起来。事实证明,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总暴动策略,是脱离实际的“左”的盲动主义的表现。

●“烧杀政策”及其恶果

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

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深。

一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

烧,烧,烧……杀,杀,杀……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要烧去整个儿的城市,湖北许多村庄整个儿的被烧尽。江苏省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口号,号召……起来参加,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

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两湖省委信》,明确规定:

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应:……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在汉口长沙如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

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

主的房子……

目前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

这一过“左”的“烧杀”政策,曾在湘南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

1927年底,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在湘南发动农民进行年关起义,随后又打垮了许克祥6个团的进攻,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然而正在这时,由于党中央和湖南省委“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中共湘南特委开始推行一些盲动政策。在发动农民起来插标分田和惩治反革命的斗争中,“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之类的口号导致惩治镇压的扩大化,并因农村的宗族矛盾而增加了相互仇杀的数量,还为后来的“白带子”与“红带子”互杀埋下了祸根。

当军阀混战暂时休止,湘南面临湘粤两敌军联合进攻时,中共湘南特委又在“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土战略”,实行“烧杀政策”,~~为了~~企图使敌军进入湘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指示下达后,群众和干部强烈反对。湘南特委一方面逐次让步,将焚烧范围缩小至湘粤大道两侧各5里,一方面仍向各级干部施加组织压力,强令推行。许多区乡干部抵制不了,只得在大道旁焚烧了少量房屋,然而消息风传,造成人心大乱,敌对情绪剧增。

当时正是湘南暴动的战果进一步扩大的时候,中共湘南特委扩大会在永兴召开,准备在3月16日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广泛开展插标分田运动。

据当时担任中共良田、坳上区委书记的李克如、李杰的回忆:

郴州是湘、赣、粤、桂4省通衢,是中共湘南特委确定的首批

实施焚烧计划的重点,而且城内房屋还要全烧。

中共郴县县委本来对群众反对烧房屋的呼声有所了解,却坚持要执行特委的指示,认为烧掉郴州使敌人无法立足才是群众的最大利益所在,想以此说服动员群众收拾家什搬迁至县城5里外,烧掉房子,却不想群众多数对此不能忍受,有的坏人混在群众中闹事。3月12日,县委通知在郴州城里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打算由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说服动员群众在尽量减少损失的措施下执行焚烧决定,以粉碎敌人的进攻。

这一天,到会者格外多,平日空旷的场地挤得水泄不通。城隍庙人口处持大刀梭标的人不少身份不明。大会于10时开始。夏明震讲到为阻止湘粤两省敌人进攻不得已实行“坚壁清野”时,台下立即叫喊:“烧房子就是不行!”

“烧死他们!杀死他们!”许多人迅速扯下颈上的红带子,换上事先暗藏的白带子。

一个暴徒窜上台去,一刀砍死了夏明震。混乱的人群刀枪棍棒齐上,县干部与群众组织负责人多人被杀。全场顿时形成一场白带子杀红带子的混战,当场死伤200多人。接着,人们一路呼啸而去,见红带子就杀,见商店就抢,相继捣毁县总工会、少先队等驻地。

当天下午,又有人散布谣言:“城里的工人要杀农民”,“共产党要烧郴州方圆50里的民房”,煽动数千农民包围了已经搬迁到城外东塔岭的中共县委机关,抢劫一空。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县、区党组织及苏维埃的负责人只能组织未受煽动的农军、赤卫队及工人进行武装反击。郴州城内又展开了红带子和白带子的血战。良田、坳上等区的中共党组织曾派出武装力量进城参与平乱。

经过这次事件,郴州损失惨重,到处充斥着仇恨与恐惧气

氛，混乱不堪。除良田、坳上等少数区损失较小外，无论城乡都遭受了一场人为的大地震。“烧杀政策”造成了严重恶果。

当时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也认识到了烧杀政策错误的严重性，很快调离了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的工作，并决定由陈毅担任郴县县委书记。陈毅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郴县县委对于执行烧城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房屋的错误决定有不可推御的责任，宣布取消错误的决定，并代表县委向群众致歉；同时还宣布了有关政策。会后，县苏维埃政府颁布布告，规定不准焚烧房屋，不准强迫搬家，不准造谣惑众等。

●“政治纪律”与周、毛受处分

“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进行过火甚至极端的党内斗争，对所谓“犯有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办主义。这种做法，在党的历史上影响更是深远。

综上所述，在八七会议上，对陈独秀的处理就有欠妥之处。到了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更别出心裁，制定了一个《政治纪律决议案》。在这个文件中，受处分的有十案，其中属于“暴动区域党部指导机关犯了严重错误”的有四案。这四案的性质都关系到是执行还是反对八七会议总方针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的处理。

关于南昌起义，决议案认为：中央的政治局决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的一部分，应以农民为主力发展土地革命斗争，绝不是希望单纯军事上的行动与胜利，但是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上军事上上面做成了极大错误的，仍旧是断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属于政治上的错误，就是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全民政

权的政纲，不坚决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而徘徊于没收二百亩、五十亩土地之间，实际上没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属于策略上的就是，军队所到之处，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屠杀并摧毁其一切政治社会组织完全没收其武装策略，及沿用军阀“不扰民”的观念，枪毙了乘机抢劫的贫民。再则没有实行没收豪绅财产以解决财政问题，却想用旧式军阀通过豪绅筹款的办法，以剥削贫民和劳动民众。属于军事上的就是拘泥于原在武汉预定的军事保守政策，不走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路线，而只顾避免敌人攻击，采取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道路。……此种错误的艰辛原因乃在前委（前敌委员会）因袭着军事投机的遗毒，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发动农民创造真正工农民众政权的决心，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中央政策的行动。据此，决议案决定：“这次前委（前敌委员会）指导做出极大的错误，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周恩来是南昌起义前委的负责人，受到警告处分。

关于秋收起义，决定案认为：“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中央屡次指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并且向省委书记彭公达同志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要省委改正此错误，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群众上面，遵照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切实准备”，“但省委的指导仍然没有改变旧的军事机关的错误：（一）公然违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动看作一件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导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儿行动；（二）在暴动区域以内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纲领，以致农民只以为是共产党的捣乱，甚至省委怀疑农民是否需要土地，反对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三）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

杀土豪劣绅的策略，以致农民视若客军过境。因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据此，决议案决定：“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做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政治纪律决议案》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负责同志的指责和处罚都是完全错误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这是一次伟大的和胜利的起义。它的发动和胜利，是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坚决地击退和克服了张国焘主张联合张发奎，企图阻挠起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决议案的指责和处分，完全抹煞了周恩来等同志在八一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和功绩。当然，南昌起义后进军途中没有采取就地革命，而是采取夺取大城市的方针，是一个失策。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其主要责任在中央，不在前委。

至于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这次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决议案的指责和处理，同样是错误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党内纪律处分上的表现。

第二章

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

●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的指示信●李立三头脑大发热●红军各路兵马远征攻城●追究周恩来责任与冒险总暴动●反“左”英雄横遭打击

未来的觉醒，为什么诞生于最冷酷的孕育？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纠正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内又于1930年夏秋产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宣称爆发中国革命，有可能掀起全世界大革命，引起全世界最后阶级决战的到来。总罢工，总暴动，集中红军各路兵马攻打大城市。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左”倾冒险的结果，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灾难和无以估量的损失。在白区，十几个省的党组织惨遭破坏，有的几乎全部瓦解。仅半年内，就有58500人被捕，6220人被杀。在根据地，更是白骨陈旷野，百里无鸡鸣。

●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的指示信

1929年10月,东北中苏边境上,张学良的军队与苏联红军激战不休,自7月份开始的中东路事件,正进入白热化阶段。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把中东路事件的发生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个新步骤”,是“直接的战争挑衅”。

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立即行动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而苏联正需要各国共产党的声援。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更寄予厚望。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可以直接牵制东北军阀的进攻行动,能对保卫苏联起到直接有效的作用。

10月下旬,中苏边境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炮声轰隆,虽然这里与莫斯科远隔数千里,却也震得共产国际领导人惶惶然。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也不等待中共对情况的汇报,便于10月26日向中共发出了关于改组派问题的指示信。该信认为:

“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这个危机的表现在:1、各军阀集团之间再次因内讧发动战争,而在其背后则是彼此间矛盾日益激化的帝国主义列强;2、形成了以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为首的,同南京国民党抗衡的国民党改组派,这个派系在一个军阀集团的支持下登上了政治舞台;3、由于反苏的冒险行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矛盾的加剧,使整个局势呈现复杂化;4、吸收外国资本大量投资和修改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一切打算,都成了泡影;5、国民党的整个国内政策明显地破产了,既没有把群众的革命运动彻底镇压下去,也没有一丁点儿可能

性实现国家财政和军事上的统一；6、由于外国资本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增大，一系列工业部门出现萧条现象；7、持久的、日益深化的农业危机，在当前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的束缚下，是毫无出路的；8、工人阶级和基本群众本来已经难以忍受的境况，又普遍恶化了；9、工人运动高涨起来，它是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奏；10、农民运动、特别是游击运动活跃起来。”

也就是说，上述十大危机表明：在中国统治阶级已经分裂，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按照列宁有关革命条件的论述，中国已进入直接革命的形势了。

接着，这封指示信又为中共规定了五大任务：

1、必须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以便进一步发展独立的革命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通过出版物、传单、群众性的口头宣传和呼吁书来揭露国民党各个集团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推翻统治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口号，以及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政权的口号，应当成为党进行群众宣传的主要的、现实的口号。

2、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卑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问题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

3、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集中全力去发展政治罢工。应当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薄弱的地方，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地方，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

4、党应当更加关注开展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必将给予正

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革命化影响,使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由于满洲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5、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洲地区、在毛泽东、贺龙活动的地区。……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

指示信还要求中共“应当全力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级。”

这封信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虽有正确的地方,但总的来讲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对任务的规定,也大大超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当时革命力量所具有的能力。这封信在中共党的贯彻和落实,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如同死灰复燃,它直接导致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产生。

1960年周恩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到了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第三种力量。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

●李立三头脑大发热

在中共“六大”之后的两年时间里,由于全党的努力,革命力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上半年,城市的工

人运动有所复兴,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农村,已建立起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已建立并发展到14个军10万人左右,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的部分地区。

在革命的客观形势方面,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千百万工人群众的失业和农民的破产,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危机的恶果转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身上,又引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从中国的形势看,南京蒋介石集团和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军阀集团之间,从1930年5月开始爆发了一场中原大战,削弱了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如果能正确利用有利时机,是可以进一步壮大革命力量的。但也应当看到,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并未因内战和危机而处在崩溃的境地,敌强我弱的形势一时还不可能改变,因此,当时还不具备发动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条件。

然而,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十月指示的影响下,未能正确估计革命形势。自1930年3月周恩来出国赴莫斯科之后,党中央主要由李立三起决策作用。他先后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了一套“左”倾错误观点,把党引向了冒险主义的道路。

6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

李立三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到了我们前面来。”他说:革命高潮的到来即是暴动形势的到来。直接革命是什么?就是暴动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而最有可能首先爆发这种革命高潮的地方,便是上海或武汉。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接下去又将掀起

世界革命的高潮。

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这个报告，制定并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强调，在革命急剧发展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争取广大群众，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地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

决议说：

“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的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决议还宣称：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6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发出请示信，说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革命形势，中央坚决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

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第二次“左”倾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内部占据了统治地位。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这时头脑还比较清醒。他们在看了这个决议之后，不同意发给全党。他们对李立三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共产国际正在讨论中国问题。中央仅仅根据一个人的报告，便作出这一决议，将来发生问题怎么办？第二，现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向忠发、关向应都病了，你们通过这一决议，将来政治局内部发生不同的意见，如何办？根据这两点意见，决议无论如何不能发出去。

二十日，远东局又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在你们代表还在讨论时，你们又有一新的决议”，“在国际已有决定时，为什么不可以等国际决议呢？”信中还指出：决议的第三部分《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是错误的。

远东局给李立三发热的头脑泼的这盆冷水是正确的。但是李立三不听劝告，说：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中共中央负责。他还指责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有“一贯的右倾路线”，损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停止罗伯特的工作。

●红军各路兵马远征攻城

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命令根据地红军攻打大城市，二是发动和组织大城市暴动。

早在192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武装保卫苏联的第六十号通告，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的问题。

1930年2月26日，中央又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提出要在集中力量进攻的总路线之下争取全国胜利，首先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数省胜利的计划，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武装暴动，要求红军尽可能集中，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与城市工人斗争相配合。

1930年4月15日，中央军委制定了一个军事工作大纲，规定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加紧武装工人，准备暴动的军事工作，

最主要的是加紧武装工人，应从组织工人纠察队做起。还规定了向城市和交通要道进攻的方向。它并着重指出，在湘鄂赣交界的一个军团及江西的各部红军应向赣江下游发展，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争取武汉及邻近数省的首要胜利；在湘鄂西交界的一个军团，鄂东北的第一军，以及湖北的各部红军应向武汉发展；闽粤桂三省的红军应向广州城发展。

5月，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中央军委和全国总工会相继联合召开了鄂代会、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召集根据地和红军负责人来上海开会，商量如何统一行动，攻打大城市。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信，调集各路人马进攻武汉、南昌等大城市。

4月和6月，中央两次向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发出指示信。4月3日的信说：“目前的革命形势，就全国范围而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四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政治意义的红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6月15日，中央的来信批评红四军前委有“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错误”，要红四军领导人“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

同时，中央向其他根据地和红军领导人发出进攻大城市的命令。

于是，红军各路兵马离开苏区，冒暑远征，向武汉、广州、南昌等城杀来。其结果是城未攻克，反而损兵折将，苏区缩小甚至陷入敌人之手，根据地人民遭难深重。

在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27日晚攻入长沙，但占领不到一个星期，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扑下撤出长沙城。8月至9月，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组成的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率领下又一次进攻长沙。在强攻长沙的战斗中,红军战士勇猛冲杀,在一些地段突破了敌军的一、二道防线,但第三道防线是高压线电网,难于冲破。为了冲破电网,将没收土豪劣绅的和购买农民的几百条牛,在牛尾绑上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着火,使牛群向电网冲去。牛因火烧疼痛,乱冲乱闯,四处逃奔,不但没有冲破敌人电网,反而在敌人机枪密集的扫射下,有些牛被打死,有些冲回自己的阵地,造成伤害,影响了部队的进攻。此外,红军还买来许多群众打禾的禾桶,把每只禾桶安上两个轱辘,用浇湿的被子蒙在禾桶前面挡住子弹,战士在后边推着禾桶往前冲锋。但在有坚固设防的敌人面前,这种办法无效。于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不得不决定撤围长沙。在二打长沙的战斗中,红军伤亡不小,红一军团损失高级干部二人,中级干部数十,一般干部一百以上,战士一千六百左右,红三军团也损失不小。

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军执行“左”倾冒险军事计划,远离根据地,出击平汉线。在三个月的战斗中,不仅失去了机动作战歼敌的机会,也丧失了发展根据地和壮大红军的有利时机,使红军遭受不少损失。同时,又使根据地防卫力量空虚,给敌人进攻根据地以有利空隙,致使皖西六霍根据地、英霍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根据地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皖西地区失陷后,凶残的敌人在这—地区屠杀达三个月之久,一万九千群众和四百余名革命干部惨遭杀害,无数村庄被焚毁,大量财物被掠夺,可谓白骨蔽旷野,家家闻哭声。皖西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舒家庙、团墩、三尖铺、匡黄冲、郝家集、白衣庵、新店河、西河口、大化坪、千笠寺、漫水河、长山冲、独山、闻家店、燕子河、七邻湾、金家寨等,十屋九空,几乎成了无人区。

在湘鄂西,红二军团远离洪湖根据地南征岳阳、长沙。结果

不仅使根据地遭受损失,而且红军本身也损失巨大,仅杨林市一战,红军伤亡 2000 余人,其中第六军损失四分之一以上。

在闽西,“左”倾冒险错误执行的结果,把党团组织合并,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命令红二十一军远袭东江和攻打上杭,结果屡战屡败,士气低落。据当时的报告说:上杭战斗后,二十一军“大部队长及大队政治委员都要开小差,士兵开小差者日必数百,攻杭失利连纵队司令官都想开小差。全军由原来的 2000 多人锐减至 400 余人。”

在右江根据地,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转战于桂、湘、粤、赣边界,结果不但丢失了右江根据地,而且没有攻下一座城市。红七军由出发时的七千多人,减少到只剩下二、三千人。

● 追究周恩来责任与冒险总暴动

六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紧锣密鼓对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进行发动和布置。

1930 年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署的报告。他提出:他同江苏省委讨论后认为,南京兵士暴动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之起点;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以争取武汉首先胜利,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全国各省必须注意在各重要城市中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必须以总罢工为前提。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书共产国际主席

团，报告说：“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同时还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工作。这封信还请共产国际通知周恩来、瞿秋白速回国内。

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问题和长江局工作计划，又强调：“武汉首先胜利，必紧接着全国革命高潮。”

22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宣称行动委员会是党领导斗争最集中最有力的行动组织；在这一组织方式之下，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在行动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行一切命令；要求实现党员军事化和党的组织军事化。

7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但李立三在得到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消息后，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

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

李立三首先发言，说：

“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

他又说：

“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他进一步强调：

“我们如果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

在谈到全国武装暴动的部署时，李立三提出：“在这种形势下，我党应很快地成立中央总行委与成立南方局、北方局。”

参加政治局的其他人都附和立三的意见。

项英说：“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

最后，由总书记向忠发作结论。他指出：

“立三同志的发言完全是根据实际问题来作答复。这许多实际问题都说明党的路线之正确。”

他又说：

“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切右倾的危险。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向国际负责，同时应对革命负责。”

8月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会议的议程是“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

李立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他声称：

“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向忠发说：

“恩来同志尤其是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玉成进一步提出：“恩来同志回

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

会上还有人提出要求:

“中央对恩来的斗争必然是很坚决的,但必能以实际问题战胜其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不同路线,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很快地解决,就是同样可使革命更快地发展。”

8月5日,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武汉南京暴动和建立全国苏维埃的计划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又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

8月8日,向忠发又致函斯大林,请求联共(布)中央给中国革命切实的援助。8月10日,中央给长江局发出指示信,命令长江局迅速发展武汉党的领导力量,在赣东北地区积极组织湖口、澎湖暴动,占领马当要塞,切断长江航线,以支援武汉暴动。

14日,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29条政治纲领,表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

这种“左”倾冒险主义在白区特别是在大城市贯彻的结果,给党在白区的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极大的损失。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党的省委机关先后遭敌人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特别在南京,从6月到9月,先后有市委书记和市行动员会委员6人被捕,3个区委的干部全部损失,15个支部全被破坏,100多名党员被捕,近百名党员被杀害,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6次大破坏。另据不完全统计,仅1930年上半年,全国被捕58500人,被杀6220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大中城市。

●反“左”英雄横遭打击

李立三为了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观点,对党内执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打击何孟雄同志,就是“左”倾冒险错误在组织工作上的表现。

何孟雄,一名陈芳,生于1898年,湖南酃县人,是党的一位优秀干部和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后,他就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活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至1931年2月牺牲时为止,他一直在江苏地区工作。

李立三的一些“左”倾错误观点早在1929年11月就开始暴露出来。11月,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何孟雄对李立三不少观点公开的提出了不同意见。在革命形势上,他认为反动统治不是崩溃,只是动摇,现在革命没有日益走向高潮,也不是低落,只认为革命有高潮的前途;在党的策略路线上,他不同意李立三的进攻路线,认为要争取防御的进攻,加紧领导日常斗争,主张积蓄革命力量,不是进攻而是准备进攻,主张建立根据地。在这次大会上,何孟雄受到李立三的批评,被指责为“动摇总路线”,“割据观念”,是“调和主义”。

1930年2月26日,中央发出70号通告,把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到来作为党的最迫切任务,把集中进攻和组织政治罢工当作党的中心策略,并号召反对右倾调和主义。何孟雄的观点被李立三等人作为右倾调和主义的典型。《红旗日报》指责何孟雄为“调和派”。李立三亲自撰写文章,把何孟雄关于工人斗争暂时很难有很快的高涨的正确观点说成是“极危险的右倾倾向”。在1930年5月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上,李立三又以中央的名义打击何孟雄,把他的意见说成是“调和派的主张”。

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日益发展,何孟雄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斗争也越来越坚定。他在上海区委产业委员会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沪中区委会、市政委员会会议以及几批全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都批评李立三的路线是一条错误路线。

1930年9月1日,在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上,何孟雄当面批评李立三的领导路线。他明确指出:同意中央的总路线,但不同意一系列策略上的问题。他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份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占领长沙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已经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再发展下去就要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这些十分宝贵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他当场被李立三剥夺了发言权。李立三在会议结论中,指斥何孟雄为“取消派暗探”,是“机会主义”。会后,李立三还提出要开除何孟雄的党籍。

9月4日,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撤销了何孟雄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停止其工作。

9月8日、10月2日、10月9日,何孟雄三次向中央政治局上书,再次明确表示自己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意见。

但是,何孟雄继续遭受“左”的打击。9月10日,江苏省委书记以《反对何孟雄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其取消派的暗探作用》为题,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号召对何孟雄同志作批判斗争。9月22日和9月22日,中央以《右倾机会主义对于正确路线的进攻》与《两条路线的斗争》为题先后发表社论,指责何孟雄为隐藏于党的队伍中向党的正确路线进攻的取消派之暗探,号召全党批判。

随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但又对何孟雄进行点名批判。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告同志书》将何孟雄列为右倾路线的代表,号召全党集中火力批判。

10月28日,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不让何孟雄参加,并作出决议开除其后补省委委员资格。

11月20日,何孟雄再次写信给江苏省委并转中央,声称:“我反抗这一决议和开除我的省委并公开答复意见书,将意见书和文件转共产国际。”

此后,随着反立三“左”倾错误的深入,中央政治局于12月16日作出“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撤销对何孟雄的错误处分。

可是,随着王明的上台,何孟雄又继续遭受打击。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和王明的打击,何孟雄被敌人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壮烈就义。

第三章

从三十万到三万

- 一名“学生娃”成为中共领袖
- 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反“罗明路线”与邓小平撤职挨整●两位德国人在江西的较量

人造的灾难，可以使碑文风化吗？

然而，历史为何真实得太不像历史！

“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三十万饥寒交迫的红军官兵，艰难跋涉，征衣褴褛，伤痕累累，历经二万五千里险途，会师陕北时，仅剩三万余人。悲夫！他们来自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来自东方不再属于传说的传说，来自共产主义旗帜上一滴滴最红最鲜的血，来自王明猝然成为中共领袖后制造的种种“左”倾灾难与不幸。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罗明、邓小平、毛泽覃……到普通广大官兵，幸免于“左”祸者，更几人欤？分明是李立三已经“左”得发昏，却被王明们称之为形“左”实右。分明一错再错，却要错上加错。似乎，比“左”更左就是时髦，是真正的

革命,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于是,中间派成了“最危险的敌人”,要“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继续进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于是,对持不同意见者欲加之罪,不患无辞,帽子满天飞,甚至“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将他粉碎!”于是,一次次不幸连着不幸,血河汇进血河……

难道,只有灾难,才能诞生真谛?

难道,只有乌云深重,才能响彻新世纪的雷声?

那滑过晶莹叶脉的,是血雨? 是凉泪?

——何以眩目而今?!

●一名“学生娃”成为中共领袖

1931年1月7日,东方的“巴黎”——上海,细雨,街上一片寂寥、湿冷。

中共中央正在这里秘密地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这一天,对于王明(陈绍禹)来说,是一个喜日,他依靠共产国际代表密使米夫这个靠山,一跃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爬上中共领导最高层,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共的“领袖”。但对中国共产党员来说,这一天意味着新的灾难开始了。

王明,又名陈绍禹,安徽省金寨县人。1925年由湖北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王明因聪敏过人,能说会道,深受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器重。

这时,米夫已成为中国问题专家。1927年2月,米夫受联共

(布)中央派遣,率领一个宣传家代表团来华访问。米夫有意培养王明,把正在中山大学学习尚未毕业的王明带在身边作翻译,同去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访问,并让他出席了中共“五大”。以后,王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过两个月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他又跑到苏联,继续追随米夫。

当时,联共(布)党内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愈演愈烈,莫斯科中山大学出现了以代理校长、教务长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同以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的争权斗争,中国学生也卷入这场斗争。王明站在支部派一边。米夫从中国返苏后,利用手中的职权打击“教务派”学生,制造了一个“江浙同乡会”案,使中国学生有12名被开除党籍,4人被捕。随后因中共代表与联共(布)代表团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米夫对瞿秋白怀恨在心。

1928年3月,米夫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因为支持米夫上台,更加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随后米夫又安排王明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担任译员。随后,王明等人把尚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李剑如、余笃三等工人出身的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进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斗争。米夫和瞿秋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又产生尖锐的分歧。

1930年春,因为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错误地作出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份,并与共产国际书记处商定新的成分。共产国际还决定调瞿秋白回国工作。

至于王明,他于1929年上半年回国到上海后,既不去农村根据地,又不去基层,想方设法留在中央机关工作,先后担任了上海沪东区委干事、中宣部《红旗报》编辑、全总党团秘书兼《劳

动》三日刊编辑、中宣部秘书。

1930年1月,王明在沪西区一次群众大会上被捕。因急于出狱,王明竟违反党的白区工作纪律,托巡捕带信到中央宣传部接头机关找人保释,因此在1930年3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1930年7月9日,王明、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共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议上,就当时中央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等问题与李立三等发生争论。他们站在更“左”的立场上来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向忠发、李立三认为他们反对中央路线,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等3人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王明在以“左”的教条主义态度传播共产国际的一套“左”的理论时,还继续进行宗派主义活动。除了同从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人保持密切关系外,还企图拉拢其他一些人支持他,进一步暴露出他希望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伺机上台的目的。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在8、9月间讲的一些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恭之辞,传到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下决心把王明等“忠实”同志扶上中共领导的岗位。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发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示信到达上海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便先于中共中央把共产国际的这封给王明看。王明心领神会,为了表示自己紧跟国际,王明把原来写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子进行修改,抢先提出了“反对调和主义”的口号,按照共产国际定的基调,指责李立三犯了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并进而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要求。

1930年12月,米夫再次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他到上海后,马上单独召见王明,听取汇报,面授机宜。在米夫的授意下,王明一面与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何孟雄、罗章

龙等人分道扬镳，一面发表《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一文，为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瞿秋白人造舆论。12月25日，米夫以提拔反立三路线干部为借口，逼迫中央委派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博古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从而为他们上台做好准备。在此前一天，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意见，并将此上报给共产国际执委，很快得到批准。这样，米夫为王明上台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之下，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大部分代表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有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被拒绝在会门之外。

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里10点多钟，只举行了一天。会上各执己见，争论激烈。米夫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通过了他所提出的政治、组织诸方面的决议。王明终于取得了中共中央领导权，达到了他们的预期目的。这次会议的结果，引起了中共党内的一次分裂。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米夫把会议上反对王明上台的一部分同志找来开会，极力美化王明，称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他一再强调共产国际是绝对正确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体现共产国际路线的。他声言：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王明进入中央后，又把同他意气相投的教条主义者安插到从中央至地方的各级党组织领导岗位上，其中博古担任了团中央书记。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身亡，王明代理中央总书记。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1月10日，王明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国内工作则由同年9月下旬成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从此，王明在莫斯科遥控中共，博古等

人则贯彻执行万里之外的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

王明在上台之后，积极推行一条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左”的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上，不承认中国革命还处于低潮，过高地估计中国革命形势，认为中国革命“进入革命危机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他们要求“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强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保护苏联”。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政治决议案中写道：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新的尖锐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中国革命正处在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时期，继续强调“进攻”。

在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和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比重，夸大中国当时的革命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富农的意义，不承认中间势力的存在，主张整个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并提出立刻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打倒中间势力”的口号。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绝对化、机械地要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国共产党进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命令红军占领南昌、杭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将各根据地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在组织方面和反倾向斗争方面，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

断开展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他们把对“左”倾教条主义有怀疑、不执行的同志，一律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中央苏区，特别是在鄂豫皖、湘鄂西、陕北苏区，把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错误的肃反政策混在一起，使大批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遭受诬陷和杀害。

●毛泽东被剥夺军权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领统治地位后，便开始向农村各根据地贯彻推行。

在大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到1930年时，开始创造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时的毛泽东，目光敏锐、虎虎有生气。他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认为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的同志通过调查了解，才能办好。然而，这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所绝不能容许的。这样，他们势必要排挤和打击毛泽东，以便在根据地推行“左”的一系列错误方针和政策。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贯彻到中央苏区之前，毛泽东、朱德等人已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领导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反革命“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出现了大好形势。他们在军事上通过反“围剿”战争实践，初步总结出一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工农红军的作战原则，这包括：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是红军战胜敌人的好

战法。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是红军的作战形式。除了军事方面，还在经济问题、土地问题和其他方面制定出一套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1931年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会议（简称苏赣会议）。这是一次开始排挤毛泽东，贯彻王明“左”倾错误的会议。会议主张加紧反对富农、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实行过“左”的土地政策。尤其在军事问题上，会议要求红军应攻城略地，争取实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会议指责中央根据地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土地改革中执行的是“富农路线”；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犯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这些指责，明显地是针对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

为了排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中共临时中央决定：让毛泽东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另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其所属部队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也被撤销。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工农红军占领南昌等大城市。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人不顾毛泽东的反对，集中红军攻打赣州城。战役历时33天，红军腹背受敌、城未攻克，损失却很大，且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最后不得不以撤退告终。

1932年6月，曾一度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经过周恩来的反复要求，苏区中央局于同年8月同意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乐安、宣黄战役，并攻克乐安、宣黄、南丰三座城市，俘敌

5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

此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其他根据地的压力，并要求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宣黄间久待”。红一方面军前线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则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的错误。”他们还电告中央局：“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进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

这样一来，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周、毛、朱、王为另一方，在红军的作战方针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并迅速激化起来。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毛、朱、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这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中央局，坚持原来的看法。他们在复电中痛切地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没有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他们还指出：“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

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回电,蛮横地认定:“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几天后,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这就是党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与会的大多数人要求:“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的主要危险。”他们认为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

于是,宁都会议把主要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周恩来虽然在口头上承认“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出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于是,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是想把毛泽东留在前方。

但是,会上大部分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会后,苏区中

央局一些人对周恩来还表示不满，致电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本人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自己负指挥战争全责。结果通过了第一种方案，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毛泽东再一次被剥夺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2年10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委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反“罗明路线”与邓小平撤职挨整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因推行王明“左”倾冒险错误，使白区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因此，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迁入江西瑞金后，为了完全推行王明“左”倾方针，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斥和打击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于1933年2月中旬在福建省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罗明，1925年入党，长期在福建进行党的工作和组织农民运动。1928年2月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曾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回国后继续任福建省委书记。1932年3月，闽粤赣苏区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成立闽粤赣（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闽西的红军主力调往江西，仅留下3000人坚持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了闽西的大片地区，闽粤赣苏区的斗争面临着严重的

困难。

罗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正在这个时候，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斥的毛泽东同志，在汀州傅连璋同志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他仍时刻关怀着革命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安危。那时，我因奉命随中央主力红军进攻漳州时跌伤腰部，进医院开刀治疗。八月间得到好转后，毛泽东同志就找我谈话。他总结概括了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的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次日我出院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同志，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决定我任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我离开期间，由刘晓同志主持省委工作。

“我所经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都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检查和部署了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同志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由于我们按照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由于罗明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势必引起临时中

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的不满。于是，从1933年2月开始，他们对罗明进行批判，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关于这场斗争的发起，罗明同志本人后来回忆说：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先后经永定、上杭前往中央苏共首府瑞金。他们路经上杭白沙时，就指责我，‘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我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他们又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说没有听到传达。他们对此很不高兴。他们还问我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我回答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去年四月十四日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还没说完，他们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当时，我和许多同志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都很不理解。

“他们到瑞金后，就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被迫把县独立团、区独立连、乡独立排，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一时来不及进行补充。敌人便乘机向边区大举进攻。赤卫队由于缺乏地方武装独立团独立连的配合，眼看着敌人进行烧杀抢掠，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群众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对这样改编地方部队的做法意见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大主力红军确有困难。当时，上杭、永定、龙岩三个县城的敌人受到了我们三次重大打击之后，遂集中几团兵，三路配合进攻上杭的中心点白沙。我们接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照前次的经验，坚壁清野，暂时退出白沙。我们立即进行紧急动员，保卫革命根据地，加紧扩大地方武装，从四面包

围白沙，打击敌人。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决心打击和迫使敌人退出白沙。我们召开县级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随后，我们又和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同志一起开会，总结贯彻毛泽东同志指示五个多月来游击战争的胜利经验和分析当前斗争形势和任务。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里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和其他边县边区参考。因此，会后我连夜赶写关于上杭、永定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给省委。在此之前，我于一月二十一日亦到新泉了解情况，得知汀东的地主武装很猖狂，经常攻入苏区，还袭击我们长汀县委所在地河田。我从第四次反‘围剿’的全局出发，就长汀、连城和新泉的工作向省委报告，提出了几点意见（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显然。这个报告和意见违背了王明‘左’倾路线的要求，因而后来成了所谓的‘罗明路线’的重要‘罪证’。例如：我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一开头就写明对杭、永、岩工作另作报告。只提出对汀、连工作的意见，要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目的分明：一是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击敌人的‘围剿’；二是防止驻龙岩的十九路军向连城、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但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硬说我‘没有一句话说到闽西原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说‘根本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苏区根据地，向后方逃跑退却的’。为此，他们说我们‘退却逃跑’。这完全是违反当时的事实，断章取义的。这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到瑞金不久，就派出中央特派员到福建检查工作。他首先抓住我给省委的报告和意见，断定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直至红军长征，这一斗争才告

结束。”

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罗明同志后来回忆说：

“发动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我是在上杭看到《斗争报》才知道的，后来接到省委的通知，要我赶回汀州。

“途遇张鼎丞同志从汀州来，我问他，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说，他们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我说，我们工作上有许多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如果路线错误，为什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根据地能得到这样快的扩大，我们并没有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和边区应有所区别。就是在杭、永、岩边区也没有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那里是什么路线错误？谈到这里，两人对坐无言，十分愤激。

“我回到汀州，又接到通如要我赶往瑞金进行检查。到瑞金后，中央局几个干部找我谈话，批判我的‘错误’。接着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同我谈。我说，我自己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由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县边区参加游击战争，为何说是‘退却逃跑’呢？他们说，从路线上说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过去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打就变成‘游击主义’了。他问我，在边县边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我说，边县边区要进行游击战争，随时打击敌人的进攻，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采取三分之一的方法，逐步地分批地扩大主力红军。他当即武断说，这是‘富农路线’，你说听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么听吗？我说这是永定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还引了列宁的一段话进行反驳，列宁说：‘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家压迫的真正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

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后来,中央书记和我谈话,劈头就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他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最后他要我回福建,在省代会上进行检查。

“我在瑞金期间,住在叶坪中央局的一个房间里,不能自由进出。有一天晚上,就在附近召开了一个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气氛很紧,不断高呼口号,有个青年干部提出要揪我出去批斗,并高呼要把我枪决,后来中央局的杨尚昆同志上台讲话,作了解释,气氛才平息下来。

“福建省委于二月二十四日在汀州召开的省临时代表会,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央局派员参加,福建省委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贞等同志都出席了,我照党中央的决定在会上作了检查。会上虽然对我进行了批判,但是各地代表在讨论中仍有许多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说,新泉就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否则新泉根据地就不能巩固。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说,毛泽东号召开展游击战争是正确的,罗明同志和我们大家一起照毛泽东的指示打了好多次仗,取得了胜利。当时我们对敌人每次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都侦察估计得很准

确，打击敌人的部署很细致，如果各区乡切实这样做，可以使敌人受到更大的伤亡。当时中央代表插话说：‘对敌人的估计是一般参谋人员的常识，没有什么奇怪的。’上杭、永定的代表坚持赞成采取三分之一的办法逐步分批扩大主力红军。他们说‘留得红色区乡在，可以不断出红军’。大会中由中央代表作总结，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和撤销杨文仲同志的新泉县委书记的职务决定。杨文仲同志也曾经给省委写报告，汇报了新泉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他写报告和报告的内容我都不知道。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把杨文仲同志说成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并且怀疑和追查我和他有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光明磊落，彼此只有革命工作关系。杨文仲同志被批斗后调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后来在长征途中光荣牺牲。

“正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和三月上旬，我们中央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当时周恩来、朱德同志和中央主力红军的领导同志，在实际的战斗中发现王明左倾的军事路线行不通，所以坚决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原则，诱敌深入二战宜黄，缴枪万余，继续追击敌人取得了胜利。主力红军还在闽西连城地方武装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消灭了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收复了连城、清流、宁化等大片地区。但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反以为是他们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因此他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福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首先在省级机关展开，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一直搞到每一个支部、区乡。在这一斗争中，他们往往采取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和处理党内斗争，提出了‘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将他

粉碎’，‘无情打击’等等口号，不仅对我，而且对其他省委负责同志也是这样，例如中央代表就曾指着张鼎丞同志的鼻子说‘你张鼎丞之流，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也要‘用铁拳进行粉碎’，‘无情打击’。特别是当时是在一九三一年肃反扩大化之后，突然听到要与‘罗明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人就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罗明是‘反革命份子’。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许多很熟悉的同志都不敢同我和其他犯了‘罗明路线错误’的同志接近。

“当时，参加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志，不少并不真实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省委派李明光、黄宜章、张恩垣等同志到前线去开展这一斗争。当他们了解情况后，反倒同情起‘罗明路线’来了。有的随随便便应付了事，回去交差；有的抵制了这一斗争。例如，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军区政治代主任李明光同志不愿连城前线开展这场斗争，在错误路线压制下，不能打游击战，因而在同敌人硬拼硬打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们还贯彻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口号下，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几乎都不能幸免，例如，福建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同志，由于不愿检查所谓‘罗明路线’的错误，被指责为‘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来向党进攻’的机会主义者，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在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军区党代表大会上受到批判并撤销了军区的一切职务。张鼎丞同志由于不同意反‘罗明路线’而被扣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的帽子，被撤销了省苏维埃

主席的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同志是一九二六年的党员、广州全国农讲所毕业的学员，是龙岩党组织主要创始人，说他是‘罗明路线’的拥护者，不断遭到打击，经斗争后先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调到省军区宣传部，后来又调到一个地方去领导几十人修筑工事，最后把他调到军区当勤务员的教员，以后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病逝。省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同志和省团委书记陈荣同志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而受到批判。省土地部长范乐春同志，省军事部长游瑞轩同志，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同志，长汀县委书记李坚贞同志，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同志都被调离了原职，另行分配工作，其他县区的领导干部，也不断的受到批斗撤职，如永定县的罗禄山、关坤林等同志，武平委书记陈玉梅同志，汀东县委的玉珍、熊丁州等同志，都受到打击或撤换。总之，‘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各级干部大受其害。”

在福建反对“罗明路线”的同时，从1933年2月开始，临时中央在江西省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即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俟）、古（柏）的斗争。

在进行这场斗争之前，邓小平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毛泽覃是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和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俟任红军独立五师师长。古柏在江苏省苏维埃政府任党团书记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他们四人长期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的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工作，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3年3月，临时中央为了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同志，抓住所谓“寻乌事件”，把会、寻、安中心县委有计划

地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以打击进攻苏区敌人的正确部署，诬为“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把以灵活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进攻，说成为“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早在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即发表文章，进行反“纯粹防御路线”的舆论准备。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直接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议诬蔑“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单纯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会议还决定改组会寻安三县委和县委常委，开展所谓反“机会主义斗争”。这次会议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4月中旬，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召开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以总结全省三个月的工作为名，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把江西党内邓小平、毛泽覃、谢维埃、古柏为代表的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打成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对他们进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这次会议是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高潮。此后，这场错误斗争即在江西全区全面展开。

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压力面前，邓、毛、谢、古四人没有妥协退让。他们在总结会议上和所写的声明书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左”倾教条主义者便强行对邓、毛、谢、古进行组织处理，撤职，将他们调离，到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工作队）的工作，同时在江西全省从省委到区委、支部层层进行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

这场斗争历时一年多，给江西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这场斗争中，以邓小平、毛泽覃、谢维埃、古柏为代表的江西党内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遭到打击，江西省委、省苏维埃

政府受到错误的指责，一些县委被加以“改造”。特别是“左”倾的肃反政策与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混在一起，使大批优秀干部饮冤受害。至此，王明“左”倾错误在苏区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军队中得到完全推行，因而招致后来反“围剿”的失败。

●两位德国人在江西的较量

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在中国中部江西的土地上，进行着一场奇特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国民党军队，人数达100万，由蒋介石任总司令，由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任顾问；另一方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人数仅8万多，由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博古总负责，由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任顾问。

塞克特和布劳恩都是德国人。前者于1866年生于石勒苏益格，一直到1926年都担任德国军队司令部的长官。在国民党军队中的60名外国军事顾问中，没有谁象德国将军一样获得这样显赫的地位。后者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党员，曾入莫斯科陆军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受苏军参谋部和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他们两人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塞克特当时已是一位著名的将军，而布劳恩是一名士兵。

就这样，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在江西的决战，变成了两位德国人的较量。

在塞克特的参谋顾问下，国民党军队在苏区土地上攻势凶猛，并由工兵在每条山口和所有的公路干线修建战壕和小型碉堡，以巩固占领的地盘。几个月之后，就形成了一条警戒线，江西苏区日益缩小，濒临绝境。

布劳恩受到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尊敬，被授予指挥红军

的大权。他把在苏联学校里学到的一些正规战战略战术加以运用,对塞克特的碉堡政策实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命令红军战士建起一座座土碉堡,与国民党军队的钢筋水泥碉堡对峙。

结果,布劳恩被打败了。

1933年9月底,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黎川。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

虽然红军经过了浴血奋战,付出了重大伤亡,但未能抵挡住对方的进攻。到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中央苏区的腹地,兴固、宁都、石城相继失守。

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不得不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瑞金、雩都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

接着是坛坛罐罐大搬家,行动迟缓,贻误战机。湘江一战,8万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

其他各根据地红军也无法立足,先后进行长征。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军由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的30万减到3万、只剩下十分之一。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几乎是没顶之灾!

第四章

左倾屠刀下的万千冤魂

●整肃“AB团”大冤案○冤
杀万人○富田事变○陈毅险遭
杀害●闽西苏区“肃社党”大冤
案○事出有因○滥杀无辜○恶
果严重●湘鄂西肃“改组派”大
冤案○四次大肃反○大开杀戒
○幸存者不堪回首

逝去的一切就叫历史吗？

那么，就掀开这沉重的一页吧。字里行间，时间凋落成一片寂然，蒿草已在雪白的头骨上灿烂。但是，这千古一页深处，依然不息着凄厉而悠长的泣喊，似呜冤，似嘶啸，似喧咷，那是成千上万无辜英灵永难安魂的悲音。天高地迥，可以凄怆悲愤者矣。呜呼！

不忍卒读吗，请读下去：

三十年代前期，各革命根据地大规模肃反，怀疑一切，

帽子满天飞：“AB团”、“改组派”、“社民党”、“第三党”、“托派”……就连一同喝茶者，成了“喝茶会”，一起散步者，成了“并肩会”，一同饮食者，成了“麻花会”。于是，严刑逼供，大开杀戒。于是，互猜互疑，人人自危，一片恐怖。于是，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任意处决，杀自己人杀红了眼，冤假错案数以万计，就连肃反犹豫者，滥杀无辜者，也在劫难逃，直杀得山河失色，残阳如血！

肖菊英(陈毅前妻)在忧惧中死去。

百战百胜的红军名将段德昌走向刑场。

贺龙险遭不测。

身经百战的干部潘家辰在酷刑中呼冤声声，喊道：拿刀来，割开胸膛吧，取出心看看，是红是黑！

无数红军与苏区创建人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

一批批死难者面对自己人的枪口，临刑前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

有的仅一个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本连连长。有的提拔一批滥杀一批。有的杀得几乎全军没有党政干部了……风云开阖，何以物极不反？哀哉！悬在空中的是泪，闪在梦里的是星，星与泪之间，由远而近着纯金般的祭文与格言。直面吧，读下去，不要浩叹，也不必回答，请与我们一同，以后人的名义，向死难者，以及一同被杀害的森林般浩瀚的才智、赤诚、信念、向往，深深鞠躬吧！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整肃“AB团”大冤案

冤杀万人

整肃“AB团”主要是在赣西南地区进行。

1929年下半年，赣西有些地方在肃反中即开始抓“AB团”。

1930年“二·七”陂头会议后，抓“AB团”的面逐渐扩大。红一方面军在打AB团的过程中，从刘天岳、曾昭义、龙超清、梁鼎元、江克宽、周赤的口供里，“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总团部，段良弼、李伯芳、谢汉倡为其首要。”因此，肃AB团的矛头又指向地方。

1930年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AB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10月26日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简称省行委）发出指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必须“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赣西南的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此后，打AB团的活动即全面展开。

在整肃AB团的过程中，赣西南苏区把AB团说成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并已大量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庞大的特务组织。因此，从革命队伍内部一批又一批地肃出那么多AB团，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多“AB团”分子。是怎样肃出那么多“AB团”来的呢？最主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多种多样的严刑拷问，受刑不过就乱供乱咬，供了就抓，抓了再用刑，造成恶性循环，“AB团”越肃越多。



当时刑讯逼供,不是某机关某人在违法乱纪,而是领导机关提倡而普遍采用的手段。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的第20号《紧急通告》,在“最近破获赣西南AB团的经过”一题中说:“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万安县委破获,AB团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织,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党团特委和赣西南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这里叙述了逼供信的经过,也是逼供的历史证据。紧急通告还在“彻底肃清AB团的具体方法”一题中强调说:“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事实上,AB团就是这样肃出来的。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还有“所谓软硬兼施办法,软要诚恳,硬要庄严。所谓诚恳者,就是用言语编(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仅胜利一县就有120余种刑罚,“不招供,不停刑”。不仅要招认自己是AB团,而且还要招出AB团的组织系统;不仅要招认谁发展了他,而且要招认他发展了谁;不仅要招认谁领导他,而且要招认他领导谁;不仅要招认准备杀谁,而且要招认派谁去杀;不仅要招认何时暴动,而且要招认谁组织和谁指挥。就这样,不仅觉得

AB团到处皆是,而且是无孔不入的凶恶敌人,于是捕杀AB团之风,越刮越烈。

那么,AB团是怎么回事呢?1930年前后赣西南苏区有没有AB团组织呢?

江西历史上确实存在过AB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省党部占优势。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部分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发现江西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人“把持党务”,这是他要使南昌变成反革命基地的极大障碍。于是,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组织国民党右派组织——反共反人民的AB团。

AB团产生后的首要目标,是篡夺省党部的领导权。1927年1月1日至15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17名执行委员中竟占了14名。一些AB分子吵吵闹闹,说共产党包办选举不算数。段锡朋借机玩弄阴谋诡计,提出把选出来的17名执委再加一倍上报,由蒋介石转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办法解决,圈定谁,谁就当执行委员。蒋介石圈定的结果,得票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都被圈掉了,得票少的AB团分子,反而被圈进了省党部,于是AB团从此篡夺了省党部的领导权。

AB团篡夺了省党部后,很快把一些地主豪绅组织起来,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往各县、市。他们每到一地便纠集同伙,拉拢流氓打手,无恶不作,为所欲为,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

在江西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同AB团把持的省党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3月中旬,南昌市的党组织召开市民大会,公开揭露AB团反共反人民的种种罪行。同时宣布被封

闭的市党部恢复办公，它的机关报——《贯彻日报》继续出版。

3月17日，共产党邓鹤鸣率10余人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汇报和揭露江西AB团把持的省党部反共反人民的大量罪行，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大力支持。汉口《民国日报》于3月19日至25日，连续把AB团的罪行公诸于众。这给AB团分子以极大打击，大大鼓舞了江西人民的革命斗志。

3月30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作出了改造江西省政府的决定，由朱培德代替李烈钧任省主席，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任委员和厅长。消息传来，江西人民奔走相告，兴奋异常，趁势于4月2日组织了大暴动，一举打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

4月3日，南昌各群众团体3万余人在皇天侧公安体育场举行揭发控诉AB团罪行大会，并组织了裁判委员会，除了少数逃到京沪的AB团分子外，被捉到的30余名AB团骨干被禁闭起来，准备处理，没有被捉到的AB团分子不敢留赣，逃之夭夭。5月，以方志敏为首的共产党人，又重新召开江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组建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各县、市也随之变化。在这一段时间里AB团没有活动的余地，更没有重建和恢复之可能。6月，形势朝着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反革命的方向急剧变化。武汉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宁汉合作、蒋汪合流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善于投机钻营、望风使舵的朱培德投靠了蒋介石。他在6月5日“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后，立即公开倒向了蒋介石一边。他虽然释放了AB团分子，但一手操纵了“党务”、“政务”、“民运”大权，使AB团分子失去了重建或者恢复的条件。

1931年4月，曾经是AB团头子的段锡朋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奉中央开始清党，是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

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以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实。”段锡朋这段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所以,1930年前后,赣西南和其他地区并无所谓AB团组织,也没有AB团分子。

肃“AB团”,是大搞逼、供、信,造成的冤假错案。仅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中,就被肃掉4000多名AB团分子。如果加上地方党政各级干部,那么被肃的人就达上万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党的高级干部,根据地创始人遭到杀害。如李文林,这位东固地区江西省红军独立二团与四团的创建人,曾以党绝对领导军队而受到毛泽东的极口赞誉,当时已是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曾是当地抓AB团的带头人,特委决议中甚至有“实行赤色恐怖”的口号。连他却被定为AB团的首要人物,被逮捕了(后被杀害)。

富田事变

富田,是一个水秀山清的地方。它位于江西省吉安,永丰、兴国三县之交界处,属于吉安县管辖的一个村庄,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曾一度是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政府所在地。

1930年12月,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AB团口供中、发现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存一个AB团总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倡为其首要分子,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捉拿。

李韶九率领一个红军连队,“于三〇年十二月七日下午三时一刻到富田,李即把队伍摆在省行委门口”,“首先即将段良弼、李伯芳捆绑,同时原四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亦被捕,任心达、谢汉倡、金万邦、马络、周勉亦拘禁。”总前委只指段良弼、李伯芳、

谢汉倡是“AB团要犯”，而李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又由段供出金万邦、刘敌，周勉，马铭、任心达、丛允中、刘任化、李文林、段起风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从12月7日下午开始到12日晚，共抓120多人，据说其中有几十个“骨干”，11日还处决了24人。

12月9日，李韶九把省行委肃AB团的任务交给古柏和曾山，他带红十二军一排人，捆绑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前往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AB团。

因为12月7日晚刑审时，谢汉倡胡乱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立即通知刘返东固。刘敌9日接到通知，率一七四团第一营11日抵达东固。李韶九同刘敌谈话时，开口便说：“刘敌！你很危险？”刘问：“我什么危险？”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刘问：“供什么？”李答：“AB团哪。”刘笑着说：“你看咧，我象不象一个AB团？”李说：“是呀！我也不信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刘问李说：“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李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刘敌知道强硬的不承认会受酷刑，于是装出诚恳的态度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查，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李也装着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刘知道李韶九素来是一个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因而，认定李抓AB团是杀害赣西南干部的阴谋。但为了不被抓起来用刑，故意软化李韶九，向他表示，“我相信毛泽东、刘军长和你总不是AB团，我总认你们三位是追是随。”李韶九被软化了，又加之同乡关系，谈话后放刘回一营营部。刘敌越想越认为李韶九是借抓AB团之名搞阴谋。于是在12日晨立即和营长张兴、政委

梁学貽紧急商议,决定扣留李韶九,抓起刘铁超,让他们讲出阴谋。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捆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倡等所谓 AB 团犯,李韶九闻风逃走。为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诬为 AB 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倡率部于当日晚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二十军一排人的枪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 12 月 7 日至 12 日被捕的近百名同志。古柏、曾山闻枪声逃走。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

12 日当晚,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抓 AB 团有阴谋,“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13 日上午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与会的人纷纷控诉,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同时放出误捕的易尔士。14 日下午把队伍拉到河西的永阳市,15 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到总前委,段良弼到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红二十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富田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和敌人作斗争。

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将其定性为“AB 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要决心消灭“叛逆”。

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 1931 年 12 月 16 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AB 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 AB 团取消派。”苏区中央局在 2 月 19 日的第 11 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 AB 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 AB 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

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

当时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认为双方都有错误,应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予以解决。基于这种认识,项英一方面责成富田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过河西,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另一方面通知肃 AB 团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以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中央政治局于 2 月 20 日开会决定派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在代表团未达赣西南苏区前,政治局于 3 月 28 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富田事变的行动“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 AB 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4 月中旬,中央代表团到达,并以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性说: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中央政治局及其代表团的决议,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是敌我矛盾,因而,把遵照中央局通知,4 月间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网打尽,先后处决。对于 7 月间回到于都县平头寨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 AB 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都先后处决。甚至连为教育红二十军作出重要贡献的曾炳春及后任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红二十军战士,被编入红七军。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经过和结局。

富田事变发生的时候,正是蒋介石调动 10 万大军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紧急关头。这时对领导机关肃 AB 团的错误采取武装反抗的手段,无疑是错误的。特别是把队伍拉过河西,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分裂口号等,则更是错误的。对事变作出适当的纪律处分,无可非议。但当时认定事变为“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案。把参



加事变的大部分红军干部当作 AB 团分子，甚至把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等人当作 AB 团分子加以处决，则是极其错误的。

首先，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同 AB 团毫无关系。刘敌、谢汉倡、段良弼、李白芳、马铭、丛允中、金万邦、曾炳春、刘经化等，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赣西南组织暴动领导革命斗争的 leader 和骨干。他们不仅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而且是红三军、红二十军等江西地方武装的组织者与创始人，功不可没。毛泽东亲自指挥和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兵源是他们动员群众输送来的。毛泽东 1929 年 1 月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经过极端艰苦的转战于 2 月来到东固革命根据地，也是他们竭力给予帮助和支持，使红四军得以休息整顿一个星期，壮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力量。1930 年 5 至 9 月，毛泽东率领的主力红军不在赣西南苏区，这时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在他们领导下得到继续巩固和发展。总之，他们的斗争历史，投身革命的实际行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光辉业绩，证明他们同 AB 团毫无关系，“AB 团”纯系强加的罪名。

其次，事实证明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虽然把队伍拉往河西，使防地空虚，有错误，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也避免了红军互相残杀的悲剧。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对敌斗争的大目标上，始终没有任何动摇。省行委 1930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和 1931 年 1 月 1 日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都把对敌斗争作为前提进行了部署，实际上他们一直把发动群众，消灭敌人，攻打吉安作为活动准则。无论多么艰险的环境，没有任何一个人投敌叛变，而是始终如一坚持和敌人作斗争。这是有案可查的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历史已充分

证明，“反革命暴动”的结论，是不实之词，必须彻底推翻。

还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始终心向着党。在富田事变后第一次行委扩大会议上，他们就决定派丛允中随中央特派员易尔士去总前委，段良弼去党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经过。他们听易尔士说共产国际从1930年8月起，不再给我党经济上的接济，中央活动经费困难，扩大会议就马上决定筹集200斤黄金送给中央。在易尔士向中央的书面汇报中，也可证明有这件事。段良弼于1930年12月下旬即给中央写了较为详细的关于富田事变的书面报告，刘敌也于1931年1月11日给中央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讲述富田事变的经过，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中央给以处分，表示要始终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斗争。当易尔士指出他们提出的反毛口号错误，他们接受意见，承认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当苏区中央局通知双方都到中央局开会，用会议方法，分清是非，解决纠纷时，他们服从决定，按期到达。这一切都不仅说明他们同AB团、反革命格格不入，而且证明他们始终心向着党，一切听从中央和中央局的安排。

纵观富田事变及其处理的全过程，是非是清楚的，原定性是错误的。同时也可看到，富田事变的行动，也确有某些错误，如何看待他们的错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作分析。如果当年不以逼供信的手段抓AB团，绝对不会有富田事变；如果富田事变后按犯错误进行处理，今天也就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陈毅险遭杀害

在赣西南肃“AB团”的过程中，中央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红一方面军重要负责人陈毅同志，力主正义，坚持调查研究，因而被肃反大员李韶九怀疑，险遭杀害。

陈毅当时对富田事变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的。但是乱抓乱

杀现象越来越严重。他作为书记又不得不传达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的决定并组织实施。向来神情开朗、喜笑怒骂流于形色的陈毅忽然沉默寡言。他为被错抓错关的人重新甄别定案，一旦查无实据即予释放。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于1931年2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曾提到陈毅主持正义的事实，陈毅写信给他，要他去总前委如实陈述当时的情况，信中有“被诬枉的同志们暂时忍气，在将来我亦可代为申白”等语。

1931年3月9日，国民党对江西苏区和一方面军接连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围剿”。陈毅在赣西南特区委为反“围剿”做了大量工作，筹集粮草，组织运输，输送预备兵员，还率领兴国、宁都、赣县、于都等县的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对于肃反，他更了解内情了，便经常指示要认真调查，注重证据，不搞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对那些被乱抓乱押的人，凡无真凭实据的，他敢于下令释放，使那些干部和积极分子得以投入反“围剿”斗争。经陈毅之手释放的人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中央苏区》中，曹金山写的《陈毅同志救了我》，就曾写到仅于都一地一次就放了几十人。

这样就触犯了肃反大员。肖克1981年8月回忆说：“李韶九早已怀疑陈毅，有一次公开对人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陈毅听说，就公开表态：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

陈毅很坚定，却也感受巨大压力，因为李韶九当时是大权在握的人。陈毅常有去上级开会就象李文林那样永不回来的感觉。他的这种情绪自然为他年轻的妻子肖菊英察觉，日夜担忧。或许出于某种预感，她托人把陈毅送给她的一支派克金笔转送给她的哥哥。但没等金笔送到，就已出事。一次陈毅远出开会，临行又似诀别，陈毅告知肖菊英某日一定回来，如果到时候没回来，

就可能发生了意外。陈毅的确如期踏上归途，不料中途遇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陈毅与警卫员绕道步行回兴国城，回到驻地时，为陈毅日夜担忧的肖菊英已死在井中了。

1968年10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谈起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时的个人经历。他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团的团长，整了3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毛主席去打仗，就把红军的战费和他的几篇著作的油印稿交我保存。他对我说：红军的战费都在这里，还有我的几篇稿子，都重托给你了。我是很感激主席的。”

1932年5月，李富春、陈毅、吴德峰受命组成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省肃反委员会宣布：在过去红军肃反工作中作AB团分子杀了的官兵，尚未宣布而查不清楚的，其家属如在地方仍一律以红军家属优待。

●闽西苏区肃“社党”大冤案

事出有因

在赣西南肃“AB团”的同时，闽西苏区则从1931年1月开始，进行了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肃反运动，铸成了又一大冤案。

这一冤案的发生，有几个方面的起因。

首先，与中央指导上的“左”倾错误有关。

1930年8月14日，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占统治地

位的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其中第四部分为反对“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宣言》把邓演达的第三党说成是社会民主党，并说“社会民主党在中国组成的意义，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运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企图在中国革命的大风暴中，挽救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命运。”这样，把应该争取的中间势力即邓演达的第三党力量，看成为反革命组织。这为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

其次，1930年12月，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苏区首府龙岩和永定、长汀、坎市等主要城镇相继陷落，苏区内外的反动派趁机制造谣言，扰乱民心。同时，少数混入红军的异己分子在战斗失利时，鼓动投敌或逃跑。苏区党和红军的一些领导人对于困难局势和失败主义情绪看得过于严重，估量上发生偏差，“觉得干部、群众、军队都不行”，并且错误地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党和红军内部混入了反革命派别，主观地推测在敌人军事“围剿”的同时，“闽西的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及一切反动派也同样的活动”。这种唯心的推断，进一步助长了他们急欲在苏区内部开展肃反运动以扭转局势的意念。

再者，赣南苏区在1930年下半年开展的所谓肃清“AB团”的运动，对闽西发动“肃社党”也有一定的影响。闽西苏区的领导人实际上并不了解“AB团”为何物，也不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就错误地认定闽西也混入了“AB团”、“第三党”、“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等实际并不存在的反动派别，把苏区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与群众的消极情绪混为一谈，甚至把党内同志的正确批评也视为“反革命团体”的破坏。

闽西苏区的“肃社党”运动，就是在这种很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

滥杀无辜

1931年1月,红军新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会上,有人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这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的紧张,并据此逮捕了十几名红军指战员。这是闽西苏区捕获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分子。

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的联合组织,在初期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后来堕落为修正主义。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展开了斗争,后来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在纪念他们的大会上,一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杂历史缺乏知识的青年军人呼喊上述一类口号,是不足为怪的。

但是,这一本来就不甚重要的事情却引起了新十二军和闽西党组织一些领导人的惊慌。他们不作实际调查便认定有一个潜伏在苏区专事破坏活动的反革命派别。他们对被捕者严刑逼供,受刑者不堪忍受,便胡乱招认,以致案情愈来愈复杂,审理不清,一起起冤案便由此发端,终于酿成了一场波及整个闽西苏区和红军的“肃反”运动。

首先遭到无辜拘捕的是原新十二军第一〇〇团政委24岁的林梅汀,他被指控为“社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其余还先后逮捕了60多人,他们大多是红军或地方政府的领导骨干。

1931年2月14日,闽西各县裁判肃反委员会联席会议分析与研究了苏区与红军内部情况,作出错误判断,确认“最近各县各地苏维埃区域以内红军发现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的暗藏活动”。联席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势力进攻苏区的危险,情况非常严重,必须立即“加紧健全肃反组织,担负迅速肃清苏维埃区域

内的各种反动派别的迫切任务”。

一个星期以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裁字第一号通告，强调肃反工作在当前已十分紧迫，“如果我们不能根本肃清内部反动势力，即无法巩固苏维埃政权，更说不上巩固全国苏维埃根据地，猛烈向外发展，完成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任务。”通告要求各级政府立刻根据闽西政府最近颁布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等反动政党的罪恶与事实，在各地严密清查这些暗藏活动的反动派，“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

随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裁字第二号通告，对捕获的“社党”作出处罚规定：“社党”的主要负责人应连同其口供押解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一般的成员由各县政府裁肃委员会处理；对其重要负责人，应扣留严办，一般成员在公布其行为后，令其自首，处以禁闭与警告。这个通告特别强调：“千万不能轻易处理。”在此前后，闽西苏维埃政府还曾发布《反动政治犯自首条例》，规定凡在半个月內自首者，不论其职务高低，概行免于处罚。这些规定，虽然都错误地认定在苏区内存在着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但提出的“惩办”原则，还比较宽容，也讲究一定的组织手续。然而，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这些规定实际上并未真正执行。

闽西苏区的“肃社党”运动，在最初的两个个月打击而还不是很大。但在3月1日以后的几个月内，“肃反”的调子越唱越高，成千成百的所谓“社党”分子被逮捕或处决，在革命队伍内造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局面。

3月1日至2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县虎岗召开“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审判以林梅汀为首的34名“社会民主党党魁党员”，其中包括所谓“社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特派员、青委书记”等。从当时的现场报

道可以看到,许多被告由于刑讯而伤痕累累,被告的“供词”也有明显的矛盾和纰漏。3月2日下午,林梅汀等17名“主犯”被判处死刑。他们在临刑时,忍受着极大的冤屈与痛苦,仍然高呼“打倒社会民主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

在这次审判大会上,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主审林一秩宣布,从军队到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大部分已经破获,号召各地代表回去之后,“要继续努力去破获未被发觉的社会民主党和机关”。大会还宣布了对“社党”分子的两条惩办原则,概括起来的意思是:一,对已捕获的“社党分子”,凡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二,在社党内负有“重大责任者,处以死刑”;三,潜藏在党政军领导机关内的“社党分子”,也处以死刑。

从此以后,闽西苏区的“肃社党”运动进入了更为严重的状态。

3月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各县指出,自从在新十二军发现“社会民主党”以后,“半个月来迭次破获该反动组织政党的各县组织,捕获很多的反动首领”,这表明闽西的社会民主党问题,与赣西南的“AB团”同样严重,已不是局部的问题了。因此,“社党”问题在目前敌人向苏区进攻的形势下,是我们最大的危机。闽西苏维埃政府号召,整个苏区一致动员起来,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这个通告还指出,各级政府决不能姑息或感情用事,如果“对于这一工作还采取姑息态度,而不能坚决积极的执行领导群众一致动员肃反,这是非常错误的危险倾向”。

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发出通告,要求各县健全和加强各级肃反机构。一些品质恶劣和投机取巧的分子,为了给自己捞到政治资本,满足权力和私利的欲望,不惜出卖灵魂,栽赃陷害。这些人以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骗取了党的信任,分别充任了闽西苏维埃政府及一部分地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在他们

把持之下,制造了无数的冤案。

在“肃反”初期,捕杀人犯还要报请闽西政府批准,后来捕杀的犯人越来越多,闽西政府来不及审批,作出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于是,肃反的权力层层下放,苏区的一切组织与机关,甚至医院,都可以随意抓捕审判“社党分子”。其结果是:“革命的秩序、革命的法律完全丧失其作用,因此肃反的权限有时会并且已经落入过反革命的手中……这样‘肃反’的结果,更是不能令人设想了。”为了加紧肃反工作,闽西苏维埃政府限令各地在两个月内肃清“社党”,否则“应该受公开的批评”。

在这样的气氛下,各地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都积极执行上级指示,有些地方还层层加码,以示斗争坚决。改组以后的永定县委曾作出这样的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各机关不坚决执行的应该彻底改造”,并把“在反社党工作中仍表现犹豫的坚决清洗出党去”。实际上,只要有人被认为工作不力或犹豫不定,就会被立即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不加调查审讯而草率处决。因此,人人自危,大家都要表现出积极努力,不甘落后以自保。肃反工作成了党政军机关和一切团体的中心,愈演愈烈,而“一切肃反工作中心都放在逮捕、审讯、处决上头,且还靠刑讯,极端缺乏思想上的斗争与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并以捕人最多处决人最快的为最坚决,于是有屈打成招的,有乱供的”。

1931年4月4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央,根据闽西的报告,对肃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在“肃反”斗争中反对右倾,认

为“右倾在党内和群众中要看成是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要给予无情的打击”。

中央的指示信,加剧了闽西“肃反”的进一步扩大化。“肃反”的对象不仅限于从口供中得到的名单,而且把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消极落后的同志也一概视作“社党分子”而加以清洗,其理由是因为“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分子,但实质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此外,过去曾经执行过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同志,也一齐被列为“肃反”运动中的打击对象,其理由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与发展,主要是因为……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显然,这场运动反映了浓厚的王明“左”倾宗派主义色彩。又由于在肃反运动中同时贯彻所谓“反富农路线”的错误方针,因此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同志,也根据“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的理论,进行清洗打击。这就把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滑入了唯成份论的歧途。而且各机关单位在侦破审讯中,实行逼供信,单凭被捕者的供词,“而这些供词的真实与否,只有凭着‘估量’”,在审讯中,“偏于肉刑‘苦打成招’的事实,确是有所不免。”

在“左”倾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闽西苏区在半年多时间里,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党团组织与红军部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共永定县委由于在“肃反”的开始阶段抵制了“左”倾错误,其领导人先后被逮捕或免职,县委被改组。4月28日下午,永定县委在党团联席会议上又宣布县委书记张觉先、县苏常委郑世明等13人犯有“社党”罪或工作消极,予以逮捕或开除。5月15日,杭武县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了所谓“社党杭武特委书记”伍超然等11人,其中大多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只有16岁。类似上述各种处

分、逮捕与公审处决，一个时期内在闽西苏区的各个县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至1931年5月，先后两次破获“社会民主党”的闽西特委，两次破获“社党”闽西青委，四次破获“社党”龙岩县委，两次破获“社党”永定县委，两次破获“社党”新十二军军委。甚至在少先队、儿童团也多次破获、社党组织。

在“肃反”运动中被整肃的对象，主要是红军连排长以上、地方政权区以上的干部。苏区最高政权机关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中，大约有半数以上先后以“社党”罪受害。

至5月中旬，闽西苏区逮捕“社党分子”多达一千六七百人，其中有六七百人被处决。这些被害者，有80%是党员与各级干部。其中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域的早期创始人，如后田暴动领导人陈品三、陈锦辉，永定暴动的领导人卢肇西、曾牧村，武平小澜暴动领导人张涤心，长汀早期党的领导人段奋夫等。

共青团组织受到的破坏更为严重。7月12日，共青团闽西特委在给苏区团中央局的报告中说：“经过六月份积极肃清社党工作，及最近两星期来，赤裸裸地现出闽西团内社党分子堆塞着，团依然是极严重的状态。”这个报告甚至认为，“旧的团员大部分不是我们的团员了。龙岩全县可说没有团员了。其他各地可说每个支部都有社党分子，有的甚至于全支部都是。干部方面上下层团的干部都是社党分子，部分在改组时是社党分子，经手提拔的也是社党分子。”

经过这样反复不断的洗刷之后，闽西团的组织几乎陷于瘫痪。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够勉强维持工作。因此，“团的教育工作、组织生活及执行中心任务，发生活动能力上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头绪。”

当红军抗击国民党第二、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情况下，大批红军的优秀指战员在“肃反”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红军新十二

军的战斗力严重削弱。中共闽粤赣特委在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新十二军在“肃反”之后,“内部的确是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兵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

闽西苏区大规模的肃清“社会发主党”的运动,前后延续大约一年多时间。在这一非常事件中,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减为5000。至于受害人总数,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统计,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查明在肃“社党”事件中受害牺牲者有6352人。对于一个总人口仅为100万左右的闽西苏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加上判刑关押、被迫逃亡和受牵连的家属,就更为严重了。

恶果严重

闽西的“肃社党”运动,造成枉捕滥杀,闹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因而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恐慌。不少干部和红军战士被迫逃亡,有的则在当地群众帮助下越狱脱险,或避居山林,或漂洋过海谋生,也有一部分走了抵制甚至武装反抗的道路。

1930年春,原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部长傅柏翠,由于党内意见分歧,不接受组织分配的工作。中共闽粤赣特委没有对他坚持耐心的说服教育,采取了惩办主义,不仅将他开除党籍,而且派重兵围攻其家乡上杭古蛟地区,致使他走上武力对抗的道路。当时,苏区内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肃反”斗争,一些被怀疑和追捕的“社党分子”也曾被迫藏匿于傅柏翠控制下的古蛟区。

由于这些原因,闽西苏维埃政府于3月6日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为闽西“社党”的首领,古蛟区是“社会民主党巢穴”。事实上,这些指控纯属捏造,傅柏翠一再声

明：“我不但不是‘社党’的头目，而且‘社党’这个组织是否存在，我本人也是怀疑的。”对于这一点，主持苏区肃反工作的邓发后来在经过延安整风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之后，在1945年也明确地指出：“今天来看，不仅当时全国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连傅柏翠本人是不是也难说。”

1931年5月下旬，杭武县第三区又发生“坑口事变”。

杭武县第三区（现归属上杭县溪口乡、太拔乡）在“肃反”运动中，区委书记何登南、县直属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近200人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拘押于坑口和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第三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对此极为愤慨。为了抵制和反对上级乱抓乱杀，营救被关押的战友与乡亲，他们于5月27日扣押了正在当地检查工作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写手令释放被关押的所谓“社党分子”。

当天晚上，李真率领第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时，派一部分武装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带回家乡释放。

中共闽粤赣省委得到消息，立刻认定这是“反革命暴动”，调动红军新十二军包围杭武第三区，搜捕和剿灭第三大队与刚被释放的人员。5月29日，第三大队除少数人逃亡以外，大部被缴械拘捕，被释放的人员也再次被捕。同一天，中共闽粤赣省委对此作出决议，认为坑口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因此要特别加紧在红军、工农武装部队中的肃反工作，“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设法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的处决。”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被捕的大部分指战员，先后被处决。罗寿春也在9月间被指控为“社党闽西特委组织部长”而被外决。

苏区军民对这种错误的“肃反”极为反感压抑着强烈的反抗



情绪。在“坑口事变”被镇压之后第四天，杭武县第二区的部分干部群众与地方武装，又于6月1日发生事变。在此前后，永定溪南和虎岗附近，也发生过类似的反抗行动。

由于“肃反”问题日益严重，闽西局面愈趋恶化，终于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31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对于闽西苏区如此大规模捕杀“社会民主党”表示不满，指出为什么“社党”分子“既然能广泛的深入我们的党团和红军中去，经迭次破获和逮捕之后，仍然时常发现他们在我们组织中活动？为什么一部分被欺骗的群众抱着观望的态度不能自动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产党？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从你们的一切文件中找不到这些问题最圆满的回答。”

中央来信对闽西各级领导机关震动极大。9月29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九十七号通告，宣布林一株为“社党”行委书记，还宣布原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8个也属闽西“社党”组织上层领导成员，分别处以死刑。当然，说林一株是“社党”首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他一直把持肃反大权，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早已为人民群众所切齿，逮捕并处决林一株，对于稳定混乱局面，平“肃反”错误是必要的。至于处死罗寿春等人，则未免草率。

1931年11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闽西肃反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指示必须立即纠正这一错误。

同年12月，前往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由上海经粤东进入中央苏区。周恩来在闽西目睹了错误的“肃反”运动所造成的混乱，非常愤慨。12月18日，他在由永定赴长汀的途中致信中央，严肃指出了闽西苏区肃反工作的严重错误。周恩来

在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非常严重。”他还指出，闽西肃反工作靠的是刑讯逼供，“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他认为，目前问题已很严重，转变很是困难，决心“与此严重问题斗争”！

周恩来的到达以及他给中央的信，对于进一步纠正闽西错误的“肃反”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月以后，中共中央专门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指示信。中央指出，中央曾一再指出闽西肃反工作的严重错误，然而闽粤赣省委“始终没有注意中央的指示，而继续着过去的错误。这种错误在闽西苏区内现在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现象，若不及早纠正，闽西苏区的发展与巩固是绝对不可能的”。

1932年2月19日，苏区中央局致信闽粤赣省委和即将召开的省党代表大会。这封信“根据苏区党大会后闽西工作的情形，根据周恩来同志经过闽西时的考察和这次李明光同志来中央的报告”，再次指出了闽西“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要求闽西苏区切实遵照中央和中央局对闽西的历次指示，坚决纠正。

闽西党组织在经历了一年多错误的“肃反”运动的严重破坏，得到了十分沉痛的教训，决定进行严肃认真的反省与总结。1932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作了检讨，痛心的认识到，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没有从阶级力量的对比上来观察社党、托派，夸大了社党的力量，不相信几年土地革命斗争的力量，这就发生了唯心的推测，和肃反中心论，甚至对党员、对群众都不敢相信。”

紧接着，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2年3月18日在长汀召开。在大会决议中，再次总结了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错误的沉痛教训，向全苏区军民作了公开的检讨。至此，祸害



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肃“社党”事件,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湘鄂西肃“改组派”大冤案

四次大肃反

从1932年1月至1934年夏,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湘鄂西的代表人物夏曦以肃清“改组派”的名义,进行了四次大“肃反”,冤杀上万名红军和根据地优秀干部。一并冤杀的,还有他们大海般浩瀚的才智和忠诚。

1931年以来,“左”倾中央就多次发出文件,要求各根据地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加紧进行“肃反”。同年7月,夏曦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无中生有地说:“改组派在苏区内颇活动……并已逮捕了一部分人。已组织保卫局,惟反改组派宣传还不够得很,秘密的政治保卫工作还未建立。”夏曦向中央报告湘鄂西苏区“改组派颇活动”的时间,是他到根据地工作仅仅四个月。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决议断言:“在立三路线的统治之下,在各苏区内的党实际上执行了十足的富农的机会主义路线,地主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没收,所有土地革命的果实,也完全落到了富农的手里,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等机关也很多为地主富农分子把持着,执行他们的意志。”基于对苏区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阶级状况的这种错误估计,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将党内持不同意见者都视为“反革命”,把革命队伍中一般违犯纪律的现象,或在实际工作中的一般错误,也都当作“反革命的阴谋活动”。这就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必然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大地造成严重混乱和严重恶果。

夏曦在中共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下达前，就逮捕了一部分“改组派”，本来就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但是，中共中央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反而批评中央分局“还没有进行有系统的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局形同虚设，还没有建立它的独立工作系统，在苏区内还隐藏不少的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白报会、硬肚会等，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坏，他们正在积极地进行反革命的工作”。在中共中央一再催促下，1932年1月召开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将肃反任务明确提到日程上来了。决议案认为：“苏维埃政府对于肃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湘鄂西苏区的改组派活动非常厉害，这是反革命来消灭苏维埃红军的主要阴谋，还须动员广大的群众来肃清这些反革命。”关于红军中的肃反工作，决议案说：要“加强红军中的肃反工作，清洗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应该马上执行。”

1930年以后，江西苏区开展了大规模肃反活动，以及发生的富田事变，更使夏曦觉得草木皆兵，到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与此同时，张国焘在鄂豫皖搞肃反扩大化的“经验”，也传到了湘鄂西苏区来，夏曦都奉若至宝，全盘接受，贯彻执行惟恐落后。1932年4月，夏曦以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其中写道：“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肃反的教训，很严重地教训了我们。各种反劳动保护的派别，如改组派、AB、第三党、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罗章龙派、他们总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就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

对于夏曦和中央分局关于加紧肃反的指示，湘鄂西省委立即执行。夏曦将中央关于肃反的电报交给杨光华后，杨光华当即召集省苏维埃主席崔琪、省委组织部长杨成林，省委委员、省苏

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彭元玉,少共省委书记周美童,省委委员、宣传部长万涛,以及林电岩、宋盘铭等人开会;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杨光华亲自起草的关于开展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以省委的名义密令各级党委,加紧进行肃反。同时,省委向各县派出干部,检查和督促各地肃反工作的开展情况。

在造好舆论,建立起“肃反”组织的情况下,夏曦和杨光华便进行第一次肃“改组派”行动。

1932年5月上旬,红军在襄北作战时俘虏了一个叫张锡侯的国民党下级军官。省委政治保卫局审讯时,有人指认他是奸细,张锡侯开始不承认,经严刑逼供,张锡侯受不了皮肉之苦,便承认自己是什么“统的国民党”的成员,还承认与中共天汉县委军事部长杨国茂是同乡,又是同伙。政治保卫局轻信口供,便将杨国茂逮捕,并调朱勉之任政治保卫局审判长,对杨国茂、张锡侯继续进行严刑逼供,杨国茂承认和张锡侯是同乡,说张锡侯是被驱逐出苏区的一个富农分子。夏曦、杨光华对张、杨的口供很不满意,于是逼供更甚。后来,在严刑拷打之下,杨国茂又供认苏维埃政府和红三军中的一些人与他们是同伙,准备5月28日在苏区发动武装暴乱……

对于杨国茂、张锡侯在严刑拷打下的供词,夏曦、杨光华等人不调查,不分析,便命令政治保卫局按杨国茂供词抓人。政治保卫局在夏曦、杨光华的支持下,对于与此案有关的人实行逼供信,于是一株连,层层捉人,被捕者涉及苏区党、政、军各级机关干部,甚至红军战士和普通群众,也成了肃反对象。

为了领导肃反工作,又专门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由省委书记杨光华和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成林参加的肃反委员会。负责肃反具体工作的是不受党委领导、监督,有独立工作系统的政治保卫局。只要夏曦、杨光华一句话,政治保卫局就可以将被审查对

象逮捕或处决,甚至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级干部、红军的高级将领也不例外。政治保卫局在办案过程中,采取的是逼供、诱供、提名问供的方法,凭屈打成招的口供,罗织罪名,定案处理。由于采用了这种错误作法,第一次“肃反”就打击了一大批苏区党、政、军领导,被逮捕、处决的“改组派分子”、“反革命”之多,令人难以置信。1932年7月,夏曦就第一次“肃反”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自省四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对于肃反已有相当的注意。五月间开始在天汉县(汉川之襄北天门之东的区域)破获,继在三军八师破获,以至破获三军中全部反革命组织,又因此线索破获全苏区整个反革命组织。现在可以说,反革命的全部组织已经破获。第一次“肃反”被打击的省委委员、省苏维埃执行委员、部长以上的干部即有二十三人,工作人员约四五十人,党校学生半数以上是“反革命分子”。夏曦认为,宜昌、湘鄂边特委,江陵、沔阳、川阳三县的党组织,均为“改组派”所包办;江南县委除一名书记外,其余均是“改组分子”;监利、荆门、潜江、天潜、天汉、云孝县的党组织内,均有部分“改组派分子”;只有监利县委比较“纯粹”。在红三军中,被夏曦定为“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二十八人;省军委机关中有二十三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党校学生中的半数被定为“改组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各县、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改组派分子”的一般干部,就难以尽数了。

需要指出的是,夏曦、杨光华在湘鄂西苏区进行的“肃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肃反”之名,打击那些对王明“左”倾路线及其执行者持反对态度的苏区政党干部。在湘鄂西第一次“肃反”中,被诬陷杀害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怀疑中央分局路线的正确,提议取消中央分局与进行反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斗争……首先是暗藏党内的反革命分

子。”因此，“反国际路线的斗争，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应遭到严重的打击。”

二是“右倾机会主义”保守逃跑、等待一切，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在苏区四周兜圈子的波浪或推进，不去发动群众的军事投机是阻碍革命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应受到严厉的无情的打击。”

三是“调和派企图替机会主义作辩护的工具或是抱着党内和平心理，不愿得罪人的敷衍主义，对于仇视批评和怠工抵抗党的批评分子，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

四是“红军中应当执行严格的集中军事纪律、任何执行上级指示的怠工与反抗，都要无情的予以制裁。”

除了上述几种类型的干部、党员和红军指战员需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外，凡是历史上同汪精卫的“改组派”成员，邓演达的“第三党”中某些人有过合作或共事关系的党、政、军负责干部，统统作为“肃反”的对象，予以怀疑、打击和迫害。

从1932年8月至12月，夏曦又在湘鄂西进行了第二次大“肃反”。当时红三军干部战士正在七千里大转移的长征途中，夏曦一意孤行进行“肃反”。这次“肃反”也称“火线肃反”，所打击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三军指战员。

本来，第一次“肃反”之后，夏曦曾经宣布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改组派”等“反革命组织”已经全部破获。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一九三二年“五月间开始在天汉县（汉川之襄北、天门之东的区域）破获，继在三军八师破获，以及破获三军中全部反革命组织。现在可以说，反革命的全部组织已经破获”。夏曦的这个报告写于1932年7月上旬。那么，在宣布破获了红三军中全部反革命组织之后仅仅几月，为什么又要进行第二次“肃反”，即所谓“火线肃反”呢？这要从“左”倾中央对湘鄂西

中央分局的指示说起。

1932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接到夏曦于7月份起草的报告后,专门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出了一份关于肃反问题的指示信。“左”倾中央一方面肯定了“湘鄂西党在这次(按:指第一次“肃反”)肃反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是正确的”,同时,又批评中央分局“没有有能够在斗争中加紧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中共中央的上述意见,支持和肯定了夏曦大搞扩大化的肃反政策,这对于已经被诬杀了一批高级将领的红三军来说,无疑又是一场劫难。对于夏曦来说,谁要反对以他为首的中央分局哪怕是持批评态度的人,谁就是反革命,谁就在整肃之列。这后一个原因,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已在第一次“肃反”被诬杀前就直言不讳地说:“这次肃反是派别斗争,凡反对中央分局的分子,均已肃捕,几个师长一定会向中央报告。”胡慎已的想法是过分天真了。他不知道,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大搞“肃反”,大开杀戒,正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的支持下干的。红三军的几位师长在没有来得及向中央报告之前,就已经被夏曦列为“肃反”的对象了。

所谓的“火线肃反”,是从杀害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开始的。

湘鄂西苏区沦陷前夕,曾经任省委政治保卫局审判长的朱勉之突围到了大洪山,找到了红三军。贺龙、关向应为了让干部们了解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形势,便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由朱勉之在会议上介绍鄂西反“围剿”斗争和洪湖沦陷的情况。朱勉之在第一次“肃反”中的表现很不好,夏曦、杨光华在“肃反”中制造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他是有责任的。但他在全军团以上干部面前,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万涛、彭之玉、彭国材等人在“肃反”中被诬杀的具体过程。会议上,在有的干部追问下,朱

勉之还详细介绍了夏曦在“肃反”中采取非正常手段，政治保卫局、审判庭大搞刑讯逼供、株连无辜、乱开杀戒的情况。他还着重揭露说：有些干部被处死，并没有经过法庭审判，是夏曦、杨光华让政治保卫队持他们的手令擅自处决的。特别是洪湖沦陷前夕，夏曦在准备突围时，匆忙下令杀掉了几乎所有关押在监利县周老嘴的“改组派”。朱勉之在会议上承认自己对革命犯了错误。夏曦突围到了大洪山地区后，得知了上述情况，因而对朱勉之为不满，认为勉之是同情“反革命”，是“阶级立场不稳”。对于鄂西反“围剿”的军事斗争，夏曦不向红三军领导人介绍情况，却让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向贺龙、关向应等人汇报。王一鸣在汇报时，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指出了由于军事指挥不当给红七师造成的严重损失，同时也主动承担了责任。王一鸣汇报时，夏曦也在场，他虽然一言不发，但对王一鸣的汇报是很不满意的，并认定王一鸣同朱勉之一样，是“反对中央分局”的“反革命”，必须给以严厉打击。在大洪山活动时，考虑到红七师政治委员在反“围剿”作战中牺牲，关向应便提名止朱勉之任红七师政治委员。关向应的这个建议，夏曦是点头同意的。但是，时隔不久，夏曦便以王一鸣、朱勉之“计划将七师拖走”、叛变投敌的罪名，在一个夜晚将他俩逮捕，随即将其杀害。随后，第二次“肃反”便在红七师首先开展起来。刚刚经过第一次“肃反”，部队内部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更加严重起来。正如后来贺龙回忆时所说的：“这时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已空前削弱。其实部队内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关和我么？”

但是，夏曦根本不听贺龙的劝阻仍然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加紧进行第二次“肃反”。夏曦认为，洪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失败，只是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个别错误，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改组派”的破坏造成的。从这种颠倒是非的立场出发，夏曦便在

红三军中寻找“反革命”、“改组派”，打击的对象自然是那些对中央分局的错误领导不满的干部。红三军长途大转移中，又诬杀了湘鄂西军委会参谋长唐赤英等领导干部。夏曦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

……王一鸣带队伍去边界向前走，而不保持后方。类此遂即破获王一鸣的反革命，这大概是九月底的时候。将他逮捕起来，他自己供出是改组派，获得七师中证据甚多。他在后方地方政府中发展了和很多改组派的组织。（部队）由河南再到陕西，又回头到湖北。在陕西时又逮捕反革命唐赤英……

在诬杀王一鸣、朱勉之、唐赤英的同时，所谓“火线肃反”便扩大到红三军各师、团、营，甚至基层干部和战士中。当时，红三军连续作战，日夜兼行，干部战士疲惫不堪，许多人对苏区失守有不满情绪。加上远离根据地，实行翻山越岭大转移，更有许多湖区长大的指战员想不通。第一次“肃反”中，一大批军政干部被诬杀，部队政治工作受到严重削弱，以致出现了牢骚情绪，违犯纪律，乃至少数人当逃兵、开小差的现象。对此，夏曦不是通过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指战员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以保持部队旺盛的斗志，战胜困难，去争取胜利，反而断言“改组派利用这一个条件更大的来破坏我们”，“破坏阶级路线，以及涣散军事组织，是改组派的主要阴谋”。于是，在紧张的行军、作战途中，加紧进行“肃反”活动。

夏曦突围到大洪山时，省委政治保卫局和政治保卫队便名存实亡了。这时，夏曦转而信任姜琦这个人，让他担任政务处长。在“火线肃反”中，姜琦实际上成了夏曦之下、红三军所有人之上

的人物，权力大得很。姜琦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谁的名字记在本子上，只要夏曦同意，姜琦就将其逮捕、处决。“有的指挥干部在火线上负了伤，刚撤下来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红三军在七千里大转移中经常日行百里，而且是交替掩护，边打边走。因此，有时逮捕的人多了，来不及处理，夏曦就将这些“犯人”编成一队，由姜琦派人看管。在部队翻越秦岭南脉时，夏曦命令姜琦将一百多名“改组派”用绳索连绑，每个“犯人”身上还要背上两支枪和其他东西，随部队行军。这些“改组派分子”每天只能分得两个生白薯充饥，还要负重行军，一个个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身体非常虚弱。即使这样，夏曦并没有放过他们，一夜之间，只有军部一位保卫干部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得以幸存，其余一百多人全部被处死。

所谓的“火线肃反”，贯穿于七千里远途大转移的全过程。这次“肃反”的全部情况，夏曦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二次肃反开始于六房嘴，差不多每天有敌人追击，每天战斗和行军，部队的建制也是破坏了……二次肃反，亦是这时开始。本来（第）一次肃反，已经粉碎了改组派的组织体系，但是从军校毕业的学生中被充军事政治负责人，特别是李人一、唐赤英、李强、齐素卿等补充到红军中，在军事系统内、政治制度政治机关内和党的组织里，增加了这一部分改组派分子，故这些人又把粉碎了的改组派组织领导恢复起来，在当时最严重的是破坏阶级路线，以及涣散军事组织，是改（组）派当时的主要阴谋。

在改组派最狠毒的计划，是王一鸣与宋盘铭计划将七师拖走，这一个计划是王一鸣与宋盘铭共同商议的。改组派这一个计划的未实现，是因为与八、九两师和军部会师才没

有实现。二次肃反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的终结……

二次肃反共逮捕二百四十一人。这二百四十一人中有一个师长王一鸣，一个军（委）参谋长唐赤英，其次即是团长、营长以及（第）一次肃反中所残余的政治机关人员，连长这一级是很多数的。

什么“计划将七师拖走”，这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在洪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险恶关头，作为红七师师长的王一鸣虽然对夏曦的错误指挥极为不满，但是他作为一个军人，只得执行命令，并且在历次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尽了最大力量保持了红七师的骨干力量。如果王一鸣、宋盘铭要叛变投敌，将红七师拖走，他们何必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困中率部冒死突围呢？夏曦在上述报告中所用的“逮捕”一词，实则是“杀害”的同义语。所谓逮捕了第一次“肃反”中所“残余的政治机关人员”，实际上是把政治机关干部几乎全部杀光了。报告中关于逮捕的干部中“连长这一级是很多数的”，这确是事实。贺龙后来回忆说：“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们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同志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人，条子根本不给我看。”

1933年3月开始，夏曦又进行了第三次“肃反”。当时，红三军和湘鄂西中央分局移至巴东县。同月24日，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召开扩大会议。夏曦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不但不检讨中央分局和他自己丢掉苏区所应负的直接责任，反而断言根据地的丧失是“改组派”、“第三党”的破坏造成的。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坚决反对，提出要在党内、苏维埃政府内和红

三军中,进行更深入,更彻底的“肃反”,再次提出要解散党组织,开展所谓对湘鄂西苏维埃“罪恶”的群众性的控诉运动。第三次肃反,主要是从逮捕段德昌开始。

段德昌是红军杰出的军事家,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早在红二军团奉中共中央之命南征长沙时,段德昌就不赞成部队远离根据地作战。战斗失利后,他带领失散人员返回洪湖,和周逸群一起领导了苏区的反“匪剿”斗争。1931年6月,段德昌对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湘鄂西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十分不满。他曾对中央分局的干部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了个邓中夏来,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了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段德昌对夏曦不懂军事又要独揽红三军指挥大权,不从实际出发又一味推行“进攻路线”的冒险主义的批评,的确抓住了本质,批中了要害。但是,夏曦、杨光华对段德昌这种言辞激烈但又是实事求是的批评极为反感,“认为是段的地方观念,形成了对夏的不满”。此后,在红九师出襄北的问题上,在江南失守的责任问题上,以及在红三军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问题上,段德昌始终坚持正确的意见,同夏曦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对于夏曦大搞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共产党组织的错误行径,段德昌更是坚决反对,他曾当面责问说:“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都被你杀了。现在你又要取消烈士用鲜血缔造起来的共产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敌人?”使夏曦明显地感到:段德昌是自己推行“左倾路线”的主要障碍。

红三军转战湘鄂边以后,出身于洪湖区以及江汉平原的红军指战员,由于对湘鄂边高山峻岭的生活、战斗环境不习惯,加上对夏曦丢失苏区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有些人便发出诸如“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的议论和牢骚。本来,在战斗环境转换

的情况下,干部战士对生活上的不同要求,以及由于生活艰苦,部队作风、纪律方面出现某些问题,也属正常现象,经过加强政治工作加以正确引导和批评教育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夏曦满脑子想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看到的是“反革命”的“破坏”。他把上边提到的有的指战员的牢骚话,当作“改组派的口号”,用打击反革命的手段进行查究。在湘鄂边恢复苏区的斗争遭受严重挫折,处境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段德昌多次提出打回洪湖去,利用那里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自然条件,恢复和发展苏区。段德昌曾诚恳地对贺龙说:“军长,我请求军部给我四十条短枪,批准我打回洪湖。三年之内,如果没有恢复洪湖根据地,就把我的头割下来见军部。”但是,操纵湘鄂西党、政、军大权的夏曦,却诬指段德昌“打回洪湖”,是想带红九师跑,是“分裂红军”。红三军和中央分局转移到鹤峰时,段德昌率红九师驻沙道沟,他再次写信给住在麻水的夏曦,陈述自己的主张。夏曦固执地认定段德昌“反对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准备恢复洪湖的正确路线”,还诬陷他“准备把九师带走,脱离军部,准备叛变。最后在刘家司准备暴动”。段德昌深知自己对夏曦所进行的斗争将产生的严重后果,也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他曾亲手抄写于谦的《石灰吟》诗:“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并把这首诗贴在石洞里,以抒发革命意志和情怀。

1933年4月下旬的一天,夏曦派人通知段德昌到中央分局驻地金果坪开会。段德昌心知有变,但他仍镇定自若。安排了一下工作,告别了妻儿,还把他心爱的坐骑送给了一位熟悉的同志,然后去中央分局报到。段德昌一到中央分局,夏曦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罪状”向段德昌宣布,并当场逮捕了他。1933年5月1日,“夏曦为了显示他操生杀大权的威风,在鹤峰的金果坪召开

了公审大会。段德昌在公审大会上昂首挺胸，侃侃而谈，句句为党为人民，赤胆忠心照日月。贺龙同志一再劝阻夏曦暂时不要杀害段德昌。段德昌的功劳大，在群众中的威信高，可先让段德昌去洪湖收复失地，以后再考虑如何处理。但夏曦不采纳贺龙同志的意见，还是把段德昌同志杀掉了。到会同志无不声泪俱下，有的几天连饭都吃不下去。”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共产党人，在遇难前想到的是党，想到的是人民。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对身边的同志叮嘱道：“不要忘记共产党，不要忘记洪湖苏区的人民！”

不仅如此，第三次“肃反”中，夏曦仍纵容姜琦等人搞逼供信，并采取步步株连的方式陷害无辜。王炳南被诬杀之后，夏曦又下令姜琦逮捕了王炳南的次子，并残酷地将其杀害。夏曦还要杀害王炳南的长子，因为贺龙的坚决反对，王炳南的长子才侥幸保住了性命。“段德昌被杀害时，他爱人已怀孕数月，而夏曦竟下令将她捕捉，严刑逼供。她在非人的折磨下虽留得残生，但胎儿流产了。”段德昌、王炳南被杀后，夏曦还要杀害红九师政治委员宋盘铭，由于贺龙坚决反对，这次才没有杀成。夏曦支持姜琦滥捕滥杀的结果，使“第三次肃反共逮捕了二百三十六人，主要是段德昌与军参谋处长和湘鄂边独立团的改组派分子”。夏曦在第三次“肃反”中继续污蔑周逸群、崔琪等烈士是“改组派首领”、“反革命”……于是，“火线肃反”后已经出现的党和红军中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更加严重起来。

这期间，所谓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实际上不过是夏曦一个人的封建家长式的统治罢了。夏曦曾经说过：“中央分局没有部门的分工，下面没有什么工作人员。”专事“肃反”的“保卫局的组织共有五十余工作人员。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逮捕必须有几人的证明，再加以逮捕。一般说，物证是很少的。”所谓“几人的证明”，不过是大搞逼供信和步步株连那一套；所谓“物证是很少

的”，正说明夏曦不重证据的办案方式。这种错误作法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后来，随着“肃反”的加紧进行，被打成“反革命”、“改组派”的人越来越多，夏曦更加觉得除姜琦等少数人以外，其余什么人也不可靠了。于是，在第三次“肃反”的同时，夏曦便武断地宣布“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取消红三军的政治机关”。夏曦采取这一极端错误的作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改组派占据了党、苏维埃、青年团的工作以及红军的政治机关，最大多数的是改组派。”“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夏曦甚至认为，“湘鄂西苏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共产党人含辛茹苦、流血牺牲发展起来的湘鄂西党和红军，居然“最大多数的是改组派”，让反动派惊恐万状，并被反动军队多次“围剿”的湘鄂西各地党组织，竟然不是“真正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这真是骇人听闻的奇谈。按照夏曦的这个论断，除了他控制的“没有什么工作人员”的中央分局外，其他一切都是靠不住的。果然，在夏曦的一手操纵下，解散了党团组织的同时，宣布取消各级苏维埃政府，另外组织了由夏曦任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布告说：

因为过去省苏维埃政府及各县苏维政府，为改组派包办，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指定我们七人重新组织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来领导湘鄂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本委员会宣布过去省苏维埃政府及各县苏维埃政府及其发布的命令完全无效，重新来组织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真正苏维埃政权。

在第三次“肃反”开始不久进行的所谓“清党”，更使红三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经过三次“肃反”，湘鄂西地方县以上、红

三军中团以上干部差不多杀光了。这时，夏曦又、感觉到，下层党部（甚至有战士）加入改组派之多，特别是党团员多。”他还夸大其辞地说什么“党在没有清洗以前，党的活动，供了改（组）派的利用。当时觉得改造党已经不能依靠旧的干部，因此决定解散，重新登记。”

夏曦在左倾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以致不能自拔。由于他的错误行径遭到贺龙等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因此，他便不相信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其家长制、一言堂的作风恶性发展。为了进行所谓“清党”，他自己关在屋子里起草了一份《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清洗条例》，要求在地方和军队中实行。这个条例断言：“反革命派别暗藏在党内活动，有几年的历史，并且在肃反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干部加入了反革命派别，因此决定将地方上、红三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员（会）、支部干事会，一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夏曦按照“左”倾观点改造湘鄂西党组织，党员登记中，搞唯成分论。他起草的关于清党的条例中就明文规定，能够留在党内的、准予登记的党团员是：出身于产业工人、雇工、手工业工人，贫农成份；出身于中农家庭的必须是“最可靠、最积极的分子”；没有加入“改组派”、“第三党”、“托洛茨基派”、“新共产党”、“AB团”、“陈独秀派”、“罗章龙派”；“没有破坏过纪律的”、“能坚决执行命令”的。清洗出党和不予登记的党团员是：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加入过各种“反革命组织”的；“不遵守党的纪律”的；“政治盲动”的，等等。这种组织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唯成分论，不仅把一大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优秀党团员清洗出去了，而且一大批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党团员，也被赶出了党团组织。红三军中解散党团组织后，一段时间内只有三个半党员。为什么会有半个党员？因为这期间有组织关系有只剩下夏曦、贺龙、关

向应、卢冬生。贺只算半个党员。

在第三次“肃反”这后，夏曦所推行的“左”倾路线更加不得人心，遭到红三军干部战士的激烈反对和抵制。他把这些看作是“反革命”还在捣乱。于是，他又强行进行了第四次肃反。

第四次“肃反”首先从杀害红九师政治委员宋盘铭和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钧等人开始。夏曦的理由是这些人反对他“解散党团组织”和“进行清党”。

还在中央分局第二次毛坝(扩大)会议上，夏曦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即遭到红三军几位领导人的反对。红九师政治委员宋盘铭在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在关于红三军行动方向的问题上，宋盘铭赞成段德昌的意见，主张红三军应打回洪湖。驻军麻水时，宋盘铭和段德昌曾一起写信给夏曦，陈述红三军应当打回洪湖去的理由。宋盘铭的这些言行，均被夏曦视为反中央分局的“反革命活动”。红九师师长段德昌被捕时，宋盘铭也曾遭逮捕。当时红七、九师分开活动，贺龙趁夏曦不在，便把宋盘铭放了。段德昌被杀之后，宋盘铭、叶光吉、盛联钧继续同夏曦的“左”倾政策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抵制所谓“清党”，因此被夏曦作为“改组派”而惨遭杀害。随即，展开了第四次“肃反”。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当时七师清党负责的是政委沈廉均(盛联均)，九师清党负责的是政委宋盘铭，这两人都是改派。沈廉均当时就利用清党来提拔改派分子，来打击真正的党员。宋盘铭则对清党消极与形式的执行，他把改组派组织又恢复起来。对于宋盘铭、陈培荫的错误，我们曾经严重地指出他们是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方式，帮助了改派反革命，可是没有在群众中

公开斗争和撤消他的要职。所以，当时改派残余又团结起来成立军委，以宋盘铭为书记，到了四次肃反，才暴露出来。

第四次“肃反”持续到一九三四年夏季才告一段落。“四次肃反，一共逮捕一百七十二人。”实际上，第四次“肃反”中被逮捕的人数远不止此。当时，对被捕人员和“嫌疑犯”的处理，除了大批杀害外，还采取了留用和开除军籍两种办法。留用人员被编成两种连队。一种由被捕的地方党政干部组成，因为其中有不少人担任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所以被称为“主席连”。无论是“改组派连”还是“主席连”，行军时，“让他们抬担架背大粮袋。宿营时，罚他们扫地、挑水、放哨，名曰‘改造’。打仗时，……让他们冲在前头，名曰‘考验’等等。这些同志大都是身经百战的优秀干部，他们对党赤胆忠心，在作战中英勇顽强，前赴后继。尽管他们含冤受虐待，仍一颗红心着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掩护部队转移，保卫中央分局机关。”那些被开除军籍的人，大多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如开除了他们的军籍，这对他们来说就等于只有死路一条了。……开除了他们的军籍，让他们离开自己的队伍，就无异于把他们送给反革命‘还乡团’。他们有家不能归，离开红军就无出路。很多同志苦苦哀求，不要让他们离开红军。但‘左’倾分子最后还是把他们大部分赶走了。”

有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改组派”、“反革命”。如红七师第十九团团团长贺炳炎，他是和父亲贺学文 1929 年春参加红军的，是在贺龙亲自培养下成长起来的。1933 年 5 月，贺炳炎被捕。“罪证”是一位被逼供承认是“改组派分子”的人“供认”和贺炳炎一起下馆子吃过饭。在严刑拷打下，贺炳炎毫不屈服。他曾当面质问夏曦：“夏主席，你说我哪点是改组派？”问得夏曦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贺炳炎被捆了二十多天后，被贺龙发现了。贺

龙气愤地质问夏曦：“为什么要捆贺炳炎？别人说他是反革命，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打起敌人来会那样不要命吗？他十四五岁跑来投红军，是我把他拣回来的，是我亲眼看着他长大成人的，别人我不了解，他的历史我清楚！为什么不来问问我呢？难道对我也相信吗？”这样，在贺龙的坚决反对下，夏曦才将贺炳炎释放。贺龙后来回忆说，夏曦“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里刻过油印”。王尚荣在下面当文书，什么错误没有，也被捕了。

罪恶的“肃反”一方面使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被诬杀，另一方面也为反革命分子利用肃反扩大化以大售其奸提供了条件。夏曦怀疑一切，打击一切，却对个别心怀叵测、刁钻狠毒而又阿谀奉承的人深信不疑，并且加以重用。第三次“肃反”开始被夏曦重用的政务处长姜琦，既是在“肃反”中杀人如麻的魔王，又是一个隐藏很深、货真价实的敌特分子。这个利用“肃反”制造冤案、假案，诬杀了大批党政军干部的刽子手，就是在第四次“肃反”中暴露的。1933年夏初的一天，红三军的张副官和侦察连长肖美成，在鹤峰麻山附近捉到一个敌探，并从敌探身上搜出了姜琦与敌人勾结的密信。随后，经卢冬生审讯，敌探承认是受四川军阀郭勋指派，已经数次与姜琦秘密接头。卢冬生连夜将敌探连同物证送交夏曦、贺龙、关向应处理。夏曦眼看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暗中通敌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十分尴尬，气急败坏地命令将姜琦逮捕起来，送保卫队看押。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半夜企图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姜琦被击毙，红三军除去了一个大害，干部、战士无不拍手称快。对夏曦的“肃反”活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但是，夏曦并未悔过，仍一意孤行。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一位为创建湘鄂西红军和建设根据地作出很大贡献的红军干部，在被杀害

前质问夏曦：那么多为创建红军、创建苏区流血牺牲的老同志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夏曦回答说：这些人是为了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而发展红军，为搞垮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的。何等荒唐透顶的逻辑！

谢觉哉曾经是湘鄂西苏区“四大文豪”之一（其他三个人是周逸群、万涛以及孙子涛），他1931年秋赴湘鄂西苏区，初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后在省苏维埃政府主编《工农日报》，并兼文教部副部长。1932年9月20日，他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突围时于洪湖被俘，后辗转逃出敌人魔掌。1945年3月他曾就夏曦在湘鄂西“肃反”写过一首诗。诗中写道：

“好人”不比“坏人”贤，
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
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
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
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
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在，
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

漏网愿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
要防为敌作驱除。

大开杀戒

夏曦在湘鄂西进行的四次大“肃反”，给根据地造成巨大而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肃反”的滥捕滥杀过程中，夏曦起草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文件里关于“严重的打击”、“无情的打击”、“严厉的打击”等术语，在“肃反”中不过是处死的代名词而已。1932年夏季，夏曦、杨光华在第一次“肃反”中就杀害了湘鄂西苏区一大批县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其中的大多数人是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人，如万涛，四川省黔江县人，土家族，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重庆、武汉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初，被湖北省委派往鄂西参与领导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同年5月，设于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机关被敌人破坏，7月，组成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新的鄂西特委，万涛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同周逸群一起，领导鄂西地区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在洪湖、白露湖、华容东山一带建立了若干小块革命根据地。1930年初，被派往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传达中共中央和鄂西特委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与鄂西红军会师的指示，后任第四军二路党代表，为实现湘鄂西主力红军的会合作出了贡献。同年9月后，他历任中共湘鄂西特委委员、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第三军政治委员等职。曾和段德昌等带领第三军第九师转战潜江、沙洋、荆门一带，迎接第七、第八师返回洪湖根据地。1932年1月，在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因反对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左”倾错误，遭到“左”倾分子的排斥、打击。万涛有较高的理论

水平和实际斗争经验,对夏曦等人的错误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32年5月,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开始大搞“肃反”,万涛便成了“左”倾分子们打击的对像。同年9月,万涛被以“改组派”的罪名杀害于监利县周老嘴。

被夏曦诬为“改组派”的王炳南,湘鄂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02年生于湖南桑植县袁家坪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入贺龙部队当兵,后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他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中任五团一营营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家乡组织武装。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贺龙的指挥下,率部转战于桑植、鹤峰、五峰等地,创建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王炳南平日沉默寡言,性格耿直,打仗勇敢,深受士兵和当地群众的爱戴。贺龙对王炳南很了解,曾极力反对夏曦逮捕他。王炳南被捕关押在麻水时,贺龙曾同他谈过话,认为王炳南没有问题,应该放。这时,王炳南已经被姜琦等人刑讯逼供,折磨得遍体鳞伤,“隔几米就闻到臭味,他身上伤得没一点好地方。”最后,夏曦还是将王炳南杀害于麻水,时年四十一岁。

在肃反中,夏曦还企图加害于贺龙。夏曦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忠实执行者们有一种极为错误的观念,说什么湘鄂西红军中,“在贺龙领导下的部分,因为大半是军阀,口头革命,实际上是改良主义。因此,其部下大部是改组派。”在夏曦看来,即使是“军阀”,是“改良主义”,是“改组派,”那么,对“这种反革命分子的扑灭是毫不奇怪的”。从这种“左”倾立场出发,夏曦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肃反”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湘鄂西红军的缔造者贺龙。从洪湖突围开始,夏曦一路“肃反”杀人,一直杀到大洪山。1932年10月初,夏曦率突围的少数部队到大洪山会合红三军不久,有一天在枣阳县王店,他居心叵测地对贺龙说:你在国民

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夏曦还要贺龙写声明书,表示拥护抓“改组派”。贺龙听了夏曦这一派胡言乱语,非常气愤,当场将夏曦顶了回去,他对夏曦说:“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向我要十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了你五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闹的他下不了台,关向应出来调停,说他是共产党员。11月底,夏曦又一次企图对贺龙下毒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部队到达竹林关时,夏曦在谈话中无意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来电的问题。贺龙、关向应认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湘鄂西红军反“围剿”斗争方针的电报,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尽管当时形势恶劣,情况危急,但如果能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精神,改变错误的作战指挥,即使不能扭转被动局面,挫败敌人的“围剿”,也可以使部队免受那么大的损失。因此,贺、关对夏曦故意封锁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指示,将其重要内容秘而不宣的作法十分不满。但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更不允许他人批评的夏曦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竟然带人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都下了。当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枪都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贺龙对夏曦的错误作法十分气愤,当面严厉地责问夏曦:“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贺龙对夏曦的这种拙劣表演又十分蔑视,将自己多年使用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从身上掏出来,放在桌子上,并对夏曦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贺龙这一番话顶得夏曦张口结舌,只得悻悻面去。在当时的情况下,夏曦纵然有加害于贺龙的企图,但是慑于贺龙在红三军中的威望,终于没有敢动手。

在“肃反”过程中，以夏曦为首的“左”倾分子简直杀红了眼，杀到后来红三军几乎没有什么党政干部了。“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夏曦就连自己身边工作的四个警卫员也不相信，亲自下令捕杀了三个，可见他头脑已经昏热到何等地步。贺龙的来回忆说：“解散党、团组织 and 第三、四次“肃反”后，红三军中的、党员只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和我四个人，根据地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干部损失最大。”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中说：在前后四次“肃反”中，共“肃捕三千多人”。这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据贺龙的回忆，只在第一次“肃反就杀了一万多人。”

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是不遗余力的，尤其是肃反扩大化，给苏区的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后果。到1934年4月，红三军从1933年春的九千多人，锐减为三千多人，枪多人少，有时一人要背几枝枪，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减弱。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已经将红三军推向覆灭的边缘。

幸存者不堪回首

庄晓东同志是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往湘鄂西根据地工作的。在肃反过程中，他也被逮捕了，险遭夏曦的杀害。后来在回忆那段惨痛的历史时，他说：

在王明中央代表的支持下，王明极左路线在会上完全得到贯彻。党代会结束，夏曦利用职权，借肃反之名，大肆打击报复。凡是反对过他，不同意他或不支持他的，都上了被“肃”的名单。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这两年中就进行了四次大肃反，零星的还不算。第一次肃反是一九三二年六月间开始的，同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差不多同时开始。敌人从外开刀，夏曦从内开刀。夏

曦在给中央的肃反报告里说：“第一次肃反就解决了一千多。”据当时幸存的老战友回忆说：“敌军逼近洪湖来不及杀的都用麻包装起来，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都变了颜色。”

肃反是从部队开始的，首先抓了八师参谋长胡慎已，并扬言反革命分子还多着呢。接着，省、县、区、乡的许多负责干部也相继被关被杀。分局、省委的办公地方，都成了关押犯人的“牢狱”。办公室没入办公，出来吃饭的人也逐渐减少。省委、省苏维埃以及各部门的许多负责人相继不见了。

一天夜里，手电筒照亮了我们的宿舍，潘家辰的自卫手枪被缴去了。我们被赶出省委宿舍，住到反帝同盟机关里的一间又黑又湿的小房子里，被变相监视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出来搞点热水洗洗满身的疥疮都不许。可是，连这被监视的生活也没过上几天，又是一天夜里，我同潘家辰一起被逮捕了。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分手时，潘家辰坦然地对我说：“肚子里没病，死不了人，放心吧！问题会弄清楚的。”

被捕后，我说，一个革命者在苏维埃政权下受“反革命分子”的待遇，要求见夏曦，可被拒绝了。气愤之下，我七天夜一点东西也没吃下，他们把我当作神经病，送进医院禁闭。在去医院的船上，我弄到纸笔写了封报告，托来入代转党中央（不知中央已被王明把持）。在洪湖医院，我说服了医院的党支书，他给了我笔和纸，我偷偷写了信，托他代转党中央（一九五三年在北戴河遇上张闻天同志，他告诉我曾看到我的信，当即致电夏曦，指示潘家辰和庄晓东的问题，暂缓处理，由中央解决。后联系中断）。我一再声明没病，要求赶快审问，他们只把我转到关“犯人”旁边的一间房子里。一夜之间，同一战壕里战斗的阶级兄弟，竟变成万死不赦非杀不可的敌人。在我被转到“犯人”旁边房子里的日子里，



特别每当深夜,所谓“犯人”被打的呼叫声,吵得我几乎没有一夜能合眼,只有利用白天来补睡。一天中午,大概看守的人饭后休息去了,我朦胧中只见一个满身是伤似人非人的阴影在蠕动,这是谁?我几乎叫出声来,见他频频摇手示意,细看之下,才认出原来是红九师政委戴君实。他走前几步细声对我说:“庄同志,您大概不要紧的,希望您能照着列宁主义的路线来发展中国党的事业!我是摧残党的,当打得我受不住、他们指着名单叫我认的时候,我那时昏了,我都认了,凡是我知道的和我听说过的名字我都认了。”当我叫他据实向肃反负责人说明时,他连连摇头说:“我承认了,说也没用,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

另一个被打断了手的负责军委组织工作的郑大庆,有一天他偷偷站到我跟前告诉我,朱勉之(当时是军事法庭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夏曦杀害了)怎样暗示他供认刘鸣先(军校负责人)和潘家辰。潘家辰的右手也被打断了。潘家辰受刑时死不承认,并大声喊叫要他们拿刀来,割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一次敌机空袭,我被疏散,在一间农民的草房里,我意外地见了潘家辰同志一面,见他用手去拿碗倒水,水未倒成,碗掉在地上打碎了。原来他的手不听使唤了。

为了党的利益,免得自相残杀,我向以夏曦为首的“革命法庭”反映了我所知道的实情,并提出不要逼、供、信的建议,他们当作耳旁风,置若罔闻。逼、供、信的结果,所谓的、改组派”、“第三党”、“托洛斯基派”等帽子满天飞。有几个在一起喝茶,就说是“喝茶会”;在一起散散步,就说他们是“并肩会”;在一起吃东西就是“麻花会”或“好吃会”等等,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在夏曦的眼里,到处都是反革命,把自己的四个警卫员就杀了三个,剩下的一个还是贺龙同志救出来的。连贺龙同志也上了夏曦的黑名单。段德昌同志是湘鄂西苏区创建人之一,亲自率领红军,



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敌人闻风丧胆，人民称作救星，受过党中央特别嘉奖。痛心的是他于一九三三年也被夏曦杀害了。夏曦为了显示他操生杀大权的威风，在鹤峰的金果坪召开了公审大会。段德昌在公审大会上昂首挺胸，侃侃而谈，句句为党为人民，赤胆忠心照日月。贺龙同志一再劝阻夏曦暂时不要杀害段德昌。段德昌的功劳大，在群众中的威信高，可先让段德昌去洪湖收复失地，以后再考虑如何处理。但夏曦不采纳贺龙同志的意见，还是把一代英雄段德昌同志杀掉了。到会同志无不声泪俱下，有的几天连饭都吃不下去。贺龙同志激于义愤，流着热泪把在极左路线下被夏曦杀害的几千个同志的名字，写在当时仅能在农民家里找到的黄裱纸上，派特别交通送给毛泽东同志，希望革命能及时得到挽救。可是山水阻隔，敌军围困，加之王明路线代理人夏曦作梗，能到毛泽东同志手上吗？

第五章

残酷的闹剧：抢救失足者运动

●草木皆兵与反奸运动
○“特务”张克勤骑马戴红花○
康生的恐怖报告○创伤深重●
一桩悬了 49 年的冤案○王实味
直言酿成杀身祸○漫长的平反
昭雪●蒋南翔忘身进谏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清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加强党的思想与组织建设，为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运动后期，康生插手和制造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滑天下之大稽，又导演了一场残酷的闹剧。

揆昔察今，负苍天者谁耶？

●草木皆兵与反奸运动

“特务”张克勤骑马戴红花

1942年10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延安成了不夜城。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其他一些人通宵达旦地指挥着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的审干运动，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被“抢救”。

各单位的汇报，雪片般飞向领导机关。一些人忙于计算本单位的成绩，搞出了多少特务，多少叛徒，多少反革命，似乎越多越好，却很少有人顾及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批集中起来，被送到反省机关审查。西北公学是重点之一。各单位一批批来报到了，被选出的受审查者，或带着行李，或空着两手，一个个目光忧郁，神色沮丧，有的实际上是逮捕来的。名义上是学习，可谁都明白，灾难临头。

随着人员到来，材料也一批批汇齐。一下子，西北公学集中了三百多人，猛增加三个班。细览材料，有的复杂，有的则仅是一些小事。其中，有一份从鲁艺转来的材料写道：

“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搞特务的……”

张克勤于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张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樊执一和妻子朱方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1942年



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回忆分析，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另外，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这时，延安鲁艺又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康生见到这些材料，如获至宝，马上派人看管张克勤。当时，张克勤年仅19岁。

在汪东兴办公的窑洞里，西北公学的审干人员开始了对张克勤的审问。

一位当年参加过审问张克勤的人回忆说：“你是怎样来延安的？”这是我们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张把自己来延安的经过详细地作了一番介绍。“你来延安干什么？”我们又向他提出了问题。张克勤笑了笑说：“我是由甘肃党组织的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都有介绍信。”“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这个问题一提出，张克勤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苦笑着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决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僵住了，我们又问他家庭情况，他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个名中医，常给别人看病，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收入……“都给什么人看病？”我们问。“什么人都看，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他说。我们几个同志交换了一下眼光，觉得这倒是开始入门了，于是就追问他父亲和这些官员什么关系，但张一口咬定，就是看看病。

一根蜡烛点完了，却毫无结果，我们让张下去之后，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搞，汪东兴同志认为，根据他在根据地搞保卫工作的经验，应该连续搞下去，我们党得这办法不错。

第二天接着审查，追问他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父亲与国民

党官员的关系。他一口咬定没有别的关系。问题越提越多，开始张克勤还较镇静，可是越谈他就越应付不了了。我们几个人轮流地休息，吴德、汪东兴他们一班，我和王涛江、毛诚一班。到第三天天快亮时，蜡烛也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同志打了个电话。李说：“这时候已是关键时刻，你们怎么能休息呢？我也还没休息嘛！没有蜡烛，我让总务处给你们送一箱去。”一会，蜡烛果然送来了，我们只好继续搞下去。

到了凌晨五点，张渐渐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好吧！你只要好好交代，可以重新做人嘛！”我们对他说。于是张交代了以下情况：其父在给一个国民党大官看病的时候，经那大官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自己也就加入了特务组织。僵局终于打破了，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又问他来延安干什么。他说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的，说得有鼻子有眼。“你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又问他，他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当时张还哭了一场。

口头交代完了，我们又让他写成书面材料，他一口气就写了出来。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赶忙向李克农同志汇报，他很高兴。

根据康生和李克农同志的指示，第二天就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都派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作典型报告。会上，张克勤痛哭流涕地讲着自己如何参加了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搞特务活动，更谈了自己如何受骗上当，表示感激组织对自己的挽救，而且决心重新做人。他讲得非常生动感人，使听会的人都很感动。

晚上，又让张克勤交代还有什么人和自己有联系，他一下子

交代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个司机潘法生和鲁艺的那个同来的同志。

张克勤交代以后，不仅在本单位作典型发言，还让他到别的单位讲，到根据地讲。讲的内容除了交代的外，还有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下子人们的头脑就热起来了，各单位都在千方百计地找自己的典型。

张克勤这个典型是假案。我们由于头脑发热，当时并没有发现问题，作为运动的领导，康生等人更把它当作一个大问题的突破点，顺藤摸瓜，问题越搞越多，涉及面也越来越宽，特别是所谓假共产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问题，影响到许多省市的地下党组织，甘肃、四川、河南等省的党组织都被打成“红旗”党，如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专从河南调到延安进行审查，一直到七大结束以后好长时间才搞清楚。

1943年4月1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首先让“坦白典型”张克勤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作“坦白运动”报告，进行“现身说法”。张克勤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接着各系统、各单位都掀起“坦白”高潮。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坦白”的花样越来越多。在当时形成一种“坦白”光荣，不“坦白”就有问题的气氛。行政学院9班有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于是他们便立即举行庆祝大会，大家捐钱买了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组设有“坦白”的人去参加。大家漫谈反省的思想过程，启发没有“坦白”的同志到本组去“坦白”。边区政府总务处有一批勤杂人员，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



化程度较低，苦于没有问题“坦白”。老处长因此弄得吃不下，睡不好。总务处里的同志平时和老处长关系融洽，他们便私下商量：一是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二是“坦白”了能戴红花，吃饼干，于是大家一齐“坦白”成“特务”。这样“坦白”的人没有感到压力，老处长也因而笑逐颜开。5月22日，边区政府大礼堂也召开“坦白”大会，从表面上看是个人向党反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偏差。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在“坦白”的热潮中，埋下了冤假错案的种子。

由于这些假案的影响，“特务”一批批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人人自危了。

运动向高潮发展着，影响面越来越宽，康生欣喜若狂。一天，他来到西北公学作了个报告，俨然以一个教师爷的把式，在讲台上振振有词地教训着人们：“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的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他唾星四溅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报告后来又印成文件发到各单位，发到各根据地……

本来已经扩大化了的“抢救运动”，由于康生这一煽动，终于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而那些还没有搞起来的单位，领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例如有一个单位，因为没有人“坦白”，受到康生的批评，领导人回来后吃不好、睡不着。一天，已经夜深人静，人们都已进入梦乡，他忽然吹起紧急集合哨，全体人员从床上惊醒，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待集合之后，这位同志就开始训话：“别的单位的特务都坦白了，有那么多，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其实很多，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向我坦白，否

则我要严厉惩罚你们……”

在周围压力已经非常大，整天等着“抢救”的人们受不住了，连夜找领导坦白，当晚就有几十人交代了“问题”，在当时这位领导看来，是多么意外的收获，又是多么大的成绩啊！

有的情况在现在看来也许是个笑话，而在当时却是事实。例如有一个同志，才新婚不久。一天，他去向上级汇报工作，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他爱人还在灯下等着他，这位同志不仅没理会爱人的心，反而怀疑她有问题，硬揪着她到李克农那里去交代问题，弄得她哭哭啼啼，把李克农也弄得啼笑皆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同志头脑已经发热到什么程度。

康生的恐怖报告

针对审干中出现的问题，1943年7月1日，毛泽东给康生写信，明确提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并指示将此批语刊登在《防奸杂志》第六期上，以引起重视。

但是，康生并没有执行。这时，康生虽然被迫停止了秘密地滥捕，但他仍坚持“左”的做法。他说：“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个特务”，“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坦白”运动继续迅猛发展，“坦白”者越来越多，到7月9日，已有450人“坦白”了问题。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

召：“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他还解释为什么要“抢救”：因为“一个小孩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康生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机关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当时康生除领导整个运动外，还负责领导中央机关的运动。边区系统是罗近（李维汉）负责，西北局系统是高岗负责，各单位的运动，分别由各单位的领导负责。

李维汉回忆说：“在康生报告的第二天，7月16日召开抢救大会。”“在短短十多天中，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以‘坦白’号召‘坦白’”，“把张克勤请来作‘坦白’，这叫作思想发动。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劝说‘回头是岸’，欢迎上台‘坦白’。气氛极为紧张。”“如文书科的一个女同志，在‘抢救’她的时候，满头大汗，紧张极了。”

“第三次是控告，由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控告一个工作人员。场内群情激愤。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当时，“台下还高喊：‘捆起来，捆紧点！’”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地下党员朱子彤回忆：“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

不止，逼着大家交待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促使他们交待问题；有时组织被关押的所谓“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坦白交代”，给他们施加压力。张宣回忆：“抢救运动扩展到群众中后，保安处领导要我到延安市民的‘抢救’运动大会上‘现身说法’，坦白自己的‘特务’问题。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向我施加压力。我对他们说：去是可以，但我在群众会上先要声明：我本来不是特务，是保安处领导布置的任务，叫我来讲的。他们听了，把我训了一顿，要我严肃考虑。过了几天，问我考虑好没有？我说我去不合适，我只能是那个办法。我既要服从组织，又不能欺骗群众。他们又发了一顿脾气。一天，他们派人押着我去参加延安市民的‘抢救’大会，我向押我的人说，我要讲的内容前几天早都说过了。到了会场我一直往台上走，押我的人一把拉我下来，怕我讲上面的话，便又把我押回了保安处。”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抢救”运动中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

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

当时的情况，是以主观推论代替调查研究，将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信为坦白彻底。康生常常拍着胸膛说：“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要不是奸细，把我康字颠倒写。”甚至说有的女同志“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等等。他不仅怀疑抗战初期进边区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迫害一些老干部。如对中央组织部一个老同志，因为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牧师学过外语，就被整成“意大

利特务”。把一个在 1935 年坐过国民党监狱的老同志打成“叛徒”。平时，他可以任意指定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送干部去受审查。一次他让李维汉先后送到边区政府的三个干部，结果只放回两个，一个音讯杳无。

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取口供。

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 19 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3 天 3 夜不让她睡觉。并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一套假口供。康生说要“犯人”反省“那些最不愿意叫人知道，最对不起党，最怕人说的，人家一说就翻脸的事情”。当诱逼出大量口供后，康生又说：“犯人供出那么多问题，谁知道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怎么能不追查呢？”他教干部号召“犯人”坦白后一律宽大处理。有干部问是不是对交待好的宽大释放。他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待不清楚，交不上卷嘛。”他还教审讯人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犯人”永远答不完。康生还发明一种叫被审查人员“填月表”的办法。就是突然让被审查的人当场填写每个月的历史，如果记不清或填写的内容和过去交待有出入，就以“特嫌”论处。有些地方提出“五分钟解决问题”，搞“坦白竞赛”等。

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

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 24 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

至1943年7月15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后，逼、供、信更为严重。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私自被关押的29人。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了2463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挖出170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96%的“特务”。

据当时任靖边县委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说承认后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在一次批斗陈元方时，由于他拒不承认是“特务”，便被五花大绑，整整48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他的两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建国后还没有蜕尽。

创伤深重

“抢救”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如当时有一千多名工作人员的通讯部门，因许多人打成了“特务”，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许多通讯工具无人掌握，使延安和各根据地、各省的联系一时中断。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外勤工作，也因为审干，把各据点的负责同志和外勤干部抽到延安接受审查，外勤工作交由各分处代管，而各分处也由于审干、反奸，集中全力于内部，因而外勤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其次，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在运动中，把一大批国统

区工作的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分子”，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有的甚至遗恨终生，有的则丧命。由于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边区与国统区、敌占区处于隔绝状态，而大部分被“抢救”的人又是从国统区、敌占区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些问题很难在边区内部查证清楚，所以有些人的“包袱”一直背了几十年，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作结论。有的审干中的问题被当成“辫子”和“尾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揪住不放，挨整了几十年。有一个被康生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的女同志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 14 年之久，前 7 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 19 岁；后 7 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之下了。”张克勤深有感慨地回忆说：“今年是我参加革命 50 周年，50 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 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 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 5 年半监狱。”彭尔宁同志 1939 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由于追求进步，投身抗日，从沦陷区历尽千辛万苦才在 1940 年春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到自然科学院工作。整风时，为墙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生硬说此画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把他打成“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直到 1980 年康生问题被揭发后，这一桩 38 年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但他年已古稀，为祖国作贡献的大好年华已一去不复返了。彭的父亲钱来苏是老同盟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因不满蒋介石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反共政策，于 1943 年 3 月在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帮助下，带着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住在延安交际处。来后不久，正值反奸斗争进入高潮，儿子被打成“特

务”，女儿女婿也都受到隔离审查。1944年元旦和春节，钱来苏老人孤独一人，心情郁闷。当时交际处其他客人也都不敢和他多交谈。他找到交际处的领导激动地责问说：“第一，是不是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搞成特务才算？外边来的人皆不能相信？”“是不是下面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搞成特务，到上面去报告功劳就愈大？第二，既要我来，又如此对付我，到底为什么？我出来是为了抗日救国的，难道是来干这个（指当特务）的？如这样，我不如在家当汉奸，我还冒风险跑出来干什么！”有些人经受不起冤枉折磨而自杀。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曾被誉为抗日“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1936年在陕西西安师范上学时就加入地下党，积极从事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1939年9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延长新华书店、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派他到晋西北工作。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被逼供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社（蔺当时任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蔺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确定转晋绥公安局关押审查。在送走前，晋绥分局后方负责人廖井丹找他谈话，廖回忆说：“黎印（蔺克义）始终是痛哭流涕地讲他不是特务，没有政治问题向党隐瞒。”以后一直被关押在晋绥公安局看守所。“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老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是这批被错误处死者之一，时年仅29岁。他的案子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平反。

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也曾因坐过敌人监狱，被整成“叛徒”，气得他暴跳如雷地在骂娘：“老子在犯人中不是第一号，也是第二号坚强的，



他们简直胡闹，想我把打成叛徒。”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董学源，1942年8月到延安参加完组织工作会议后，被高岗留下参加整风学习。在“抢救运动”中也受到审查、批斗、关押，1945年平反。还有西北局民运部的10多个干部，全系西北各省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1941年民运部机关党支部办了个墙报，叫《西北风》，陈元方任主编。第一期墙报贴出后，反映强烈，高岗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是一种不满的发泄”，以后便停办了。当年底，陈元方调到靖边县委任常委、统战部长。1943年4月初，突然通知陈回西北局机关，一进机关，挎包还未放下便被叫去参加批判会，要陈交待《西北风》问题。而且说《西北风》和《轻骑队》一样性质，都是反党的。接着便是无休止的批斗，到5月说陈是“死顽固”，进行假枪毙后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直到1946年7月1日才结论平反。在康生的影响下，还不仅认为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一概是审查对象。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当时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邹是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党员，对党忠诚。他在对敌斗争中脊椎骨折断了。把伤养好后他的腰从此直不起来，加上胃病、肺病，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仍坚持对敌斗争。1940年，党中央调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审干中他被当成是“特务”进行批斗，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延安，与邹结婚时间不长，审干中她经受不起考验，也说邹风平是特务，并因此离开了他，和别人同居了。这对他也是一个沉重打击，致使邹风平自杀了。他在绝命书中还申辩自己是被冤枉的。直到1945年8月，中央党校才给邹做了结论平了反。

在抢救运动中，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道，“绥师已有160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

动坦白者 280 余人，被揭发者 190 余人”，“一个 14 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16 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 9 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 230 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 73%。

再次，造成革命队伍同志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人人自危。一些被错整的干部，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的创伤。1946 年下半年，四川地下党的一个干部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挨了整，致使精神受刺激，平反后组织派他回四川工作。中央布置陕西省委把他带出封锁线，到了白区，由他自己回去。当时省委在柳林镇有一个工作据点，公开名义是骡马大店，负责人邢志舟。省委让邢志舟找个可靠的关系把他带出边区。邢委托耀县的一个保警队长，连夜带着那位四川同志越过封锁线，到保警队楼上隐蔽起来。由于那个保警队长晚上穿的是便衣，第二天早上他换上国民党的警察服，那位四川同志一见以为他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保警队长一再解释，那位同志就是不肯下楼，并把墙上挂的一支步枪举在手上说：“谁敢上楼就打死谁！”无奈，保警队长又马上跑到柳林据点去报告。等到柳林据点派人赶到保警队时，这个四川的地下党员已经神经错乱，在楼上自杀了。

●一桩悬了 49 年的冤案

王实味直言酿成杀身祸

王实味冤案，发生于 1942 年的延安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

关。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是范文澜，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1942年初，张闻天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农村作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临走前，委托李维汉代他照管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张闻天离职期间，李维汉就成为中央研究院的最高负责人。

王实味，原名叔翰，实味是其笔名，河南潢川人，1906年生。1923年中学毕业后，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读过一年书，因此英文的底子比较好。1925年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去关系。后因缴不起学费，未能读到毕业。1930年开始创作和翻译小说，靠稿费维持生活。他写作的小说有《休息》等，翻译的作品有：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法国作家都德的《萨芙》等。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奔赴延安。开头在鲁迅艺术学院教书。不久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10种，其中《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本是他翻译的，还有《列宁选集》18卷，他翻译了其中两卷半。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成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调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那时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级，王实味才思敏捷，文学和翻译方面已颇有成就，被任命为特别研究员。当时中国文艺研究室的主任是欧阳山。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整风开始后，王实

味于2月17日写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又写了一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共4个小题目，分两次发表在3月13日和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对自己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意见。他批评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是延安“歌啖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批评干部待遇上的差别，不应“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尤其是批评了某些官僚主义……言辞尖锐，忧愤于色，亦时有偏颇。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李维汉讲了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几点意见：讨论整风和检查工作分开进行；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这是针对许多人认为只着重检查领导说的）；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等等。王实味对李维汉的意见带头反对。他认为整风就是要“要割大尾巴”；反对指定一部分人为当然委员，主张全体委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还写了《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灵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头两期上。他希望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他还提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一石激起千层浪，王实味的言论，反响很大。《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

这一切，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

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啃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

为此，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召开全院座谈会，主题为“党的民主与纪律”，到6月11日结束，一共开了16天，其间开了14次大会。

从会议开始，康生就插手了。更准确地说，是抓了领导权。整风开始，担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受中直机关总学委领导的，康生就当然成为上级直接的领导人，他说的话就成为代表总学委的“指示”。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了反王实味的斗争会。座谈会开始的时候，有些同志还把王实味问题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过了4天，就升级为政治问题，说他“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到第6天，有几个同志发言，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清晨（陈其昌）有过来往，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是王实味自己向党组织交代过的）。至此，反王实味斗争迅速升级，成为“托派思想”，“敌我问题”。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把王实味称为“托洛茨基分子”了。在最后一天的大会上，李维汉说：“支配着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仍抱着“挽救”的态度，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

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可是康生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在1937年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就常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常在大会上批判“托洛茨基匪帮”，常说“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他还说过：“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好记，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就容易记得了。要记住，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反王实味斗争结束之后，他要继续“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七、八月间，他用“打迂回”的战术，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发动了一场斗争，追查成全（陈传纲）和王里（王汝琪）夫妇与王实味的关系。成全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王里在妇委工作，他们一起到中央研究院来看望过潘芳和宗铮夫妇（王里和宗铮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王实味住在潘芳和宗铮隔壁的窑洞，他们又一起看望过王实味（王里曾与王实味在河南相识）。此后，他们有过几次来往，一同吃过饭。经过七斗八斗，就把他们5人的关系说成“托派关系”，把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说成“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

中共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在1942年10月23日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二天，他突然不见了。院党委四处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了。他正在哭诉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他又于26日交给党组织一个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年——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于1941年向党作过详细报告”，他“确实未参加托派组织”。他要求把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停止党籍半年”。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视“托匪和敌特、国特为一体”，至1942年底，康生下令将他逮捕。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

审讯。到1946年再次强行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处决。

漫长的平反昭雪

早在1949年进北京后，毛泽东知道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了，大为震怒，曾厉声说要还他一个王实味。

建国后，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左”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王实味冤案不可能平反。

但是，到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实味冤案的平反出现了转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持抓紧完成。”

中央组织部也明确提出：“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准定、哪一级定的；也不管是什么时期、哪一次运动定的，都要统统甄别、平反。”这里说的第一个“不管”，是指那些曾经由毛泽东等领导人定案的案件；第二个“不管”，是指不仅“文革”中的错误要纠正，而且“文革”以前“四清”、“反右”以及解放前历次斗争中整错的，也都要纠正。这就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打开了大门。

为王实味案进行复查，是李维汉在1981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来的。李维汉在“文革”中，惨遭“四人帮”和康生的迫害，身陷囹圄7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才恢复自由。他在狱中身罹重病，此时尚未痊愈。他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有一篇《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讲到反王实味斗争的经过和教

训。文章的最后一节：“一个悬案”，提出了王实味错案的复查问题。此文是他在1981年定稿的。在1984年7月出版的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中，都收入了这篇回忆文章，但因为当时王实味问题尚未平反，都把最后这一节删去了。现将这一节全文照录如下：

一个悬案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以后所出现的“反党五人（指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问题。最近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组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调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的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来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

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1981年7月，是延安中央研究院创建40周年。在京原中央研究院部分人员开了个座谈会。有好几个同志提出，应该对王实味问题进行复查。李维汉表示，他正在向中央组织部提出为王实味复查的建议，他会负责协助中央组织部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中央组织部在接到李维汉的建议后，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决定中说：

“毛主席 1950 年 7 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既已被否定，王实味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的。但是，王实味的“托派分子”问题被搁置了下来。在中央组织部复查王实味问题的时候，查到托派分子王凡西在 1980 年 11 月出版的《双山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就是王实味问题被搁置的原因。

1985 年，王凡西又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一文，声称要“用事实来说明他与我乃至中国托派之间的关系”。王凡西说，他和王实味原是 20 年代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在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后来，王实味与党失去了联络，同支部的几个人也都失散了。1930 年春天，他在上海遇到了王实味，大约有一年时间，来往不到 10 次。同他们来往的还有陈其昌（陈清晨），也是北大同学，还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此时王凡西和陈其昌都已加入托派。他们同王实味谈过托派的观点和主张，王实味同情他们的某些观点，但反对他们“自立门户”。此时王实味已同刘莹（也是北大同学）结婚，生活十分困难，靠写作和翻译小说得来的稿费维持生活。王凡西正在约集几个朋友一起翻译一本托洛茨基的《自传》，约王实味翻译了书中的《纽约》和《集中营内》两章。王凡西在文中对他在《双山回忆录》中所说“……托派（例如王实味等）”这句话作了说明：“这

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着重点是原文有的）。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王凡西文中还说：“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些完全是出于他独立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在促进王实味冤案平反的过程中，当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同过事的温济泽也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谈到王实味冤案平反过程时说：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一直想着，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李老临终的嘱托，常萦绕在我心头。李老和李言都离开了人世，过去他们尚未做完的事，只能由我来完成了。因此，在我看了王凡西的文章以后，就以按捺不住的心情，在1986年11月，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个报告，再次提出为王实味‘托派’问题的平反申请。在报告中，我还建议把从批判王实味，直到‘文革’批判‘三家村’的经验教训作个总结。可是报告送上去几个月以后，因故又被搁置起来。

“1988年3月4日，我再次写了报告。5月13日，中央组织部一位同志打电话告诉我，报告已经批转到公安部，因为王实味的档案在他们那里，并说中央组织部将协助公安部做好复查工作。”

1992年2月7日，终于由公安部作出了为王实味冤案平反的决定。决定说：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 1930 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信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 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至此，王实味在蒙冤 49 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王实味得到彻底平反之时，他的夫人刘莹同志已届 85 岁高龄。公安部派了两位同志前去看望她，把《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送给她，向她表示道歉和慰问，并送了慰问金 1 万元。她看到《决定》上对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她坚决不收慰问金，后来把慰问金捐赠给当地（湖北省十堰市）文联，作为对王实味的一个纪念。

● 蒋南翔忘身进谏

蒋南翔同志在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中，曾先后参加“青委”和“民委”（青委和妇委职委合并而成）的审干和“抢救”工作。1945 年 3 月，他对这场运动进行了认真而实事求是的总结和反思，并写成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上报给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这份材料对人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抢救”运动，极有价值。现全文引用，以飨读者：

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

（一）中央青委的抢救运动

早在抢救运动以前，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中旬，青委本就依照中央原先的指示，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机关的精简工作都已做完。……

但在五月间（即我搬回杨家岭不久）青委和妇委职委合并成立了民委学委会，说是仍将继续审查干部的工作，……因此，没有办法，青委也就只能和职委妇委一道，抛开一切工作，重新关起门来审查干部。

青委合并到民委以后的干部审查工作，不能在此详细赘说。总之，在抢救运动初期，妇委职委纷纷突破，并且他们人多，汇报“思想动态”时可以报告出一大串人的情况（现在已可很清楚地知道这种“突破”“思想动态的汇报”是怎么回事！），而青委当时正式的工作人员仅仅只有四个人，连家属病员在内，一共才只有八个人，正式提出的抢救对象只有……两个人，无法报告得出那么许多名堂，曾因而不止一次地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批评。

在几次批评以后，我抱着一种想把自己工作做好的心情，曾经紧张卖力地连天连夜的工作，以期使青委的抢救工作获得成绩，并有一个时期——抢救运动前后的三、四个月中，我的思想也钻了牛角尖，我完全接受当时抢救运动中所流行的那种思想和作风，我用尽心机从被审查同志的身上找矛盾，找岔子，并没有确实有力的证据，只是抱着一种“死硬”的成见去观察对方，强迫“反省”，强迫“坦白”，企图用各种方法强制被抢救的对方戴上自己所凭空预制的帽子，只感到对方不肯一如自己主观所希望的那样承认问题的可恶，毫没有用一分心思来反省和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

但是，工作是吃力不讨好，我自己那种极端主观武断的思想，也终于不得不逐渐被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所唤醒过

来。譬如说：许多所谓坦白分子，都在语无伦次，莫名其妙的乱咬胡说了。象杨学诚这样纯洁优秀的青年同志，竟被指为“特务头子”了；象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竟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而青委的审查干部工作，也愈来愈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面进行了，诸如此类的事实，都不能不引起我对于这种普遍推行“抢救”方式的根本怀疑，不能不刺激我深深地思索，苦苦地思索，差不多是一日数次地在头脑中盘旋着这个问题。

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月的时候，由于许多切身的实际体验，已使我敢于确定地相信：“青委的抢救运动是根本失败了！”这“失败”，我的了解不同于当时各方面（主要是民委的领导者）批评青委的那种见解，认为青委未能如职委、妇委那样“突破”许多“特务”，因此应该承认“失败”——而是相反地感觉到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的“反特斗争”至少在青委所获得的不是任何积极的效果，只是相当严重的损害！因为同志之间不是增加团结，而是增加隔阂；在草木皆兵的空气下，党与党员的关系不是靠近，而是更推远；同志们的工作积根性和工作效果不是提高而是萎缩；三风不正的毛病在有些同志身上不是得到改进而是更其发扬。……

在一九四四年的四、五月间，听到“一二·九是红旗政策”这类观点，已在不少地方把它作为审查干部的尺度，我感到这样的推演下去，实在干党于革命太有损害，因此我曾直接找过一次少奇同志，简单申诉了我的意见，并且正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抢救运动这种方式是否妥当？

一九四四年的七月间，我参加边区文教工作组到陇东去工作，顺便也看到了那里抢救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马

克思说过：“已经发育的身体，比构成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假使研究延安抢救运动的毛病还如研究构成身体的细胞那样不太显著的话（其实也是相当的触目惊心），那么观察陇东的抢救运动，真就可以说是象观察已经发育的身体那样一目了然了。我深深感觉到：我在陇东亲身身历其境所得到的印象，和康生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中的估计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关于陇东的抢救运动的反映另见附上的材料，兹不多赘）。陇东的抢救运动的情形，对我是提供了这样众多而且有力的活生生的证据，以至不能不使我对于抢救运动的总的方针发生更深刻的怀疑。从陇东回来后，我就想写一个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因为种种缘故耽搁下来。在此期间，曾听了邓发同志在民委检讨会上的两次正式报告，康生同志在中直大会上的一次报告（十二月卅日），但在我思想上仍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仍还是把已在头脑当中盘旋了一年多的疑问，总括的写在下面：

（二）对抢救运动的估计及其方针的检讨

抢救运动所得的成绩和所犯的错误，究竟应该如何估计？我以为仍有严正的重加全面检讨的必要。

“一年的反奸斗争，我们收到伟大成绩。但在执行正确路线时，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是：有的地方因经验不足，对大部不捉的方针，没有及时注意；有的地方对九条方针宣传不够，对宽大政策与争取方针，没有贯彻到底；有的地方不注意调查研究、轻视证据，重口供；有的地方忽视分清是非轻重，对清查特务与保护好人没有完全统一，因此就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错误，基本上是进步中产生的，即斯大林所说的‘实行正确的政策时有了过火行动’……”

这是康生同志去年四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估计。

应该承认，康生同志的这一报告，曾在此次审查干部过程中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它帮助同志们纠正了在抢救高潮中流传下来的许多过左观点，有力地推动和指导了甄别工作的进行。但是，康生同志对于抢救运动的上述估计，我以为仍有值得商讨的地方：第一，对于抢救运动产生错误和缺点的分析（如云没有及时注意大部不捉的方针，没有足够的宣传九条方针，不注意调查研究等），康生同志只是指出了一般错误的现象，并没有指出产生错误的最主要的根源。第二，康生同志对于反特斗争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和客观的事实不完全符合。

我亲身经历和知道得最清楚的中央青委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第一，已如第一节所述，这是一个根本失败了的工作，绝对（我敢于说是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是成绩多于缺点，说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基本上是进步中产生的”。第二，中央青委抢救运动产生错误的最主要的根源，也不是康生同志上述估计中所列举的原因，而是根据中央青委当时的具体情形（审干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有没有再来一次抢救运动的必要的问题（当时我曾提议青委下乡锻炼，已见前述）。

我是这样认识：中央青委除非不“抢”，要“抢”就得“石子里榨油”，非硬逼硬斗而犯“逼供信”的错误不可。因为当时提出的任务是要在十天半个月的短时期内解决问题，在这种短促突击之下的斗争方式和工作态度，客观上也就不可能不鲁莽、不草率。如不气势汹汹地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



认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是大有问题（青委在抢救运动中的遭遇正是如此）。因此，我认为中央青委抢救运动错误的最最主要的根源，是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发动这种“短促突击”的“无的放矢”的公开斗争，这种气势汹汹的“抢救”即已发动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就决然难免。至于康生同志在上述估计中所指的那些产生错误的原因，其实只是说到了比较次要和枝节的问题（当然，不要短促突击的抢救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审查干部工作）。

这是显然无疑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抢救运动中间是相当的普遍，青委绝不是唯一的例子。因此，抢救运动的结果，究竟应该如何估计，是值得全面地重新检讨。

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抢救运动使同志们纠正了自由主义，提高了阶级觉悟，推进了工作效率。然而这些断语，到今天看来，殊有加以“复审”的必要。在抢救运动以后，诚然似乎有过上述积极效果的一方面，但同时绝不可无视这一事实：正是这个抢救运动，它还有产生更多消极因素的另一方面。

在抢救运动期间，所有的坦白分子及嫌疑分子都竭力想表现自己，紧张积极，不敢丝毫懈怠。当抢救运动的紧张空气过去后，他们就泄了气，因而另一方面的消极因素也愈来愈暴露出来了。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们（他们在坦白分子中的百分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是有到处发牢骚、更厉害的发展了自由主义的呢？有的。是不是有工作情绪更加消极、工作效率更为低落了呢？有的。是不是有神经受了刺激，弄得精神失常、语无伦次，以至在好长的时期内都不能恢复过来的呢？有的。是不是有隔阂存在于“抢”与“被抢”的同志之间呢？有的。这种情形是不是个别的现象呢？不是。无

论机关或学校，这种现象毋宁说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因为被戴错帽子和被当作嫌疑分子看待的人是这么多，他们在抢救运动中受了委屈，吃了苦头，自然要在那一个人的心中发生一定的反映，只是各人认识的程度和表现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要求他们完全满意是不客观和不可能的。如上所述，我们把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情况比照一下，那么，我们就显然不能把前者不称比例地夸大起来，当作一种代表的趋势来看待了。

有的说，无论如何，在抢救运动中是比过去抢出了更多的特务，这个成绩是不可抹煞的。对的，抢出一个特务也是成绩，何况抢出许多个。在这个意义讲，抢救运动的成绩是无可怀疑的。但另外还应说明一点，就是这些成绩，究竟是用什么代价而取得的？

假使一个国家，在国内发现了少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第五纵队，因此就立刻颁发全国总动员令，对隐藏着少数第五纵队公开宣战，那么，大家知道：动员和武装起来的将士就要寻找敌人作战，但敌人是非常之少而又非常之隐藏，于是找错对象，自相火并，也就只能命定地成为必然的结果了。在这种盲目的战斗中，虽然也会碰巧击中一些敌人，但却更多地伤害了自己——我以为，这正是前年全党所发动的抢救运动的写照。

如果事后总结，仍还认为这是一次胜利的战斗，因为它击倒了若干敌人，美中不足的仅仅是指挥和作战的艺术还不够熟练，因此在执行正确方针下面有了一些过火行动。那么，这种估计显然不能说是全面的。

其实，只要是下了总动员令，向极少数隐藏着的敌人宣布了大规模的战争，那我们就确定地做了“傻事”。因为我们

最大限度的满足了第五纵队扰乱我们的目的。在发动了战争的前提下，纵然是各级干部都有极丰富的指挥经验和作战经验，能够使自己的部队在动员、调遣、作战的过程当中不受任何意外的损失，事实上这也仍然不能估计为成功的战争，因为在全国动员的战争状态下，正常的建设秩序完全破坏，整个国力的消损，则远非破获若干第五纵队所可补偿的（自然并不是说第五纵队的破坏性不严重，我们可以对他们放任不管）。同样，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大家几乎把一切正常的业务都停顿下来，在这种紧张的时代，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回想在整风学习后，当时有许多同志都热烈地要求下乡，的确是在党内涌起了一种蓬蓬勃勃的革命热情。可惜我们没有适时地把这种革命情绪，引导到各种实际工作（其中也包括审查干部及保卫工作）上去，而是完全把它引导到抢救运动中去，加以浪费了。假使在此期间，让这整风以后的几万干部，带着新鲜泼辣的精神好好下去工作两年，那么，不论对党的工作，对干部本身的锻炼，都将获得比现在更好的结果。

因之，抢救运动中抢出了特务，若就单纯的保卫工作的观点来说，这自然是有成绩的；但若就党的全面的利害得失衡量起来，那应说是得不偿失。其实，审查干部的工作，完全可以不采取这种抢救运动的方式而进行，并且能够进行得更稳当和少发生毛病一些。

有的说，抢救运动是成功的，我们获得了很宝贵的经验，这种经验是有历史意义甚至是有世界意义的。诚然，我们是从痛苦中获得了很可贵的经验。但从一个运动获得经验是一件事，而这个运动是否成功，是另一件事。我们可以说是从大革命时代的陈独秀主义与冒险盲动的立三路线获



得很宝贵的经验，并且说这种经验是有历史意义，但却不能不说大革命和立三路线是失败了（自然抢救运动的错误和立三路线等的错误是有原则上的不同，下面还要说到的）。

有的说：历史不能腰斩，抢救运动是从整风运动中的坦白运动发展而来，它的某些缺点又在下一阶段的甄别工作当中得到纠正，坦白运动、抢救运动、甄别工作形成着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个运动，它是有很大的成绩，它是基本上成功的。所谓整个运动基本成功，若是广义的指整风运动而言，自然是对的。若是就审查干部的范围说，那么我们只能说，坦白运动发扬了每个人对党坦白的自觉性，甄别工作纠正了抢救运动的过火偏向，二者可说是基本上成功的。至于其中抢救这一部分，我们就不能不说是更有更大毛病，其毛病就是轻率地对不很确定的假想敌人下了广泛的总攻击令，这显然不能估计为仅仅是技术上的错误，而应估计为这一阶段或这一部分（仅仅是这一阶段或这一部分）的基本方针有了毛病。我们这样认识，并不是对“历史的腰斩”，而是对问题的具体分析。

即如前年八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的决定，这是抢救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给反奸斗争指示了许多正确而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它明确地提出“一个不杀”和“分清是非轻重”的方针，保证了抢救运动没有陷入“难以挽救”和“不可收拾”的窘境。但严格地检讨起来，这个决定就依然有其缺点，缺点就是它基本上批准了当时对于特务的夸大估计，如云“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批准了运动中的那种斗争方式，批准了而且推动了一次前面所已说过的错误的大规模战争；这就不能不在某种意义上助长抢救运动的错误的蔓

延。例如延安以外的各地抢救运动，就都是开始在这一决定发出以后，但他们仍不免于重犯延安的错误，甚至他们把延安各种抢救的方式加以翻版，加以发扬光大，因而造成了更大的偏向。因此，假使现在有一个什么地区又要进行类似的“抢救运动”时，那么我们最妥当的指导方针，就是应该要他们赶快停止这种带有损害性的盲目斗争，采取另外一种更妥当的处置。

抢救运动——这种没有确实把握的发动全面的短促突击的反特斗争，我以为并不是整风运动中值得保留的组成部分。抢救运动的发动，我以为在整风运动中是“画蛇添足”，是美中不足。

(三)关于抢救运动的群众路线问题

关于群众路线的问题，是此次抢救运动当中值得特别提出来检讨的一个问题。

共产党做任何工作，都需要依靠广大群众。此次抢救运动中，提出反奸工作的群众路线的主张，在原则上是毫无疑问地正确和必要的。但群众路线在反奸工作上应该如何具体应用？应该运用至何种程度？这就还有更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必要。

在抢救运动中所表现的群众路线，就是所谓“高度的群众运动”，最主要的，就是抢救运动所采用的普遍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会，所谓要“将群众发动起来”要“发扬群众的火力”，要“善于掌握群众情绪”等等，事实上也正就是指领导群众斗争大会而言。

对于在抢救运动中所组织和发动的那种普遍到每一角落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会，即所谓抢救大会，我是这样认识：这根本不能被看作是反奸工作中的正确的群众路线的

运用。因为这不是正确地启发了群众的警觉性，而只是无止境地发扬了群众的盲目性。

对于“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了解：马克思说：理论掌握群众，就成为物质力量。我们所要求的群众路线，也正应是正确理论掌握下面的群众行动。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理论指导下面的群众行动，才能产生最伟大的物质力量，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群众路线。但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作领域，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特殊规律；因此，我们也要要求须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群众行动，来适应各种不同工作领域内的不同规律。因此，我们不能有抽象的一般的群众路线，只能有适应某种工作规律的某和具体的群众路线。例如农民运动所要求的群众路线是一回事，反奸斗争中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又应是另一回事。不问何种场合，不问具体的工作性质，都简单地把某一种固定的内容（如云“发动群众斗争火力”之类）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商标和万应灵药，那是不恰当和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农民的减租斗争中，只要能够把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发动起来，就可能取得胜利；但在反奸斗争中，问题就决不如这么简单。在我们统治下，内奸是以非法的地位和隐藏的面目存在，我们要取得反奸斗争的胜利，关键不在于是否缺乏对付敌人的斗争火力，如象农民的减租斗争那样；而是仅仅在于是否能够正确无误地认出他们的内奸的面目。内奸一经识破，那就等于被解除了全部武装，不能再作任何有效的抵抗。因此，我们在反奸斗争中所要求的群众路线，主要应该是怎样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来帮助识别内奸的问题，不是要依靠群众力量来镇压特务的问题（在我们政权下，镇压内奸的力量是绰绰有余的，不成问题的！）。但在抢救运动



中所普遍盛行的群众斗争大会，假使现在冷静地检讨一下，那么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承认：那种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地进行考察和识别内奸的工作。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是成了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依靠群众来做打气加油的啦啦队！所有这些，和搜集真实材料、判断客观情况，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完全沉浸在群众狂热情绪下面的斗争大会，相反的结果只是使得大家的头脑愈来愈偏激反常，视线愈来愈模糊混乱，事态也愈来愈扩大化。这种所谓“群众路线”，如果不是中央提出“甄别工作”加以补救，如果还继续“听其自然”地发展下去，辗转牵连，那就不知要弄到怎样“不堪设想”的地步。然而这种带有盲目性的群众斗争大会，却一直被认为反奸工作中群众路线的重要部分，这真是对群众路线的莫大误会（自然绝不是说群众的斗争热情不好，而是说用错了地方）。

群众性的反奸大会不是不可以开，而是要开得很慎重。譬如我们的《解放日报》，它随便发表虚伪和错误的东西，那么就会在群众当中引起极大混乱，起着非常有害的作用。同样，群众大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无异是一份活的“解放报”，而所有参与群众大会的人，也就是这份活动报纸的认真的读者，他们都从这份活的报纸（大会）上得到党的暗示，得到行动的号召。因此要开这种大会，也必须尽量求其正确真实，不能随便发动没有确实把握的群众斗争大会，以免造成不良后果（此次抢救大会就是现实的例证）。

邓发同志曾几次以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来为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过左行为辩护说：大革命时大家

责骂湖南的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的时候，毛主席却偏偏说是“好得很”。现在许多同志也批评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过火了，他也要说这种群众的斗争热情是“好得很”。但是，这样的看法是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湖南农民运动和边区反奸斗争的具体区别。

在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把地主打翻在地上，并且还要踏上一只脚；那种打击是毫无错误地落在地主阶级身上的；毛主席拥护这种“过火运动”，是发扬了广大农民的解放自己的斗争积极性。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群众的种种过火行动，现在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赞成这种过火行动，客观上就只能是鼓励党内的互相猜疑，盲目斗争（自然奉令作战的群众斗争热情还是好的，他们无可厚非，但事情的是非曲直仍应弄清楚，庶可作为前车之鉴，不致重犯错误。特别是指挥群众作战的领导者，更不应不从痛苦中接受教训）。

反奸斗争是一种比较专门和复杂的斗争，不是较有专门知识的专门人员，不容易熟练地掌握这和专门和复杂的斗争，虽然一般群众能够在反奸斗争中发生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必须有意识地加以充分的注意和运用（过去忽视这种作用是不对的），但另外却必须承认一般群众在带有专门性的反奸斗争当中所起的作用，仍是有其一定限度，假若给予的任务是超过他们所能胜任的程度，那就反而会把事情弄坏。

为了保证广大人民身体的健康，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推行广大的群众卫生运动：如进行医药卫生的宣传教育，提倡科学的卫生习惯等等。并且这种群众卫生运动能在广大人民的保健工作上面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但是假使发生了

严重的疾病，或是发现了严重疾病的征候，那就应请专门的医生来医治和诊断。假使大家随便按照一点一知半解的医药卫生常识，就大胆地乱投药石，甚至乱动手术，那就会发生很危险的结果。这里就得承认群众卫生运动在保健工作方面所能担任的任务，是有其一定的限度。同样，为了保护党的纯洁，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推行群众的防奸运动，打破保卫工作的神秘观念，进行普遍的群众防奸教育，加强群众性的锄奸工作（如把破获特务的典型例子作为群众的防奸教材，利用群众大会、出版物、展览会等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来提高干部和一般群众的政治警觉性和反奸斗争的知识），以及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随时在日常的各种实际活动中，进行盘查或检举混进来的坏人。这种群众的防奸路线，就能使党在反奸斗争中获得最众多最明亮的群众的耳目，大大增加破获特务的可能，减少特务活动的间隙，给予我们的反奸斗争以极大的支援。但是远远地赶这个限度，完全放任所有无经验的群众“瞎子摸鱼”，捉迷藏似的在一切自己的队伍之中乱找特务，乱作斗争，并名之为反特斗争的群众路线，这就无异叫所有无经验的人给自己周围的一切真伪莫测的假想病人乱投药石，乱施手术。其结果当然就要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了。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我们仍要说“这是群众路线”、“这是好的经验”，也未免太勉强了。

（四）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

此次抢救运动中，在审查新知识分子工作上而，产生了最普遍和最突出的偏向。

康生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的报告中，对新知识分子的问题，曾作了这样的指示：

“在坦白运动中，又增长着不相信新知识分子的情绪，

或怀疑其中很多人是特务，甚至有的工农老干部有报复主义的宗派思想，这也是错误。不相信新知识分子，对他们歧视，或对他们报复的宗派思想，要彻底克服。”

康生同志上述的意见是正确的，它纠正了许多对于新知识分子的偏见。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偏向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单是说对新知识分子有宗派思想，还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一问题。

知识分子审查工作所以产生偏向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由于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我们有了错误。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认识和政治估计上的问题。

不管自觉不自觉，不管承认不承认，在抢救运动中，是暴露了我们在政治认识上的模糊，暴露了我们对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真理这一点，还缺乏深刻和坚定的信心！

虽然我们平时也都抽象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马列主义能够战胜任何党派的思想，取得最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拥护。但在此次审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们自己完全推翻了这种前提。对于一般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教育，做好几年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是坚决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种观点出之于我们共产党，说来是非常可怪的，但事

实确然是如此。例如陇东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里在抢救运动中，正式肯定了这样的观点：国民党于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听说这种说法是西北局已故的李景波同志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提出来的）！因此，陇东的外来的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抢得所有的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

第二个问题，是组织上的干部政策问题。

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但知识分子和工农同志是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而来到革命阵营里的，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方面，都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这样，主观上虽然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也是不可能了。何况有些工农干部，甚至很负责的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干部抱有一种宗派主义情绪，自然就更是“火上加油”，一发不可收拾了。明明是内科医生，偏偏要叫他们动复杂的外科手术，在干部政策上讲，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于知识分子党员信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上的具体

反映。教条上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动摇的阶层，它不是无产阶级的亲骨肉。因此在反奸斗争的抢救运动中，知识分子党员就受到了“另眼相看”的待遇。但是我们竟没有全面地具体地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看一看：在他参加革命以来，到底做过些什么事？起过了些什么作用？这种活的革命历史和革命行动的实践，本应是鉴定一个阶层和一个党员的最主要和可靠的尺度，至于反映那些实际活动的文字上的材料（如自传表格、证明信等）和口头上的材料（如口供、谈话记录、讨论会上的发言等）和实践相比，只能居于比较次要的辅助地位。因为和整个实践相比，那些反映实践的材料，不能不是比较带有片面性，同一事实在不同角度的反映之中会有距离，甚至同一事实在同一人的反映之中也会因时间和认识的不同而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唯有活的主要实践应被确认为第一重要的鉴定尺度。但在抢救运动中，我们的主要论点，却常常不是从整个实践出发，而是比较带有片面性的从文字和口头的材料出发。自然，研究实际历史，也并不能离开材料，因此绝不是说不要重视材料，而是说材料必须联系实际，并以实际为主来研究。假使把一个人的实际历史完全放开不提，单单从他的自传、证明材料等等来研究，那么可以断言：我们可以从任何人的材料之中找到某些仿佛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从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起来的思想逻辑，应用到另一个经历并不相同的人的历史材料上去，很难完全吻合而无丝毫分歧。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抢救运动中，所有被抢救的人，几乎就无例外地都从他们的材料之中找到了“问题”了，但是现在甄别的结果已证明：这些所谓问题，有极大一部分，都不是客观实际存在的，而是从歪曲的材料或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上

产生出来的。

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分子受打击）。虽是经过甄别工作，时局又处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情况没有也不致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但这次留在他们精神上的创痕是确实划得相当深，而且至今没有完全平复。抢救运动后，我在延安和陇东，曾接触了不少抗战前平津知识分子同志和抗战后的大后方知识分子同志，有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一二·九”运动和抗战以后，大批知识分子涌进了党来；屈指计算，已将十载。在这将近十年的时期中，他们在党内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起了些什么作用，这笔历史的账，是容易考察清楚的。我以为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加进党内来，对我们整个党说，是输进了一些新血液，增强了一些战斗力量，无论在前线后方，无论在那个部门，他们都为党做了若干工作，并有许多已为革命而英勇地洒了最后一滴血。他们应该和工农同志同样被看为是党的一种宝贵财富，无分轩轻地受到党的信任和爱护。

自然，工农同志有许多优点，新知识分子有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能相容，是毫无疑问的。但缺点可以克服，克服知识分子缺点的主要方法，是要让他们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这是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所明白指示了的。因此我们对待新知识分子，应该是尽量放手让他们到下面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使他们

的文化知识能有机会和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方面新知识分子就能在深入的实际锻炼中最有效地改造自己，另一方面又能使他们的文化程度，转化为各种实际工作上的创造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工作（如陶端予同志下乡获得良好的成绩，就是一个具体例证）。

应该承认：已经有了好几年党龄的知识分子党员，究竟和一般党外的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吃苦耐劳，为人民大众服务！”他们大多是有这种决心和精神准备的。因此，党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领导他们走上中央已提出过的“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道路，使他们能够深入工农兵的群众大海中去接受真正“工农化”的洗礼；不必对他们的知识分子出身抱一种太保守的观点，始终把他们看成为只会看书写字的书生，并把他们的工作范围，也比较地囿于文化娱乐宣传教育一类的狭小圈子内。假使能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发挥知识分子党员的积极作用。（我不是说要无原则地提拔知识分子，而是要知识分子尽量做下层工作，在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中去受锻炼。）

一九三九年《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及一九四二年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所提出的“容”“化”“用”三项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决定的精神，可惜至今没有为全党所接受和掌握，在此次抢救运动中，此点暴露得特别明显。现在有许多地方（自然不是一切地方）还确实存在着这种事实：领导上无条件地对知识分子抱着某种“戒备”心理，使他们在工作上面无形之中受着约束，不得舒展。另外是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同志，好多年来，都壅塞在上面的机关学校中，无法接触到实际。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正当的现象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

(五) 几点意见

对于整个抢救运动的认识,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意见;

1. 抢救运动在反奸工作上面虽然获得了相当成绩,但另一方面却使党受了很严重的损失,而且把成绩和损失相比较,应该说是“得不偿失”。本来只是局部机体的病症,我们却小题大做,施行了全身麻醉的大手术。局部机体的病症虽然治好了一点(也仍不能全部根治的),但整个人的元气却大大损伤了。

2. 在抢救运动中,整个组织方针有毛病。中央早就提出的宽大政策,毫无疑问是反奸斗争中的完全正确的方针,但在此次抢救运动中,实际上并没有能正确的掌握这一基本方针。从四三年四月……起,以后康生同志《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全延安安全边区的狂风暴雨般的抢救大会,以致抢救大会后的人生观学习(在民委变成了一种强迫反省强迫坦白的组织杠子)等等,只要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当时的所谓宽大政策和争取方针,事实上只是成了一种口头上的陪衬说法。我们对于一切假想的特务分子说:“坦白了可以宽大,不坦白就要镇压!”这显然是把镇压作为我们最后的王牌,实质上还是强调了镇压的精神。抢救运动中的组织路线,是此是和宽大政策的正确方针发生了分裂了(宽大政策应以真凭实据的事实和感化为后盾,不能以镇压为后盾)!

应该承认:我们在群众大会上广泛地对一切不可知的假想特务“将军”,这不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而是多少抱了一些“侥幸心理”办事。但这次的实际经验又一次证明:这种违背了马列主义指导原则的侥幸心理,是不足为

训的。

3. 抢救运动的偏向发展得这样普遍，而且继续得这样长久，暴露了我们党的领导上，是存在着很严重的弱点。第一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许多领导同志，对于自己直接领导下面的同志，除了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认识他们的面貌以外，其余一切，他很少甚至毫不了解；这自然是由于他不想去虚心地仔细地认真了解下面情况的结果。由于存在着这种上下脱节的官僚主义领导，因而在抢救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乱怀疑乱点将和扩大化的现象。第二是领导上的缺乏民主精神。在抢救运动中，很多领导者往往绝对地只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当作不可动摇的“唯一真理”，对于被“抢”同志的申诉呼吁，或是其他同志的任何不同意见，只要不合自己胃口，就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丝毫不加考虑。此种专断的不民主的领导作风，就不得不自己闭塞自己的头脑，对于下面的真情实况熟视无睹。因此不但助长了错误的发生，而且使错误发生之后，也不能及早地看到和纠正。

今后党内的领导，必须注意贯彻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领导上要真正熟悉下面同志的情形，特别是要尊重每个同志的“党员权利”，没有完全确实根据，不能随便对任何同志滥用“党外斗争”的方式（自然并不是否定严肃的审查工作之必要）。

4. 但抢救运动的偏向，没有一直发展下去，而是得到了纠正。这里应该是表现了中央的伟大的坚强的领导。就在抢救运动的最高潮，中央也仍慎重地坚持了“一个不杀”的方针，并且又提出和实行了甄别工作，最后把抢救运动中的偏向纠正过来。依靠了中央的领导，我们才能最后掌稳了使抢救运动改正方向的舵。因此，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抢救



运动虽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是和内战时期的肃反错误有着原则的根本的区别，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肃反是一直肃到底，而且开刀杀了人，抢救震动是不但没杀人，而且走上错误道路，就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央连忙拉回了头。

5. 关于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希望中央能够根据各方面的特别是下层的实际情况，正式答出详细的全面的总结。这样既能帮助全党同志正确地接受此次从痛苦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又能在这一问题上面使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帮助全党同志的真正团结。抢救运动以后，下面同志之间由于在抢救运动当中所造成的隔阂，至今没有完全消除。例如中央民委虽曾开了几十天总结会，但在思想上就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认真检讨过。许多人感觉到：抢救运动后，领导上的解释辩护是多了一点，诚恳和虚心的自我批评是少了一点。因此在中央的总结中，我以为应该包括自我批评的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许多领导同志放得下自己的架子，进行彻底的检讨；才能帮助把问题弄明白，使大家心悦诚服。此次运动所涉及的范围是这样宽广，对于相当多的人，这是一段提起来就叫人伤心的血泪史，要是缺乏严肃的足够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不能最后达到“搞通思想，团结全党”的目的的。

6. 最后，我们应从此次抢救运动得到教训，从此废止在党内进行“普遍肃反”这种反奸斗争的方式。因为当这种大规模的党内反奸斗争一旦发动起来，不问名义上是叫“肃反”还是叫“审干”，如下的现象也就必然会随之而生：第一，大家精神上先抱着一种主观的成见去观察事物，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特务如麻”的思想很难避免。第二，斗争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确定的战线，斗争火焰不分前后左右的到处延

烧开来，势必牵连不已，引起混乱，使党陷于孤立（抢救运动中，弄到各单位几乎很难找到可以被全党安全信任的党员，实际上党是很孤立的）。第三，互相猜疑，容易助长党内的宗派主义倾向，造成党员的中间的隔阂，分裂党的团结。第四，我们的行动完全暴露，敌人站在暗处，反使他们容易混水摸鱼，得到可乘之机。类似这种情形，无论从此抢救运动，从过去的历次肃反运动，我们几乎是无例外地得到了非常沉痛的教训，这是十分值得我们警惕的：在我们的统治下，我们真正受到特务破坏的损害恐怕倒是比较少，受到肃反运动的损害恐怕倒反要大得多。因此，这种党内大规模肃反性质的反奸斗争，这种已在屡次实际斗争中证明是有害的斗争方式，我们实已到了应该给它作出否定的结论的时候了。

自然，废止这种普遍性的反奸斗争，并不是主张从此对于特务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也不是主张在反奸斗争中不要依靠群众性的检举，而是主张以更慎重和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反奸斗争和审查干部工作，使我们在反奸斗争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中，不至同时产生另外不良的反作用。假使我们对于吸收党员入党就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经过一定考察，以后又经常在实际工作当中，具体审查每个同志的革命品质，不犯官僚主义。那么就不会在党内普遍存在庞大数量的特务——也不用在党内进行使全党发生剧烈震荡的大规模肃反运动。这是对工作采取最慎重的态度，同时也就是对工作采取了最严肃的态度。

以上所述的一些意见，不知是否正确，希望得到指示。

一九四五年三月

第六章

掌上风云

●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文坛狂飙○《武训传》激起惊雷
○“小人物”征伐俞平伯●奇冤如梦命如丝○胡风“三十万言书”○怆然“别姬”○苦狱生涯●“莎菲女士”的遭遇○丁玲泪对千人指○定案在先，对证于后○苦役无边●梁漱溟雷犯毛泽东，○“以笔杀人者”○暴风期中的沉默

时过境迁，往事一去悠悠。

然而，这以文罹难，千人缘坐，亦可悠悠一去吗？这言出祸随，恢恢文网，亦可滑出历史，甚至溜出几代人的记忆吗？那布衣寒水之悲，文人秋风之别，昭示了中华民族又有过怎样令人遗憾的历史。历史就是历史，非篆非隶，非正非草，一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自有真谛和精义。回避吗？莫如正

视抑或正听：

镣声啷当，胡风怆然“别姬”……

荒老星穹下，俞平伯陷入口诛笔伐的人民战争之大海汪洋……

北国荒村，苦役绵绵，丁玲与丈夫相对无言，又作断肠搥别……

细弱的小路上，残叶摇着寒夜最后的信念，独立其间，梁漱溟怅然哀然愤然默然，不忍问苍天！

让我们怀着对生活与历史的忠诚和深沉的责任感，重返当年的岁月深处，寻找我们伟大民族有过的失落和迷误，作尽可能本质的考察与探索，以自珍自重，无愧这般灿烂的苦难，无负后人。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文坛狂飙

《武训传》骤起惊雷

一部普普通通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如此引人注目，是空前的，但以后的历史表明，它还不是绝后的。这部影片名字叫《武训传》，从1951年初公映以后，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拥有广泛读者的《大众电影》杂志将它列为本年度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作为一种艺术评论，最初的分歧观点出现在3月底。起初由《文艺报》发表署名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指出这部影片大肆宣扬“乞讨设教”的武训精神，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接着，该刊又发表一篇批评文章，认定“影片降低

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战斗力”。这篇文章，也许有其深刻的背景，也许只是一种艺术观点分歧的探讨，总之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真正的难忘的一页，是在5月20日翻开的。

《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赫然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宣称：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这样严厉的诘问，在全国引起剧烈的震动。绝大部分群众并不知晓，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毛泽东主席于日理万机之中，一直关注着这场争论。他的结论很快就做出了。他还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争论在党内的思想意义，便厉声责问：

“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无疑是在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又一发展。他以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与威望，使得全党闻风而动。也就是这一天，《人民日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参加这场事关重大的批判运动。

序幕正式拉开了。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这样评价这场批判的背景和意义：

1951年，党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从生物学研究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将知识分子从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他们大多数人是曾经受其熏陶的——轨道转变到苏联

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轨道去。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清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向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对《武训传》的批判中,部分地表现了这种努力。

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也鲜明地指出批判运动的目的。党的号召下,仅在五月、六月、七月,就掀起了批判《武训传》及有关评论的高潮。

5月21日,上海就召开讨论会,与会代表共200多人,分别来自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华东文化部、教育部、新华出版社、上海市文化局、教育局、文联、教育工会以及电影界。这一地区的文化界领导人不得不作沉痛、真诚的检讨,严厉批判自己的错误,计有黄源(华东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长)。

舆论攻势还在进行,如暴风雨般,难以抵挡。据不完全统计,从《社论》发表之日起到8月底,《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消息动态达100多篇,《光明日报》发表了30多篇,上海《文汇报》发表了100多篇。这些文章中有不少是有关人士的自我批判。

与此同时,批判运动还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延伸到对武训其人的历史调查,当然,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不仅仅是一部电影问题,但是步骤那样快,是出人意料的。

《社论》发表不到两周,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达20多天,遍访150多人,遍查各种县志、著作、地亩帐、匾额、文集、土地契约、碑文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青以“李进”化名参加这个调查团。这是这个女人政治生涯的正式开端。

行前,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一句话，涉及对电影《武训传》的评价与歌颂者的错误的性质。在这里，历史影片的文学性与文献性之间的差别是绝然不存在的。

调查报告写就，题为《武训历史调查记》，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在1951年7月27日至28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报告的结论是：

“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在这样的结论而前，原先对武训的赞词就显得格外反动：“劳动人民的典型”、“文化翻身的旗帜”、“表现了勤劳智慧的崇高品质”，这些言词的作者在劫难逃了。

风暴继续横扫，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各界都进行了大讨论，以《武训传》及其教训为由，对本专业的传统思想和学术观点进行清理。许多教授、学者开始真心诚意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

对电影本身的批判丝毫没有放松，不少文章指出，应该挖出编导者主观愿望上的“反动政治企图”。于是，在1952年6月3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出现了《武训传》导演孙瑜的“检讨”：

“我给武训这具封建僵尸穿上了假革命的外衣”，“宣传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改良主义”，影片是“反历史、歪曲历史、捏造历史”。

连扮演武训角色的赵丹也感到无所适从，他被告诫，表演应该壁垒分明地体现出阶级内容。更为严重的是在大批判过后，新成立一个“电影指导委员会”，江青在其中操掌影片制作的生杀

予夺之权。在“委员会”的指导下,1952年全国只生产5部故事片,而在1950年为39部,1951年为12部。电影事业成为最直接的遭殃者,陷入停滞境地。

从此,文学艺术和学术理论的批判失去了独立的地位,总被严厉的政治批判所取代。文艺批判本身也陷入严重的教条公式中。连周扬在1953年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都承认,出现了“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和“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

时过30多年,中国意识形态战线的主要领导人胡乔木在一次会议说道:

“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部影片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影片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

胡乔木的这个讲话是在1985年12月发表的。

“小人物”征伐俞平伯

批判电影《武训传》不久,也就是在1953年,中国文化界又惊飙骤起。事情是两个年轻人引起的,毛泽东把他们叫做“小人物”。

1953年5月,《文艺报》(第9期)刊文介绍红学家俞平伯的新著《红楼梦研究》,并评论说,它“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不久,两位刚刚从事文学研究不久的后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他们天真地致信《文艺报》,发出可爱的提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

他们的信被搁到了一边,不久就进了纸篓。

见得不到答复,他们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寻求支持。结果,该校学报第9期全文发表了他们的文章。

于日理万机之中,毛泽东又注意到了这场争论,特别是青年人的文章。

9月中旬,江青的座车驶进《人民日报》大院,找到负责人,要求转载该文。该负责人不知深浅,居然答曰:“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不予转载。江青不动声色扭头便去。

事情刚刚开始。第二年《文艺报》(第18期)转载了李、蓝的文章。问题是主编冯雪峰亲笔加了一个“编者按”,小心翼翼地称:“这两位青年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加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加全面。”

不久,《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又发表了李、蓝另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核心还是指责俞平伯否定《红楼梦》一书的“反封建宣传”。

过了不到一周,10月16日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有关领导人,收到一份文件,打开一看,是毛泽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亲自发话了: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

并往往加以阻挡，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是对三十多年以来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10月28日，《人民日报》开始对《文艺报》攻击，指责其“阻挡在前”，“压制于后”；进而批评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长期以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屈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

连轴转的批判会，在毛泽东发话的第三天就开始了。18日，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信，先作初步的思想检查，过了两天，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讨论会，承认《人民日报》的指责，认为清除胡适派唯心论的影响是“迫切任务”。

又是一场极其严峻的政治批判。

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连续八次，讨论同一问题，并最后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认定其主要错误是：“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

会议决定，改组《文艺报》领导机构，另组编委会以加强领导。

批判《武训传》的招数又在重演，全部报刊一边倒，无数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竞相发表，一时间“红学热”席卷神州大地。各式各样的帽子满天飞，长长短短的棍子到处抡：

“红学”，是一个思想大战场，是各个不同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一场尖锐斗争；

“新红学派”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

这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

这是胡适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配合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散布民族自卑感；

为帝国主义的“文明”和“理论”张目……

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我们必须战斗》断言：俞平伯的文学见解“不但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封建的”、“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

声势越来越大，调门越来越高，引起全国的强烈震动。意识形态形势骤然恶化，弄得文学界、理论界、思想界人人自危。

过了两年，1956年5月26日，在怀仁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到了这场对俞平伯的政治大围剿：

“现在检查起来，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做得对的，在分寸的掌握上也大体是对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

这种表态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央决策层对批俞平伯运动的想法。

早在1954年12月8日的联席会议上，郭沫若以《三点建议》为题发表讲话，指出：这场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的一个重大事件”。他号召，“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的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工作者，报纸杂志编辑人员，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

争中来。”

他的号召是很有感召力的。

一场更大的批判运动展开了，矛头同时指向胡适。到 1955 年 3 月，这个讨论会共举行 21 次。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了通知：《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1955 年 1 月），《进一步在全国人民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1955 年 3 月）。

胡适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许多学术领域颇有见解，于是，就需要每个领域的无产阶级权威来予以分门别类的批判：

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孙定国、金岳霖、张世英等人集中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

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曾文经、汪子嵩、孙思白则以胡适的政治思想为靶子；

范文澜、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则对胡适的历史思想深揭狠批；

何其芳、游国恩、刘绶松、蔡仪、王瑶、余冠英、陆侃如、冯沅君把胡适的文学思想彻底否定……

至于那些曾经与胡适同过事，有过交往或受过其影响的学者，在批判胡适的同时，还必须检讨自己，否则，难以过关。于是就有了沉痛的自责与交待，这些人士其中有：罗尔纲、罗根泽、周汝昌、冯友兰、贺麟、李长之、吴景超、向达、陈友松等。

还是过了 30 多年，1986 年 1 月 2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说道：

“1954 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指俞平伯）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

取的双百方针……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1986年11月,《光明日报》文载:

胡适“一生著作丰富、桃李遍天下,对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称得起一代宗匠”。

●奇冤如梦命如丝

胡风“三十万言书”

1951年,新生不久的中国文坛,经历了几次颇具规模的批判以后,气氛紧张起来。特别是毛泽东,在着力抓抗美援朝、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关注着文艺界的动向。作家们被新生政权的朝气鼓动着,迫不及待地拿起笔来,书写他们的感受、思考,其中一些以特有的文艺创作主张为基础的作品,刚一问世,便激起巨澜大波。从小说、诗歌到戏剧、电影,争论纷起,或学术主张不同,或政治棍子的乱抡……毛泽东亲笔写就关于《武训传》讨论的文章,称《武训传》及其一些作品表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领袖的言论,立刻引起主管全国意识形态宣传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惊恐。从9月起,连续召开会议,直到11月,在一份关于领导责任的沉痛的检查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决定:在文艺界进行一次整风,借以清除不正确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确立党的文艺方针和对文艺工作的绝对领导。全国文联在11月份开会表示拥护。

胡风早在1933年7月,便在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并从事文学理论工作,和鲁迅等人配合,与国民党反

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1936年，他与鲁迅、冯雪峰等共同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建国后，曾历任第五、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等职。因其独特的文艺理论及其强大的影响，也因其好友在文坛上过份活跃地实践他的主张，而变得极为引人注目。特别重要的是从三十至四十年代，直到建国初期，胡风在宣传自己的文艺理论时，不断与文艺界领导人发生冲突。更难以容忍的正是他的那些理论始终是左翼革命文艺理论的对立而，建国以后，则成为一种非主流思想潮，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这样，文艺界整风以胡风文艺思想为靶子，是理所当然的。

胡风，这位耿直的理论家，曾经满怀真诚与激情咏唱：“毛泽东！毛泽东！/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的力量/汇集着活在你的身上/你抓住了无数的河流/他们的意志/汇集着活在你的心里/你挑起了这一部历史……”

他也在担忧，越来越多的人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武器，来攻击他本人的文艺主张。对此，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好友路翎因为“仍然公开宣传胡风的文艺思想”而遭到严厉攻击。为此，胡风在1952年2月28日给路翎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这样看来，以某为首，是在布置一个谣言阵地了。我想，应该慎重处置。”

可见，胡风的神经已经被触动了，如何办法，他还是仅局限在与好友的通讯中发发牢骚。但是，利剑已经落下来了。

一位“读者”来信出现在《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第15、16号）上，第一次提出应该在文艺界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批判。他看到这份通报时，已经是4月初了，《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早已印制好。他当然明白，这决不是供学术研究用的。

不久，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到上海，受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副部长彭柏山之劝,胡风与这位领导人见了面。

在这次谈话中,胡风开始明白自己“问题”要害之所在。在他后来的《三十万言书》中回忆说:

“××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

这次谈话表面上没有闹开,还相约以后再谈。但局势已经使胡风感到不妙了。也还是听从彭柏山的劝说,胡风开始写一篇学习毛泽东《讲话》的体会文章,以争取主动。他提起笔来,感到字字沉重。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写理论文章,而且不是直抒胸臆。停顿良久,他写下偌大的标题:《学习,为了实践》。这篇文章由彭柏山带去北京送审,胡风又专门附一封信给周扬,诚惶诚恐至极。但回复是“没有作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又命胡风北上首都参加关于他的文艺思想的讨论会。

车轮还未启动,胡风心神不定,随手翻开带上车未及看的《文艺报》(第66期),顿时浑身冰冷:

又是“读者”来信!

又是要求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关于七月会议,周恩来有指示: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意见,平心静气的好好地谈。文艺界领导人在传达完指示以后,依然剑拔弩张。

胡风邀见文艺界领导人,却被推说忙,不见,又约见《文艺报》主编丁玲,被告知,本人不搞理论,很快离京出差,不便谈。胡风就成为一只孤零零的羊。

依照周恩来的指示,胡风还是写出《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但“鬼门关”还是没有迈过。

9月6日·北京金色的秋天,万里无云,胡风心头却愁云密

布,坐在“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会场里,满耳是批判、斥责、嘲笑。这样的会成为马拉松式,11月26日,第二次;12月11日,第三次;12月16日,第四次;到第2年1月29日,全国文联开会,举行胡风文艺思想讨论报告,胡风在北京已经滞留了三个多月,这次会议却被排斥在外,不准予参加。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胡风小集团”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来。到2月份,讨论结束了,但冤案已经铸成。

胡风已经被搞臭了,像一条死狗一样,被扔在角落里,无人理会。

但是,这位刚烈的理论家,思维机器没有停止过运转。他关注着文艺界的生机在消失,反思自己的经历,沉默一年后,在众多朋友们的协助下,写出一部洋洋洒洒三十万言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胡风的众多朋友伸出了帮助之手,为他提供材料、见解,他们哪里知道,这些手日后被牢牢地捉住,他们是:卢甸、阿珑(天津)、欧阳庄(南京)、耿庸、罗洛、张中晓、贾植芳(上海)、方然、冀沅(浙江)……

怆然“别姬”

1954年7月22日,胡风心情格外激动,他邀见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神情庄重地向习双手递过《意见书》:

“请转交中共中央、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他一字一句地说。

在报告前的附信最后几行,工整地写道:

“我热诚地希望得到中央的审查;

“我热诚地希望得到中央的批评和指示;

“我要遵照指示随时做补充的检查；

“我要担负我应该担负的任何严重的责任。”

大约过了三个多月，胡风在给张中晓的信中，喜孜孜地传递了重要的消息：毛泽东主席通过评《红楼梦》事件批判《文艺报》，还要公开出版《意见书》。

可是，胡风高兴得太早了。

12月8日，在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连续批判《红楼梦》研究问题以后，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发出了呐喊：“我们必须战斗”。郭沫若、茅盾都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第二天，《人民日报》迅速向全国传达了这一信息，这意味着对胡风的公开批判已经展开。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扬的一段话：

“胡风先生实际是在反对‘学究式的态度’口号之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藉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

事态在日益升级。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对胡的意见书作了如下结论：“他的意见书系统宣传了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肃清他的影响。”1月26日，党中央批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大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工作来看待。”

胡风此时意识到自己的失策，但为时已晚。他的出现，使早已开始的思想文化界的思想改造运动达到新的层次，在给方然的信中，他慨然长叹：

愧对战斗者们！

权衡再三，他在1月11日写出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进行前所未有的自责。与此同时，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们，要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有所准备。

他哪里知道，不久，毛泽东用他那遒劲的字体，在他的这份检查书上批道：

“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让他‘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脱，而予以彻底批判。”

1955年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全国各地的作协负责人赴会，标志着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全面展开。

4月13日，胡风的旧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一文，反戈一击，教人喘不过气来。最致命的行为也出自这位好朋友的双手。他主动交出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私人通信，意在洗清自己，表明自己很早与胡风就不是一路。这一举动，把胡风推向了无底的深渊。

私人信件被公开发表在《文艺报》上。胡风像被剥光了衣服一样，无处藏身，无地自容。

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彻夜不灭，毛泽东陷入沉思，舒芜交出来的信和胡风的检讨放在他的案头。他感觉到，胡风问题与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的各种争论一样，是一种严重的信号，提醒执政的共产党人，应该全面执政，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胡风代表的是反革命势力，是一种危险的势力。他提起笔来，愤然疾书……

毛泽东的批示转到文艺界领导人那里,使他们大吃一惊。显然,那是白纸黑字对“胡风小集团”作了更严重的定性:反党集团。

这哪里是理论之争!伟大领袖洞察一切,阶级斗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开来。人们纷纷开始修改自己的讲话稿和文稿。

5月初,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胡风反党集团案”专案组正式成立,随即派人四处搜集胡风的有关信件,调查胡风等人的历史。

5月13日,毛泽东亲自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的检讨和信。五天以后,该报辟设专栏:“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纷纷撰文讨伐。之后,在5月24日、6月10日,又公布胡风案的第二、第三批材料。这些材料被汇编成册,由毛泽东亲自写《序言》,印数达七百六十万册,散布全国,仅一个半月,《人民日报》批判胡风的文章达200篇之多,诸如“豺狼”、“死敌”、“灰色蛇”、“阴谋家”、“忠臣孝子”、“最阴险的阶级敌人”之类的定号,触目皆是。

胡风真正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胡风吃惊也罢,否认也罢,承认也罢,反省也罢,已经身不由己了。

5月18日,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胡风,而实际上,在两天以前,他已经锒铛入狱了。

5月16日下午,胡风的自由生活终结了。据他的夫人梅志回忆说:

“饭还没有吃完,刘白羽和几个人来了。胡风见是作协领导,非常高兴,便招呼里屋去坐。……胡风和他们在里屋单独谈话,什么内容我不知道。我坐在客厅里,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过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和我谈话,

无非说是反党的问题。随后，抄家开始了。进来了一群人，把书柜上的书翻了个遍，我和胡风一直被隔开，在这期间，两人没有见面。……他们抄家时，还向我掏出搜查证要我看……一直折腾到半夜可能是一两点，胡风从里屋出来，要把他带走。也不准我们俩谈话。胡风只好和我打了个招呼，什么也没有让带，就出门了……从那以后，有十一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夜半三更，胡风走在柔和的春风里，浑身发冷。附近，北海的白塔似隐似现，凄然高耸……

在这前后，他的一些好友，也就是“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一些成员，都被押上了囚车。

在北京：梅志、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雪苇、村谷；

在天津：阿珑、鲁藜、卢甸；

在南京：化铁、欧阳庄；

在上海：贾植芳、任敏、张中晓、耿庸、王戎、何满子、罗洛、王元化、彭柏山、李正廉、顾征南、许恩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

在湖南：彭燕郊；

在杭州：冀沅、方然；

在湖北：曾卓、郑恩。

这些人的逮捕令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签发。经清查，与“胡风反革命案”有牵连者达 2000 多人，其中 78 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这其中有 61 人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

在胡风被逮捕一个星期以后，文联会堂里坐满各路知名人士共 700 多人，这里在召开文联主席团与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会场上群情激愤，声讨胡风。

苦狱生涯

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郭沫若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尽管这已经是“迟到的请求”，但郭沫若的声音还是那样庄重：

“到了今天，全国人民正在集中力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而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然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内部破坏，这是怎么也不能容忍的。

“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一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

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开除、撤销的决议。就在这时，有人要求发言，得到允许以后，他走上主席台，坐在郭沫若、周扬中间，停顿了一下，望着下而黑压压一片与会者，说道：

“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

话音未完，会场一片哗然，随之而来的是斥责与咒骂；有人跑了过来，将他拉开，推下台去。第二天，新华社报道说：

“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

这位仗义直言的勇士，随后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软禁在家。

随着胡风的厄运而来的是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从6月13日，《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改为“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案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之重大、之深远，恐非常人所能知晓。

秦城监狱的寒月，伴随胡风度过整整10年时光。他没有书

报,天天被要求写交代,盖上无数次手印;没有人说话,他就找到一种自白的办法:吟诗,抒发伤感,抒发思念,抒发愤懑。在狱中的第一个除夕夜,他吟道:

竟在囚房度夕时,奇冤如梦命如丝;
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
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
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

胡风被莫名地关押了10年以后,1965年11月26日,他被带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明显比10年前消瘦,赭红色的脸,略略发暗,一件棕色中式棉袄,过于肥大,长及膝部。最令人难忘的是他总把两只手拢在袖口内,似闲散之人。在审判大厅上,他没有说话,站着,双眼微闭着,听着对他的宣判。或许他不明白,怎么现在要对他宣判了?现在是哪年哪月?

结果,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等待他的还有4年铁窗寒月。而他正式出狱的时间是14年后的公元1979年1月15日。

整整24年,可谓囚狱生涯!

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第6号文件,进一步为胡风全面平反,包括对他的文艺思想也作出了新的评价。

胡风在1985年6月8日,已经溘然长逝。

当年,胡风被批判、关押时,哪里知道,中国共产党内同时又出了一起冤案,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事件”。由于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由于他的抗争,也由于“潘杨案”,于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反运动”。

这是逻辑使然。因为早在6月1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必

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已经有了推论：

“胡风集团力图在我们的党内、国家机关内、人民团体内和文化教育机关内发展组织，就是从这些不健全的分子身上下手的。因此，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每个单位、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并且都要学到一项本领，要善于辨别反革命分子，以便把一切反革命的阴谋揭露出来。”

社论最后号召：“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正式的战略部署在7月1日下达。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指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第一，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首先是教育500万知识分子和干部，提高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第二，利用胡风事件，在全国各个工作部门和各条战线上，经过坦白检举，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取得另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线索，为今后的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和干部的审查与清理工作作好准备。

于是，从7月开始，连续一年，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参加第一批肃反运动的总人数达570多万；从1956年开始第二批肃反，主要对象是县区干部、工厂矿山职工、中小学教职员、医疗卫生机关的医务人员，有860万多人参加，到1957年底结束。

在1956年9月，肃反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

“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

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莎菲女士”的遭遭

丁玲泪对千人指

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在三十年代崛起于中国左翼文坛的丁玲,进入延安之后,依然是引人注目的文坛女星,延安文艺事业的中坚之一。她受到过毛泽东的大力称赞,建国后,历任《文艺报》主编,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职。1952年3月,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篇小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

1955年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决议。丁玲以作协副主席身份坐在主席台上,听着发言者对胡风的厉声批判。她知道不知道,就在这年的年底,她自己也会成为批判的对象,并成为“反党集团”的头目?

其实,她的厄运早就开始了。

1952年2月,丁玲被莫名其妙地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离开了中国文学界的第一线。她被委任筹办、主持文学讲习所,和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打交道,同时,只兼任《文艺报》的编委。

1953年,在文联内部开始了对丁玲、陈企霞的斗争,丁、陈被谓之“小集团”。

1954年10月28日,因为冷落两位“小人物”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艺报》遭到了袁水拍的“质问”。当然,没有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讨论的“重视”,这种质问是不会发生的。接

替丁玲任《文艺报》主编的，是她的好友冯雪峰。冯雪峰在写下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以后，便被免职了。他虽然大包大揽了一切过错，但丁玲在这个“错误”中的作用，一直被有关人士所关注。她的有些言论曾风传出去，引起了人们的“高度警惕”，当然，还有她在二十年代的数度被捕而安然出狱，早已是一些人头脑中的问号了。

一场紧锣密鼓的审查早就在进行了：重点是两个，一是解放前叛变投敌，二是解放后组织反党小集团。

对此，丁玲进行顽强的抗辩：

“我的历史上被捕问题，党中央早在延安时期就做过结论了，我是清白的。”

“我和陈企霞的关系，就是同仁、朋友关系，说我们在延安时就结成集团，纯粹是无中生有！”

这不是忧郁而怅然的“莎菲女士”，而是刚强不屈的“莎菲女士”！

这类申辩，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是何等的无力。1955年12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传达报告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正式传达中央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调查结果。此时，陈企霞刚刚从囚集地点释放出来，何以与丁结为反党集团？

天大的冤枉！

丁玲、陈企霞不断向党中央写信申诉，要求复查，要求平反。

过了一段时间，钉在“反党集团”耻辱柱上的铁钉松动了。陆定一在一次会议上顺便提了一句：

“‘丁陈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

丁玲等的处境稍稍改善了一些，但心灵上的创伤远没有愈合，何况还没有正式的平反结论。也许，很快就会有的……丁玲

在盼望着。

1957年6月6日、7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连续三次召开会议，准备为“丁陈反党集团”案平反，复查的材料齐备了，结论基本确定了，只是讨论如何具体化的问题。

党组书记邵荃麟宣布说：“丁陈集团案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帽子应该摘掉。”周扬真诚地承认：“对丁陈的斗争有偏差，斗争过火。”

但是，不要忘记，这是1957年夏天。

第二天，6月8日，《这是为什么？》的诘问发出了，周扬宣布休会。

7月29日，举行第四次会议，调子忽然变化，周扬重申，丁玲、陈企霞是“反党的”，他们的问题不是平反，而是进一步深挖深究！

人们目瞪口呆。

“丁玲的历史问题主要是叛徒问题。”有人下结论了。

“丁玲在去年春天以后特别活跃，借党整风，说党中央‘偏听偏信’。”

“丁玲说1954年对《文艺报》的批评是错案。”立刻有人开始揭发。

丁玲再次落入灾难之中，不仅“反党集团”案上的铁钉钉紧了，又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她被指责“勾结冯雪峰、陈涌、罗烽、白朗等人，疯狂反对党的领导，攻击文艺界领导人”。她的处境再次艰难。有一次，在妇联，被一群女工团团围住，指着鼻子骂她是“叛徒”。回家以后，她伤心地流泪了，仿佛只有泪水才能洗清自己。

攻击升级了。1958年1月，毛泽东指示：要对丁玲、王实味等人在延安时期的毒草进行“再批判”。他亲自为《文艺报》有关

专栏修改按语：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青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丁玲不但没有翻过身、站起来，反而跌入更深的深渊。

定案在先 对证于后

丁玲、陈企霞的“反党集团”案，在1955年定性以后，经党内多次开会进行严厉批判，《文艺报》也对“一本书主义”进行指责，但是丁、陈坚决表示不服，向中央告状，喊冤。

一年以后，1956年11月30日，署名“作协党组”的一封信发出去了，接信人是与丁玲有过交往的河北省作家、《平原烈火》的作者徐光耀。

徐光耀直到12月8日才接到信，拆开一看：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其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在进行调查对证……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具体材料……”

显然，这是对丁、陈集团的进一步揭发。徐光耀知道这是党的任务，不能耽搁，便开始搜肠刮肚，准备据实回答。

丁玲的问题已经被定性了，为什么还存在着调查和对证的事情呢？这一问题是谁也不敢去想的。

那么,要调查的是哪些问题呢?丁玲究竟有什么问题值得在“定性”以后再来进行调查和对证呢?

作协党组的信一共提了六个问题: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经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话是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样?

(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有人说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说的,什么情况下说的?她是否在鼓动你的骄傲情绪?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人要写出一个作品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是怎么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中宣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什么反响?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

布过不满中宣部的言论？

（六）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你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六个问题中有六个“有人说”，且处处充满着暗示和诱导，不容被问者回答时置身事外。

这些问题，核心是丁玲与党闹独立性，对青年作家影响恶劣。丁玲已经是戴罪之人了，但徐光耀还是奉“作协党组”信中之命，坦陈了自己对丁陈事件过程的想法，这位年轻的作家太天真了，他的答复中说道：

“假如在丁、陈事件的揭发处理过程中，有着过火或失当的地方，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一个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的意见。”

徐光耀为自己的这些话，在半年以后的“反右”斗争中付出了沉重代价。那时，丁、陈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要每个党员交待与丁、陈的关系，交待要坦白、彻底，以“卸掉包袱，轻装前进”。徐光耀怎么交代也没有逃脱厄运，继樊斌、公刘之后，他成为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第三位右派，首要的理由不是别的，而是“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

他被勒令交出与丁、陈所有来往信件，不得有任何隐瞒，对其他党员来说也是如此。

就在这前后，国外研究丁玲作品和思想的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也在研究被指责的“丁玲问题”。他们的结论是：丁玲的许多“罪状”是不能成立的；对丁玲的批判，采用了前后矛盾的、实用主义的作法。

但这又怎能于事有补呢？丁玲已经被发配遥远的、寒冷的北大荒去了，整整 20 年，她的声音和身影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

1957年底,丁玲被正式开除党籍。

她曾经被戴上手铐,脱光了衣服搜身,搜查反党的罪证。

事后她回忆说:“我这一唯一的财产,我珍藏着的这些诗篇,全部当作废纸而毁弃了,唉,尽管我池时一再恳求,说这是我的‘罪证’,也没用,别了,这些珍贵的诗篇”。

苦役无边

在北大荒,丁玲也不知道过了几年,只能感到时光的变化,秋天过去了,严冬来临了,春寒料峭,接下来便是苦夏……周而复始,没有尽头。

1958年的夏天,她被遣送北大荒,头戴两顶硕大的“帽子”：“丁陈反党集团头目”和“大右派”。乍到新地,人们关注她,问她是不是很难受,她答道:

“倒不怎么难受,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么,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丁玲这个大右派从北京下来到农场,一个人民的作家忽然成了人民的敌人,群众无动于衷才真的怪了。”

她被分配在畜牧队喂来亨鸡,整整一年,直到1959年初秋,她被调到生产队当文化教员,帮助“教育”。她在这个农场整整呆了六年半,之后,又被数度迁移,她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她只知道中宣部开往北大荒的介绍信是这样写的:“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

一天,吃过早饭,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她的屋里,他打量了一下丁玲,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65岁了。”丁玲没有忘记这一点。

“看来你身体还可以,能劳动吗?”

“我一直都在劳动。”丁玲回答。

来人说道：“我们准备让你去劳动，这样对你好些……让你去××队劳动，是由革命群众专政。”他反问了一句：“懂吗？”

丁玲早就知道去××队劳动意味着什么，那个队是由一群“什么事都干过的人”组成的，那是一个老虎队。多年的北大荒的寒风，使丁玲似乎变得麻木了，她没有为自己申辩，只是问道：

“什么时候去？”

“就走。”

丁玲说：

“我要清点一些夏天的换洗衣服，能回家一次吗？”

“我们派人替你去取，送到××队”，来人站起来就要走。

丁玲不得不恳求了：

“我要求同陈明（她的丈夫）见一面，我们必须谈一些事情，我们有我们的家务。”

这样的请求是在来人沉吟一下以后才被允许的。

自从去年夏天丁玲在养鸡队被揪走以后，她和她的丈夫就没有单独见面的机会了。她被单独关押在一间房里，不断拉出去挨斗、挨打、挨审。过不久，陈明也被押来了，被关在丁玲隔壁的大“牛棚”里，不允许说话，碰上了也不允许见面。这对苦命夫妻有时只能隔着窗户相互对视一眼。

眼下，她又要被送走了，又是痛苦的别离。

陈明推门进来了，在这黑暗的囚室里，丁玲急切伸过手来。时间不多了，他们相互凝视，无言以对，忍住眼泪，不让流出来。

丁玲已经两鬓染霜，容颜憔悴。她关心的是自己的丈夫，“你到什么地方去？”

“还不知道。”他摇摇头，拿出一张钞票，轻轻而又慎重地放到丁玲的手中，这是每月15元生活费中的节余，也是仅有的五

元钱。他叮嘱道：“你尽管用吧，不要吃得太省、太坏，不能让身体垮了，以后，以后我还要设法……”陈明说不下去了。

“通”地一声，门被踢开了，一个年轻小伙子瞪眼看着屋里：

“时间不早了，带上东西走吧。”

这是老虎队派来的人。

薄薄的被子，还有几件换洗衣服，分捆成两个小卷，一前一后地背着，丁玲就这么走了，不是走向自由，而是走向更深重的苦难……1970年4月，她作为要犯，被押往北京秦城监狱。

她在1978年获释，回到了文坛，使许多以为她不在人世的朋友与读者，大感意外。

1984年8月1日，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落实和几次慎重的讨论，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为丁玲彻底恢复名誉。

●梁漱溟冒犯毛泽东

“以笔杀人”者

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常常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共商国事。梁漱溟也经常被邀列席会议。作为德高望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他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且又是一个始终关注国计民生的人。在1953年9月9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听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以后，在小组讨论会上，即席讲道：

“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么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他强调说，“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

觉行动,其效就能倍倍增。”会场上反映不错,下午散会时,周恩来请他在第二天作个人大会发言,梁漱溟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因为发言人太多,真到第三天下午,梁漱溟才有机会发言。

祸端由此而起。

梁漱溟在发言中说:“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开展一场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的。”他在二十年代中国农村展开的“乡村建设运动”曾经风云一时,费了他不少心血,他视之为理想实现之试验。他历来特别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这个上面来了:

“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九天,农民的生活在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这一席话引起了同样关注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毛泽东的严重关注。在20多年的前,两人选择以农民、农村为对象,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设新社会的方式,今天又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议立刻做出强烈反应: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然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

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大惊失色，他感到委屈，又不服气，便当即提笔给毛主席写信申辩，但信未写完，就宣布散会了。回家以后，他继续写信。大意是：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在信中，他希望有机会解释自己原来的发言。这位旧知识分子的倔脾气犯了，在他眼里，不符合事实的话，就应该收回。第二天，他在会场上把信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约他晚上谈一次，但时间匆匆，两人固执己见，最后不欢而散。梁漱溟深感失望，便寻机要在大会上公开解释，以求公众评议。16日，他终于登台，复述自己过去的发言，再三重申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当即，无人相驳，但第二天，一位中共领导人登台，专讲梁漱溟的历史问题，证明此人是一贯反动的。显然，这是精心准备好的。其间，毛泽东频频插话：

“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以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梁漱溟极度震惊，他要求当场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讲。

9月18日下午，他登上了讲台，倔强的声音又响了。

“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定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

足。”他劈头就这样说，还谈到了解放前几十年他与中共的关系。

他的话刚刚开头，便被人打断，不让再讲下去，梁漱溟特别急切地要为自己辩解，便转向毛主席，争取发言的权利：

“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验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以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主席立刻回答：“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的。”

梁漱溟立刻回答：“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

毛泽东立刻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争辩道：“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他的话被台下的呼喊所打断：

“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滚下台来！”

梁漱溟坚持不下台，他极为认真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毛泽东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10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

“我有很多事实要讲，10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他的话马上又被会上的哗然声打断，但梁漱溟倔强地坚持要“公平的待遇”。

毛泽东最后说：“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

后来，有人提议付诸表决，看看赞成他讲的人多还是反对的多。结果，大多数人举手反对，梁漱溟就此被哄下台，一下台就是二十多年时间。

暴风雨中的沉默

梁漱溟被这种结局深深地震动了，许多好友都来规劝他，他自己也感到茫然无措。他清楚地记得，两年以前，他和毛泽东谈过农村的一些情况，并表明了自己的担忧，比如他提到了在土改斗争会上，打地主，打得很凶，一对地主夫妇因此而跳河自杀。他说：“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毛泽东则笑道：“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两人谈得相当融洽、投机。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意外局面呢？

在33年后,梁漱溟回顾说:“由于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这桩事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之举。”

然而,梁漱溟作为当事人,这是想得过于简单了。会后,他没有受任何正式处分,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但他是不出户,闭门思过。

然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却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而且还涉及许多历史问题。这种错误判断一直延续了很久。

当时,政协委员陈铭枢曾经问过毛泽东:“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略加沉思以后,回答说:

“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得了,不严厉批判不行。”

周恩来指出:“从历史上看,梁的路线明为帮助人民民主力量取得胜利,在紧要关头却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使人民失败的‘路线’”。

当时,这一批判并没有公开、大规模地进行。到1955年5月,在猛烈地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中央宣传部在向中央递交的《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提出要逐步扩大批判范围,“要对近几十年来其他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在今天还有影响的(如梁漱溟)进行批判”。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也就是从这一个月起,报刊上开始公开、大规模地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涉及对他的政治、哲学、文化、教育思想,集中火

力,猛烈抨击,还提出他的历史问题。这种批判整整持续了半年。后人评说道:“这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在党内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四大自由’、‘新税制’的同时,对党外民主人士的一次最有代表性的批判。”

梁漱溟沉默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中,他一言不发,侥幸逃过“右派”的帽子。这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可是,下一个轮回又该怎么样呢?在“大跃进”热潮中,他写了一篇洋洋六万言的长文《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10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之由来》。尽管他认为这是以人大决议和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依据,尽管他迟至1964年底才公开宣传他的文章观点,还是立刻招来批判。

在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时,梁漱溟有一个四、五千字的发言,主要讲听了政府工作报告的体会。

但有心人立刻警觉起来,从1962年以来,全党全国都在谈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为什么梁漱溟对阶级斗争只字不提?

一份书面发言在他的座位上出现了,其中断言:“梁漱溟不仅否定阶级斗争,而且曲解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阶级路线”;说他“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封建主义道德观’;从梁漱溟的反动立场、观点,可以看出反映在旧知识分子当中的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严重性”!

大会执行主席称:这篇书面发言值得一看。

梁漱溟没有得到在会场辩解的机会,但一场辩论已经布置好了。梁漱溟专门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辩护:

“我从来没有说过否定阶级斗争”;

“我虽不敢保证自己不唯心,却可以保证自己不反动”……

他的发言只是招来更加升级的批判热潮……在“文革”的浪潮中,这条“落水狗”再次遭到痛打。他为邓拓等人说过几句话,便被斥为“替反党分子开脱罪责”;当然还要引伸到1953年那场争论,说:“梁漱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多年来的反动立场决定了的。”

红卫兵小将们冲进他的家,翻箱倒柜,把他珍藏的图书、字画以及旧长袍、马褂、妇女服饰用品,统统堆在院内,点火焚烧;随即,他的房屋被占为红卫兵组织的司令部。

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初,他被逼着表态,但他就是沉默,立刻招来指责:“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

经人催促,他发表了长篇发言,结果又是批判的升级,开始还限于20多人的直属学习组,后来上升为一、二百人的联组批判。

对他来说,说话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一切皆因他在1953年“冒犯”龙颜留下的“臭名”!

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沉默。

第七章

反右斗争和“阳谋”

●毛泽东的“阳谋”○整党与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灭顶之灾●“共产党内就有右派”○在劫难逃○首“恶”必办○战果辉煌●一位右派作家的经历○横祸难躲○“炮声”难躲○苦役难躲●“小小右派”们的命运○普通右派多如牛毛○十六岁的小右派●不是“右派”的“右派分子”○“祸从口出”还是“祸从笔出”○“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

不忍卒读，又不能不读。

不堪回首，又必须回首。

一场反右浩劫，五十五万余人沦为“右派”，五十五万余家庭横遭不幸，牵连者更是铺天盖地。一同殃及的，还有无数的生机、希望和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辉煌梦想。为什么灾难连着灾难，周而复始？为什么自残了英灵雄气，自息了挺进新世纪的壮曲？为什么自残自害，批判、告密、规劝、迫害、处分……几乎成了生存的空气？花开似血，无数英烈追求的思



想、信仰与创造的自由何在？人的尊严和人道的崇高何在？

十六岁小“右派”李日垓悲壮抗争。

暮年老翁马寅初拍案而起！

怜我华夏民族，到处是史诗般的沉默。敬我华夏民族，星辰与星辰之间，支撑沉重头颅的，确有伤痕累累却青铜般高贵的脊梁。

呵，祖国，数不该尽！

●毛泽东的“阳谋”

整党与大鸣大放

进入1956年，中国面临着一场巨大的风暴，这风暴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1954年4月的一个深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那个著名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后来被中国党一直称之为“反斯大林报告”。此后，社会主义阵营陷入一片动荡之中。1956年秋天，终于在匈牙利爆发了大规模流血事件，以致于苏联不得不出兵干涉。

消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是那样的令人震惊：许多共产党员被残酷杀害，尸体被像墨索里尼那样倒悬起来；国旗党旗被焚烧；《裴多菲俱乐部》的那帮秀才们还在不断鼓动……其实，毛泽东早在赫鲁晓夫报告发表不久，就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问题警党起来。这位党的领袖，每当历史关头，总是厉声提醒全党要把握方向、端正作风，不要犯大的失误。人们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进城以前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全党的

谆谆教导：切记不要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

此后，他不断运用“整党”的方法来时时给全党干部和党员敲警钟，他说：我就是唠唠叨叨的婆婆，还要唠叨下去。1947年冬至1948年，在各解放区，毛泽东在指挥伟大的战略决战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整党运动；时隔一年，全国政权在握。1950年到1954年，他又下令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整党运动。在1956年8月的“八大”会议上，他又一次发出信号：

“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

“匈牙利事件”很快就平息下去了。各种谴责帝国主义阴谋颠覆、反革命分子猖狂进攻的声讨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连续不断，震耳欲聋。毛泽东心里是清楚的，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更坚信，连续不断的整党，对巩固政权是何等的重要！

随后，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定地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之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进一步指出：

“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最后一句话明确地体现了他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

在1957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向全党打招呼：

“现在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参加的，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错误也还不少……通过整风，不断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过了一个月，即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关于这两个报告的学习，按照这两个报告的基本思想，并参考一些其他有关的文件，总结和改进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在学习中，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

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关于这一方面学习的计划,将来另行规定。

这样的《指示》往往不是一般的号召,总是指出具体的政策标准、工作方法和布署,这是毛泽东得心应手的做法。《指示》最后指出: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可以同时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整风学习,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推广。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各单位应该组织领导小组。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负责,抓紧领导。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整风的组织领导办法和具体工作计划,由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和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自己规定实行,并且希望于收到本指示以后两星期内能够将这种具体计划报告中央。

这一党内文件随即在报刊上公布。这是极不寻常的做法,体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坚定信心和决心。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根据毛泽东的判断,和党的“八大”的决议,社论明确指出:

“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的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

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毛泽东的最深刻的担忧在《社论》中通过侧面的手法显露出来:党群关系问题!

这样的号召的震动是极其巨大的。美国学者阿瑟科恩后来在他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中指出:“毛泽东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以便有助于党的整风,这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还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结论至少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正确的。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1942年延安时期就开始了的“整党”,以及以后若干次的整风,都没有想到或要求党外人士来(特别是知识分子)帮助整风。

这种非同寻常的抉择意味着什么呢?

至少在一年以前,即在对知识分子中的个别人士(如胡风、梁漱溟)进行严厉批判、肃清旧思想不久,党中央对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采取了新的做法。这集中体现在《人民日报》1957年3月21日的《社论》中,这社论的题目是引人注意的:《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它说:“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从他们中间发展大批的党员,通过他们去影响和团结全体知识分子向科学和文化进军。”

那么,那时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作怎样的评价呢,社论指出:

但是还有不少学校、机关、团体、厂矿在知识分子中发

展党员的工作至今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是不是这些学校、机关、团体、厂矿中的知识分子不多呢？不是！是不是这些学校、机关、团体、厂矿中的知识分子特别落后，没有人要求入党、也没有人具备党员的条件呢？不是！这主要是在一部分党员特别是党组织的负责工作人员中，还存在保守倾向。这种保守倾向目前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具体问题的看法上，这些党组织的负责人说知识分子的政治经历和社会关系复杂，不能接收入党；说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浓厚，还不能做一个党员。

这里指出的仅仅是组织上的态度，而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评论是通过“虽然”、“但是”形式出现的。

显然，改造、团结、教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通过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可以把这一问题的解决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这种考虑决不是一时之计。毛泽东早已开始思考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深思熟虑以后，于1956年4月25和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两次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并说：

“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

接着，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有許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场的情况下又谈到这个方针。当时全体与会者听到他的讲话，如感到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这一讲话后来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要文献之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许多外国关注中国事务的专家、新闻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惊呼：毛泽东在对中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严厉箝制”八年之后，终于给他们以自由了！

其实在这之前，也许是受当时苏联东欧“解冻”气候的影响，中国的知识界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了。文艺界一批年轻作家推出一大批勃勃生气、针对时势的作品：《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本报内部消息》等。

据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后来回忆：“在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中宣部部长）向毛请求关于中央党史的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

毛泽东在那篇讲话中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他还专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

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那么，怎样才能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善党的领导，克服党内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对他们的劳动不尊重，对他们的工作不适当地干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也就是说，首先要在政治上信任和依靠，其次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周恩来就此更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同时，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

安排,做到用其所长,专业对口;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支持,在接触资料和调查研究上给以方便,尊重、重视他们的工作成果和意见;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待遇。

党分析了知识分子的状况,认为,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比,我国知识分子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有很大差距。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不断提高现有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和政治觉悟外,还必须造就工人阶级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这也是说,在党中央布置整风时号召全体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是当时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5月4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1919年以来值得骄傲的一天。1956年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开展批评的指示》。针对前一阶段在毛泽东《讲话》和党的号召下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的形势作了如下估计:“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中断。”

为此,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月8日至6月3日,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共达13次。与此同时,还与国务院“八办”在5月15日至6月8日,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达25次,而且所有发言第二天立即见报。“知识分子喉舌”《光明日报》在上海、天津等全国九大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



识分子“鸣放”，并详尽地报道了内容。

在这些会议上发言的著名人士有：张奚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陈叔通（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许广平（民进副主席）、龙云（民革副主席）、刘斐（民革中央常委）、黄鼎臣（致公党中央常委）、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何香凝（民革中央副主席），等等。

与此同时，全国各工厂矿山、企业、学校、机关、农村等基层单位都展开了大规模的鸣放运动，小人物被鼓动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这芸芸众生的声音，汇成了浩浩的海洋。

引“蛇”出洞

毛泽东是不是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呢？他知道，而且很关注，很警觉，并提醒党中央注意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每天向他汇报座谈会的情况，全国各地的动态也源源不断地送到他的案头。

1957年5月上旬，他在听汇报时，已经开始皱眉头了，当听到有人说：“中国应该搞轮流坐庄”，“应该有一个自由言论的‘海德公园’”时，他说了一句：“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的头上，把这些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

李维汉继续汇报道，座谈会上有人说，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

毛泽东立刻反驳：“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夜深了，毛泽东久久难以入眠，他最后提起笔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并立刻送党内高级干部传阅。毛泽东愤怒地写道：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坚

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下令那些“反动言论”全部刊载在报刊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李维汉事后回忆说，这表明，毛泽东已下定决心“引蛇出洞”，然后进行坚定的反击。这就是“阳谋”的开端。

座谈会还继续开，各地鸣放也在进行。这期间，李维汉在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暗示道：“发言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这篇总结发言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看过的。毛泽东的信中已经首次提出了“右派”这个概念，但在这个总结发言中还没有出现，时间是1957年6月8日。

也就是这一天，反右开始了。

在党内，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社会上，《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自己作了回答：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员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

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6月10日，党内又一次发出指示，明确说：

“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顶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扩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一年半，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要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10%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这里提出的“比例”概念，以后就成为划定右派的一个重要标准，各地区、各部门的反右斗争，都有了“比例”性质。

公开的点名批判是在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章伯钧、罗隆基不仅被点名，还被说成是“章罗同盟”，所谓“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党进攻”的伏笔就埋下了。

7月份，中共中央召开青岛会议，部署进一步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又写了《1957年的夏季的形势》一文，提出：再用若干月的时间深入挖掘右派分子。

这样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社会气氛已经热烈起来了。6月8日，“反击”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就报道了某个钢铁厂工人对右派的愤怒批判，并刊载读者来信，厉声批驳右派分子的反党

反社会主义言行,第二天,又刊载了同样内容的读者抗议信。与此同时,各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沈阳、鞍山等)的工人阶级纷纷集会,声讨右派分子,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些活动在广播、报刊上广泛报道。6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提醒全国人民,要把是否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判断是否右派的唯一标准。同一天,《工人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中国青年报》从6月11日到14日,连续五天发表五篇社论,动员全体团员青年给予右派分子以沉重的回击。

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青岛会议精神,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这场运动必须在中央、省、市一级单位和地县两级同时深入下去。

关于右派分子的定性,调子也越来越高:最初,中央认定,那些错误言论“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也只能这样对待”。到了6月26日,变成了“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到了7月1日,右派分子被明定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到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开始把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相提并论,曰:地、富、反、坏、右。

灭顶之灾

在如此强大的攻势面前,右派分子惶惶然不可终日。各种各

样的批判会开始了,首先的仪式是右派分子做自我批判兼揭发检举。

6月13日,在民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叶笃义(民盟中央常委)率先进行自我批判,陈新桂也如法炮制,结果被认为很不满意,一周以后重新进行自我交待与批判。在最初的会议上,章伯钧承认“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5日,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与工商联联席会议上,李康年(中央常委)为表示沉痛悔过之心情与决心,声明放弃曾经提出过的延长资本家定息期的建议;而章乃器(民建中央副主席)则声辩自己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

6月15日,在民革中央委会会议上,龙云(民革中央副主席)对指出他的错误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而黄绍竑(民革中央常委)则认为自己过去的发言受了“误会”。

6月21日,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会上,储安平(学社中央委员)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要划清与章罗的界限。

各民主党派的反右决议也作出来了。6月17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会号召所属各级组织向右派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6月19日,农工党中央执委向各级组织发出指示:《坚持社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作斗争》。6月18日,民盟中央常委会号召全体盟员展开反右斗争,并在盟内整风;在这之前,民盟有6个省9个市的委员会通过决议,指控本盟主要右派分子,并敦促盟中央端正态度,划清与右派的界限。6月19日,民建和工商联向各级组织发出指示:《全体工商人士团结起来,立刻行动起来,向章乃器反社会主义行为作坚决斗争》。6月15日,《光明日报》的由各民主党派代表组成的社委会,延续两天,要求社长章伯钧、总编储安平承担《光明日报》反社会主义立场的责任。6月16日,《文汇报》表示,欢迎一切批评指责。

6月18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公开发表,人们惊讶地发现了一段在原来讲话中并没有的话: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反右斗争的性质已经无可争辩了。

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这是永无尽头的炎热的夏天。

6月12、13日,居然在湖北汉阳县发生了中学生罢课和暴力活动,参加者达1000多人。直接起因是升学问题,但事态是严重的,他们捣毁了县委县政府办公楼,毒打党的干部,还张贴大标语:“共产党走下坡路了”、“打倒县委会”、“欢迎国民党赶快回来”。骚乱很快平息了。在六、七月,类似事件在全国其他地方有过多起。6月25日,毛泽东签发命令,建立“人民警察部队”。

对章罗等人的打击还在进行。6月26日,全国人大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右派分子在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为了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手中把国家的政权篡夺过去”。7月11日,陆定一在大会发表讲话《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7月16日,章伯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人民低头认罪》,承认召集过阴谋会议。1958年1月19日,民盟中央召开批判“章罗联盟”最后一次会议,史良作了《章罗联盟批判》的报告,详尽其四大罪行。

至此,对民主党派的斗争宣告大胜。实际上,在1957年8月,已经硕果丰富了。比如,在民盟从中央到地方中挖出右派分子500多名,5名副主席中有2名,38名中央常委中有12名,在142名中委中有35名,在41名候补中委中有13名。

在这同时，对党内右派的斗争、揭发、批判也在深入展开。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连党中央都不太清楚。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右派有30万；不久，又说有40多万；第二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说，右派有45万人，在20年的复查中，实际摘帽者人数多达552877人。1980年5月，被摘帽者为54万余人，剩下一万余人继续甄别，最后的结论是96人确定不予平反，其余全部摘去“右派”帽子。这些“铁定”的右派占被打成右派总数的万分之二不到！

55万人的血泪，罄竹难书！

●“共产党内就有右派”

在劫难逃

从《工人阶级说话了》以后，神州大地狂飙横扫，右派们在这种强大攻势面前，或无条件投降，低头称罪；或自寻短见，以求解脱；或反戈一击，戴罪立功。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拉开帷幕，那些身居“高位”的党外右派分子纷纷手拿着厚厚一迭讲稿，步履艰难地登上那座神圣的讲坛，作自我检讨，违心者敷衍了事有之，诚服者悔恨至极有之。7月12日有2位党外右派作检讨，13日增至5位，到15日猛增至13位。人民大会堂成为一所大批判的会堂，气氛空前热烈，台下代表们情绪激昂，台上“右派”惶惶不可终日，争相用最惊人的自我贬低和讨伐来获得听众们的宽恕。像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琪翔、陈铭枢、费孝通等人不得不把往日的威严和自尊打到十八层地狱里，“鸣放”的罪过被与建国前的民

主活动(不是与共产党的最密切合作)联系在一起;自己的错误或罪行被与朋友、同事的交往联系在一起;揭发就成了许多人检讨的必备部分;否则,决不可能被放过关。他们哪里知晓,这种空前的羞辱与批判在第二天就通过报刊广播公之于数万万之前,而就在两个月以前,这些报刊广播还满目满耳他们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对经济建设的耿耿忠言。

事情还远远没有终结。7月28日,权威的《人民日报》刊发一篇重要社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这不是暗示,而是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右派狼狈为奸。这一社论实际上宣布,党内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

过了不到两个月,即9月11日,《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又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称“现在需要对于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问题的重心已经转到怎样对待这些党内隐藏着的右派,基本的政策界限也已经划清了:

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们就会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

社论还用极其严厉的口气批评那些对党内右派“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的同志,鲜明地指出,那些有较长党龄的右派,“更不应该犯错误,他们成为右派就更不能够宽恕”。显然,在党内开展反右派的斗争面临的困难与障碍要多得多,一则因为许多被认为有右派言论与错误的人多为党龄长的老同志,他们的许多

部下、同事难以对他们下手批判；二则，这一问题涉及对党的历史上许多纠纷或不明之事的评价，必然要引起巨大的震动。

但是，风暴临头，难以遏制，千钧之势，横扫一切。各种各样的批判、揭发、告密、善意的劝说、严厉的处分，使党内生活波澜横生。

实际上在1957年9月2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已经“统计”出党内右派3000多人，这一数字随后逐日猛增，弄得党内人心惶惶；而党的舆论工具不断呼吁“要战胜温情主义”，“保持党的纯洁”。

首“恶”必办

在北京梯子胡同的一个集体宿舍中，每天彻夜灯火通明，伏案者的头发斑白可见，窗外的寒风不断透过窗缝漏进来，他全然不顾，依旧专心地校订着厚厚的书稿。在他的简陋的书架上，那一套《鲁迅全集》格外引人注目，那是花费他主要精力的作品，从收集、校订、注释、出版、看清样，他每一步都毫不放松。这位普通的编辑不是别人，正是鲁迅先生最亲密的战友、“左联”党团总书记、参加过红军万里长征的老党员、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

如今，他是“党内骨干右派”。从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大标题的报道中第一次点了他的名以后，他一直成为诸多报刊头版批判文章的“对象”，更有甚者，常常占了“双头条”，真所谓“声名显赫”。

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织处理结论是：

“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

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

不仅如此，他听到组织上将开除他出党之时，啜泣着哀告：在党30多年，离开党怎样生活难以想象。然而，“天命难违”。当文学出版社支部表决开除他的党籍时，“全体通过”，连他自己都颤抖着举起手来。

冯雪峰的厄运在他读到《人民日报》7月28日、9月11日的社论时，已经难逃了。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这两篇社论都提到那些有较长党龄的党员中有些人在历史上就有问题，或是动机不纯，或在重要的历史关头立场不坚定，或是执行党的路线不坚决。而他冯雪峰则因为和当时党内主管文艺的主要领导人在30年代有过一场纠葛，且建国以后一直没有处理好关系，处在一种很微妙的境地。“反右”开始以后，文联和作协又把1955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抖落出来，冯雪峰知道其中的奥妙之所在。果然，从6月6日开始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开到第四天，那位领导人开始把冯雪峰当作“问题”提出来，提及他与胡风的关系。这是老调重弹。因为在查胡风案时曾经点过他。更大的问题在后头。冯雪峰在会上被要求交待他近些年的“反党”言行。

这位诚实的老党员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真的没有“诸如此类的”言行，从何谈起呢？经过与会者的点拨，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他与那位领导人有过不同意见乃至小小的冲突，历史的成见也有，观点的不同也有。他终于开口了，心里充满着难言的痛苦：

“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

误的,反对周扬实际上就是反党。”

他还表态说:“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

话音未落,立刻有人指出:“‘团结在周扬的周围’这种说法不对,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

冯雪峰心里说,周扬不就是党嘛,但他连忙表示要纠正原来的说法。

又有一个声音似乎一针见血:“你冯雪峰实际上只承认反周扬,不承认反党。”责问者不断发难。冯雪峰苦笑了。

散会时,在会场出口处,周扬主动和冯雪峰握手,说:“你的检讨发言,我倒认为还好的,肯承认错误就好;过去有些问题以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冯雪峰又一次苦笑了。

但是,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1936年围绕着“国防文学”和“民族解放战争文学”两个口号争论的历史伤痕,在全国(特别是党内)反右派斗争中,又撕裂了,最后使得冯雪峰遍体鳞伤。

那次检讨三、四天以后,他被叫到文联大楼会议室,名曰接受“帮助”。已有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等在那里。

周扬的话惊人的坦率:“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

冯雪峰盯着周扬,好像在看一个熟人,又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周扬接着说:“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

这时,冯雪峰听到另一个声音在说:“我一向敬重你,但必须对你斗争,这是为了党的利益。”

又有人说:“不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

“这次到底要批判我什么问题？”冯雪峰很真诚地问道。

“你有什么问题就检查什么问题。”这就是回答。

冯雪峰如堕入五里雾之中。

事情对批判的组织者来说是很明白的，主要是三十年代那场争论，他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这是难以容忍的。但这毕竟是历史旧帐，虽然《人民日报》社论中点明了党内右派的历史问题的“可追究性”；但右派的批判与划定，少不了他或她的现行“右派”言论与活动。于是，有人揭发，以前在一次出版社青年团员请冯雪峰吃烧饼的晚餐上，他居然说，现在是大鸣大放，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又有人揭发说，1954年因为两位年轻人的评《红楼梦》引起的风波中，作为《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对中央布署批判《文艺报》大为不满，说什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其实，没有这些“现行”言论，冯雪峰也在劫难逃。在以后举行的若干次批判会上，他主要因为三十年代的“口号之争”而受到严厉批判，几乎所有发言者都集中谈这一问题。有人痛斥，有人质问，有人系统地揭发，整个气氛轰轰烈烈。在8月14日的批判会以后，冯雪峰再也不能忍耐，晚上，他打电话给周扬求见，要求有说明事实的机会。得到的回答是：

“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

这使得冯雪峰顿感茫然。虽然允许他在会上发言，但未及说完，便被轰下来。

我冯雪峰到底是什么人啊？他只能在内心里呼喊着自己。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那是在《人民日报》上：“丁陈集团的参加者”、“胡风思想的同路人”、“文艺界的反党分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

1957年8月27日，冯雪峰终于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定案的组织程序很快就完成了,第二天,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下达:

……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

巴金在《纪念雪峰》一文中写道:

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大会议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不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和他夫妇在附近闲谈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冯雪峰“摘去”右派帽子;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辞世。

1979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1979年11月17日,冯雪峰追悼会在一个不能开追悼会的地方召开。

战果辉煌

像冯雪峰这样的党内右派,经过全党上下的一致努力,着实揪出来不少。反右斗争被宣传为党员的神圣职责,是一场严峻的

考验；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反右的战略部署上，保证做到“深入挖掘”。8月1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真所谓“天网恢恢”，战果累累。

下面仅列举数例：

沙文汉，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

潘复生，中共八届候补委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

欧百川，贵州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

王汉，监察部副部长，中共八届纪检委员会候补委员；

杨思一，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

李世农，安徽省副省长；

陈沂，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少将；

孙作宾，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青海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

丁玲，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文联常委；

曾彦，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江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美协主席；

秦兆阳，《人民文学》副总编；

艾青，全国文联常委，作协副主席；

上述所列，皆为当时的高级党政干部和社会名流。在党内反右派斗争中，广大的普通党员所遭到的迫害和打击在数量上是极其惊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斗争和1956年发起的党内整风运动合而为一，变成了对党的干部和成员的管制。这一直

延续到 1958 年,大批党政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另有数十万党员受到各种各样的纪律处分。至于那些被划为“右派”的党员则和非党右派一样,遭到拘禁和强制劳动。1957 年 8 月 3 日,国务院颁布了“劳动教养”的决定;而第二天,又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这一决定表示拥护。这意味着右派分子的“出路”已经从法律上确定下来了。

●一位右派作家的经历

横祸难躲

“反右”的声音在神州大地上刚刚响起之时,强烈的回声就出现了,各个单位立刻对在“鸣放”过程中的所有言论进行审查,当然,要害是抓住并揪出那些隐藏的右派分子。

在 1957 年这个早来的夏天,丛维熙已是一个刚刚出头的青年作家,他曾经响应过党的“鸣放”号召,发表过一些言论,但还没有意识到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他工作的《北京日报》社,最早被揪出来的右派是李滨声(漫画家)和杨凡(小品文家),报社美术组除一人之外,全部被定为右派。再翻开报刊,那些往日在中国文坛艺坛上叱咤风云的作家艺术家们的大名,接连不断地被作为批判对象出现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还有那些与丛维熙年龄相仿且同样血气方刚的青年作家们,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刘绍棠、方之、陆文夫、高晓声……在报纸上,他们不再被称呼为“同志”了。

最要命的是那位“神意”作家刘绍棠,居然是丛维熙知心好友。“鸣放”刚开始时,丛维熙远在北国体验生活,接到刘绍棠的信,信中说:“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

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在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年代。”

这封信要命吗？不，要命的是，他回到北京以后，两位好朋友聚首在酒桌。刘绍棠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这话虽是两人之间说的，难得不会隔墙有耳，那些定“右派”的依据很多不都是“私房话”吗？况且，刘绍棠历来直率，他或许在一些公开场合表露过这类意思。

总编辑派人来召丛维熙了，他的心“嘭嘭”跳，迟迟疑疑，不敢推门进屋。

表情是冷峻的，问话是严肃的：“你最近怎么样？”

他连忙答道：“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尽量避免捧大跤子！”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

“对，完全对。”口气是赞许的，但双眉是紧蹙的。随即丛维熙被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最初，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各单位都在紧抓右派，挖右派，如此关头，居然离开本单位。

回到家，妻子提醒他：“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但是，农村也不是平静的天地，各种消息不断传来，又有一些名流被打成右派，严厉批判，还挖出个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集团。很快，他被召回机关，参加反右，报社里已经先后揪出10位右派了，下一个轮到谁了呢？

针对丛维熙的大字报已经出现了，其中有一张写道：“我们非常奇怪，丛维熙在文艺界放了那么多毒，为何叫他去搞‘社教’，让他逍遥法外？我们强烈要求把他揪回来，审查并批判他的

右派言行。”

下面签名的许多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丛维熙的妻子已经被划为右派了。他曾去看望他岳父，老人听了十分震惊，连连摇头叹息，随后他说了一句：“我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才对知识分子操动干戈。”

“被匈牙利事件吓昏了？”他问老人。

“所以杀鸡吓猴，这真是中国的悲剧。”老人说完，两人都沉默了。这位老教育家的家庭中有四位解放前入党的党员，有三人后来被定为右派分子。

丛维熙有些发慌了。在“鸣放”时期，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在中宣部召集青年作家开座谈会，地点在沙滩那座著名的红楼。王愿坚来了，陆柱国、西虹来了，刘绍棠、邓友梅、高延年、邵燕祥、李希凡、蓝翎都来了，丛维熙也被召到场。这二十多位青年人是周扬麾下的年轻战士，是文艺界的未来。作为长辈、作为领导人，周扬耐心而威严地启发他们，要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文艺界情况“鸣放鸣放”。

会场气氛还算活跃。谈到目前盛行的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时，丛维熙居然从后排椅子上站起来：

“我认为，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写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

一语既出，四邻皆惊愕不止。坐在他身边的好友蓝翎对他耳语说：“蔫人出豹子！”意指丛维熙平时沉默寡言，如今却如此大胆进谏。

后来，丛维熙知道，他这是在编织把自己紧紧束缚住的罗网。但当时，他对自己的忠诚和热情坚信不疑。没过几天，他妻

子私下传了她听到的中央北戴河会议的内容，令他大吃一惊：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成了撞网的大鱼？”

一连串的问题，不知是问妻子还是问自己！

“炮声”难躲

对丛维熙的批判就这样开始了，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人们都在比赛谁的批判调子严厉。丛维熙发表的许多文章和小说已经在社会上遭到批判。《北京文艺》杂志上有老舍的批判文章，他最后定性说“丛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他的一篇论文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法的科学性，被一位老作家斥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当然，最真切的攻击与批判是在他亲临批判会场，接受批判时，首先他被要求揭发已经被定为右派的刘绍棠的问题，谁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丛维熙结结巴巴地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破坏。我曾经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

这样的“揭发”是不够的。

丛维熙只得又说：“在一次闲谈中，我和他深感到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3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当时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绍棠、丛维熙不拿工资靠稿酬生活。）

还不够！

丛维熙又交代揭发说：“有一次，刘绍棠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大米下乡深入生活。”

他的话被打断了：

“这是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

“态度太恶劣！”

“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

但是，丛维熙的“揭发”第二天就见报了，在影响很大的《中国青年报》上题为《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一文中，谈到“刘绍棠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他和丛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

丛维熙看来还不醒悟，他立刻给写报道的记者写了一封抗议信，结果换来新的罪名：“这是兔死狐悲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落，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

斗争在深入，动员他人对丛维熙的“揭发批判”开始了。首先被点名站出来的是丛维熙的好友房树民：

“房树民，你是丛维熙的朋友！你们一块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现在，我们希望你能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

房树民迟迟没有站起来，便招来一顿呵斥：

“房树民！你耳朵聋了？！”

“你到底说不说！”

“现在是你和丛维熙划清界限的最后时机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房树民终于开口了：“依我个人和他的接触来看，他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刘绍棠像是右派，他当真不像右派……”

会场立刻炸开锅：

“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丛维熙！”

“这是向党进攻！”

“让他也老实交代他的罪行！”

连珠炮似的责问连续轰响着，最终，房树民被宣布“退场”。

对这种场面，丛维熙见得太多了。在报社里他是第十三个被划成右派的，当他还是“自由之身”时，参加过陪斗。那天，批斗老编辑徐钟师，当徐剃光了头发，昂着光秃的头颅走进严肃的会场时，立刻招来指责：

“徐钟师，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无语。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焰！”口号响起来了，一呼百应。

“先整他的态度！”

“叫他低头！”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打倒徐钟师！”

这种连珠炮再一次炸响，令人震耳欲聋。

丛维熙还忘不了，最初批斗刘宾雁时，全场鼎沸，突然，一个会议参加者窜上四楼窗台，扑向大地，鲜血染红了大地。

会场又炸响了连珠炮：

“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

“死有余辜！”

“早就该死！”

……

当丛维熙被下放劳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宁静的荒野山地之夜，他的耳边就会响起连珠炮般的轰鸣声。

苦役难躲

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强制参加劳动,先是在建筑工地上。夏天很快过去,几乎没有秋天,冬天就降临了。右派们用白嫩的双手,抡起丁字镐,拼命刨地,不能间断,只能在上午一刻钟的休息中,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边,或到堆煤的小屋里去取暖。

时间过得很慢,又很快,到第二年4月,这批右派被装上卡车,运往北京西郊鲁谷公社参加劳动。这地方离城市不远,却是一片古荒之地。当时,火葬未普及,坟穴到处都是,丛维熙便被分配去做挖坟坑的苦力。30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以外,还有嗅觉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如火,跳进坑穴抡镐刨着沙石,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渗过来的臭水。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水的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把胆汁都从胃里抖落出来。

苦役是漫长的,还要伴随着不断的“改造学习会”,人人都必须神态严肃地表态说要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真像自己犯了什么大罪似的。

现实又是那样的严酷,各种右派念头又止不住地冒出来。这就是现实吗?在公社化运动中,家庭伙食全部取消了,右派们和社员一样,每天吃饭时,默默地走进“公共食堂”,排着长长的队,等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在这样的晚餐以后，总是“改造会”，肚里的食物消化不好，还要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座的都是右派，相互之间的揭发、批判是受到鼓励的，谁的表现最好，谁就能有解放的希望。所以，会场的斗争气氛决不亚于群众斗右派的批判会。

丛维熙的好友李滨声在“改造会”上被指责为为贫农画牛画瘦了，画驴是居心险恶，其他右派们都愤怒地纷纷指责：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

“你面孔狞恶，装什么救世观音！”

“公社的牛膘肥肉胖，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之极！”

这样的会往往延至深夜，第二天照样起早干活。

不久，丛维熙和其他右派又被装上卡车，送往远郊的深山里。先是当开山筑路的壮工，后又当建筑工，为北京市委营建疗养院。在这里，他遇上了他的好友王蒙。王蒙的右派帽子被戴上，又摘下来，又戴上有好几个来回，使他精神受到严重折磨，人更加消瘦。他们俩谈什么，都是半躲半藏。这里有无数双眼睛监视。

这些右派全部住在棉帐篷里，打地铺，被窝阴冷而又潮湿；每天早晨醒来，帐篷顶上，总结有一层层薄薄的白霜。这里，没有护士，也不给取暖设备，右派们睡觉时都要戴着帽子，或围上毛巾，或戴上口罩，以防冻僵。

他们经常被从白天使唤到深夜，或从深夜使唤到白天。悲剧常常出现：或是病重、或是受伤，或是因为压力太大而自杀……

1960年底，丛维熙等右派被召回报社：是不是苦役的终结？是不是有了新的开端？两年多的劳动改造应该有收获了吧？

12月19日，星期一，丛维熙和妻子被召到报社。

“是不是有什么事？”他们俩心里都在问。

“可能是传达文件。”正在发烧生病的妻子猜测道。丛维熙扶着妻子，一起爬上报社4楼，止不住直气喘。推开会议室玻璃门时，看到的却是一位身着武装的警察。

会议室的人们都在等着他们俩。

仪式开始了。报社领导严肃地宣读了“罪状书”：涉及他们对反右运动的议论、对“三面红旗”的议论、阅读《南共八大会议纲领》、传播傅聪“叛国”消息，等等，等等，结论是：

“这是有纲领的‘反改造小集团’，是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必须严加惩处。”

签字的笔早已准备好了，丛维熙等在众人的注目下，乖乖地在“劳教判决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随即，警察押送他们爬上吉普车。

丛维熙明白了：过去的两年半时间，只是漫长苦役的开始。

●“小小右派”们的命运

普通右派多如牛毛

反右斗争最初的对象是那些大人物，他们在鸣放时期的言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之后，又在同一报刊上受到严厉的批判。他们都是著名右派。在几乎所有的批判中，他们被称为“大右派”，但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决不只是这些“大人物”。在那个时期，多少直言的普通党员、非党群众也遭到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中共中央的若干次反右指示中都谈道：

“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

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

普通右派的命运实际上更加悲惨,因为他们是小人物,申诉无人理会,甄别轮不到他们,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谁也不知道何日是尽头。而且,数十万右派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小人物。谁也不会知晓他们的名字,除了他们周围的人:领导、家属、朋友、同事……但他们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的!

(1)尹志铿,四川广安县人,陕西西北光学仪器厂技术员,下中农出身,1933年出生,在整风期间,出于对党的热爱,坦率地给厂里一些干部提了意见,并发表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1958年5月,被定为右派分子,撤销技术员职务,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先调离仪器厂,后分配到陕北农场长期劳动。因不断申诉,被判刑。1979年1月23日,被平反。

(2)董冷石,1924年生,辽宁锦西县高中校长,1957年冬一夜之间,被诬为“反党”,材料送往县里,县里对他过去的言论审查后认为不是右派言论,不同意划右派,只定为右倾错误。1959年,再次整风时,他被认为是漏网右派,受到县委书记的包庇,于是改判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由行政十六级降到二十级,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7月,他给陈云同志写信申诉,招来更大灾祸,在“文革”中被捕入狱,达十三个月,出来时,又多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1979年秋,县委为他彻底平反。

(3)沈俊(云南省富民县法院院长)、杨明(县检察院检察长)、王仕(县公安局局长)和李义(县委副书记),因在1956年不同意县委书记把所谓的“破坏互助合作”的“漏划富农”、“反革命分

子”李凤英逮捕法办的决定，在第二年，被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反革命”，统统被戴上右派帽子。沈俊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王仕被开除党籍、公职、遣送原籍农村；杨明的家庭出身因此由贫农“升为”“富农”，最后被判刑15年；李义被定为“全县右派分子的统帅”，开除党籍、撤职，由行政十七级降为二十四级。1979年7月，他们全部被平反。

这样的右派几乎每一个人的身边都可以轻易的找出十个、八个来……更可悲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20多年以后才被宣布“平反脱帽”的。

十六岁的小右派

那天，云南省昭通专署机要员李曰垓，背着行李，在冰雪中走了五天，到达离机关300里的山区农场，但被告知到那里报到，下放劳动锻炼。这是1958年的一月。

他走进农场办公室，一位干部宣布说：

“按照地委整风办公室的通知，你已经是劳教人员了。”

李曰垓惊得瞪大了眼睛，问：

“我犯什么错误？什么罪名？什么帽子？依据在哪里？通知书在哪里？”

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都不知道，你也不用问这些，已经给你编入右派分子劳教小组，明天出工。”

李曰垓被推了出去。

这一年，他刚刚十六岁。

他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被划成右派的。他只想起来，在整风过程中，单位负责人多次在会议上鼓励大家为整风而大鸣大放，不要有什么顾虑，李曰垓一直没有发言，直到后来，大家都表

态了，他才发言，谈了一些看法，这是多年思考的问题，他诚实地希望我们的党能纠正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不料，这番发言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也只是在20多年后他才知道的。

他实在不服啊！他要申诉，向党中央申诉！到北京去！用双脚走过去！

一个月后，他设法逃出农场。然而，没走几十里路，就被抓了回来，随即戴上脚镣，被强令戴着脚镣在磨房里推磨。

为防止他再次出逃，他很快被逮捕，押往彝良县监狱，以“劳教逃跑，抗拒改造”为名，被县法院判刑六年！

他的心里充满悲愤，可又无可奈何。但他不想虚度光阴。我还年轻啊！

在狱中，他和两位年龄相仿的难友秘密组织了读书性组织，取名就叫“华夏学社”。他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发疯般地读书。监狱不准犯人看报纸，他冒着镣铐加身的危险，寻机从医务室里“偷”报纸读。

第二年三月初，李曰垓被押解到硫磺矿劳改，这个场所劳动强度大，又危及健康，他瘦小的身体不到五十公斤重，但要背一百多公斤的矿石，每天多达三吨。

在如此繁重的体罚之余，他还自学大学课程，并尝试着学习写作，白天在背矿石时构思小说，到夜半三更，再在一张碎纸片上起草，然后誊清在笔记本上。岂料，此事被犯人告密，李曰垓立刻被押入禁闭室，已经完成的12万字稿件全部被查抄走了，并向全矿宣布：“李曰垓书写反动小说”、“诬蔑反右运动”，这是一起“死心塌地的继续犯罪的反革命事件”。

时日漫漫，在禁闭室里一关就是半年，五平方米的牢房，整天暗无天日。在这半年中，不准洗脸，不准洗衣服，也从不给放风，在热酷时节，不给水喝。

更大的劫难还在后头。这位戴了八年右派分子帽子的青年，在“文革”开始以后，又成为硫磺矿犯人中的“第一号打击对象”。在他的笔记本中查到了他抄录的邓拓的12首诗，于是，他成为“硫磺矿的邓拓”，是“借三家村语言恶毒攻击党的领袖”。

他又被禁闭了，一直到1966年底。第二年年年初，他因为“写反动小说”、“吹捧三家村”，再次逮捕入狱，往牢房里一关，整整六年，居然没有审讯过一次。

“文革”中的派性之争同样出现在监狱中，管教人员中出现两派对立，犯人们被强迫要求“拥护”其中的一派，以证明那一派是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的代理人。李曰垓却说了一句：

“我不能凭一派之词贸然表态，谁是谁非让实践去检验。”

这一下子惹恼了支左的军代表。李曰垓又受到重重的惩罚，他被戴上脚镣、背铐，整整两年半。

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啊！

1973年3月，右派分子李曰垓终于出狱了，但被强制安置到一个铅锌矿就业，根本没有行动自由。第二年夏天，他和一位比他小12岁的姑娘恋爱了，年底，女方开了结婚证明。李曰垓把这份证明连同自己的结婚申请一起交给铅锌矿领导，以求批准，竟被无理扣压半年，不退回也不答复。结果，李曰垓又被捕入狱，被迫承认和出身“阶级敌人家庭”的姑娘结婚是反动行为。

到了1975年5月，这位右派分子第三次被关押。他被诬为组织反革命“大同党”，定案以后，随即转为逮捕，一关又是三年半！

从1975年6月至8月的两个月时间，连续进行十二次审讯。

问：李曰垓，交代你的罪行！

答：我无罪，抓我关我不需要什么证据，但要我李曰垓俯首

贴耳接受迫害是不行的。我十六岁进监狱,现在三十一岁了,这次抓捕不过是旧戏重演!

问:不要攻击,交代!

答:我的罪行就是不愿意接受那个负责人的交代……我没有罪,事实证明,你们这次抓人又是错误的!

问:根据你几次审讯的态度,经上级批准,给你戴上刑具(脚镣)反省。

答:不管什么刑具折磨,搞逼供信,制造冤案,总会破产的。

问:你自己的罪行自己清楚。

答:我清楚是受迫害。

从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起的20多年里,李曰垓写的申诉材料达百万字,其中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及省委、地委就寄了50多份申诉信。有的被积压,有的被中间阻滞,有的被逐级照转下来,最后落到被告人手里,招来更激烈的迫害!

1979年7月,李曰垓被摘掉右派帽子,彻底平反。

●不是“右派”的“右派分子”

“祸从口出”还是“祸从笔出”

马寅初,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建国以前就以硬骨头闻名。他被蒋介石囚禁在歌乐山上,达两年四个月之久,但没有屈服过,最后被放出来。1949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浙江大学,请校长马寅初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大学校长。

这位老先生的名字最后与《新人口论》联系在一起,带来的

不是好运，而是灾祸。

他对中国人口的关注早就开始了。1955年以后，他连续多次下到浙江各村镇，调查人口变动情况，找干部和老农民座谈，还专程到上海了解上海国棉工厂等基层单位的人口生育情况。结论是惊人的：中国每年人口净增为千分之二十二，而中国的人口基数极大，这意味着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马寅初为这严峻的形势和前景所震惊和担忧！他要呼号，要引起政府和广大公众的注意！

1955年6月，人大会议召开，在浙江小组会议上，马寅初谈了对人口形势的看法，提出要节制人口生育。不料，被人说成是“马尔萨斯的那一套”，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东西，虽然说法不同。

马寅初被迫无奈，主动把提交给大会上的发言稿撤回来。但他逢机会就找人谈这一重大问题，多方奔走，终于于1957年3月31日，在中华医学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响起了他的声音：

“在目前我国，人口和生活资料都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生活资料的增长不能说不快，但即使这样，人民的生活也只能维持现状，不能得到很大的改善……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必须是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一方面控制人口。”“控制人口必须用政治力量才能达到，控制人口必须要由政府来做，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这个政府做得到。”

两年前有人对他的指责他还没有忘记，所以，这一次，他特别指出：“马尔萨斯说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是错误的，他的学说在当时就已经破产。”

第二个月，他在北京大学燕南园接见《文汇报》驻京记者，想通过报刊使自己的想法被更多的人知道。时值“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时期，马寅初特别兴奋，他对记者表明，“双百”方针是深得民心的，过去多少不敢谈和不能谈的问题都开始谈了，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愿意在这个繁花似锦的大好春天里，把人口问题的方方面面全部摊开来，供大家研究、讨论。

“我马寅初决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的人！”

记者说道：“您的这些看法会不会有人反对？”

他坦然一笑：“反对，一定会有的，事情总是这样的！……前年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人口问题时，在场的人就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守中立，有人甚至说，苏联没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谈……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看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反对的多，他们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

过了两天，在北京大学饭厅里，马寅初对他的部下和门生们再一次谈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现在我们人民内部矛盾很多，党与非党之间有矛盾，群众与领导之间有矛盾，群众与群众之间有矛盾，政府各部门之间也有矛盾，就连我们小小的北京大学矛盾也是很多的。这些矛盾我都不谈，我只谈今日中国的大矛盾，那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主要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别的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人口问题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着手，人口问题怎么解决呢？唯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

两个月以后，即1957年6月，召开了一届人大四次会议，马寅初没有再犹豫，用书面形式把自己的人口增长控制理论递交给大会。7月5日，也就是反右斗争开始后不到一个月，他的书面发言由《人民日报》全文刊载，标题赫赫醒目：《新人口论》！

全国上下为之震动。

为这《新人口论》的写作，马寅初对当时“大鸣大放”过程的政治动态并没有怎么关注，但是，也参加和政府安排的所有整风会议，而且，在会议主持者的动员下，他总是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有话就说。

5月14日、15日，马寅初连续出席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会场气氛是空前热烈的。有的发言者甚至提出，党应该拆除和群众之间的墙，填补沟壑，还有人要求高校非党化。马寅初坐不住了，他腾地站起来说道：

“目前有些批评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也不说。”“学校党委制也有它的好处，以北大为例，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人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单纯批判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来拆，共产党整风拆墙，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单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

当即有人站起来反驳马寅初的看法，说：“民主党派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

在其后的整风会议上，马寅初还是坚持墙必须两方面同时拆的观点。

马寅初也不是对形势的发展糊里糊涂，他自有自己的坚定看法。6月初，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谈了自己的忧虑，但是，话是极为婉转的：“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从片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分离与仇视；从全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团结与互助。”

这位老先生善意地以居中者的笔调写下这段文字，显然，他没有想到，针对他的一场风暴很快就降临了。



“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当初没有遭到正面的攻击，但不祥征兆是，那些同意他的理论的教授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打成右派，纷纷落马者中有著名的人口学家吴景超教授、陈达教授。

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而在此之前，许多批判右派的文章和发言，只要提到右派分子的“人口论”，就要不点名地把矛头指向马寅初。

转眼到了1958年3月，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反浪费、反保守”大会，许多教授、学者被作为“白专”、“保守”的典型受到猛烈批判。作为校长的马寅初，带头写了两张自我批评的大字报，检讨自己的官僚习气和去年四月在饭厅作人口问题报告中一处错误提法。

很快，这两张大字报在《北京大学校刊》上刊出来，被加上了花边框框……

效应马上就产生了，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难以招架，但马寅初居然还一张又一张地写大字报为自己据理力争。他到底在想什么呢？或许他认定，他的“问题”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终于，面对面的批判开始了。马寅初被请到前年四月他大讲人口问题的北大饭厅，在主席台上就座，这一回，不是由他侃侃而谈，而要接受批判。康生也出现在会场上，他当时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戴着深度近视镜，对台下的参加者说：

“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有人立刻呼应道：

“马老口口声声说自己 and 马尔萨斯不同，可是，马老在《新人



口论》里确确实实传播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这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马尔萨斯的基本论点触目惊心贯穿着马老的全部论点。”

“马老说他是马克思的马家，而我们只能说他是在新中国开设的一家马尔萨斯的马家黑店。”

马寅初的硬骨头精神又犯了，他怒火冲天，反驳说：“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于是，“态度不好”、“对抗运动”、“和群众对立”的帽子一顶连一顶地扣下来了。

第二次、第三次批判会连接着就召开了，却不允许马寅初参加，他被缺席审判，连辩驳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达几千份，贴满了北京大学的饭厅、礼堂、走廊、操场，汇成大批判的“海洋”，要将这个顽固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活活淹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批判马寅初哲学思想小组”在神圣的大学校园里纷纷成立，并展开赶写批判论文的竞赛，伴之以“咚咚、咚咚”的锣鼓声。

北京大学的围墙盛不住这大批判的浪潮，1958年5月9日，《光明日报》首先开辟专栏，对马寅初的经济思想进行严厉至极的批判，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振振有词，义愤充满在字里行间，当然，各种各样的帽子也少不了。其他报刊也争先恐后。马寅初仔细地读着那些文章，一拂袖子，说：

“《光明日报》不光明！缺乏光明磊落、以理服人的精神！”

他要申辩。他不是那种低头的人。他几乎不顾一切地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在《新建设》、《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经济问题》等报刊上，他一气发表了10多篇评理文章。其中有一段批驳文字：“我的文章原文是四万字，我敢断言他只看了四分之一就批判，何等马虎！好在我还没有死，还可以当面责问！”

他哪里知道，他被“赐予”的申辩权，是一种围套。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支持他的观点的文章，那也是为了树立靶子，证明他的思想流毒之深之广。一些作者因此被扣上“马寅初的信徒”、“马尔萨斯的徒孙”等帽子。旁观者清，一些好友劝他不要再坚持下去了，认一个错了事，以免影响政治地位，但马寅初别无选择，他还要申辩。

1960年1月，他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要求允许百家争鸣，文章清样落到康生手里，他如获至宝，说道：

“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这是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地揭发批判！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他下令《新建设》在马寅初的文章前加个“编者按”：“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和批判！”

马寅初的问题就这样“升级”了，再也不允许他公开为自己申辩。北京大学里，大大小小批判会一起开，声讨马寅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随着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马寅初被取消三届人大代表的资格，他理所当然地得不到提名。

上门的客人也越来越少了。庭院冷落，寒风袭人，落叶有声。

马老虽然从来没有被正式划为右派，但一直作为比“右派”分子危害更大的社会分子而被严密的内部控制着。

197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迈进马寅初的门，当面宣读了为他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决定。

然而，“错批一个人，多生8千万”的恶果已经造成！

第八章

共和国的“天堂”神话

●冒失的决策○小社并大社○
北戴河会议●遂平：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嵯峨山崛起人民公社
○应运而生，天下第一●理论“巨擘”的庄严鼓噪○陈伯达出口不凡
○当代“原始共产主义”蓝图○张春桥闻风而动●毛泽东亲自巡视人民公社
○徐水之行○安国定县之行○七里营之行○齐鲁之行●徐水：中国共产主义的试点○徐水的“毛泽东效应”○《大同书》来到徐水○徐水的《共产主义规划》○徐水人进入“共产主义”○徐水的“试验”轰动全世界

是真实的“天堂”神话？

是庄严的人间荒唐？

是古老而又并不陌生的悲哀？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共和国领袖问徐水县人：你们

的粮食太多了怎么办?又说过,一天吃五顿饭。徐水县人说:一九六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又说过,我们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自此,领袖、徐水县人、几亿农民,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步伐,走进悲剧、历史和壁画。

黄土地。黄种族。黄脊梁。

薄薄的东方血色中,朦胧着惊世警言。

● 冒失的决策

小社并大社

1958年3月。

天府之国的成都,春寒料峭。

中共中央正在这里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和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兴奋异常。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全国农村出现的大规模、大协作的农田水利建设等“大跃进”活动的局面,使他十分满意。在3月9日、10日、20日、22日和26日的会议上,他都作了发言。他对1956年以来党的高层领导人中一部分人提出的反冒进主张进一步表示不满,并继续予以批驳。他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打击群众积极性”。在会上,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次会议提出了扩大农业合作社规模的问题。早在1955年

加速合作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就酝酿着要把农业社规模搞大的思想。他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渐合并。有的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不但平原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并得到会议的同意。这次会议通过的37份文件中，其中就专门有一份名为《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3月20日，会议通过这份文件。4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文件。文件认为：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会是必要的。

三月成都会议之后，一些地区随即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4月，河南的遂平、平舆两县各办了一个6000至7000户的大社。5月至6月，这两个县的农业社全都并成了大社。随后在整个信阳专区，形成了一股小社并大社的热潮。其他地区也相继

掀起了小社并大社高潮。

北戴河会议

8月，烈日如焚。毛泽东风尘仆仆，对河北、河南、山东和天津一些地方进行考察后，来到北戴河这座北国海滨城市。海风习习，柔滑，凉爽拂去了他身上的躁热。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相继奔赴这里，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于8月17日至30日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

毛泽东在进行一些实地调查后，对各地小社并大社的工作信心倍增。他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和“提高”，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设想。早在6、7月份，他就通过陈伯达等人，传递出他对人民公社的设想，提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会议还提倡实行供给制，工资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穿衣不要钱。

会议作出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决议》主观臆造出所谓建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和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

《决议》对人民公社的规模确定为：一般一乡一社到数乡并为一社，社员户数可以从2000户到6000户以至2万户以上。《决议》规定小社并大社和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是：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

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并大社转公社过程中，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先试点，然后推广。在各地并大社转公社的实际行动中，并没有遵照典型示范、群众自愿等原则，而是强迫命令，一步实行公社化。

这个《决议》脱离实际地强调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算细帐，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零星果树、股份基金在一二年后也变为公有。《决议》还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快的地方三、四年，较慢的地方五、六年就可以。《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成都会议和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决议，如一阵春风，吹开了“人民公社”这朵无果之花。

● 遂平：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

嵯岬山崛起“人民公社”

遂平，地处河南省中南部，位于太阳系这颗最壮丽的行星的北纬 32.95°至 33.18°，东经 113.37°至 114.10°之间，总面积 1222.89 平方公里。它虽然不如江南的鱼米之乡，却也盛产小麦、玉米、大豆、芝麻、花生、高粱、棉花。这个县的桔梗、黄桃、白菜、西瓜等经济作物，驰名全国。

遂平地处中原腹地，早在商朝末年即已得到开发。西周时期，这里名为房子国，到汉朝设置为吴房县，唐朝元和十二年，唐

宪宗敕改为遂平县。

在县城西 25 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名为嵯峨山。山上石笋林立，犬牙交错，怪石如虎如猴、又如花似莲……各抱一姿，真是鬼斧神工；山下空洞百窍，玲珑剔透，万人洞、午阳洞、仙人洞……洞洞景异，风嘘则鸣，深邃莫测。早在三、四十年代，嵯峨山就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根据地，刘少奇、李先念、王震等曾在这里先后指挥过豫南的革命斗争。

嵯峨山有奇峻怪异的自然景观，也有动人心魄的革命历史。

然而，真正使之闻名于世的，是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之后，此处又诞生了第二个公社；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上，这是第一个公社——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它诞生的时间是公元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与巴黎公社成立的 1871 年相隔整整 87 年。

嵯峨山人民公社的诞生，在全国引发了千千万万个人民公社的出现，曾对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and 人民生活诸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应运而生 天下第一

1958 年 4 月，春满嵯峨山。

山下，来自四方八面的数千民工聚集在这里。奋战一冬，他们已胜利完成了下宋水库的修建任务。

4 月 15 日，民工们召开庆祝大会，庆贺水库竣工。河南省信阳专员公署的专员张树藩，中共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中共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都亲临会场，表示祝贺。

当天晚上，工地指挥部放电影慰问民工。这三位领导干部就在指挥部休息、聊天。

娄本耀问陈丙寅：

“丙寅，下宋水库工程已完成。你这当部长的，下一步有啥打算和安排？”

张树藩也紧接着说：

“老陈，对农村情况你熟，你就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陈丙寅看看专员，又望了老娄一眼，说：

“说实话，现在的农村工作很难做，矛盾很多。在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山区、平原互相协助共同发展等方面，都存在着本位主义现象，存在着小农意识。假如能找到一个办法，让他们携起手来，那我们县的经济就会快得多！”

听了陈丙寅一席话，娄本耀看看张树藩，谨慎地说：

“张专员，解决这些矛盾，我倒有个办法，不知行不行！”

张树藩兴致勃勃，问：

“老娄，快说，有什么好法子？”

娄本耀道：“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原来都是老山区的，要是现在再把它们合一块，不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一区一社的精神吗？张专员，你看这样如何？”

“这……合一起怪大呀！”张树藩没有表态，休息去了。

娄本耀和陈丙寅来到另一间屋子。

娄本耀说：“丙寅，明天你辛苦一下，把四个乡的书记喊来研究成立大社的事！”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娄本耀等人陪同张树藩来到渣呀山爬山，陈丙寅则按娄本耀的安排留在杨店中心乡召开四个乡的书记的会议。此事没告诉张树藩。

到太阳西沉时，娄本耀陪着张树藩回到杨店中心乡。此时，办事利索的陈丙寅早已开完了四个乡书记会议。

第二天上午，娄本耀和陈丙寅把昨天开会情况向张树藩作

了汇报,并请张树藩对成立大社一事表态。

张树藩瞅瞅娄本耀:“这么个大事,我自己个人怎么随便能表态?这需要地委讨论决定!”

娄本耀当即拿起电话筒,把长途电话直接挂到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办公室里。

经过片刻沉默,电话筒里又响起了地委路书记的声音:“老张,中央有精神,就按上级的意图去办吧!”

三天后,4月19日,中共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书记处书记娄本耀和副书记赵光,还有农工部长陈丙寅,副县长史发周整整开了一天会。会议主要讨论和研究大社成立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并把社名确定为:嵯峨山大社。

行署专员张树藩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会议最后同意娄本耀、陈丙寅提出的方案,决定大社设立管理委员会,由陈丙寅任书记,由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四个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的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等管理部门。

陈丙寅又说:“大社建立起来后,整天要和外边打交道,没有外交部可不行!”

于是,会议又决定设立一个外交部,一共八大部。同时,还设立了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大社建立后,原来的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嵯峨山大社成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工业的高潮。赵光和陈丙寅认为,“嵯峨山大公社”的名称已不适合大跃进的形势,需要赶快更换名称。但换个

什么名为好呢？

陈丙寅经过一番考虑，说：“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搞个集体农庄？”

赵光表示同意，但又补充说：“社的名称要反映农庄的先进性，再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这样，“嵒嵒山大社”成立后仅三天，4月22日，又改名为“卫星集体农庄”。

与此同时，中共遂平县委迅速将这一信息上报给河南省委书记处。

1958年5月5日上午九时，在郑州河南省委会议室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接见了娄本耀和新乡县七里营刘庄高级社的史来贺。娄本耀向谭书记汇报了嵒嵒山卫星集体农庄的有关情况。

谭震林听完娄本耀的汇报后，在会议室里一边踱步一边说：“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呢？听你说这个情况，实质上不是集体农庄。你这个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比苏联的集体农庄层次要高得多。我看，这与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你们有武装、有公安等政权机构，又包揽整个经济，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至于叫农庄好还是叫公社好，我作不了主，还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时，谭震林指着娄本耀对坐在一旁的史来贺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可以组织人去看一看。”

娄本耀和史来贺当即分别往家里挂了电话。娄本耀在电话里指示遂平县委办公室主任高运坦，要他当晚就把全县8个农庄改为公社，尤其是车站和卫星两个农庄一定要改过来。第二天，当新乡县七里营参观的人赶到时，卫星集体农庄已变成为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李有久来到卫星公社搞调

查。他对陈丙寅社长说：

“你这个公社有发展前途，但名称很不合适，到哪里都可以用，还是要带个地名。”

李有久又问：“你们这里地方什么东西最有名？”

陈丙寅回答说：“崆峒山最出名。可那是个小村庄，又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不行。”

“行！”李有久说：“就叫崆峒山公社！社址可以设其他地方。”他又问：“这是谁的公社？”

陈丙寅计上心来，脱口而出：“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崆峒山也是人民的，应该加上‘人民’二字！”

李有久很满意，笑着说：“说得好！”

就这样，卫星公社又改名为“崆峒山人民公社”。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短短的一个月内，在遂平县由大社——农庄——公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在四面八方的催产下，完成孕育过程，终于呱呱落地。它一诞生，世人都对它投来了惊奇和神往的目光。

●理论“巨擘”的庄严鼓噪

陈伯达出口不凡

陈伯达何许人也？当代人并不陌生。“文革”中，他曾红极一时，忽又成为阶下囚。正是此人，于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声威赫赫，是不可忽视的“大理论家”，其职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红旗》杂志主编。回顾人民公社化过程，人们不能不看到他的巨大“功劳”。

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陈伯达得到了毛泽东要把“工、



农、商、学、兵”组合为一个大公社的精神。于是，便舞文弄墨，讲演游说，颇是辛劳。

195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的纪念日。北京大学数千师生聚集在一起，欢迎这位大理论家光临并演讲。

陈伯达健步走上讲台，神采奕奕，环视会场。待到人们的掌声消歇下去后，清清嗓子，开始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

“今天，是我们党的生日。我们党从建立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七周年了。这是中国人民和我们的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经历曲折道路，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三十七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三十七年的历史不算很长，可是，人们看到，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中国人民已经在自己的大地上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并且正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全国解放八年来造成的生产力，在某些方面说来，大大超过过去几千年造成的生产力。这还只是我国生产力解冻的开始。可以预卜，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今后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加一日千里地显出新的面貌。”

出口不凡，陈伯达气宇轩昂地从嘴里吐出了三百字。接着，又从马克思、恩格斯讲到列宁，又讲到毛泽东，从民主革命讲到社会主义革命，侃侃而谈。在讲到建立公社时，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著作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可以采取的十项措施的最后两项是：‘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状态逐渐消灭’；‘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在现在中国的实际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又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它所包含的几个基本点正在使这两项措施的实现条件和具体形式，逐步明

朗化。”

“毛泽东同志最近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商业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毛泽东同志关于公社的这种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他又高瞻远瞩地表示：

“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

他在讲演中对北京大学的学生充满希望，他说：

“在座的同学都叫大学生。我在这里说话，又要大家甘当小学生，而是首先是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这说得通吗？这是说得通的。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程度的大学生；又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程度的小学生。又是大学生，又是小学生，这叫做辩证法的对立统一。”

最后，陈伯达激情满怀地号召道：

“在现在中国，正在展开着一个比欧洲文艺复兴更伟大得不可比拟的伟大的新时代。处在中国这样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看到人民群众的热情奔涌，才思横溢。这真是广大群众源源不绝地涌出自己创造力的伟大的时代。毛泽东旗帜给了我们以明确和坚定的方向，给了我们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伟大的旗帜下，充当前进的战士，为人民的幸福，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明天，而努力奋斗！”

讲演结束了，鼓掌经久不息。

同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在谈到湖北鄂城县委会的《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和《旭光一社是怎样领导和管理小小工厂的》两篇通讯时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陈伯达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

“可以不可以说，这个合作社（指旭光一社）的所作所为，在实际上是指出了我国能够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较迅速地消灭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区别以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从而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出顺利条件的正确道路呢？我想，完全可以这么说。”

这位大理论家已经发现一条中国从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

当代“原始共产主义”蓝图

嵯峨山人民公社的诞生，使陈伯达兴奋难抑。

1958年7月下旬，陈伯达不辞劳苦，在中共河南省委农工部部长赵定远，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鄢丙玉等陪同下，光临嵯峨山，进行调查研究。

陈伯达到达嵯峨山后，简单听取了当地领导的汇报，就在土山大队进行取消货币的试验，试验方式是在流通领域实行以物换物，辅之以“货券”。这样，自陈伯达到达之后，土山大队的市场出现了以鸡蛋换韭菜，用红薯换辣椒，如价不等再找以货券的场景。

这时的土山人，似乎又回到了中世纪，不，可以说是原始社



会后期的境地。但陈伯达的试验目的,是想通过取消货币达到消灭商品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

在土山进行试点后,陈伯达又把遂平县银行行长王国昌召到土山,让他发行全县流通的货券。

第二天,陈伯达一个电话,又召来了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县长张庆林。

陈伯达对他们说: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协调,社会才会较快地发展。你们现在的公社规模太小,应该搞一县一社,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更大的气魄才行!”

8月5日,遂平全县成立了一个“卫星人民公社”,县委书记改任政委,县长改为社长,副书记、副县长分别改为副政委和副社长,原来的各公社一律改为管理区。全社的户数共为9369户,接近一万户。

这样的公社管辖区域相当于中国古代分封制时代一个小诸侯的地盘。社长、政委堪称“万户侯”。

8月7日,在陈伯达的亲自指导下,制定了《嵒呀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单(草案)》。

请看《简章》的部分内容:

第二条,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积极创造条件,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为此,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社会产品很丰富和人民有高度觉悟的条件下,逐步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过渡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第五条,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

第十四条,公社在收入稳定、资金充足、社员能够自觉地巩固劳动纪律的情况下,实行工资制。按照每个劳动力所参加工作的繁重和复杂程度,以及本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和劳动态度好坏,由群众评定他们的工资等级,按月发给不同的一定的工资,有特殊技术的,可以另加技术津贴。逐月所发的工资可以有多有少,在公社收入较多和社员需要较大的月份,工资可以多发,其余的月份可以少发。遇到特定灾害,可以酌情少发工资。

.....

8月8日,中共遂平县委发出了全县各食堂实行统一流动餐票的通知,供给制的范围,由嵯岬山卫星人民公社进一步扩大到全县。

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嵯岬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被列为会议材料之一印发给每个与会者。同一天,毛泽东亲自对这份材料的有些内容作了修改,并加以以下按语:

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9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七期对《嵯岬山卫星

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予以全文刊载,并加上了编者按语。

陈伯达的“试验”成功了,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很高兴,踌躇满志。

10月,遂平全县实行了工资制。但工资仅发放了一个月。由于全县财政收支无论如何也不够再发一个月的工资,所以11月份的工资只好停发。嵯岬山人民公社10月份发放的工资人均一元八角六分。

张春桥闻风而动

8月19日,全国各协作区主任会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

8月21日,毛泽东又说:

“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象“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



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当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把毛泽东关于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见解转告后，身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闻风而动，挥舞大笔，写下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登载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上。

张春桥在文章中，改换马克思、列宁的本来含义，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核心是等级制度”，把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说成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适用，而实行薪金制等“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的原则的攻击。”

张春桥文章中的观点，当时受到不少人的反驳。《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发表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评价张春桥的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问题并没有说明白”。该文还提出质疑说：“按照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度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却对张春桥的文章表示十分赞赏，指示由《人民日报》转载，并代写编者按语：

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

意(见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张春桥不感到害怕和孤立了。他充满信心,踌躇满志,并准备在政坛大展宏图。10年后,他爬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层,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

●毛泽东亲自巡视人民公社

徐水之行——毛泽东问:你们的粮食太多怎么办?

1958年夏的大跃进形势和公社化运动,使毛泽东兴奋不已。他要亲自巡视各地,到一些“公社”去调查一番。

8月4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站开出发,疾驰在华北的原野。

雨过天晴,田野里依然一片潮湿,只是阳光更加灼人。麦收已过,一个个禾场上,可以看到堆集或散落的麦秸。

毛泽东透过车窗,望着华北的原野,情不自禁:

“秋庄稼长得好哇——”

一种朴素的亲切感,在他身上化作一种巨大的激情。他觉得在城里呆久了,总是满脑空空,走到下边来,便常有新的收获。他从小下地干农活,参加革命后大部分时间也在农村。土地、庄稼,黑黝黝的庄稼人,都是他激情的源泉。

前不久,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将一份报告呈到他面前。报告说,河北省徐水县人民大搞水利建设,去冬以来,用三个月的时间,修建山区中小型水库17座,葡萄串、满天星式的平原水库173座,实现了水利化。而此行毛泽东巡视的第一站便是徐水。

毛泽东要视察徐水，早在一周前县委就知道了。

为了迎接毛泽东来徐水，县委组织人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毛泽东看的地方；下面按军事编制，连、排、班负责人要明确；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县委内部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打发到偏远的地方安排下乡，不准回城。县委把一切都安排得如同报纸上和报告中写的那样真实。

县委书记张国忠，时年 33 岁，1957 年调任县委书记。小伙子聪明好胜，精力充沛，在毛泽东来徐水前，已是河北省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

毛泽东的专列一停下，张国忠即应召上专列去见日夜想见的领袖。

毛泽东很高兴地同张国忠握手。临行前，他看过谭震林和陈正人关于徐水工作情况的报告，成绩不小，尤其是在这里创造的劳动组织军事化的经验，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他没有想到县委书记竟是一位年轻人。

毛泽东亲切地问：

“你今年多大？”

张国忠答：

“33 岁”。

毛泽东笑了，频频点头。

张国忠补充说：“我们县委一班人大多数是年轻的。”

“多大？”毛泽东又问。

“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

“好，都是年轻人哟。”

接着，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徐水的土地、人口、生产和实行劳动组织军事化的情况。张国忠一一回答。

“到你们县里去看看农业社好吗？”毛泽东提议。

张国忠立即欢迎领袖下车。

公元1958年8月4日下午4时零5分，毛泽东走下专列，踏上徐水的土地。

“这庄稼长得不错嘛！”毛泽东乘汽车，沿着瀑河往东缓缓行驶。他被路边庄稼的长势吸引住了。

“我们计划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达到2000斤。”张国忠与毛泽东同车，一路上，他不断把他的宏伟目标报告给毛泽东听：徐水县计划亩产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山药秧子都是用飞机运来的……

汽车路过一排猪舍，张国忠向领袖介绍：这里养着计划长到1000斤的“卫星猪”。他还介绍：把猪的甲状腺割了，让它吃了睡，睡了吃，就可以多长膘。

路旁的庄稼地里，有两座炼钢的小土炉，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张国忠说：那是农业社的炼钢厂。

“炼钢我可要看一看。”毛泽东说。

汽车便停下了。一行人来看炼钢。只见几名“炼钢工人”在两座坟堆似的东西旁边忙碌，大风箱拉得“呼哒呼哒”响，劈柴火在熊熊燃烧……

毛泽东问：“一炉出多少钢？”

张国忠答：“200斤。”

毛主席计算起来：“一炉200斤，10炉就是2000斤。”

下午4时半，毛泽东的汽车到达大寺各庄。

路北一座院落，庭院清洁，房舍工整。正房是农业社的会议室，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锦旗、奖状、生产规划和上级发的大跃进宣传画。画上有攀着玉米秸子上天的小伙子；以花生皮当大

船，漂洋过海周游世界的老汉；在农业社的棉花地里，摘棉花的嫦娥姑娘……

毛泽东步入会议室，首先被墙上的各种锦旗所吸引，兴致勃勃地一一看了，回头问农业社社长李江生：

“你们农业社叫什么名字？”

“叫第八瀑河农庄”。李江生答。

农庄？毛泽东沉默了一下，觉得这是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不合适，便说道：

“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人群里顿时发出一阵“呀呀”的赞叹声。

据当时在场的人们回忆，毛泽东当时还解释了“公社”的名称。其中提到 87 年前，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诞生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巴黎公社。

“今年的麦子收成好吗？”毛泽东笑嘻嘻地问满屋子激动、拘谨的庄稼人。

李江生：“很好，比哪一年都强。”

毛泽东：“每亩平均多少斤？”

农业社党支书阎玉茹回答：“754 公斤。”

毛泽东高兴地“啊”了一声：“不少呀！”

毛泽东又问秋季预产情况，问了社里的又问县里的。

张国忠回答：“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 2000 斤，全市总产计划拿到 12 亿斤。”

毛泽东睁大眼睛，惊讶地说：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 31 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张国忠：“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

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李江生：“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毛泽东说完，又笑嘻嘻地望着人们。一时间，谁也答不上来，粮食多了究竟怎么办好呢？人们只是望着毛泽东笑。县委书记张国忠也只好承认：“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结束了在农业社的谈话，毛泽东在人们的簇拥之下，观看了农业社的幼儿园、幸福院、公共食堂，到村子外边，看了“山药山”。这些“山药山”是把土堆成小山形状，在上面插秧而形成的。

张国忠不离毛泽东左右，滔滔不绝地向领袖介绍这些新发明、新创造。当他说到这些山药亩产可达到100万斤时，毛泽东回头对人们说：

“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人们齐声说：“好！”

在通往县城的路上，毛泽东与张国忠边走边谈。

毛泽东问：“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

张国忠：“刚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吃了大锅饭。”

毛泽东开玩笑似地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嘛！”

张国忠：“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个人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大车、牲畜等等，群众都要求转为全社所有和办国营企业。农村没有小商人，城市也没有小

商人。社内还有个专管居住房屋建筑和分配的组织。我们讲，不共产几千年是贫困落后、阶级压迫；一共产就大跃进，拆了旧房搞新的，因此大家都说共产好。”张国忠把他刚学来的“共产”理论，讲给毛泽东听。在他心目中，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就是把房屋树木合到一起一块过日子。

毛泽东来到徐水县委，早已等在这里的人们发出一片欢呼。从保定抽调来做服务工作的年轻姑娘们纷纷挤上来争和毛泽东握手。张国忠和县委其他负责人赶紧把毛泽东请到会议室。

服务员端来已切开的西瓜，毛泽东一边吃西瓜一边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

毛泽东又向坐在身边的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说：“这里的妇女劳动力解放得彻底哩。”

李悦农告诉毛泽东：“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四台（即锅台、炕台、磨台、碾台）。”

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这时，毛泽东大脑中忽然记忆起一项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创造：劳动组织军事化。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张国忠说：“这是逼出来的，全县 11 万劳力，4 万人搞水库，打机井，办工业，支援外地，修路，逼出来个军事化。全县成立了 90 多个团，200 多个营。”

毛泽东说：“这是形势逼人哩。”又回头对陪同他的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说：“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 90 多个团，200 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安国定县之行——毛泽东说：你们推广了徐水的军事化经验没有？



视察徐水的第二天,1958年8月5日,毛泽东又到安国县去考察。

在车上,毛泽东问同车的李悦农:

“徐水的军事化,你们推广了没有?”

李悦农回答说:“已通知各县搞了一个试点乡,尚未全面推广。现在省委正派人总结徐水食堂化和军事化方面的经验。”

毛泽东说:“徐水这样干是逼出来的,张国忠讲全县11万多劳力,弄4万多人打机井、修水库、办工业,还剩7万多劳力,非常不足,就逼出来军事化,象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李悦农:“这样组织起来,劳动效率提高多少记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第一场雨时,山区龙门水库坝角发生塌毁,我们从徐水调2000民工去抢修。晚上11点通知徐水,他们几个钟头就集合起来跑步到达水库。”

毛泽东恍然一悟,说:“这不成了军队了?有纪律没有?按时吃饭,按时上班,组织起来没有点纪律也不行。你们能不能弄一批枪给徐水,把他们武装起来。徐水劳动力共11万人,其中青年男女可能有5万人,20%的发枪,共需1万支。几十个团,又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5万人里1万支枪,5亿人1亿支枪,6亿人需要1.2亿支,没有这么多枪怎么办?你们会造吗?”

李悦农:“县里不会造枪。”

毛泽东:“对!不要县里造,一个地委可以办一个兵工厂,将来每人一支枪,30发子弹。叫他们平时学打靶,这就是全民武装。全国这样组织起来,就把帝国主义吓死了。工农商学兵,要有兵,要发枪。”

李悦农:“现在还有个条件,很多复员军人回了乡,可以使用起来。”

毛泽东：“对！”

专列到达保定地区的定县。按事先安排，安国县县长焦家驹奉命来接毛泽东。

在定县火车站站台上，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挡住了焦家驹。

叶子龙问：“让主席参观安国县是什么地方？”

焦家驹：“伍仁桥。”

叶子龙：“那儿离县城多远？”

“30里。”

“好走吗？”

“要过一条河。”

“有桥吗？”

“没桥，已准备好船。”

叶子龙决定：“不去，在县城附近，沿公路的地方看看。”

焦家驹琢磨了一会儿，说：“那就看流村吧！”

叶子龙询问了一番流村的情况，才把焦家驹带上专列。

叶子龙介绍：“主席，这位是安国县县长焦家驹同志。”

毛泽东：“焦，焦赞的焦，是吗？”

“是。”

毛泽东握住焦家驹的手说：“我到你县参观一下庄稼行吗？”

焦家驹：“我正是来接主席去我县视察工作的。”

毛泽东一行与焦家驹下了火车，乘一辆汽车，穿过定县，沿定安公路往东，奔往安国。

汽车在定县境内行驶。李悦农告诉毛泽东：定县韩家洼有个马宝山，带领一帮穷乡村成立了高级社，生产搞得不错，今年粮食可望获得大丰收。

毛泽东又劈头一问：“他们产那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

李悦农：“我们还没有考虑这件事。”

毛泽东问焦家驹：“你县小麦产多少？”

焦家驹：“亩产 491 斤。”

毛泽东：“明年计划多少？”

焦家驹：“计划 45 万亩，亩产 2000 斤。”

毛泽东：“怎么实现？”

焦家驹：“我们每亩地施粗肥 300 大车，普遍深翻一尺半以上。”

当时，深翻地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项内容。据说，有一位研究农作物的专家，在五尺深的地底下找到了小麦扎下的根须，这成为深翻地运动的理论根据。于是，深翻！越深越好，越深越革命。

毛泽东说：“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的一环，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根深才能长得壮，深翻还能保持水土。要苦干深翻。”

李悦农：“我们已将拖拉机和双铧犁改成深翻犁。”

毛泽东：“对，有工具就用工具，没工具用人力也要深翻。”

据当事人的回忆，安国县的深翻运动创造过深翻 1.2 丈的纪录。

毛泽东兴致很高，定安公路两旁的庄稼也的确长得很好。汽车经过定县境内的小镇东亭，毛泽东看到了临街墙上写的很醒目的大字标语：

“乘东风、驾火箭，共产主义定实现。”

“压倒安国，超过安国”。

毛泽东说：“他们要和你们比呢？现在是他们压倒你们，还是你们压倒他们呢？”

焦家驹说：“是我们压倒他们。”

毛泽东：“压倒了吗？”



焦家驹：“还没压倒，他们干劲很足。”

毛泽东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压倒，压倒……”

汽车进入安国境内，毛泽东被安国的庄稼吸引着，一再要求下车看一看。汽车在辛安村南的公路上停了下来。毛泽东下了汽车，走进庄稼地，朝正在地里干活儿的两个妇女走去。

“你们怎么劳动？”毛泽东大声地说。

“包工。”一个妇女直起腰来回答。

“你们的生活如何？”毛泽东继续问。

“比过去好多了。”

毛泽东询问了庄稼的生长情况，往回走时，一个妇女拉住焦家驹，小声问：“他是谁？”

“毛主席。”焦家驹说。

两个妇女二话没说，扭头就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毛主席来了……”。

大家赶紧催促毛泽东上车。

汽车继续东行。毛泽东情绪越来越兴奋。此时，平坦整齐的田园，丰收在望的好庄稼，甚至连忙碌着的农家妇女，都激起了他蕴积在心中的伟大激情。

“你们愿意整修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砍掉？”毛泽东问。

焦家驹说：“我们非常希望修。”

毛泽东：“这要占用一部分土地。”

焦家驹说：“我们地不少，可以出地。”

毛泽东：“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

中午1时，毛泽东的汽车开到流村村头停下来。

村头聚集了許多人。毛泽东和县委副书记袁硕儒、淤村乡党

委书记郭键、流村党支部书记王长锁握过手，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朝村南走去。

村南是一大片玉米丰产方，田方地正，没有一棵杂草。从玉米丰产方往东，是高粱丰产方和山药丰产方。毛泽东走到一块高粱地边，回头问跟在身边的郭键。

“这样的高粱一亩打多少斤？”

“五六千斤。”郭键回答。

毛泽东：“一棵能结几个穗？”

郭键：“八个穗。”

“这玉米长得好啊！”毛泽东走到玉米地边上大声地赞叹着，随即又皱起眉头：“就是有许多虫子。你们有什么研究机构吗？”

焦家驹：“我们有农业大学。有技术研究委员会。”

毛泽东：“要好好研究治虫，二三年内消灭掉。”

中午天气很热，人们请毛泽东到地里的一个窝棚内休息。

这是事先搭好的一个窝棚。毛泽东在窝棚内摇着扇子，听郭键介绍淤村乡农业社合产并社的情况，随后问郭键：

“你看过《三国》吗？”

郭键：“看过。”

毛泽东：“《三国演义》第一句话是什么？”

郭键回想不起来，只好说：“不知道。”

毛泽东：“《三国演义》第一句话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象你们社，一社二三千户，四五千户，五六千户，一乡一社。”

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钻出窝棚，来到一块山药地里。

毛泽东问：“这甘薯亩产多少？”

郭键说：“计划 80 万斤。”

毛泽东说：“要看结果，这还是计划，20 万斤也不少。甘薯

这样多，人吃、牲口吃，以后猪也要改善生活，吃豆子。”

看完庄稼，毛泽东乘车到安国县委，在车上询问焦家驹1956年至1958年的工作情况。

焦家驹说：“安国在党中央和省、地委领导下，没有出现‘马鞍形’”。

毛泽东说：“好，没有出现‘马鞍形’，风没有刮动你们，好。”

汽车开进安国大街，路经药王庙，毛泽东问：“药王姓什么？”

焦家驹说：“不知道。”

毛泽东不满意说：“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

可怜这个安国的父母官，文革期间，被反绑了双手，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革命群众面前接受批斗，几乎所有的批判发言都有：“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在鞭子和拳头的威逼下，也有这样的喝问：“药王姓什么？”

药王姓邳，名彤，是北宋年间的名医。800多年来，安国人对他顶礼膜拜，小心侍奉。但是1960年大饥饿袭来时，安国人被浮肿病折磨得抛尸荒野的时候，药王却视而不见。

下午3时30分，毛泽东在安国县握住了县委书记刘振宗的手。

毛泽东问：“你是哪里人？”

刘振宗：“是定县人。”

毛泽东：“定县书记是哪里人？”

刘振宗：“是安国人。”

毛泽东说：“定县人在安国当县委书记，安国人在定县当书记，又到安国来参观，真巧。”

毛泽东对安国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在听取了刘振宗的汇报后说：“粮食是命根子，你们安国是农业先进县，要大上粮食，要在北方带上头。现在亚、非、拉各国的国际友人，都希望中国卫星

上天，钢铁、粮食过关。中国粮食过了关，不吃进口粮，还要拿出粮食支持亚、非、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

下午4点钟，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了安国。

七里营之行——毛泽东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到达河南新乡七里营乡视察。陪同的人有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吴芝圃、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史向生以及有关地、县、乡的党委负责人。

七里营乡已建起了人民公社。毛泽东参观了这个公社的托儿所、“幸福院”、食堂、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又到田间观看了棉花的生长情况。毛泽东和在“幸福院”里过着晚年幸福生活的老年人握手，并且谈了话。在滚珠轴承厂里，毛泽东详细地观看了用土法生产滚珠轴承的过程，他对这个小工厂在两天时间里就生产出五千多滚珠极为称赞。

毛泽东对于田间一望无际长得特别好看的棉花感到特别高兴。毛泽东走到正在棉花地里喷射杀虫药剂的女社员面前提议说：

“作作给我看看”，六个女社员兴高采烈地给毛泽东作了表演。

毛泽东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棉花的果枝上棉桃成串，他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

毛泽东从棉花地里走出来向社干部说：

“象这样的棉花有多少”？

社干部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

毛泽东笑着向吴芝圃说：

“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象这样就好了。”

“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吴芝圃说。

“对！有这样一社，就会有好多社。”毛泽东说。

毛泽东在襄城县的梁庄农业社、十里铺乡薛元农业社等地观看了烟叶和谷子生长的情况。

这里种的云南多叶烟，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每棵有七十多叶，每亩计划三万斤。毛泽东高兴地走到烟叶地里，仔细地观看了烟叶的生长情况，并向梁庄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张富德等详细询问了烟叶的种植和收获方面的问题。

在长葛县“五四”农业社，毛泽东观看了长得很好的麦茬玉米。这里有四十亩密植麦茬玉米，已经长到六尺多高，计划亩产两万斤，附近的另一块干部玉米试验田长得更好，计划亩产两万五千斤。

毛泽东称赞了这些生长良好的玉米，对县委书记吕炳光说：

“今年玉米的产量如何？”

“保证一千五百斤，争取两千斤。”吕炳光说。

毛泽东笑着问：

“能达到吗？”

“一定达到，秋后到北京给主席报喜。”吕炳光满怀信心地说。

在商丘县道口乡中华农业社“七一”试验站，毛泽东看到架秧和不架秧的两种试验红薯以及这个社第一次试种的水稻，并且对这些作物生长的情况表示满意。

毛泽东看到高粱的时候，就问：

“有没有种多头高粱？”

“有许多地方种了这种高粱。”商丘地委第二书记任秀铎回答。

“这种高粱产量高。”毛泽东说。

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了三天后离开河南。

齐鲁之行——毛泽东号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八月九日，刚刚立秋。

毛泽东从河南又到山东省进行视察。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省各项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就各项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且特别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

“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毛泽东还一再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指导。他还指出了办大社的优越性。

当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多，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在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了大片藕田和丰产稻田。在去北园农业社的路上，毛泽东看到路旁秆粗穗大的谷子时，接连向陪同他参观的谭启龙、裴孟飞和中共历城县第一书记吕少泉等同志赞扬说：

“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孬嘛，我看群众干劲不小。”

到了北园社，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乡、社干部一一握手，接着就视察藕田和丰产稻田。

这个社有二千五百多亩藕田和二千一百多亩稻田。在视察稻田的时候，一群青年小伙子在田旁列队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社里的“青年卫星队”正准备到稻田锄草，毛泽东亲切地握了每个队员的手，还同小队员韩茂林谈了话。

“这里的水稻长得很好。”毛泽东一边看，一边说，并向社主

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

当毛泽东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

“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争取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大干的。”毛泽东还询问了这个社妇女参加生产的情况。

接着，毛泽东视察了山东省农业研究所。

“这个所的副所长秦杰是什么专家”？毛泽东问。

“是研究棉花的。”秦杰回答。

毛泽东详细察看了中共山东省委负责同志和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同志在这里合种的棉花试验田。这块田里的棉花有一人高，长得象棉花树一样，估计每亩能收五千斤籽棉。

毛泽东亲手剥开棉壳，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一株棉花的棉桃，这一颗已长棉桃六十四个。数完以后，毛泽东微笑地对秦杰说：

“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

“过去搞得不大好，只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后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秦杰说。

毛泽东诙谐地说：“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当秦杰汇报棉花容易落桃时，毛泽东说：

“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毛泽东继续问。

秦杰说：“还是农民行，我们在向农民学习。我们的小麦就没

有农民最好的小麦产量高，我们打算明年赶上农民。”

“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毛泽东鼓励秦杰说。

视察农业科学研究所以后，毛泽东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陪同，和这个部队正在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见了面并合影留念。在和代表见面的时候，毛泽东还和长征时曾当过他的警卫员的陈昌奉上校作了亲切的谈话。

在济南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来济南参观全省小麦丰产评比展览馆的著名劳动模范、农业社干部吕鸿宾、刘秀印、刘洪章、徐建春、刘廷茂、厉月举、张式瑞等人，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并且勉励他们说：“你们干得好，都鼓足了干劲。”

离开山东后，毛泽东赴天津，并准备参加北戴河会议。

●徐水：中国共产主义的试点

徐水的“毛泽东效应”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

毛泽东离开后，徐水人激动万分。

著名作家康濯，当年曾在徐水县体验生活，他记叙当时的情景时说：

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脸上焕发容光把西边地平线上金黄鲜艳的彩云照得花团锦簇。徐水城关附近的人们，奔走相告，对于根本不认识的人，也要叫他赶快去看看毛主席。自然有些人没能见得着领袖的面，但是，没见着的虽然惋惜不止，却也和见了领袖的人一样兴奋如狂。大家都说：毛主席



没有离开徐水,你看,咱们每个人不是都干劲更足了么?毛主席一直在咱们面前,鼓舞咱们的干劲呢?

黑夜,县委召开了全县的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自觉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巨大的幸福已使人们激动得无法表达。

一位有腿病的老汉,从幸福院跑出来,坚决不再回去,说:“我见到毛主席,腿早好了,我要赶美英!”

一位只有小学文化,不安心在县肥料厂工作,总想上中学、上大学、当工程师的姑娘,见了毛主席,认为自己的算盘打错了,对不起毛主席,检查了自己想上大学当工程师的错误思想,安心工作了。

大寺各庄,连夜成立了人民公社,为纪念领袖视察,定名为:徐水县东方红八四人民公社。并宣布:一切房子、树木、猪、羊、大车、牲畜全部归集体。社员实行工资制。公社党委连夜修订跃进指标和生产计划,粮食产量由原来亩产 38000 斤提高到亩产 40000 斤。

8月5日,徐水县委立即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会上作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他说:“今天是共产主义文化跃进大会,这是我们县要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很重要的会议,这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文化教育全要提高,向共产主义进军”。“要建设共产主义,就要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党领导群众多年,就是要为建设共产主义,使人民进入生活、劳动幸福的乐园,要消灭贫困、压迫、阶级。我们这一代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向幸福的乐园前进。”他还说：“毛主席深入农村，亲自看看大寺各庄农民用什么干劲向共产主义迈进。”关于建立公社他说，“现在高级社改为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要“把人民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内”。讲话中他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共产”，他说，“大车，牲口全要公有，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机器，哪个是个人的？存款还算自己的，生活用品是自己的。这就叫共产。共产行不行？（台下喊：行！）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私产是贫苦受罪，粮食不能高产。共好了是两千万百斤，好得多吗？（台下喊：好！）”他根据毛泽东的号召要求全县成立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离开徐水后，“一个建设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在全县城乡中掀起。就从那时起，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在社员自愿的基础上，各户私有的部分农具、牲畜、房屋、树木等都已转为公社所有；生产资料入社折价款的部分也决定取消。各个公社正在实行或者准备实行工资制。”“为了把现在规模很小的公社合并成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型人民公社，徐水县于8月15日将全县二十个乡镇并为九个大的乡镇。”人民公社的成立，给徐水县的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

《大同书》来到徐水

8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徐水视察工作，带来了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

陈正人8月6日到徐水，8日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河北省委秘书长尹哲，副省长胡开明，地委书记李悦农和徐水县委领导，南梨园乡党委书记，大寺各庄、北邵庄、双营、六里铺四个村的支部书记和社长。座谈会上陈正人听取了徐水县委的汇报后，就提出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问题。他说，第二个

五年计划,就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过去没有想到跃进这么快,今年钢的产量能搞到一千二百万吨,炼钢设备可搞到二千万吨,明年钢产量达三千万吨,超过英国,这样就逼得我们想问题了,就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机关、学校都搞。

陈正人还讲到为什么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他说,因为这县跃进很快,你们搞了军事化,大大地解决了劳动力,在水利建设上有创造性,这次军事化又走在了前面,一年来群众在运动中也有了很多锻炼,农业上有大基础,交通很方便。

为了搞好共产主义试点,陈正人还大体讲了工业,农业,文教的规划、指标,提出了全县可搞一个大联社。号召大家看几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和毛主席有关方面的文章。会后,陈正人还把他带来的康有为写的《大同书》送给一些同志,叫大家看看。于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群众运动高潮很快在徐水全县掀起来了。

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人人幸福的大同世界。他决不会想到,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河北徐水县,会进行共产主义试点,去实现他所设计的规划蓝图。康有为若是在天有灵,会无比欣慰。

徐水的《共产主义规划》

中共河北省委对徐水的共产主义试验非常重视,于1958年8月12日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进行了研究。会上提出:“成立规划小组,中央、省派人参加,各部门都要有,在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规划总的要求,是使徐水发展速度比其他地方走在前头两三

年,以便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于是,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1958年8月22日,徐水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这个规划草案,于1958年8月26日在《徐水报》上全文刊登。向共产主义迈进规划的公布,对全县人民来说,虽然感到突然,由于正处在大跃进的高潮之中,广大群众干劲很足,也就使全县大多数人头脑更加发热起来。

这个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写道:我们的任务是,随着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继续组织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大跃进,加速农业机械化和电器化,力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为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创造充分的物质基础;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群众的高度文化水平创造条件。奋斗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县的规划前景是:今年(1958)年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1963年实现高度机械化和电器化,一切主要体力劳动都为机械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不再仅仅是为了谋求生计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1959年每人平均可以分到粮食二千斤,食油二十斤,肉类五十斤。1963年每人平均可以分到粮食二千斤,食油五十斤,肉类三百斤,棉布一百尺,糖二百四十斤,水果一百四十七斤。主要生活资料实现各取所需。1959年三十岁以下的文盲都消灭,到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再过五年,或者更短的一点时间内,即从明年算起,在七至十年内,三十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成为专家。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规划中还具体规定了1959至1963年工业、农业、林牧渔、交通、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指标。这些指标主要是:

工业：新建县营工业有：三百台机床的机械厂、酒精厂、制糖厂、人造石油厂、淀粉厂、化肥厂、联合纺织厂、水泥厂、综合化工厂、炼焦厂、热电厂。人民公社工业有：机械修配厂，每个公社两个化肥厂、棉纺厂、酒精厂、水泥厂、综合食品厂、制鞋厂、砖瓦厂。每个居民村都要建被服厂。

农业：耕地原有七十九万亩，播种面积扩大到一百六十万亩。1959年粮食播种九十万亩，平均亩产三千斤，每人平均四千斤。其中小麦八十万亩，亩产一千五百斤；甘薯二十万亩，亩产七百斤。经济作物四十三万亩，亩产皮棉七百万斤。1962年缩小粮食播种面积，播种六十四万亩，亩产粮食八千斤，每人平均二千五百斤。

林、牧、渔：林业1962年发展到一百万亩果树两千万棵，大牲畜发展到十三万头，羊一百万只，猪三百二十万头，鸡八百万只。

根据这个发展规划，到1962年平均每人将占有粮食四千八百斤，棉花三百五十斤，食油一百二十四斤，猪肉四百斤。

交通：修建县办铁路六十公里，还要修建公路，发展航运。

文化：七至十年内把现有三十岁以下的人提高到大学或高等专科文化程度，县办综合大学一所，各村办业余红专大学。各公社还要建图书馆、体育馆，剧团等。

中共徐水县委在正式公布全县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后，1958年9月20日，又向全县人民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供给制试行草案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制订的。

徐水县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标准和办法是：

一、实行供给制的范围：农民、工人（包括县营、各公社工厂

工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一切在徐水工作的人员及大、中、小学学生。

二、供给制等级的划分标准和具体办法是:

伙食:农民、中学以上的学生每人每月五元,幸福院的老人,小学学生,幼儿园的幼儿每人每月四元,托儿所的幼儿每月二元,工人根据技术、劳动强度每人每月十至十二元;干部,县委级干部每月十八元,一般干部十二元。伙食费不发给本人,由伙食单位掌握。

服装和日用品:服装以国家棉布定量为标准,日用品根据需要适当发给。具体标准:农民,每人每年单衣两身,两年棉衣一身,每年鞋子四双,帽子一顶。幸福院的老人和学生,幼儿园的幼儿比这个标准略少一些。在日用品上一般都是袜子两双、肥皂两块,香皂一块,牙膏两支。干部和工人一样只多一件衬衣,两块肥皂。

津贴费:农民每月一至三元,幸福院和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每人每月三角;工人分七等,一至十六元;干部分四等,县委级十六元,局级十二元,一般干部、教员八元,勤杂人员六元。

卫生、医疗、文娱:实行供给制后,农民、工人、干部每十天发一张澡票,二十五天发一张理发票,每月一张电影票,看病全部免费。

实行供给制后,干部、工人家属同社员一样待遇。退休干部享受幸福院老人们的同等待遇,因对革命有贡献,可以补助零用钱一元。

这个打破了按劳分配原则的方案,是低标准的供给制,按县委试行草案中讲的是“各尽自行的能力参加公社劳动,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须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就是这样一个平均主义的

分配制度,对于向往早日建成共产主义的人们来说也是新鲜的。人们为了庆贺全县实行供给制,举行了游行,游行的队伍抬着“庆贺全民实行供给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红匾,敲锣打鼓,高呼“拥护实行供给制”,“以实际行动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口号。在这热热闹闹的群众运动中,全民供给制没经细致的算帐,就在全县开始实行了。

徐水人进入“共产主义”

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和实行全民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发出后,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高潮立即在全县掀起。

为了扫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障碍,县委成立了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和县委宣传部一起,在全县展开了共产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放在了农村。运动中提出了拔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白旗,插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红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公社好不好,公社的远景规划如何,如何消灭城乡差别、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对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中央、省委、保定地委十分重视,为了搞好全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中央、省、地和县委组织了一百多人参加的班子,其中中央有七十多人,省委十多人。中央到徐水的干部有: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家计委、化工部、冶金部的局长、处长,还有工程师。他们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对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园田化等,全面进行了规划。

随着共产主义教育的开展和规划的全面制定,徐水县首先改变了所有制,把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改成全民所有制。改变所有制后,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大部分

的生活资料也归于全民所有，社员私人的房子也可随时拆除，让社员去居住居民点，想用这个办法达到乡村城市化，消灭城乡差别。县委在住宅规划中，提出了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旧砖房一律在10月前拆除的规定。据统计，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拆除了33000间房子，一时间搞的社员住房非常紧张。虽然当时由清华大学派来的几十名师生帮助设计居民的房屋，但因为材料和资金不足，一时也很难建起来。只有大寺各庄边拆边建居民楼，拆了300间平房，盖起了9栋300居室的质量极差的楼房，群众搬进了居民楼。大部分村没有建起新房，只是老人进了幸福院，幼儿进了幼儿园，拆房加宽了街道，美化了村庄，但使部分群众住房十分紧张。为了破除私有观念，向共产主义过渡，鸡、鸭、猪和树木也都归了公，砸了锅炼铁，家家户户不冒烟，全都去吃食堂。为了消灭私有制，甚至有些地方把箱箱柜柜都收为公有。因此群众说：除了一双筷子和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都归公了。这给了群众一个错觉：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就是一切归公。

徐水县委把全民所有制当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主要标志。因此，千方百计把一切都搞成全民所有。基于这种认识，县委把一些集体企业统统上升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把集体所有制的商业、公私合营的商业也改为国营商业。有领导地组织工商业的私方开会讨论，使大家“自觉”取消定息，敲锣打鼓报喜庆贺。并将659名商店人员下放参加集体劳动。同时把手工业社、运输社以及建筑社和小贩一同全部转变为国营。这种单一的所有制方式和经营方式，扼杀了企业的活力，也给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根据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在全县实行了全民供给制。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搞起了15包，即：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

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由县里统一包下来。从这年9月开始，干部停发了薪金，改成发津贴费。但津贴费没按供给制方案规定的标准执行，因经费不足降低了标准。通过摸底算帐，定出县委的干部每月9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每月2元。当月领工资领得早的就领了全工资，领得晚的就只领了津贴。有的干部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一分钱也没领，只是到食堂就餐不要钱。当时的机关食堂办得较好，每顿都有好几个菜以显示供给制的优越性。同时，干部家属也随同干部开始吃食堂。这种办法实行了3个月，因国家的负担过重，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不能解决就停止了。社员也是这样，原来吃食堂定量，后来实行供给制后，不仅吃饭不要钱，还可以放开肚皮吃。当时县委农村干部常这样说：“今年粮食大丰收，从现在开始，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因为全县都实行了供给制，一些对外的饭馆也不收钱了，很快就被吃垮了。

在实行全民供给制的过程中，县委为了做到统收统支、统一供给标准、统一核算、共负盈亏，经讨论，于1958年9月15日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实行县社合一。这个新的机构，当日就在保定地委的机关报《东风日报》第三版上向全区公布。县人民公社的设置共有十五个主要部门，其中有：办公室、计划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法公安部、军事部、工业交通邮电部、农田水利农业部、妇女部、文教卫生部、劳动工资福利部、畜牧家禽渔业部等。还成立了徐水人民出版社。

徐水县人民公社的成立，实行了全县一级核算，劳力、资金、基建、生产建设由县统一管理，这就给县财政上增加了极大的负担。首先全县社员的工资由县人民公社统一发放，这年11月，曾给社员发过一次工资及部分生活用品贷款，共达550万元；12月份又筹集了90万元的工资款。按供给制方案应统一发放的物

品因物质不足和经济负担不起无法兑现。如每人应发两条毛巾，全县应发1440000条，但只发了720000条。其它生活用品，只给部分幸福院老人和幼儿发了一些，至于看电影、洗澡等根本没条件达到。当时徐水县全年财政收入不足2000万元，离计划需要量相差很多，只好挪用商业上的资金700万元，使商业资金不能周转。所以不过三四个月全民供给制就夭折了。

由于全县实行一级核算，劳动力可以统一调配，军事化进一步加强，给民兵发了一万多支枪，全县组织起7个跃进兵团，92个团，666个连，1998个排。行动的军事化，使劳动力可以随便调动，这就出现了劳力的大平调，为了实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工业化，不顾资金的紧张状况，县、社工业一起上，县里建起了39个工厂，公社建起了1348个小工厂；在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指导下，不顾资金和师资的严重不足，提出大办教育，盲目地建起了11所大学、84所红专学校。文工团、各种剧团、电影队、医院蜂拥而起，但不久大部分都垮掉了。而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就变成了一个空名，基层办事机构还没来得及作实质性的变动就流产了。

对于徐水县全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施，党中央、省委、地委的领导十分关注，及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纠正。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后，把身边的18名工作人员派往徐水，进行了实地调查，因此1958年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时，就及时地指出了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六亿人民的所有制要国务院发工资，徐水实行的所有制还是自己发工资。明确地指出了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全民所有制，实质还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制。

1958年9月10日刘少奇到徐水视察时，对徐水的一些问题当即给予了明确指示。当他看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

后,感到规划有些毛病,就向县委作了指示。他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讲明了生产规划的复杂性、重要性。在分配问题上,要便于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刘少奇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作算一笔细帐,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所算的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地减少。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刘少奇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要大家学习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充分地认识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了,大家都半天劳动半天学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

河北省委根据毛泽东对徐水问题的指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刘子厚率领,参加人有:张明河、赵一民、朱子强、王路明等70人,于10月18日至20日,在徐水做了三天调查研究。10月21日下午,工作组就主要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徐水县存在的一些问题又作了重要指示,明确指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对分配问题不要搞平均主义,对私人之间的债务不能一风吹,这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所得。对作风问题提出了:不要讲假话,不要压服,要去掉封建残余;对家庭问题提出,阴阳五行还要讲。

中共河北省委于10月29日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了徐水的工作和毛泽东的指示,指出了徐水县委在执行政策上和工作作风存在的问题,并责成保定地委帮助县委解决。中共保定地委于11月3日在常委会上对徐水问题进行了研究,责成杨培生将省委指示和地委的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传达,指出徐水县委的问题。后又派工作组进行帮助,使徐水县委

在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中的一些过急的做法和“左”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纠正。从11月份开始，根据省委、地委的意见和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把全县的一社的体制改为三级实权制，财政管理实行了两级三统一包。全民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由国家供给的干部恢复薪金制，并宣布私人房屋仍为原主所有。从12月份开始，徐水停止了全民供给制的一些做法，干部、工人、恢复并补发了工资，社员们虽然吃饭不要钱，但开始定量，停止发津贴，使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大办”有所收敛。由于整个社会有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左”的思潮，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说法在群众中已经传开。因此，这里仍然遗留着不少以扩大共产主义名义为名的“左”做法，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高潮已经过去。从此，共产主义试点就很少提及。

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是我国五十年代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盲目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典型，是1952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已经完成，已处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在中国的反映。虽然徐水县的共产主义试点只搞了四个月就以失败告终，但是其教训十分深刻，如果说这个试点是对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探索，那么付出的学费是昂贵的，值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后人不会再做出这样的蠢事。

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在全国两千多个县中只是一个县，成功和失败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究其影响并非如此。它不仅使这个县1959和1960年缺粮，甚至饿死了人，对国内外的不良影响也不能低估。

徐水的“试验”轰动全世界

当徐水县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声浪中，开始搞共产主义试

点时,立即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瞩目,他们以参观、学习、访问的形式纷纷来到徐水。内宾外宾摩肩接踵。尤其是国际友人以及国际上各方面人士,都带着许多的问号来到这里,他们要实地看一看徐水的大跃进和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据当年徐水县接待参观访问的报告记载,从1958年3月到10月30日,来徐水参观的人就有四十多个国家的九百三十多人。这些国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来访人员有:驻我国大使馆外交人员、新闻记者、艺术家、专家、代办及知名人士等。他们来徐水参观,大部分是抱着友善的态度来看一看,也有的是专找问题的。据当时在徐水体验生活的作家康濯说:

当时来的人对徐水有各种看法,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对徐水的做法是伸大拇指的。当赫鲁晓夫听说徐水搞共产主义时,就让塔斯社记者马上到中国去看看,看徐水搞的是什么共产主义。于是后来赫鲁晓夫说,“中国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在参观后,也有些国际友人善意地给我们提出了好的建议。总之,徐水的大跃进和共产主义试点,当时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当时从国内各地来徐水参观、学习、考察、采访的人员更多,仅全国各省市以及中央各个团体就有三千多个单位,全国的组织工作会议,全国兵役工作会议也到徐水召开。这些人来自十七个民族,他们之中有党政领导人、工人、农民、学生、士兵、教授、民主人士、工程师、科学工作者、记者、艺术家和归国华侨等。他们来参观一般都是根据我党提出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的观点,来学习搞共产主义的经验。他们在当时一种“左”倾思想影响和没有深入了解情况下,撰写了不少赞

扬文章，报纸书刊屡屡刊载，给后人们留下了一篇篇向往共产主义然而带有“左”倾色彩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很值得人们研究和深思的。

哪里呀吃饭不要钱？
哪里呀老少笑开颜？
走遍天下找不到呀，
人民公社哟吃饭就是
那个不要钱，
嘿，吃饭不要钱！

徐水的经验以大跃进的速度在全国铺开。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这支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歌曲，便唱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然而，歌声的余音还在袅袅之时，中国人民便从莺歌燕舞的海市蜃楼中一下子跌进水肿病、瓜菜代的残酷现实里。

第九章

满天“卫星”满地灾

●毛泽东向全人类宣告：15年
赶超英国○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大
跃进针锋相对反冒进●周、陈、薄、
李“大检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
大产”○卫星人民公社的粮食“卫
星”○农业协作会议○“卫星”越放
越离奇○中央党校校长不堪回首的
回首●蜂拥而上：一亿炼钢人○两
年超英，十年赶美○夕阳无限好，只
是近黄昏○数百万土高炉●一错再
错，跃进更跃进○新的跃进○开门
红、满堂红，红到底○幻想与困境●
惨重代价

莫再文过饰非了，

——视而不见铜鼎铭文般的羞辱。

莫再拒绝反思了，

——听而不闻历史回音深处警钟声声。

太阳系这颗最壮丽的行星上，曾经有过何等荒诞的一

瞬：一亿人蜂拥而上，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砸锅扒房毁林，可谓杀鸡取蛋。大江南北，阡陌纵横，陡然林立起数百万座土高炉，连共和国的外交部院内也烈焰熊熊。几亿人争放高产“卫星”，亩产最高者声称达八十二万四千五百余斤！从领袖到百姓，相信神话又唯恐不信，制造神话而不舍时机。终于，年轻的共和国步履艰难了，失身于辽阔深邃的啼饥号寒之中。仅1959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达4千余万。直接经济损失1200亿元。耽误了中华民族锐意进取的大好光阴。

中野何萧条，青山犹哭声，可谓悲剧。

更为悲剧的，是这段岁月，深化了一个民族的劣根性和几乎重铸了一个民族的不幸性格。那漠视科学的粗犷口号，至今让人耳热心跳：“乘上卫星腾云飞”，“脚踏地球手托天”，“赶英超美平常事”，“英雄意志似钢坚”。走出劣根性和悲剧赋予的不幸性格，需要几代或十几代人的奋发图强，更需要森林般的自警自醒，自珍自重。

不必讳言，因为我们是炎黄子孙。

●毛泽东向全人类宣告：15年赶超英国

毛泽东出访莫斯科

1957年11月，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纪念之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云集苏联首都莫斯科。14日至16日，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16日至19日，又举行了64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则派出了以毛泽东

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苏联的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的两个代表会议。

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宏伟目标：苏联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要超过美国。在这之前，赫鲁晓夫还曾提出过，并经苏共中央批准的口号：在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赶上美国。

各国共产党人为苏联的目标所鼓舞。

苏联老大哥又前进了，中国小弟弟怎么办？

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和共和国主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开始设想中国如何赶超美国的问题。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作过粗略设想。他计划大约50到70年左右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和超过美国；设想50年以后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1957年7月，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形势》一文中写道：“10年至15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的条件，准备以8个至15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提出15年内赶超美国后，毛泽东受到启发，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

11月的莫斯科，虽然寒冷异常，但毛泽东心里热腾腾的，情绪激奋。

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表示：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

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的时候,你们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是一个小国。但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地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

毛泽东停了停,喝了一口水,继续讲下去。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以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以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以及英共总书记高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这样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还充满信心地设想:

“归根到底,我们应当争取15年的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得永久的和平了。”

毛泽东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的同意。

在国内,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也随即得到了公开宣布。

12月2日至1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祝词,说:

“我们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他又说：

“在 15 年以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会上作报告，他对中国 15 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

“当我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且进一步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国就有可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根据大体计算，我国到 1972 年，钢的产量有可能达到 4000 万吨，即比 1957 年的产量增长 6.6 倍左右。英国在 1956 年的钢产量已经达到 2100 万吨左右，但是根据英国工业发展速度慢，资源有限和市场难以扩大甚至日益缩小的情况，即使抛开必然要发生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不说，英国在 1972 年钢的产量也不易达到我国同年的水平。而在煤炭、机床、水泥、化学肥料等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15 年以后我国肯定能够超过英国的水平。在 15 年后把我国的工业从现在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状况改变为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状况，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个伟大的光荣的面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1958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进一步向全国人民宣传了 15 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

赶超英国，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鼓舞的口号和目标！

英国是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1870 年产钢 22 万吨，1957 年达到 2099 万吨，估计到 1972 年可以达到 3600 万吨。

中国，1949 年新生的共和国建立时，年产钢才 15 万吨。到 1957 年，已达到 535 万吨。到了 1972 年，要达到 4000—4500 万

吨。

15年赶超英国，就等于中国只用23年的时候完成英国102年所走过的路。

100年前，英国人凭借自己的优势，冲开了古老中华大国的国门，中国人遭遇了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屈辱。赶超英国，是渴望富强的中国人民多么向往的事！

但经济建设有自己的规律，其速度限于基础和技术等因素，发展速度是有限制的，不能完全随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变化。古人云：欲速则不达。

大跃进针锋相对反冒进

毛泽东最欣赏的名词，莫过于“大跃进”。

中国人赶超英国，不能按部就班，必须有一个“大跃进”！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批评说：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国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这篇社论还要求开展全民大讨论，“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使用“大跃进”一词。

毛泽东欣赏这篇社论，更喜欢社论中的“大跃进”一词。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审定修改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认为: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发展,证明了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是,“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来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社论要求“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

与此同时,1957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批判。随即沿用1956年发动跃进的路子,在各省、市、自治区农村,组织数百万、上千万农民日夜奋战在田间,造成了一个广泛群众性的以冬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土壤为中心的生产建设热潮。然后以农业战线的群众运动形势促进工业的跃进。

为了发动“大跃进”,1958年春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4月汉口会议。他在会议上提出了“不断革命”的观点。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

“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事实证明：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是经济建设中“左”的急于求快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大跃进”就是这种思想指导的结果。

中共河南省委在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

“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理想、敢于向前看的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批评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那时候有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惊呆了，“简直惶恐得很”，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社论要求：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号召人们“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也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道：

“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三条，没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

毛泽东又提出：

“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提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毛泽东警告说：

“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

在4月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所谓“稳妥派”和“观潮派”。他说：

“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进吧！’。‘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

●周、陈、薄、李“大检讨”

周恩来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

1958年5月。北京。

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八大二次会议。

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会议对1956年的反冒进又一次提出了严厉批评。中央在工作报告中说：

“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1956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造成了“一个马鞍形”。

5月的北京，杨柳依依，景色优美，气候宜人。但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却无心观赏。因为他是1956年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他不得不在会议上作出检讨。他心情沉重，在大会的发言中作自我批评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中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建设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两方面的问题。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问题。这样建设或者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前者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矛盾。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

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全会上，毛主席最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前进和发展是总的趋势，指出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不要‘促退会’。不久，党中央又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的讲话，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全国展开了增产节约运动。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1957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拿最近3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作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1957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两种方法所产生的两种结果。大跃进从正面教育了我们，反‘冒进’错误从反面教育了我们，诚如少奇同志说的，‘正是由于这种反复，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正确性，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我的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

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会’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 and 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在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这里,应该特别讲一讲的,就是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害怕不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的规模、压缩消费的方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教导我们说,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经常的”,

“我们当时对于不平衡的看法和采取的平衡的方法，恰恰同毛主席教导我们的相反，只看见死的物资和数字，没有看见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活生生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

关于周恩来准备检讨的经过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心态，当时任周恩来理论秘书的范若愚同志后来有过详细的回忆和描绘。范若愚在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说：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

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桌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词。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

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的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来，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陈云检讨：反“冒进”我负有主要的责任

1956年底和1957年初反“冒进”时，陈云曾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他说：

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如果保守了妨碍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

陈云的这一观点，是适合当时我国的建设情况的。

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反“冒进”的言论和行动被看作是“错误”的。陈云也不得不在会上作出检讨。他在发言中作自我批评说：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我在1957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所说的争取市场稳定和财政平衡的方法，就是从局部现象出发，因而不是从积极方面、千方百计地去发动群众增加生产，来克服困难；而是采取了消极的方法，迁就了困难。过多地注意了物，对于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过多地注意了分配方面的关系，对于扩大生产重视不够；过多地注意了所谓‘稳’，而不是积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

的东西。这些错误曾经使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损害,并且减低了1957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我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上,虽然只作了粮食、养猪、油料、副食等问题的报告,没有涉及当时的全盘财经问题,但是,因为我是财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的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是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如果不是得到毛主席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薄一波、李先念检讨:反“冒进”我也有责任的

在上次反“冒进”时,薄一波、李先念也曾发表过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意见。他们当时一个是国家经委主任,一个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们也分别作了发言,批评了自己的“错误”。

薄一波自我批评说:

“国民经济的大跃进,是我国当前形势的主要特点。这种形势的到来,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总路线的胜利。自从去年三中全会,特别是今年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肯定了1956年第一次跃进的成就,彻底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进一步阐明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路线,……于是很快就出现了当前这种新的形势。这种新形势的发展,就使我们有可能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更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经中央批准的1958年国家计划的第二本帐,工业的发展速度是34%;农业的发展速度

是21%”，“现在看得很清楚，1956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1956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我对于这种形势没有很好地加以分析，没有抓住形势发展的主流，对于一度出现的材料紧张的困难，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动员和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反而强调了这种困难，认为既然原材料生产赶不上去，基本建设的速度也就不能太快。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我看到了我国人口多，消费也多，强调提高积累比例有困难，而没有强调人多可以生产得更多，积累便更多。因此，对于反‘冒进’的错误我是有份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1957年计划是保守的。而且在思想没有完全解放的情况下编制出来的1958年计划的第一本帐，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设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泼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为教训的。……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不仅对我们国家有巨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世界也有巨大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是力争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就意味着延长人民的痛苦，就意味着延缓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的时间。问题是这样严重地摆着，而我们一些做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的同志在过去并不真正理解这个问题。”

薄一波在发言中还表示：

“最近，我重温了毛主席近年来的著作和讲话记录，使我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总路线，是老早

就提出来,并且在不断地完善着的”,“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李先念在会上检讨时说:

“几年来,财政工作在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是有成绩的,是基本上执行了党的总方针、总路线的。但是,在工作当中确实发生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个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方针性的错误。”“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一怕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建设事业前进当中是会发生某些供求失调现象的,看到这些一时的现象,我们就表现异常敏感,盲目叫喊紧张。”“当1956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一些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幸而中央及时地作了纠正,否则,损失不知道会有多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卫星人民公社的粮食“卫星”

在高指标和批反冒进的压力下,1958年上半年,各地开始出现严重虚报产量、竞放粮食“卫星”的现象。

1958年1月3日,广东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

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亩产3025斤的纪录。

入夏以后,竞放粮食“卫星”,浮夸风又有进一步增长。

下面请看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放粮食“卫星”的经

过：

1958年5月，中共遂平县委对嵯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麦收十分重视、寄予厚望。麦收当中，县委副书记赵光专程到嵯岈山，先找到公社社长钟青德，问：“有没有亩产千斤以上的高额丰产田？”

钟青德看看赵光答道：“有哇！你的试验点就有！”

赵光大喜，随即就和钟青德往他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奔去。

大队长陈世俊低声对支部书记曹玉娥说：“赵书记想在咱这儿放卫星哩！”

曹玉娥有些担心，说：

“咱这麦也打得差不多了，就只有村北20亩试验田的麦子没打，亩产往多说也只有三、四百斤。”

陈世俊说：

“那书记想放卫星哩，咱不放会中？可以把面积少说一点。”

曹玉娥还是怕露馅儿，两人又商量了好一会儿，才去向赵光和钟青德汇报。

“今年村北试验田的二亩九分麦子长得最好，产量准在千斤以上。”

“真的？”赵光一阵惊喜。

赵光把这一消息立刻通知了新华社河南分社女记者方簧，请她到嵯岈山总结小麦试验田的高产经验。

当天晚上，韩楼大队召开了群众大会，曹玉娥、陈世俊等人专门就试验田麦子的产量、施肥量、管理方法向群众做了详细讲解，并要求群众必须按其所讲的意思回答任何人的提问。同时规定在5天之内，任何人不得请假外出。

打麦时，由公社副书记陈世伦、银宗武和从郑州赶来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方簧等人监打、过秤。结果，2.9亩总产10210.

9斤,亩产3521斤(实际上是20亩试验田的麦子移到一起的结果)。

6月13日,中共中央农工部和国家农业部联合发来贺电。

6月18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发表卫星人民公社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21斤的高产纪录。后经复打,每亩又增加300斤。《人民日报》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了卫星人民公社一大队亩产小麦3812斤的消息。

《人民日报》的号外报道像一声惊雷,震动了全国各地。从6月21日起,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蜂拥而至,络绎不绝。韩楼村最多时一天接待3万多人。参观者喝干了韩楼村的井水,只好又组织妇女、小孩子到河里挑水供参观者解渴。曹玉娥和陈世俊等大队干部则轮流向参观者讲解高产措施,并组织民兵轮流看守麦囤,参观者只能看不能摸。高产的措施之一,据说是用“狗肉汤浇地”。

这年12月,韩楼大队支部书记、高产奇迹的创造者之一的曹玉娥被请到北京,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韩楼村农民陈家正曾因“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受到大会批判,他自编自演了下面一段快板而被评为公社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

我为心中有块病,
存在肚里一春冬。
小麦高产我想不通,
病根就是我的老右倾。
通过教育我思想明,

改正错误我见行动。
老汉今年我六十八岁整，
没见过麦子长恁凶。
麦秆粗，麦穗重，
这头推着那头动。
人人讲，个个夸，
亩产小麦三千八。
共产党，会当家，
我老汉心里乐开了花。

遂平县豫剧团，以曹玉娥为剧中主要人物，编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叫做《中国的卫星上了天》，几句唱词风传一时：

崮嵒山，八宝山，
小麦亩产三千八百三。
中国的卫星上了天，
江北变江南。

农业协作会议

1958年6、7月间，各大区召开了农业协作会议。

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主持，参加者有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上海等四省市掌农业的书记和农业、水利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也参加了会议。根据会议的统计和汇报，这一年的农业生产虽然遭受严重的冻、风、雹、虫、病灾害，但粮食仍获大丰收，四省一市今年小麦比去年增产73.5亿斤，增长57%，油菜比去年增长317万担，增长了76.2%。会议研究了今明两年的粮食生产指标，各省市

负责人对今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平均每人 1000 斤到 1500 斤都充满信心,并要求在今后的三至五年内使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 2000 斤。

西北地区农业协作会议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四省(区)党委管农业的书记以及陕西等省(区)农业部门的负责人。会议认为西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大跃进的新形势已经形成、并且正在继续高涨,估计全区夏收总产是可以比 1957 年增产 62% 左右,大秋作物生长良好。估计,今年西北地区每人平均可有 1100 斤粮食。到明年,每人可达 2000 斤,到 1962 年全区粮食总产是增加 6 倍,突破每人 3000 斤大关,此外棉花总产量增加 11 倍,油料总产增加 7 倍。

华北地区农业协作会议由谭震林主持,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和北京五省一市的省委书记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根据各省、市的汇报,六省市今年夏收作物共 24300 万亩,总产量达 496 亿斤,比去年增产 88%,等于 1956、1957 年两年全国粮食总产的总和还要多。其中,增产幅度最大的河南省,今年一季就等于去年的产量,比去年夏收增产一倍半。

中南地区农业协作会议也由陈正人主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负责农业的农委书记出席了会议。会议估计中南五省区今年春夏作物空前丰收。其中,9650 万亩早稻总产量可达到 445 亿斤,比去年增长一倍以上,亩产平均 460 斤。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公布:今年夏收粮食全国总产量达到 1010 亿斤,超过去年夏收粮食总产量 413 亿斤,增长 69%

“卫星”越放越离奇

自 1958 年 6 月开始,各地粮食“卫星”竞相争放,越放越高,达到离奇的程度:

6 月 9 日,湖北襄阳大面积亩产 1500——2000 斤;

6 月 11 日,河北魏县,亩产 2394 斤;

6 月 16 日,湖北谷城,亩产 4353 斤;

6 月 16 日,河北怡漳,3650 斤;

6 月 18 日,河南商丘,4412 斤;

6 月 21 日,河南辉县,4535 斤;

6 月 30 日,河北安国,5103 斤;

7 月 12 日,河南西平县,7320 斤。

从 6 月 26 日开始,又连续放出一批浮夸的早稻亩产“卫星”:

6 月 26 日,江西贵溪县,亩产 2340 斤;

7 月 9 日,福建省连板社,超过 3000 斤;

7 月 22 日,福建闽侯县,7275 斤;

8 月 1 日,湖北省孝感县,亩产 15000 斤;

8 月 13 日,湖北麻城县,亩产 36900 斤

8 月 22 日,安徽繁昌县,亩产 43075 斤;

9 月 18 日,四川郫县,亩产达到 824525 斤;广西环江县 130434 斤;

.....

这些报道,离奇已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令人更为惊讶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居然都相信这些增长数字。实际上，这些“卫星”的放出也是投其所好。

广东省宣布春收和早造粮食增产 65 亿斤，比上年增加 60%。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还专门著文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说本省 1 年可以种三造，达到亩产一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

7 月 23 日，农业部发表夏秋粮食公报，说夏粮比上年增加 413 亿斤。7 月 28 日，农业部估计，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加 400 亿斤，翻一番，达到 800 亿斤。8 月 22 日，安徽第一个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的省。9 月 13 日，河南省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 月 22 日，四川省也宣布自己是千斤省。

这时报纸的宣传和报道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搞到荒诞的程度。8 月 27 日，《人民日报》竟然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中说山东省寿张县，“提 5000 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 1000—2000 斤，根本没人提了”，该县正“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8 月 13 日，在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 36956 斤记录时，引用社长的话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的我们都做到了。”后来到了 1961 年，刘少奇同志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他说：这几年的事情，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对此，《人民日报》社又认真作了检查。1959 年庐山会议时，《人民日报》负责人带了一份有关浮夸错误的检查，由于后来形势逆转，没能拿出来。

当时，这种大规模的浮夸风，在国内外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对外，损害了中国一贯说话算数的声誉；对内，搞乱了国民经济统计，搅乱了人们的头脑，影响了领导机关的决策。1958 年 7 月，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粮食估计产量，竟达 1 万亿斤以上。中央感到其中水份很大，压去 1/3，估计产量达到 6000—7000 亿斤，但实际上仅 4000 亿斤。这种统计给中共中央的 8 月北戴

河会议提供了极不真实的数据,致使会议的讨论和决策建立在高度浮夸的基础上。

对于这种“大跃进”形势,毛泽东十分高兴。8月初,他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对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

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中央党校校长不堪回首的回首

对“大跃进”运动中那段离奇的历史,每位经历者,都可以说出不同的感受,都有铺天盖地的故事和笑料令人难忘。回忆“大跃进”运动的文章不少,笔者从各种林林总总的回忆录中,精选出杨献珍同志的一段回忆,帮助人们了解那一段历史。

杨献珍在80年代中期回忆那段历史时说:

一九五九年一月,我带了几名同志到河南,去看望我们下放在那里的干部,并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到郑州后,在省委招待所住了几天,许多老同志听说我来了,就到招待所看我,闲谈中他们向我反映了下面的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其中有密县人民粮食不够吃,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人,卫生部派人来调查,确属事实。我听了感到十分震惊。那时,河南省党代表大会刚开过,省委把大会的简报和发言送了我一全份。我已通知我们下放在四个县的干部集中在登封县,以便听取他们的汇报。省委送给

我的那一大堆文件，放在最上面的一份，就是我第二天要去的那个县县委书记在省党代表会的发言记录。我高兴地立即取下阅读了一遍。其中有这样的一些精彩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如此等等，一连串总有七八个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结论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当时看了，心中十分纳闷，不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天，省委派了一名干部送我到登封县。我召集下放干部开会，请他们汇报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我们的那些干部都是做了许多年的地方工作的，富有地方工作经验。我去时，他们已经在当地学习了四个多月，把当地情况摸得很清楚了。开会时，省委送我来的干部也在座，我们的干部发言情绪很高，尽说些无足轻重、不关痛痒的话，我还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到了深夜，我们的干部来找我了，反映了他们几个月来所看到的真实情况。他们所看到的和报纸上所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举例说吧，有两个同志反映，他们所在的城关公社，社长的娘来找儿子要粮吃，儿子没有，他娘只好哭着回去了。有粮，娘总是要给一点罢。但是他没有粮，给什么呢？！他们所在的公社，社员已经没有粮吃了。报了千斤省的地方，怎么刚秋收后不久，就没有饭吃了？他们所在的县，还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位下放干部参加该县县委工作，当县委书记。我对党校的下放干部说，你们把情况报告给那位书记嘛。他们说，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也没有办法，只好让老百姓把红薯藤晒干，磨成面，做糊糊喝，聊以充饥。

河南省平西县某公社放小麦卫星，“小麦亩产 7320 斤。”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还被北京某高级理论机关的负责人聘请到北京给科学界作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在一个

科学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题为《揭开“7320谜》,作者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论”,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实的。这位党委书记到处作报告,胡吹他们的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的“伟大成绩。”一九七五年我被放逐在陕西潼关,听那里的人说,他在潼关也作了这样骗人的报告。

某县城关公社有个公社干部,很有一套弄虚作假的本事。上边来人检查粮食,她领着这些人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有许多粮食,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也有粮食,实际上还是原来那一堆,而且下面都是草垫起来的。还有个公社,就像演戏一样:“报!大事不好!”“何事惊慌?”“流动红旗被夺走了!”“不好了!”于是赶快动员群众,谎报成绩,要把红旗夺回来。社员们想不通,就对社员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有一个生产大队的书记,以亩产玉米一万斤的“成绩”,来北京参加劳模大会。社员说,没有那么多呀,这不是实事求是。书记说,算了,这一次就是这样吧,下一次再实事求是。于是他就带着这个亩产万斤玉米的“大成绩”,来北京参加劳模大会,终于取得了“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衣锦还乡。还有一个地方,什么设备都没有,竟然一天一夜炼出130万吨钢,登在《人民日报》上。如此等等,几天也说不完,这就是大跃进年代号称全国第一的千斤省的人民生活真实情况。其他同志也向我反映了许许多多他们亲眼看到的浮夸虚报、弄虚作假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听了不胜惊异。《聊斋·考城隍》有几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当时不禁慨叹地续了两句:“有作假,当如之何?”

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办不到。钢是一吨一吨

炼出来的，粮食是一颗一颗长起来的。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要啥有啥，这本领已经失传了，没地方学。我们要的是真铁真钢，不是假“卫星”。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用劳动建设起来的。列宁说过，离开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有些人把列宁的这些话忘记了。个别同志甚至拿着唯心主义当宝贝。一九五九年，有一位哲学家就在河南一个县，住了七、八个月，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后来有人议论大跃进年代河南省的领导有主观主义，这位哲学家听了愤愤不平地说，河南省没有主观主义，谁要说河南有主观主义，我要挺身而出为河南辩护，谁要是讲河南有主观主义，那就是“一次反映论”。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他们弄虚作假，放假卫星，究竟需要几次反复，几次试验，才能认识那是“真理”呢？弄虚作假，放假卫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吗？在大跃进年代，这位哲学家说，共产风就是革命风。在刮“共产风”、“浮夸风”的时候，真有几个自以为的或者公认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不仅辨不清风向，拦不住风势，而且还要助风施威，火上加油。当然，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分子可以不去说他们，对于这样的人，哲学不过是他们为达到这样或那样的卑鄙目的的敲门砖。

在河南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日子里，真是让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学到了不少东西。当然，这也深深地引起了我的忧虑和思考。

回到北京后，我就十分注意中央党校南院的几十亩水田和华北小学校院子里的小麦试验田。我想亲自动手解剖一、两只“麻雀”，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这时华北小学校的一亩小麦试验田，长势十分喜人，许多同志看过后都说

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小麦。当时任农业部长的廖鲁言同志参观过这块小麦地,他说:“这小麦长得这么好,至少也要打一千斤。”收获时节,结果实收小麦七百斤。其它地方的小麦试验田亩产都在五、六百斤左右。我由此想到:若要亩产七千斤。必须密植十倍,那麦子根本就没有地方生长了。这就证明,河南放小麦亩产七千多斤的卫星是假的。

我曾说,当时某省有一条独特路线,叫做鼓足干劲,弄虚作假,力争全国第一,为个人取得无上荣誉。

●蜂拥而上:一亿炼钢人

两年超英 十年赶美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掀起,毛泽东把中国“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

1957年12月时,毛泽东设想在今年15年之内,只是赶上和超过英国,50年以后才赶上美国。

但时间没过半年,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及其以后,毛泽东认为超过英国只不过是7年,随即又缩短为5年和2年,赶上美国也不过是15年、10年便可实现。

超英赶美的一项重要指标,是钢产量的不断提高。超英赶美时间的不断缩短,钢产量指标也被不断刷新。

1957年全国钢产量为535万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时,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0万吨。

3月成都会议时,钢产量指标提升为700万吨,比1957年增长35.5%;

八大二次会议后,6月中旬,冶金工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

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20万吨,规划到1962年达到6000万吨;

6月17日,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估计1958年钢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吨。

6月19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

“干脆一点吧,争取1958年的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吨。”

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3年基本上赶上英国,有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同一天,冶金部党组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一份《产钢计划》,说根据最近召开的钢铁会议的情况,1959年的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到1962年可以争取达到8000—9000万吨。

6月22日,毛泽东对薄一波的《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为各地放出的高产“卫星”所鼓舞。粮食产量初步统计已达1亿吨,尽管不完全可信,去掉三分之一的水份吧,还有6700万吨。粮食已是不成问题,只剩下钢产量了。因此,如何完成1070万吨钢,则是当务之急了。

北戴河会议召开的时候,1958年时间已过去三分之二,12

个月快过去了 8 个月，而钢产量只达到 450 万吨，还完成不到任务的一半。在今后短短的 4 个月时间里，还必须产钢 600—700 万吨。在钢铁工业早已开始“大跃进”的情况下，全年三分之二的时

间才完成了三分之一多点的任务。要想在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里完成三分之二的钢产量任务，显然不太可能。

看到这种局面，毛泽东叹道：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但是，“跃进”的指标已经提出，就必须努力完成。因为钢产量翻一番，它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指标。完成这一任务，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毛泽东是一位喜欢接受挑战和不信邪的伟人。他认为，指标既已提出，就非完成不可！

8 月 25 日至 31 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常委分管工业的书记会议，讨论和落实完成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问题。为了强行完成这一任务，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书记挂帅”：

北戴河会议规定，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必须亲自挂帅，大抓钢铁，大抓机械。9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又发表了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个星期检查一次生产的进度，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

“一切保钢”：

北戴河工业书记会议确定机械制造、主要原材料、电力、交

通运输的工业生产排队原则,要求首先满足冶金设备和冶金工业增产的需要,其次满足制造发电设备的需要,再次满足主要机床的需要,然后才可以顾及其它工业部门。还规定除机械铸造所需的生铁外,其余全部拨给钢厂炼钢,把大炼钢铁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进一步提出了“停车让路,首先为钢”的要求,强调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到首要的地位。当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运输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首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的,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真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技术出技术,一切为了炼钢,颇有抗战时期打日本鬼子的劲头。

“指标落实”:

北戴河工业书记会议规定:铁,9月份200万吨,10月280万吨,11月320万吨,12月350万吨;钢,9月120万吨,10月100万吨,11月200万吨,12月220万吨。在地区上,钢铁工业薄弱的山西省要生产68万吨铁,55万吨钢。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一五”期间总共才生产出17000吨生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必须生产20万吨生铁。其他基础稍好的省、市、自治区任务则更为繁重。

“土法炼铁”:

单纯靠已有的钢铁厂不可能完成炼钢任务。为了钢产量翻番,还必须寻求别的途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一些地方出现

了土法炼钢、土法炼铁的做法，这时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北戴河工业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大搞小高炉、土高炉，以生产炼钢所大量需要的生铁。

“大办运输”：

为使钢产量翻番，9月17日和23日，交通部和中共中央分别发出了全民大办运输，保证钢产量翻番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成立强有力的运输指挥部，统一指挥当地的交通运输，调动机关、学校、部队等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调集大车、汽车、轮船、飞机、人力车、兽力车，甚至小汽车等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投入全民搞运输保证出钢铁的运动。

数百万土高炉

北戴河会议后，全民齐上阵，遍地是高炉。

中央一次又一次召开电话会议催促。

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又提出今年110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

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否则是不行的”，各地要组织“大兵团作战”。

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突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增加到6000多万人，年底则达到9000万人。加上其他部门直接和间接支援的人数，全国投入大炼钢运动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一座座小炼钢炉，星罗棋布，点缀着广袤的田野。7月，全国有小土高炉3万多座，到8月底，增加到17万座，9月底，激增

到 60 多万座,10 月底,达到几百万座。不少工厂、公社,而且部队、学校,甚至安徽省委机关、外交部这样的机关里,都建起了土高炉,办起炼铁厂。

当时建起的小高炉和土高炉,大的不过十几米高,小的容积仅一立方米多。不仅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小高炉、土高炉,而且把侵华日军和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都改成了土法炼铁的炉具。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代之以普通煤;煤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矿石不够,就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砸烂,当成炼铁原料。北京王府大街两旁人行道的砖块,一夜之间,被撬开运走,用来建造土高炉。

为了寻找炼钢炼铁所需的物资,全国上千万人进山找矿;到处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 10 万多个。在运输方面,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幼,既用现代化的车辆运输,也用原始的运输工具,昼夜不停地抢运大炼钢铁所需要的种种物资。人们似乎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置身百万民工用小车支前的壮景中。

在大炼钢铁的运动中,也出现了大放“高产卫星”的活动。9 月 14 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 14000 吨,提前超额完成了 9 月份 9000 吨生铁生产计划。

河南省在粮食产量方面放“卫星”名列前茅,在钢铁方面也不甘落后。在贵州省放出卫星后,马上宣布 9 月 15 日一天,全省产铁 1893.92 吨,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 8 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 4396 吨。

进行共产主义“试验”的河北省徐水县,也展开了大炼钢铁的擂台赛。下面是徐水擂台赛一幕:

炫目的汽灯下,擂台亮如白昼,两边挂着耸人听闻的豪言壮语,县委一班人端坐台上。

第一位走上擂台的是容城公社的“元帅”。这位五大三粗的汉子咬牙切齿地宣读了誓词之后宣布，“本帅”将生产焦炭若干，开采矿石若干，然后再以更高更亮的嗓音，朗读诗一般的豪言壮语：

脚踏地球手托天，
英雄意志似钢坚。
容城摆下全县擂，
哪个不服比比看。

容城元帅下，固城的元帅上。他朗读的诗更有气派：

乘上卫星腾云飞，
日月星辰心胆寒。
我们挥手搬山倒，
顿足一阵江海翻。
我们永生火箭头，
容城看也看不见。

第三位元帅来自遂城，在一番声嘶力竭的发誓之后，以诗言志：

决心冲破凌霄殿，
干劲震塌水晶宫。
英雄立下冲天擂，
誓夺帅旗飘遂城。

最后，户木公社的雄心壮志更是让全人类心惊胆战：

踏翻地球顶破天，
户木打擂台上边。
超英赶美平常事，
商庄不打擂台翻。

在炼钢中，村里腾出快一半的屋子让平原地来的人住。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地轰，张家并李家，要不一家子都搬到一间屋里去，支援大炼钢铁。

人们奔跑着，书记忙碌着，白天黑夜运铁矿石。老头子和学生娃都分了任务。那些小脚老太太一天也得跑一两趟，管什么铁矿不铁矿，搬一块石头就往回走，走回来就算一趟，不然不让到公共食堂吃饭。

炼钢的煤不够了，就劈柴，伐树，山里的树都烧光了，就扒房子。有一个村子家家户户只剩一扇门，那一扇都拆去劈着烧了。村干部们带着民兵，拉着车，手里拿着大铁棍、斧头、钳子什么的，挨家挨户串。到人家里，二话不说，先把门吊儿拧下，到屋里，用大铁棍往锅里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告诉你，你这锅使不得了，炼铁去支援国家造飞机吧。菜刀、剪子之类的东西都收走，只要沾着铁星儿的东西，都被拿去炼铁。

1958年9月29日，是中央确定全国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产量超过千吨的县。10月15日至21日，是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钢铁等“卫星”放得更大、升得更高。《人民日报》

报道：在这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 14 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 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 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 10 万多吨，生铁的最高日产量曾达 37 万多吨；日采煤炭 100 多万吨，铁路装车日均 35000 多车。在这期间，毫无钢铁工业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连放几颗大“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 6300 多吨，忻城县日产煤炭 67 万多吨，鹿寨县日产生铁竟然达到 20 万吨，浮夸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一错再错 跃进更跃进

新的“跃进”

1958 年 11 月开始，毛泽东觉察出大办人民公社和大办钢铁的过程中，“乱子出了不少”。他开始纠正已觉察到的“左”的错误。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全党进行了八个月的纠“左”工作。

1959 年 7 月、8 月间，庐山会议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又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全国再次出现了一场新的“大跃进”运动。

1959 年 9 月 14 日，毛泽东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良好”。他把由于搞“大跃进”造成的 6、7 月间生产下降和各大城市经济生活的困难，归结为“由于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作怪”，认为通过反右倾，就可以“鼓起干劲”，把“大跃进”顺利地搞下去，扭转困难局面。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0 月中下旬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

在安排 1959 年第 4 季度生产指标时,要求这一季度完成工业总产值 486 亿元,以保证全年完成 16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钢完成 470 万吨,以保证完成全年 1300 万吨的第二本账计划。

10 月 23 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向中央提出:今后几个月内,要重新开工 230 个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这样,1959 年的基建项目,在已经压缩到 788 个之后,又恢复到 1000 多项。

11 月 22 日,中央又同意国家建委的报告,确定追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 13.6 亿元。

这样,加上原定计划的 248 亿元,上年结转投资 20 亿元,各部门与地方自筹资金 30 亿元,使 1959 年投资计划总额达到 311.6 亿元,比庐山会议前夕确定的调整方案 240 亿元增加了 71 亿元,比当年年初的高计划还多出 30 多亿元。

重新开工项目的增加,导致基建战线拉长,职工队伍重新扩大。1959 年底的职工总数共计达到 4523 万人,而其中在“大跃进”中新增加的达 2082 万人。1959 年上半年中央决定当年减少 600 万至 800 万职工,到 8 月底,已压缩掉 507 万人。然而,从 9 月份开始又重新增加,到年底共增加了 536 万人,达到 4561 万人,比 1958 年底还要多出 29 万人。

经过几千万职工的拼命蛮干,从名义上看,主要的重工业产品产量拼上去了。国家统计局在 1960 年 1 月宣告 1959 年的成绩:

钢,计划 1335 万吨,实际上 1387 万吨,计划比上年增长 67%,实际为 73%;

煤,计划 3.478 亿吨,实际 3.69 亿吨,计划比上年增长 29%,实际 36%;

粮食,1959 年为 5401 亿斤;实际上只有 3400 亿斤,浮夸 2000 亿斤跌到了 1954 年的水平。

棉花、油料等产品的产量同样是浮夸不实！

在高估产的基础上，又搞了高征购。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达1348亿斤，占实际产量33.7%。农村的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降到1959年的2052亿斤。以5亿农村人口计算，平均400斤左右，远远少于实际的需要。

在工业上，积累率过高，投资效益明显下降。全年基本建设的实际投资额高达350亿元，占国民收入的44%，比1958年增加了30.1%，大中型施工项目多达1361个，积累率高达43.8%，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投资效果差，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7%，大大低于1957年的89.4%的水平。大中型项目的仅达12%，大大低于26.4%的水平。

全国市场供应紧张，财政出现大量赤字。由于基建项目大上马和职工人数大增，1959年国家财政赤字高达65.8亿元。社会需求急剧上升，而物资供应却日益减少，二者的矛盾十分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新生的共和国进入了最严重的困难时期。

开门红 满堂红 红到底

1960年。

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处在超负荷运转状态，紧张到崩溃的边缘。

然而，“跃进”的战车仍在冲刺！

1959年10月下旬，全国计划会议确定了1960年的经济计划草案，要求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规定196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26%；钢1840万吨，要增长33%；煤，4.25亿吨，增长17%，粮食6500亿斤，要比1959年虚夸的产量增长20%；棉花

6000万担,要比1959年虚夸的估产增长24%。其他工业产品也要增长百分之几十。

1959年12月30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196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计委的报告,再次提出1840万吨钢为中心的高指标,仍保留5年赶上英国的设想。1月30日,中央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各部门即按此报告安排1960年的经济工作。

国家计委的报告对1960年的生产指标有如下规定:

工农业总产值,3060亿元,增长22%;

钢,1840万吨,增长33%;

煤,4.25亿吨,增长15%;

生铁,增长26%

发电量,增长32—38%

粮食,6000亿斤,增长11%;

棉花,5500万担,增长16%。

财政收入,701.5亿元,增长22%;

基建投资,345亿元增长4%。

中央还同意钢产量的第二本账达到2040万吨,第三本帐2200万吨的计划。

1960年1月1日,60年代到来的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60年代》。社论说:

“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于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说:我们已经圆满地实现了“1959年的红到底”,正满怀信心地

为“1960年开门红”而奋斗。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满堂红，红到底”。社论还说：从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要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今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日产量，不低于或略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还要在这个基础上稳步上升，实现“月月红、季季红”；不仅要做到产量红，也要做到质量、品种、成本和安全样样红，“全面跃进”。

在强调“开门红”之后，中央于1月26日又提出了今后3年和8年的规划设想：

3年的设想：1960年至1962年是今后8年建设中的一个小阶段，其任务是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巩固的基础。具体的奋斗目标是：（一）提前5年实现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全提出的10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二）提前5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三）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纲要。

8年的总规划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基本上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中要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8年的基本任务是：一、建成全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全国的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基本上建成各大协作区的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水平、而又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二、基本上完成四个现代化。三、分期分批地采用各种不同形式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并且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第四，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要以工资制为主，采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形式。

三年设想，八年规划，其实质是要尽可能早地赶上英国，早

日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时毛泽东在安排超英赶美的时间时说：

“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到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

幻想与困境

60年代到来了！

人们期望着，幻想着，60年代的第一年中国的经济真有一个“开门红”。

还想跃进“得更远一点”！

1960年5月，中央不满足原有的高指标，又提出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的安排：工业总产值要比通过的计划再增加380亿元，年增长速度要由原计划的25%提高到47.6%，财政收入要比原计划增加79亿元，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要比原计划增加57亿元，钢产量由原计划1840万吨提高到2040万吨。其他各项产品也要与之增加。

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库存的增加，中央也提出了脱离实际的幻想。中央估计1959年粮食产量有5500亿斤，1960年计划产粮6000亿斤，因此继续实行高额征购。

1960年1月26日，中央在批准的粮食部党组报告上说：

“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

但实际上，这时农村不少人因没粮吃而浮肿，有的已经或正在死亡！

粮食部的报告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7月起，到该年底收到1016亿斤，占1959年粮食年度证购计划的94%（贸易粮），到1959年5、6月份，将超额完成计划。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增加500亿斤。报告

设想,今后3年每年的征购和销售各增加200亿斤,购销差额每年仍可维持在150至200亿斤左右,到1963年6月底,国家粮食库存可以达到1000亿斤。

粮食部的估计,大大脱离了实际。

从1960年第一季度起,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陷于困境:

钢的日产量,1959年第四季度为5.38万吨,1960年第一季度降为4.98万吨,此后直线下降!第二季度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完不成产量计划,而低于第一季度的有11种。长时间工业冒进发展的势头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了。

粮食形势更为严峻。

1959年实际粮食产量已下降,但搞了高征购,许多地方的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在发展。1960年的夏粮比上一年又大幅度减产,夏收之后收购不快,1月至7月共征购244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减少26%。库存减少,调拨不灵。5月以后,各应调出粮食的省所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而粮食销售,却大大增加。1957年到1958年度销售粮食是423亿斤,1959年到1960年增加到590亿斤。

全国粮食短缺,北京、上海、天津的粮食供应已频频告急!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不得不承认:“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脱销意味着什么?

人口大量死亡,局势动荡,危及共和国的生存!

6月6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当时这些地区的存粮所够销的时间,北京为7天,天

津 10 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辽宁 8 至 9 天。如不及时调入粮食,后果不堪设想! •

9 月 14 日,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顿粮食统销和降低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决定降低城乡人口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和制造代食品等应急措施,以补粮食之缺。

人民的生活愈来愈感觉到困难。

粮食紧缺!

副食品紧缺!

日用品紧缺!

部分城市中,已开始出现浮肿病!

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

7 月,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决定对北京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一点点特殊照顾,以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

“大跃进”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倒退!

●惨重代价

三年“大跃进”,年轻的共和国灾难深重!

经济方面:

1960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完成了 2065 亿元,只达到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高指标的 69.3%。

农业总产值 1960 年为 415 亿元,比 1959 年下降了 12.6%。粮食产量只达到 2870 亿斤,比“大跃进”前 1957 年的 3900 亿斤下降了 26.4%,跌到了 1951 年 2874 亿斤的水平。棉花产量,2126 万担,比 1959 年下降 37.8%,跌到 1951 年 2062 万担

的水平。油料作物 3405 万担，比 1959 年下降 50.9%，比 1957 年下降 54%，跌到了建国时的水平以下。人均占有粮食，农村人口在 1960 年为 264 斤，而 1957 年为 409 斤，减少了 35.3%。农村粮食奇缺，而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1960 年全国大约缺少 3000 万人一年的口粮。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从 1961 年到 1964 年，每年进口 100 亿斤左右。

1958 年底，湖南平江一位伤残老红军给彭德怀寄来一首诗，以反映“大跃进”的损失。诗曰：

谷撒地，禾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与呼！

1960 年 10 月 21 日，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今年已经有几个省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58 年、59 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了个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疲劳了，相当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

工业方面，轻工业出现从未有过的下降情况。1960 年工业产值 550 亿元，比 1959 年减少 9%，棉纱产量下降 28.6%，棉布下降了 28%，轻工业产品出现了奇缺现象。重工业则孤军冒进。

1960年重工业产值11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3倍。其中钢产量1866万吨,比1959年增长34.5%。钢材增长23.8%,原煤增长7.5%,发电量增长40.4%,水泥增长27.5%,金属切削机床增长32.9%。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比例严重失调。

基建规模增长过快,积累过高,效益下降。

国家财政,连年出现大量赤字,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上涨。1958年赤字达到21.8亿元,1959年猛增到65.8亿元,1960年高达81.8亿元,三年合计169.4亿元。1960年零售商品货源与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差额高达74.8亿元,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10.4%。

据估计,三年“大跃进”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200亿元。后来,通过5年的调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国家的经济建设走了8年弯路,耽误了8年时间。当时正是在这个时候,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等,经济和科技得到迅速发展。我们与他们的差距急剧拉大,这成为一个长时间弥补不了的重大损失。

人民生活方面:

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1959年至1961年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据调查,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由1957年的406斤降为1960年的327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下降了23.4%。植物油平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4.8斤下降为1960年的3.7斤,下降23%,其中城市下降31%。猪肉的平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10.2斤下降为1960年的3.1斤,下降了70%。

由于粮食供应缺乏,加上长期紧张的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据部分省、区和共青团中央的反映,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患了浮肿病。1960年10月和11月,

重庆市九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竟占到了35%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大量非正常的死亡现象。据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向中央的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嵒岬山公社一个社就死亡近4000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竟高达30%。从全国来看，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4000万人左右。

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出生人口4000万，经济损失1200亿元，耽误时间8年，这就是“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和所付出的代价！

第十章

庐山会议与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神仙会”与反“左”○“神仙”
八方来○“神仙”七嘴八舌○彭
大将军上山来●“上疏”风波○
天早晚要塌下来的○我为人民
鼓与呼○毛泽东的反击●“军事
俱乐部”○文臣与武将○晴天霹
雳○致命打击●万鼓雷殷地，亿
民伐右倾○只争朝夕○军队整
肃

人民受难时，中国出了个彭德怀。

彭德怀受难时，中国出了个钟伟。

因此，我们民族拥有的这段岁月，将不再苍白和平庸。然而，先人将依然浩叹怆然，后人将依然惊愕不休。六亿神州，煌煌中华，面对浩瀚的不幸和深重苦难，挺身而出者，何以只有彭德怀数人？为人民鼓与呼的人民英雄，何以如此孤单？扪心自问：作为龙的子孙，我们灵魂安否？我们配不配拥有这样的元帅？置身血色黎明里，难道彭德怀不食人间烟火？或者就没有个人牺牲和妻子儿女？曾几何时，更有一些

洒脱超然者，明言谏论者，甚至落井下石者，罗织罪名者，指手划脚者……一道道夜色中的闪电，照亮了怎样的现实，怎样的麻木，怎样的千古一瞬！

彭德怀元帅去了，走得太早太匆忙。

彭德怀元帅去了，消失在春天到来之前的寒冷中。他去了，给世人留下一片纯金的爱心。死，对于有的人，不过是千篇一律的悼词，是华贵的墓碑，是金钱与权杖的失落，是一缕缕青烟在空中散去，而他虽死犹生，以生命证实了生命的确实可以永恒。

有形的碑文终会风化或遗忘。

无形的碑文必然历久和经远。

安息吧，敬爱的彭德怀元帅！

●“神仙会”与反“左”

“神仙”八方来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一场持久的宣传战役的必然结果，也是新一轮宣传战役的开始，全民办公社、全民办钢铁、全民写诗……全民一齐上阵，是怎样壮观的历史活剧啊！毛泽东那智慧的头脑中，热情的思绪不断飞跃。在12月10日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上，他对热飞腾腾的建设浪潮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向与会各级领导人阐述自己的辩证法：

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級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千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这一激昂的语调,是空前的乐观与冒险精神的典型体现。毛泽东严厉指责那些对大跃进指头评脚的干部,谓之“观潮派”、“算帐派”,他一挥手,说道:

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然而,天行有常,经济建设自有规律,违反这一规律,必然要遇到麻烦。第二年,这种麻烦临头了,毛泽东根本没有想到如此之快。同时,他也听到了不少党内同事对经济形势与人民生活状况恶化的种种议论和担忧,连毛泽东身边最信任的秘书们、助手们,在他面前也不掩饰这种担忧。在和吴冷西(当时的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甚至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其实,这位人民领袖到1959年5月份还未必真正了解,全国许多省粮食已经极为紧张,已经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其中,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更加严重。在广东一些县,饥民们不得不抢粮求生。

虽然,毛泽东半年前就开始注意纠正各地出现的“左”倾急躁现象,但还是以保护群众和各地区热情、实现大跃进为第一要

旨，只注意局部问题，不做全面性变动，所以，形势仍在不断恶化。

1959年的夏天特别炎热，党中央决定在著名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系统地研究怎样有效地克服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为完成本年度的大跃进计划扫除障碍。

在六月底七月初的几天，中央的决策者们和各地领导人陆续抵达庐山，虽然会面、交谈、笑声、问好声不断，但人们的话语、眉间总是透露出隐隐的不安。

刚刚出国访问归来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委托秘书向中央办公厅请假，决定不参加会议。不料，第二天，他案头的电话铃骤然响起来，声音格外急促。他拿起话筒，传来毛泽东那浓重湖南口音的声音：

“德怀同志，我在庐山等你喽！”

“是，主席，我即刻动身。”彭元帅未加思索，答道。

庐山，真是人间仙境，前来赴会的领导者们暂时远离尘嚣，放松精神，从容议事。会议最初几天，与会者大都心情舒畅。据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日记》所载：

“7月3日，晚上跳舞，舞场为一小教堂。上帝有知，都进不了天堂的。一切都极为安静。有戏，有舞，却消没在山风松涛之中。跟北戴河另一番味道，那儿总是让你挂念着海，想到海中漂浮整日才好；这儿是‘深山养道之心’，尘嚣也俗之感皆被融化。”

“7月4日，清晨被阵雨惊醒。夜来风雨声，云雾知多少。至今只见窗外庐山，真面目还不清楚，讨论问题增至18个，先开小组会，我在中南组。”

兴趣更浓的场景是与会者们能赋诗者相互唱和，其乐融融。这里录朱德元帅的《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诗：

庐山真面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宛转创新陡。
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守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毛泽东也是谈笑风生，以特有的散谈风格，向全体与会者谈了这次会议要研究的十九个问题，涉及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学会过日子、综合平衡、产品质量等。

关于目前的形势，毛泽东很欣赏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三句话，就借用来概括，即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上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专门谈到了“大家要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困难一面。”

毛泽东用强调的口气说：“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说。”

“神仙”七嘴八舌

毛泽东的定调讲话，和庐山的云雾一样，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暑气，会议的空气轻松起来。

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话，更使“神仙”们飘逸起来。他话语不多，但切中要点：

“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最大的成绩是得到了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

面。”

他对会议的总的调子是这样解释的：

“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第二天，分组讨论，人们发言之坦率与热烈，可以说是过去党的会议上少见的，或许是现实状况逼使与会者不得不谈。

下面引用的部分与会者的发言记录，可见“神仙”们的神情：

陶铸（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750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吃一死，都不养了……群众懂价值法则，我们不懂……人们对总路线是有怀疑的，但要坚信，不能动摇。”

刘建勋（广西区委书记）：“去年许多措施、作风，使干群间有隔阂……再不要搞什么八百斤、千斤省之类虚名了。给农民小自由非常重要。”

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总的形势不可估计太乐观……下面干部对经济失调，还不感觉严重……建立公社太快、太大，几股风一刮，越包越多……小自由范围放宽些，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现在普遍人心思定，但转弯也不宜太急，得慢慢转。”

吴芝圃（河南省委书记）：“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去年600万人上山搞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铁今年可完成60—70万吨，钢5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河南今后方针是：一切为了巩固公社、食食、丰收和大跃进。”

王任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的成功与失败都尖锐……教训确实沉痛，比1954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已死了1500人，15万人得浮肿病……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冲昏头

脑……去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说真话真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面说假话……总之，五八年有丰富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要作充分估计，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说右倾，我也不怕。”

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不要轻信，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去年一股风，批评右倾保守，插白旗，老在帽子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五八年跃进，吃了五七年库存，预支了五九年……不要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性错误非犯不可，犯了有好处……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也难免，以不泄为好。要不要革命？革命就要出问题，不能怕出乱子，不要责备下面，所有错误和问题都由省地县担起来，省委主要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是检讨了。”

朱德(中共中央副主席)：“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

这些领导人的讲话，尽管都是神仙话，但情调不一，沉重反思者有之，轻描淡写者有之，变相辩护者有之，毕竟都是坦率的。

会上的“神仙”在会后的言谈中，变得更加直率，更能反映庐山会议前期领导者们对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党的领导的失误的沉痛反省。

田家英、吴冷西、胡乔木、陈伯达、李锐等为毛泽东所依重的“才子”们在7月6日，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聚合在一起。他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在交谈以后，显出沉重的忧虑。

李锐在《庐山会议纪实》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才子”们的言论：

综合平衡的问题进一步肯定，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

也是要保持平衡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现象总是平衡的，而政治现象才是不平衡的。富春提出“运动中求平衡”也是一种遁词，认为主席提出这个说法，是为自己五八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为元帅让路”，去年做到极点，“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等提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规律……关于公社的由来，是受嵯峨山、七里坪、徐水之地的影响，当时供给制的思想也是由此而来。公社与供给制的问题，在北戴河会议时，无人有精神准备……五八年一反常规，主席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和有关言论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前后，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产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乔木，而乔木没有向主席汇报。为此，上海会议时乔木挨了批评，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少奇向主席转告了，结果大发脾气……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受了表扬，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讲假话的习惯，去年就登峰造极了。

彭大将军上山来

应毛泽东亲自之邀而来的彭德怀元帅，上山以来，很少参加娱乐活动，他自诩“大老粗”。在舞会的灯光下，能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身影，绝对找不到彭德怀的影子，除了参加西北小组的讨论外，就是躲在住处看文件、简报和群众来信。

过去一年，他遍走西北、东北和湖南等地，实地考察大跃进

情况，他的眼前始终散不去那些场景：

一片片枯烂的番薯地；
一堆堆砸烂的锅盆；
一张张枯瘦失血的脸庞；
一床床难以御寒的薄被……

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乡，他发现，公社实际增产粮食仅仅是上报数的三分之一，恨得他牙咬得格格响：

“这不是朝主席脸上贴金，而是抹黑。要是主席晓得了这里面掺有假，他是笑呢？还是哭呢？我看他哭笑不得！”

经过调查，他作出一个大胆的举动。他对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指出：“我看今年征购 1200 亿斤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 900 亿斤为宜。”

为了给农民兄弟争得那 300 亿斤粮食，彭元帅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电报，提出建议。电报的末句是：

“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

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彭德怀对造成近年如此困难和被动形势的原因，是有自己看法的。在 7 月 3 日到 10 日的“神仙”时期，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前后有过七次发言或插话。这是武将的声音，和秀才的说法，方法迥然不同。他那粗犷的声音使得西北小组会议室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他说：

“1957 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说得意忘形可能重了点，总之是脑子热了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实验。总之，大胜利以后容易热，

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

“裤子要自己脱，不要让人家拉，江西还在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有人在暗示彭德怀，不能再“放大炮”了，但他全然不理，又提出去年毛泽东曾经给他安上的“算帐派”、“观潮派”帽子之事：“什么‘算帐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的和有利的因素。在大的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到反面的东西！”

人们都紧盯着彭德怀，有人恨不得堵上耳朵，也有人已经在手心里攥出汗来了。

彭德怀却再一次摸了老虎屁股：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而。”他几乎吼了起来。

彭德怀积郁久矣，一吐为快，但他哪里知道，“神仙时期”马上就要终结了，不仅是庐山会议，而且是未来的近20年，“神仙会”再也开不起来了。

彭德怀的讲话记录被柯庆施悄悄地退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立刻作出反映，却布置秀才们修改《会议纪要》，并强调，把问题搞清楚，道理讲清楚，决不戴帽子。然后，在10

日，他在组长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大意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郑州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不应抓住不放。

虽然彭德怀在以后的小组会上再三重提“领导责任”问题，但毛泽东不作反应。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在预定的15日如期结束。

●“上疏”风波

天早晚要塌下来的

夜已经很深了，庐山显得格外宁静，点缀在群峰之间的灯火，似乎也在沉默。此刻，彭德怀十分焦虑。毛泽东既然把大家请上山来，说是要好好总结一下近年来的经验教训，就这么算完了？

记得1958年初，“大跃进”刚提出来时，彭德怀就深感不安。大跃进？这意味着什么？他极为审慎地看待这一新生事物。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也是如此。但在3月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呐喊，这对全体与会者来说，不啻震聋发聩。在大会和小组会议上，一些领导人开始转弯子，论述“大跃进”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还有则表白自己对“大跃进”从来没有怀疑过。但彭德怀不是这样的人，他公开承认：“自己的思想长期落后于客观形势。”

他还是被毛泽东的讲话与会议的狂热气氛打动了。开始从内心里赞成“大跃进”的决策。下面也是他的话：

“南宁和成都会议的伟大收获，不仅是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有了比较深刻一些的认识，而且对于解决个人与

集体、局部与整体等矛盾的方法,也有了正确的措施。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亿人民中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新发展。”

说动就动,彭德怀坐不住了,他被真诚与兴奋所激动,频频下基层,宣传党的决策。但所见所闻却开始在他的脑海中划上大大的问号。他还是没有隐瞒自己的怀疑与看法。

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整顿问题与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在这之前两个月,毛泽东的专列驶过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他详细视察了基层的情况,也发现了许多不得不尽快解决的问题,为此,在他的专列抵达郑州时,他召集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口气严厉地批评了那种横扫一切的“共产风”,把1958年工作中的错误斥为“左”倾冒险主义。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此以往,对“大跃进”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会议是在2月27日至3月5日,在毛泽东的专列上举行的。彭德怀因故仅参加最后一天会议,未及系统发言。

时隔不到一个月,又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次,彭德怀再也坐不住了。他已经走遍了六大军区、10个省。他自信是有发言权的。他叙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又提高声音说道:

“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误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把手头吸了一半的烟撤到烟灰缸里,然后,用平缓的语调说道:

“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仅仅是底下

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

“德怀同志，你总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工农业、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去解决……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现在你是要来个‘武人忧天倾’啦。”

彭德怀不得不为自己辩解：

“主席，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我才这样讲。”他顿了一顿，迸出一句话：“我应该讲！”

毛泽东笑了笑：

“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彭德怀的脸刷地变白了，脑海一下子被搅得波澜起伏，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只好沉默了。

会议途中休息时，周恩来走过来，和彭德怀握了握手，用柔和的语调说道：

“彭总，我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了，如今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都要随之转变过来。主席不是多次讲过，要树立党的威信和对待两种崇拜观点的问题吗？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

彭德怀苦笑一下，还是忍不住“哼”了一声。

“我认为这还是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

周恩来不便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彭德怀忽然又说道：“总理，我是个臭嘴媳妇，免不了有失公公婆婆体面的时候，请主席和总理海涵。”

周恩来不容他再说下去：

“彭总，你这话言重了，不妥不妥。”

也就是在这个月末，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历时 51 天，于 6 月 13 日飞回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如今他已经在庐山上了，还是会议上的连珠炮，忧思未尽，然而，却石沉大海。

彭德怀最终还是下决心，当面找毛泽东谈一谈，坦陈自己对这次会议的看法，对目前国家社会经济形势的看法。

在庐山淡淡的夜雾中刚走出几步，彭德怀就停住了。他的眼前仿佛重现了四月上海会议的情景。他彭德怀去谈这样的问题合适吗？这几天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已经是反响很大，主席不可能不耳闻，我现在找他谈，会有怎样的气氛、效果呢？也就是片刻功夫，他曾经想到过最好由刘少奇或周恩来去找毛泽东谈，应该讲明，目前问题相当严重，如纠正不彻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彭德怀下意识地挥了挥手，算是把那个念头赶走，他迈开标准的军人步伐向主席的住地走去……

但是，他这次未能见到毛泽东，因为他刚刚睡下，警卫礼貌地挡了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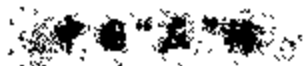
此时是 1959 年 7 月 12 日！

我为人民鼓与呼

彭德怀决定用写信的方式向主席坦诚自己的看法。他彻夜未眠，一直思考着，思考着……

第二天，他召来自己的秘书，说道：

“王参谋，你是知道的，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呀！主席一讲话，很多同志就不敢吭声了。你想想看，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好处？对主席也不好嘛！我去找主席，他在休息，看样子面谈困难呀。我考虑，只有通过写信的方式和他谈问



题。材料一直是你在搞，你就先帮我拉一拉初稿，成绩可以谈，但也要谈问题，你看怎样？”

秘书看看自己的老首长，一向敬重他，也知道他与主席之间的关系，劝道：

“我看您还是和主席面谈为好。”

“谈是要谈，怕是谈不拢哟！信还是要写，为谈不拢作准备。你就负责起草吧，说重一点，不重不解决问题，重了刺一下也好啊！我也有过狂热性、头脑发热嘛，应该和大家一起清醒一下为好。”彭德怀的决心已定。早在30年代，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在《西行漫记》中谈到他对彭德怀的印象：

“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写给毛泽东的信由彭德怀口授，秘书记录，直到中午，秘书把信誉清，改完。交给彭德怀，轻轻地说道：“彭总，信发不发，请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彭德怀看看自己的秘书，点点头。

“好吧，我再想想。”

整整两个小时，彭德怀的身躯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

然后，他提起笔来，在信末尾签上“彭德怀”三个大字。这是那个时期所有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都熟悉的字，他们的证件上，都有这三个字。

信终于送出去了。

7月14日过去了，彭德怀整整等了一天。

到7月15日，原定是散会的日子，忽然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期延长。这一消息使彭德怀极度兴奋起来。他猜测，我的信起了作用了，要真正解决问题了。

彭德怀的“上疏”共分两部分：“甲”部分的标题是“1958年



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乙”部分的标题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前者占全信的三分之一左右，后者占其余的三分之二左右。在作者看来，庐山会议不解决第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况且，在开会之初确定的主题，就是怎样解决问题。

在信中，较详细地列举了“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比如，“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第二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有些指标逐年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一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

彭德怀在信中还诚恳地提出：“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

责任。”

当然，他没有忽略在信的最后向毛泽东表白：

“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了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庐山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

毛泽东的反击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面前坐着三位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都是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中一起战斗过来的老战友。他已经把彭德怀的信交给他们传看。看完以后，三位常委习惯地默不作声，等着主席讲话。毛泽东轻轻吐出一口烟，很快挥手挥去缠绕在他眼前的雾团，平静地说：

“我提个建议行不行？大家来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

三位常委对主席的建议没有异议。于是，第三个建议也提出来了：“请办公厅立刻把这封信印出来，发至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毛泽东说完，拿起一支红铅笔，在信的首页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几个大字。

于是，一切布署在这三个建议中完成了。这是7月16日。

第二天，会议重新编组，会议代表人手一份《意见书》，结合原定的《会议纪要》进行讨论。

会议的最初讨论并没有像毛泽东想像的那样，不少代表或是赞同彭德怀的看法，或是借着《意见书》的思路提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上将曾经是彭德怀的部下，他也感到形势的严峻，他指出：

“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感到心情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笈说：

“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要做很多工作……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总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是必要的。”

但是总的趋势是对彭德怀不利的，会上会下，不少人在揣摩毛泽东的心思，也有人真心认为这封信是极为严重的事件。

农机部部长陈正人在会外对李锐提了几个问题，表明了他的挂忧：“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失”字放在前面？“得心应手”是什么意思？

程子华则认定，《意见书》的许多提法和指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把“大跃进”的成绩否定了，他说：“发生一些缺点，有的不可避免，有的由于没有经验。最重要的是，因此取得了宝贵经验，不能把得、失平列相看。”

贺龙认为：“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什么难以克服的错误。”顺便揭发了过去彭德怀在私下里对他说过的一些话。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则认为：“我们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的关系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的了不得……群众对缺点的意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

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彭德怀的信中提到的问题，为本部或本地区解释。最初的“神仙会”的那种飘逸的气氛全然消失了，整个会议已经开始转向，为目前形势和中央决策大唱赞歌的人越来越多，对彭德怀的公开的和间接的指责也越来越多，但调子还没有上升。彭德怀郑重声明：这是私人信件，不是什么意见书，要求中央收回，但已经迟了。

也就是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理论权威”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他“提醒”毛泽东，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多年来，这位“老粗”就与党同床异梦，如此等等。

●“军事俱乐部”

文臣与武将

7月18日，暮色刚刚降临，一位气宇轩昂而又儒雅的将军匆匆赶到庐山。他被安排与彭德怀同住一幢房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时，他是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奉命而来，风尘仆仆。他一到就立刻去看望老上级彭德怀。

彭德怀问：“我给主席的信你看了没有？”

黄克诚答：“还没有来得及看。”

彭德怀当即给了他一份《意见书》，嘱他现在就看。黄克诚仔细看完以后，直截了当地说：“这封信写得不怎么的，有话可以直接说，为什么要写信呢？信中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大妥当。”

彭德怀没有说什么，就起身送客。

第二天一早，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相约去看望黄克诚。他

们都表情庄重,似有难言之隐。黄克诚和他们聊了起来,才知道大致的会议情况,关键是,这次会议气氛不对,压力很大,不允许人谈缺点,特别是《意见书》出来以后,空气更加紧张。

黄克诚也沉默了。过了一会,他说,以前在书记处会议上他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点话的人,可是现在……

大家都沉默不语。

“彭总的信,你觉得怎么样?”周惠问道。

黄克诚说道:“有漏洞,有问题,有刺。”他心里明白,凭他和彭总的关系,若事先知道这件事的话,他能劝阻这封信出来。现在,为时已晚。作为高级军事领导人,黄克诚对目前国内形势的真象是十分清楚的,他也走了不少地区和部队,对事态的恶化深感震惊。彭德怀从国外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找到黄克诚,黄克诚向他反映,许多地区缺粮和春荒的惨状,眉宇之间,忧虑万千。如今,他来到庐山,面临的已经是难以逆转的形势,他深为彭帅的处境担忧,也为人民的疾苦担忧。

他该做怎样的抉择呢?

在19日,黄克诚在第五组会议上发言。他说:“我同意毛主席讲的三句话和少奇同志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检查缺点会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

他的整个发言没有谈到彭德怀的《意见书》。

和黄克诚一样处境微妙的高级领导人还有张闻天,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不知是否历史的捉弄,在庐山会议期间,他与彭德怀比邻面居,仅一墙之隔。

张闻天曾经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其经

历、气质、性格，与彭德怀很少共同之处，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想法，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国家形势与领导责任问题。

对毛泽东，张闻天始终是极为尊敬的：在延安时期，他名义上是党内第一把手，实际上注意把毛泽东放到决策核心地位上，最后他亲自决定，以后政治局会议都在毛泽东的住处开。建国以后，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国内经济形势在1956年“反冒进”以后急剧恶化，使他深感忧虑。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他抽时间频繁下基层调查研究，目睹狂热场面和严重失调，深感痛心。他对“总路线”对毛泽东的建设社会主义做法，开始发生怀疑，并下令外交部机关停止炼钢。特别是1959年3月，他到广东、广西视察，注意到劳动力紧张、粮食紧张、干群关系紧张的严重局面。在郑州、上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一再进谏，直抒对形势的看法，坦陈忧虑。与此同时，他不断找有关部门、地区的负责同志交换看法。上庐山以后，他也感到会议上压力太大，不能畅所欲言，即使在“神仙时期”，大部分同志也心有顾虑，这是这一段时间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必然后果。他感到心情郁闷。

晚饭以后，他出门散步，遇到了彭德怀。他们在东欧访问时，不期面遇，曾经交换不少看法。于是，就边走边谈，话题自然是目前形势与会议情况。

“小土炉炼铁，得不偿失。”这是张闻天的看法。

彭德怀认真地说：“我看还是有得有失吧。”

张闻天苦笑一下，说：“你的估价比我高。”

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看法，张闻天说：

“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泽东一人。”

彭德怀点头称是，补充说：“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

则问题,但没有解决正确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而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的性质的矛盾搞清楚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

这位领导人心里明白,唯其如此,目前这种不正常情况更加严峻,前景难测。

不久,张闻天接到会议印发的《意见书》,心里又是惊喜又是担忧。喜的是彭元帅敢言人所不敢言。忧的是,这种方式难有理想的结局。但是,巨大的责任感使他感到这种关头不能后退,他必须明确表态。

7月21日,在第二组会议上,张闻天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在毛泽东对《意见书》已经作出强烈反应的情况下,会议参加者也开始对彭德怀大加挞伐,他挺身支持彭德怀的观点。

张闻天指出:

“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原因……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以致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牛……赶超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

如此针对性强的尖锐言辞,是庐山会议上最直率的发言,是彭德怀《意见书》以后的又一个炸弹,使会议气氛直转而下。事后,有人作了统计,张闻天讲话记录稿共八千字,讲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一大批带“太”的词,如

“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

当天晚饭后散步时，张与彭德怀又相遇了。张闻天先开口：“今天我对你的信支援了一下。”

彭德怀心情复杂地回了一句：

“我不要你支援。”

晴天霹雳

7月23日，通知召开全体会议，与会代表全部汇集到礼堂。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来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他满面微笑，从容不迫，在主席台上坐下来。

会前，有一部代表中曾传言，毛主席表态，将是直截了当的，不再通过小组分组或简报的形式。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

浓重的湖南口音响起来，充溢着整个会场。毛泽东用手指指自己的脑门，说：“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不愿意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下去。”

在毛泽东的眼里，形势是严峻的：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

针对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毛泽东直接予以回答：

“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

“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

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

“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

“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

这一讲话，无异在会上炸响了晴天霹雳。空气极度紧张，彭德怀、张闻天们的头颅仿佛被一种无形、但有力的力量所压迫，只得低下来。

毛泽东步步进逼：

“还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得’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槌定音，彭德怀们被定了性。

一个上午，毛泽东天南海北地阔论，终了，宣布散会。

彭德怀意识到，自己的信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委屈之情涌上心头。他要向主席表白：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在会议室门口，彭德怀迎住毛泽东：

“主席，我的信是给您个人的，没有让大家讨论……您是老师，我是你的学生……”

毛泽东径直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也没有等他把话说完。

刚强的元帅难以承受这沉重的打击。他还是不明白，事情怎么到这种地步？

那些“才子”们也被毛泽东的讲话所震惊，心情难以平静。周小舟拉着周惠、李锐到黄克诚这里来了，未坐定，便急切地谈到自己各自的沉郁感受，历史给“才子”们的许多启发，此刻全部化成滚动的言语。

周小舟说：“袁世凯要称帝，有人特为办一种报纸，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些话。”

“这不是钓鱼吗？”周惠对毛泽东前几天的沉默很有看法。

“不能一手遮天。”李锐也很激动。

黄克诚毕竟年长一些，阅历丰富，内心很不平静，但话还是冷静的，听到他们的议论，很严肃地说：“怎么能这么说，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你们可以找机会和主席谈谈。”

李锐说：“主席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正说着，彭德怀进来了，听到“才子”们的议论，反而劝慰他们：“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但是，他的脸色是那样的疲倦、阴沉。不一会，他就起身告辞了，步履缓重。

这次纯属偶然的聚谈，成为以后事端的重要起因。

在强大的压力下，彭德怀作了检讨。

致命打击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斗争有了新的部署，这不因为他的检讨多么诚恳而变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即刻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定在8月2日。

那天，实到中央委员147人（缺席44人），列席15人，与会者共162人。

会议开始，毛泽东先讲话，还是那样的洋洋洒洒，毫无拘束，但锋芒毕露：

“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当时即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要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自由……一上山，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原来问题就出在‘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想改换一下题目；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

八中全会的基调是再明白不过了。

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许多历史问题，谈到彭德怀与他历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谈到张闻天是“旧病复发”，以及一系列问题。会议上印发了毛泽东刚刚写就的《给张闻天的信》，一开头称：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了，于是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这是第一次提出“军事俱乐部”问题，由此，“有组织的”向党进攻、结成反党集团的问题顺理成章被提出来了。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庐山会议便进入了一个揭批“军事俱乐部”的新阶段。林彪在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提到：

“毛主席这次对他的问题、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这一套在这次会议上暴露出来，是我们党内一种右倾的政治危险，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那会动摇、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

周恩来也作了讲话：

“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

个纲领性的东西……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黄克诚同志是同林彪同志一起上山的，17日下午我们一起谈时，林彪同志驳了‘得不偿失’，黄也感到信中有刺，但他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就是批‘左’的东西，还气势汹汹，跟谭震林吵架。张闻天同志急于表态，七月十日后，找粮食部、银行和商业部同志了解情况，他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有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

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勾勒的“军事俱乐部”全貌。

随后，8月13日、14日、15日，连续三天，这几位“俱乐部”成员被迫在全体会议上做检查，接受大家的批评。第二天，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彭黄张也举手表示赞成，周小舟因是候补中央委员，没有举手表决的权利。

在这之前，8月7日，毛泽东又提起他的红铅笔，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万鼓雷殷地 亿民伐右倾

只争朝夕

毛泽东亲自签发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时半年之久的“反右倾”运动开始了。

毛泽东为此签发了一系列文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



《人民公社万岁》、《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社论中指出：

“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党的工作已经是反右而不是继续反‘左’”。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本心和实质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

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升降，“是由于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作怪。”

“这是一股从阴沟里钻出来的阴风、逆流。”

毛泽东对运动的进展极为关注。他的目光盯在了辽宁省。庐山会议尚未结束，8月8日，辽宁省委接到省委负责人从庐山上传来的消息，没有片刻的耽搁，立刻作了传达。接着在第二天，就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认定本省在本年初和五月份，在落实大跃进生产计划过程中，两度出现波折，是因为部分干部出现松劲、右倾思想，经过斗争以后，两度扭转了生产局面，《报告》的结论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右倾松劲情绪抬头，生产就要下降，鼓足了干劲，生产就会上升，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气可鼓不可泄的真理。”

8月12日，毛泽东兴奋地指示：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

他发出命令：“要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

一声令下，全党行动。

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大规模的反“右倾”会议，步骤明确。

第一步，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讨

论增产指标,以批判“右倾松劲情绪”,开展大竞赛;

第二步:传阅彭德怀的《意见书》以及张闻天的发言记录,开展辩论,在此基础上,传达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传达毛泽东的多次讲话,以联系本地区、单位、个人情况,进行普查和重点揭批;

第三步:对“问题严重”者进行组织处理。

整个运动轰轰烈烈,然而节奏不乱。

1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标准有以下若干条:

公开散布系统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

积极支持彭德怀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毛泽东的;

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口批评大跃进、猖狂攻击的;

批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右倾”言论和行动,仍执迷不悟的。

这些成为了全国通用的标准。

结果,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国家机关重点批判了1900多人,重点帮助了2714人,把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地也竞相揪“右”,如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县以上机关单位重点批斗4696人,有1630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少省市还揪出了大大小小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虽然,中共中央决定不把反“右倾”斗争扩展到工厂、农村基层,但是,那些地方还是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湖南省农村批判对象,约占人口10%,每个大队约三五人;在广东,被重点批判的基层干部,占参加会议人数的30%,生产队一级干部则占10%;



对富裕中农的批判,每个大队一至三人,仅汕头专区,被重点批判的上中农达 3867 人!

高等学校的专家们也未能幸免,一些党员专家被指斥为“以专家资格同党分庭抗礼”。如,北京大学,有 128 个党员教师骨干参加整风运动,受到重点批判者多达 27! 在清华大学,174 名党员教师骨干,有 17 人被认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以专家自居,不服从甚至反对党的领导。”

在反“右倾”运动中,中共中央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要控制在 1% 以下。结果,在 1962 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批判的重点对象,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 365 万! 而当时的全国党员总数为 2600 万。

军队整肃

既然彭德怀为首的“集团”是“军事俱乐部”,那么,军队就成为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庐山会议刚结束,便在北京举行军委扩大会议,从 8 月 18 日到 9 月 12 日,被解除军职的彭德怀、黄克诚遭到严厉批判,其主题是揭批他们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全军师以上单位领导干部 1061 人参加,另有 508 人列席。会议采取背靠背揭发、面对面追逼的方式,对彭德怀、黄克诚的历史问题、现行问题进行批判。

彭德怀被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名,据说他在 1953 年主持军队内务修订条令时,删去了政治指导员、教导员是直属首长的提法,还说过要准备实行“一长制”,一部分政工干部要改行搞军事等。

他被认为从平江起义参加革命就是“投机入股”,他大部分时间是反对毛主席的。

他被追逼:“为了篡党篡军,你进行了些什么具体组织准备?”

你要交代俱乐部的成员！”

彭德怀回答：“交代了，4个，以彭为首，国防部、总政治部有没有？我看是没有。”

“人不止这几个，还有人的！”

“俱乐部就是四个人嘛，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其他，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报名嘛！”

追问还是不断，彭德怀愤然至极，高声吼了起来：“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庐山上中央正式确定了黄克城、张闻天、周小舟三同志是成员，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要是现在还有人愿意报名，那就上来报名吧！有吗？谁愿呀？快上来呀！”

彭德怀的“顽固”态度立即引起人们的“义愤”：“你这样顽固没有什么好处！”

彭德怀不得不沉默了。

当时，林彪主持批判会，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抱住麦克风，忽然喊道：“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是他在长征途中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

这一指责使全场人震惊不已，但立刻就响起一声呵斥：

“胡说！你们完全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

这位“不识时务”的将军就是钟伟，当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他喊道：

“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会场顿时一片混乱。立刻，总政保卫部干部奉命率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咔”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会场。钟伟不停地喊：

“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了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会议，再进行下去，也不知谁会撞到枪口上。

林彪声色俱厉地讲道：“钟伟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但这颗定时炸弹的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这证明我们的会开得是成功的……我们与彭德怀及其死党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他们的某件事、某些言论，不能凭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去批判！”

所有的领导人先后都表态，这叫人人过关。

刘少奇列举了彭德怀的四大错误：一是曾经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二是组织了“军事俱乐部”，三是里通外国，四是在庐山急于发难。

周恩来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的”。

朱德在会议上作检讨，因为斗争彭德怀“不力”。这一检讨后被发到县团级党组织。

批判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一片掌声中走进会场，他频频挥手，发出震天动地的号召：

“要彻底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称彭德怀、黄克诚“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他们“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这次向党进攻，完全是为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是他们个人野心发展、利令智昏，不听党的劝告、无视党的纪律的必然结果。”

《决议》决定将八中全会、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军，迅速掀起批判彭德怀、黄克城“资产阶级军政路线”、“右倾机会主

义”的高潮,《决议》号召:

“全军要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之后,各大军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号召开展反右倾斗争,共有 28691 名军官参加会议,占全军团以上党员干部的 63%。

与此同时,各省军区和师、团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两会”精神,联系本单位情况,对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军重点批判干部达 847 名,包括邓华上将、洪学智上将、万毅中将、钟伟少将。到 11 月底,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 人,团以上干部 195 人,占 12.5%;另有许多军官因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或表现不坚定,被指责为“中间派”,被列为“中右”、“二类”、“三类”的有 15464 人,加上前述 1848 人,总数达 17212 人!

毛泽东秘书李锐在 30 年以后写道: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斗争。”

美国学者英·迈斯纳写道: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胜利被事实证明只是一场空洞的胜利。席卷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旱涝灾害及由于欠收接踵而至的粮食短缺,使毛泽东主义的号召和思想上的鼓动,化为泡影。”

第十一章

哀哉 物极不反

●小说《刘志丹》祸及万人○左
倾回潮○习仲勋受审 16 年●百花
凋零,万马齐喑○西风压倒东风,东
风要占优势○“鬼戏”招来“钟馗”○
奇文今考●杨献珍的“哲学罪”○自
投罗网○屠场森严○株连十族以上
●圣人的劫数○受尽凌辱:大经济
学家孙冶方坐牢八年○含冤自尽:
大历史学家翦伯赞挨斗百余次●全
面深挖农村修正主义根子○社教:
大兵团作战○四清:决不姑息

这是什么世纪呵?

圣人俯首称罪,欲哭无泪。

奸徒尽奸国事,耀武扬威。

失言则为“反党”、“小宗派”、“修正主义分子”、“伺机复辟资本主义”、“污蔑领袖”、“保皇党”、“漏网右派”、“反共老手”、“蒋介石走卒”、“特务”、“黑爪牙”……挨批挨斗,株连亲友。失慎则为“阴谋篡权”、“里通外国”、“狼子野心”、“自

投罗网”、“姑息养奸”……镣铐入狱，哀告无门，直至被草菅人命。鬼语，游魂不归。该永生的被埋葬，该埋葬的却永生。人们有目不能视，有思不能辨，有脑不能想，有喜不能乐，有恸不能哀，像人一样站立，却不能像人一样生存。悲夫！

难以置信：我们华夏民族真有过这样的苦难吗？

躬身自省：我们能从此拒绝这样的苦难吗？

天意人事，物极必反。

亡灵在上，伏维尚飨。

●小说《刘志丹》祸及万人

左倾回潮

1962年，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年初，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开始了对“三面红旗”及其社会形势的反思，要求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那张著名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核心人物在主席台上谈风生的照片，就是摄录了当时的情景。中央核心似乎齐心协力地开展讲“过火”、“冒进”倾向活动，竞相作自我批评。

然而，真正的分歧远没有解决，会后，毛泽东便登上专列巡视大江南北去了，具体的克服困难、扭转被动局面的工作，交由刘少奇等人主持。

车轮滚滚，景色宜人。显然，社会形势在慢慢开始好转，然而，毛泽东依然被“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和许多干部对“大跃进”的指责与批评而耿耿于怀，他想起了什么？想起了彭德怀？还

是想起了作《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抑或想起了……

毛泽东，从血雨腥风的二十七年奋斗中走过来，亲手缔造了这个国家。他不容许任何倒退的企图。这个国家要万年永存，社会主义理想要永远保持下去，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呢？是建设经验不足而导致重大失误最终失去民心吗？

他点燃了烟，默默吸着，烟雾缭绕，思绪也随着悠然远去

两年以前，他在上海接见来访的丹麦共产党主席，已经初步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我国也有修正主义，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去年夏季向党进攻。我们批评了他，他失败了。跟他走的有七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连他自己八个。”

在刚刚结束的大会上，他对着七千人，也曾发出过类似的严厉警告说：“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一如1959年那样，这年的夏天也特别闷热，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7月份就决定在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议题是农业、财贸、城市等问题。

8月6日，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第一天，依惯例，由毛泽东主席做基调讲话。

然而，他一开口，谈的却是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使与会者甚感意外。

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

像我们的国家是否也适应？”

这是第一个问题！

“究竟这两年形势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

这是第二个问题！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的说20%，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

这是第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所有与会者都必须回答，会议本身也要作出回答，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而且要立刻回答。毛泽东说了：“我在大会只出了题目，还没有讲完。”

剩下的话和结论是在一个月以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毛泽东还是先讲话，他把他多年思考的答案摆了出来！

“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

“过去几年（形势）不太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现在，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是复杂的，其实也很简单，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

他发出了著名的号召——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

开一次会就讲。”

接着,毛泽东开始具体谈到党内修正主义问题,明有所指地说:“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近来的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没有错的不平,不能一律都平反!”

全会最后全部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论断,通过了各种决定,最主要的内容都反映在公报里: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习惯势力,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后人评说道：这次会议是“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标志，把“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刚刚开始形成的较活跃气氛打掉了，党内各种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这是庐山会议以后的又一次转折性会议。

习仲勋受审 16 年

也就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反“平反风”、“翻案风”时，他接到康生递过来的一张条子，毛泽东随即说道：“现在写小说盛行，”接着念了条子：

“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康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李建彤所著历史小说《刘志丹》（工人出版社出版）。这完全是康生利用毛泽东对反修正主义，搞阶级斗争、反“翻案风”的意志进行的诬陷。

这部作品以陕北根据地创建者之一、著名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为中心人物，广泛描写了那一时期革命干部和战士艰苦奋斗的历程，原书是传记作品，后应出版社之约，改为纪实性历史小说体裁。由于涉及西北革命历史上的诸多问题，这部书先出样书，广泛征求意见。原西北红军将领阎红彦上将读了以后，在1962年夏给作者写信说：“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一个作者是担不了责任的。”也有许多老干部表示赞成出版这部书，其中就有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他也是西北革命历史上著名领导人之一。

有人将此事告发到康生那里，康生没有看过书稿，却以他超乎常人的嗅觉，断言：“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鉴于小说部分章节已经在《工人日报》上连载，阎红彦深感事情不小，在8月初北戴河会议期间，向全总、团中央同志提议停止发表，还写信报告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康生一看时机已到，便下令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各处，一律不准发表这部小说。8月24日，他又写信给杨尚昆，要求中央书记处出面处理这一问题，他断言：“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同时，他下令工人出版社把《刘志丹》第三稿印300本，第五稿印600本，送中央审查。这意味着，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阴谋已经完成了，只需要通过毛泽东的权威来加以首肯便是。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大谈阶级斗争、党内修正主义等问题，他很快得出结论并予以高度的总结：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可见，他是从政治高度来看待《刘志丹》小说问题的。于是，一场猛烈的批判高潮掀起了。

《刘志丹》被定的罪名五花八门：“为高岗翻案”、“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剽窃毛泽东思想”、“以陕甘宁根据地为中心苏区分庭抗礼”，等等。

小说的写作被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在修改小说过程中，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等原西北革命时期的老干部们提出过修正意见，并鼓励作者写好这部书，也被说成是：“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

在没有事实依据和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十中全会认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个反党集团”，并成立专案组织进行审查，康生亲任组长。

就这样，《刘志丹》及其有关人员成为1962年“左”倾思潮再度泛滥的第一批牺牲品。这场批判索性剥去文艺批评的面纱，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批判。这种批判似乎证实了毛泽东关于目前

阶级斗争形势和党的核心任务的论断。

作者李建彤受到直接的迫害,被没收全部采访记录,在记录下记载着的所有被采访对象都被牵连进来。

另一方面,西北地区的许多党政军干部,不管与《刘志丹》有关还是无关,陆续被调到北京来学习,他们也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

在康生的一手操纵下,这一案子从1962年开始审查,直到“文革”爆发,还没有作出结论。然而,习仲勋被撤销职务,受审16年,还被关押了8年。

“文革”的爆发,使这批人受到更严重的打击。贾拓夫(国家经委副主任)早已被撤职,“文革”时被弄到北京郊区,惨死在那里。马文瑞(劳动部部长)在那时被关押了6年。白坚(一机部副部长)被揪斗致死,罪名是“为小说提供炮弹”!刘宗勉(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受此案牵连,被沉到河里淹死。高丽生(工人出版社社长)被肉刑折磨致死。该出版社的吕宁被打成内伤,周培林受到电刑的折磨。而才华横溢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乡下,六口人每月只有60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病交加中惨死。连李建彤采访时,为他带过路的普通群众王悦贤、刘景华,也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仅在陕甘宁地区,被认为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黑爪牙”而遭到迫害者达万人之多!

“《刘志丹》案”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到结束这短短三天内迅速“定案”,反映了毛泽东所强调的阶级斗争之严重性、紧迫性的观点被党的领导层所接受,不再是纯个人的思想,而成为党的基本方针。

在会议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对面临的困难的态度时,他强调说:

“第三种态度,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进攻的是反动的。”

他们希望我们犯错误,对我们的困难幸灾乐祸。彭、高、习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也提出纲领……”

毛泽东插话:“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

刘少奇继续说:“《刘志丹》80万言书也是纲领……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反党集团实际上是几支反党别动队,人数不多,用不着全党去对付,我们工作不受干扰,由少数人对付他们……两条道路的问题未最后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毛泽东插话:“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又出了赫鲁晓夫,现在看起来,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我经常这样想,要经过反复。”

刘少奇说:“斯大林在集体化以后讲谁战胜谁的问题国内解决了,国际未解决。在这里还是主席讲得对。”

毛泽东说:“我是根据列宁的说法,列宁有预见,他是在1924年死的,革命胜利后他有7年实际经验。”

刘少奇说:“斯大林不对,麻痹了自己。”

毛泽东说:“后头又出了反革命。惊惶失措,杀了很多人,有些应该杀,有些不该杀,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

刘少奇说:“谁胜谁负要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苏联、南斯拉夫、东欧的经验都证明了,我们要接受教训。我们如果让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形式上可能不同……我们党要从这里取得教训,提高警惕以后还会有这类事情,所以,必须在党内加强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以便抵制各种各样反动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思想……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断然宣布:“我们要准备五代到十代,我们算第一代,共100年到200年!”

《刘志丹》被作为一场政治斗争彻底批倒批臭了。但是，“利用小说反党问题”远没有解决，毛泽东对此早有“警觉”。文艺界的大批判运动在这以后，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核心问题依然是政治问题。

●百花凋零 万马齐喑

西风压倒东风 东风要占优势

早在1958年1月27日，反右斗争方兴未艾之际，文化部党组向中央递交一份报告：

“我国现有一支庞大的艺术队伍，这支队伍包括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方面的艺术工作者，据估计有27万多人，他们中间极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艺人。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一般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要使这支队伍真正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自己的艺术队伍，还必须继续进行改造，并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接着，报告依此强调各类艺术工作者参加体力劳动和基层工作锻炼的问题。

转眼到了六十年代初，经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经过1961年较为宽松气氛的鼓舞时期，文学艺术领域工作者的意识改造得如何呢？这一领域的阶级斗争状况怎样呢？八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又巡视全国，《刘志丹》问题虽然基本解决了，但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艺领域）的问题还是值得关注的，经过建国以来多少次的风风雨雨，毛泽东和党中央断定，文艺领域总是一块不安份的“土地”，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这一领域的斗争决不能忽视。

在巡视到华东时，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开始发表了意见：“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

柯庆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立刻做出反应，根据毛泽东指示中的文艺题材方面的问题，一个多星期以后，他在上海市部分文艺工作者元旦座谈会上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意指，文艺作品要以建国13年为核心题材。他反复强调，这依据的是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后来，在“文革”中的宣传小册里写道：“这是在我国文艺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决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战斗口号。”

但在当时，这一口号一提出，立刻引起激烈的争论，作家们、评论家们和大部分文艺界领导人天真地以为这是一个关于文艺题材问题的口号之争。2月中旬到4月底，周扬、林默涵等在北京新侨饭店连续召开座谈会，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的29位（一说25位）“文艺名流”参加会议，主题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周年，许多与会者指出“写十三年”口号有片面性。

周扬说：“写十三年有困难……时间短，印象不深……提倡写十三年容易把题材弄得太狭隘……民主革命也要写。”

当时身为上海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为这个口号辩解，并列举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

这种争论还没有直接被引伸到不久的政治大批判上去，但却为此埋下伏笔。文艺界领导人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指示，是闻风而动的。1963年4月，在文联三届二次会议上，周扬所作报告的题目就是《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把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苏联文艺中的修正

主义)当作主要任务;10月26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的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报告中,更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任务。

问题是,这些领导人对文艺界现状的评价与具体的步骤方针,被指责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包庇修正主义分子”、“顽固坚持文艺黑线”。

“鬼戏”招来“钟馗”

灾祸首先降临在戏剧界。

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首先点了新编剧《李慧娘》的名,称“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后一句话主要是指廖沫沙1961年8月31日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有鬼无害论》一文。报告还指出,这出戏的要害是对“大跃进”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行影射。这一剧本最初发表在《剧本》(1961年第7、8期)上,在1963年被提出来加以批判,决不是偶然的。自封为文艺界“流动哨兵”的江青通过柯庆施在上海组织的批判文章,最初发表在《文汇报》(1963年5月6、7日)上,署名为梁璧辉,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指责《李慧娘》作者及其辩护者是影射共产党。戏剧界对“鬼戏”的批判高潮由此而掀起。康生直截了当地说《李慧娘》是“坏戏”的典型,“是用死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场严重的阶段斗争”。到1965年3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宣布,《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批判进行了两年多,还涉及到其他“鬼戏”,如《探阴山》、《奇冤报》、《女吊》、《活捉王魁》等。

这一场批判,在“文革”中被认为是:“由于当时文艺界大权

不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这一批判被引向‘学术研究’的邪路,没能深入开展下去,更没能击中要害。”

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文艺界“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所以,斗争又开始了。5月2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就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提出了音乐的阶级性问题:

“一、这样‘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

“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

“三、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流派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毛泽东对文艺界刚刚开始露头的大批判很快表明了态度。1963年9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11月,他又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政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激愤之情,可见一斑。

同年12月,毛泽东的案头出现了柯庆施通过中宣部文艺处送上的材料。12日,他批示道: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

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极点,而且涉及几乎所有文艺领域!

这是事态严重化的征兆。刘少奇急忙于1964年1月3日,元旦刚过,就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多人举行座谈会,由周扬传达了上述批示,并分析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情况。他说:

“这一年多来,主席很注意文艺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方向问题上来,提到文学艺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来,还提到反修问题上来,把一些现象综合起来,提到这么一个高度来看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彭真说:“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也可以说最落后……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方面有责任……匈牙利事变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乐部。”

刘少奇则说:文艺界“绝大部分是认识问题”。

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出现了重大事件,使文艺界开始了一场整风,批判运动达到新的阶段。元旦座谈会后,2月3日,由中国戏剧协会组织,在政协礼堂举行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迎春晚会”,被部队文艺工作者向上告发:“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文革”中称这次晚会是“黄色下流、腐朽透顶”)。对此,中宣部长陆定一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

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责成剧协党组作出检查,并在3月下旬召开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共50多人,连续三天讨论,结论是:“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会议布置各协会及全国文联举行七到十天的整风。到5月8日,中宣部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指出,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各单位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文艺理论批评旗帜不鲜明,不鼓励作家创作现时代的先进人物,反而提倡多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对文艺队伍的落后面估计不足,忽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并提出五条改进措施,核心是“加强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其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并要求各单位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干部下放劳动,并改组领导机构。

这份未定稿,被江青私自送到毛泽东的手里。6月27日,毛泽东在报告(草稿)上一口气写下如下一段文字: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边缘”、“势必”之辞,表示了事态的严重性。

这第二个批示如同炸雷,使文艺界人士昏昏然不知所措。显然,毛泽东笔下的“修正主义”、“裴多菲俱乐部”的称呼是以表明

问题的严重性。

7月2日，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和文化部负责人，布置第二次整风，并在8月27日成立起到指挥部作用的“核心组”。

然而，即便如此严厉的“整风”，在“文化大革命”中，仍被指责为“假整风”，被斥之为：

“周扬秉承刘、邓旨意，慌忙布置，进行顽抗，从7月至11月，导演了一场抗拒最高指示、牺牲车马、保存将帅、打击左派、包庇坏人的假整风，抛出夏衍、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人，只在所谓小范围内进行了所谓‘批判’，企图蒙混过关，从而掩盖刘、邓的罪恶，并使自己捞取新的政治资本。周扬、林默涵对旧作家协会提出：‘批判只限邵荃麟一人，只限文艺问题’，只限‘中间人物论’，不准触及大连会议政治要害，他们还抚慰田汉、孟超、陈荒煤、袁文殊等一伙‘不要紧张’。由于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刚刚接触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要害问题，周扬一伙及其后台刘少奇见势不妙，便放出空气，于九月份叫大家下去‘四清’，从此，这场假整风更是松松垮垮，后来于11月草率收场。11月24日，周扬作了假整风的‘总结报告’掩盖了这些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政治问题，混过了关。”

即使在这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第二次整风的紧张气氛。作家、艺术家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们，无不人心惶然。实际上，这场整风直到第二年4月才结束。中共中央在1965年4月7日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夏衍、齐燕铭文化部副部长职务。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受这场“左”祸最深的，则是这前后展开的广泛的文艺作品批判运动。小说、诗歌、戏曲、电影、音乐、文艺评论、美术、舞蹈等领域，无一幸免。

奇文今考

下面是一份资料,记载的是 1964、1965 年两年期间重要文艺评论、文艺批评的一小部分目录:

1964 年:

(1)《革命的人情味和反革命的人情味》(罗大冈,载《文艺报》第 5 期)。

(2)《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刘绶松,载《文艺报》第 4 期)。

(3)《时代精神与典型问题——驳周谷城等的错误观点》(魏巍,载《光明日报》,9 月 11 日)。

(4)《浸透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早春二月》》(若湘,载《文艺报》第 8、9 合刊)。

(5)《究竟谁是我们时代的主人?》(王春元,载《文艺报》第 8、9 期合刊)。

(6)《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关于〈三家巷〉、〈苦斗〉讨论综述》(佐平,载《文艺报》第 10 期)。

(7)《〈父子〉宣扬的是什么思想感情?》(艾克思,载《文艺报》第 11、12 期合刊)。

(8)《“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文艺报》编辑部,载《文艺报》第 8、9 期合刊)。

(9)《“现实主义深化”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复活》(钱光培,《文艺报》第 10 期)。

(10)《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制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文艺报》资料室,《文艺报》第 11 期)。

(11)《人性论思想不容辩护——同〈北国江南〉的一些辩论者们辩论》(《赵雨荫:文学评论》第 4 期)。

(12)《把文艺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社论,7月31日)。

(13)《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红旗》社论,第8期)。

(14)《用阶级调和思想毒害青年的小说》(《中国青年报》,9月1日)。

(15)《关于小说〈邻居〉的再讨论》(《吉林日报》,9月16日)。

(16)《陆文夫的翻案和自我吹嘘——读陆文夫给〈文艺报〉编辑部的一封信》(《雨花》,第9月号)。

(17)《〈‘强盗’的女儿〉不值得赞扬》(《解放军文艺》,第11月号)。

(18)《一株借古讽今的毒草——评〈杜子美还家〉》(《北京文艺》,第11月号)。

(19)《〈赖大嫂〉的问题在哪里?》(《山西日报》,11月17日)。

(20)《〈大地的青春〉宣传的是什么路线》(《辽宁文艺》,第11月号)。

(21)《必须清除〈文谈诗话〉的流毒》(《大众日报》,12月9日)。

(22)《〈李慧娘〉——一株毒草》(邓绍基,《文学评论》第6期)。……

1965年:

(1)《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繁星,《北京日报》,2月18日)。

(2)《资产阶级阴暗心理的自我暴露——批判舒群短篇

小说〈在厂史以外〉(宋汉文等,《文艺报》第2期)。

(3)《怎样看待〈在软卧车里〉这篇小说》(钱光培,《文艺报》第1期)。

(4)《我们和康濯同志的根本分歧——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一文》(项红,《文艺报》第一期)。

(5)《为谁写挽歌?——评历史小说〈广陵散〉和〈陶渊明写“挽歌”〉》(颜墨,《文艺报》,第2期)。

(6)《为什么必须批判〈不夜城〉?》(管大同,《文艺报》第7期)。

(7)《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文艺报》11月10日)。

(8)《反对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阶级调和论》(杨耀民,《文学评论》第3期)。

(9)《〈上海屋檐下〉是反对时代精神的作品》(卓如,《文学评论》第3期)。

(10)《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毒素的作品——批判电影文学剧本〈亲人〉》(《电影文学》第1、2期合刊)。

(11)《〈文学评论〉的问题在哪里?》(《文学评论》第1期)。

(12)《对〈文艺报〉的几点批评和建议》(读者来信,《文艺报》第2期)。

(13)《从〈戏剧报〉的几篇社论看它的编辑思想》(读者来信,《戏剧报》第2期)。

(14)《〈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人民日报》12月19日)。

.....

上述目录所列文章数量比起当年充塞全国各种报刊的大批判文章用“九牛一毛”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以“左”倾思想为基础的文艺大批判，使文艺界百花凋零，文艺工作者们噤若寒蝉。他们被戴上或可能被戴上的帽子太多了，另有一份材料实录于下：

第一，“反党、反毛主席、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树碑立传”者：《刘老丹》、《六十年的变迁》（第二部）、《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小城春秋》、《朝阳花》。

第二，“歌颂错误路线，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者：《红旗谱》、《播火记》、《我的一家》、《风雨湘江》、《晋阳秋》。

第三，“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者：《三家巷》、《苦斗》、《火神》、《大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苦菜花》、《文明地狱》、《在茫茫的草原上》、《山高风云录》、《三月雪》、《变天记》、《山河志》、《普通劳动者》、《我们播种爱情》、《工作着是美丽的》。

第四，“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上海的早晨》、《在和平的日子里》、《乘风破浪》、《风雷》、《在田野上，前进！》、《香飘四季》、《金沙洲》、《归家》、《水向东流》、《过渡》、《南行记续编》、《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勇往直前》。

第五，“丑化工农兵形象，歌颂叛徒，美化阶级敌人”者：《红日》、《暴风骤雨》、《破晓记》、《桥隆飙》、《屹立的群峰》、《红路》、《源泉》、《清江壮歌》、《辛酸地》、《铁门里》、《战斗到明天》（第一部）、《长城烟尘》、《新四军的一个连》。

第六，“大写所谓‘中间人物’，反对塑造工农兵形象”者：《下乡集》、《三里湾》、《泉洞》、《丰产记》、《李双双小传》、

《山乡巨变》、《东方红》、《桥》、《我的第一个上级》、《高乾大》。

这份目录所列,仅仅是小说这一种文艺种类的一个部分,堪称挂一漏万。然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如实记载,以供未来世纪的人们考证。

●杨献珍的“哲学罪”

自投罗网

早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就对席卷全国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有不同看法。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深感这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也就是在“大跃进”风正盛之时,1958年11月19日,他在中央党校对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学员的讲课中,指出:“大跃进”中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是被冲昏了头脑的法条,“现在我们有些人就认为,主观能动作用是万能的,只要能够想到的,就能够做到。”他以哲学家的逻辑断言:“离开一定的物质基础空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是没有办法发挥的!”

此后,在1959年初、6月12日、7月29日,在许多会议上,他再三重申自己的观点。他甚至说,有些地方“大跃进”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

他的所有这些言论,理所当然地被当时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康生所关注。庐山会议以后,康生立刻布置中央党校党委对杨献珍开展批判,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竟延续了八个月之久!杨献珍没有逃脱“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康生

认定，杨献珍和彭德怀是一样的，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杨献珍被迫递交了《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书。不久，他由校长降为副校长，成为党内反右倾运动的“高级牺牲品”。在1962年初，经复审，他被平反。

但是，他的更大的灾祸在后头。1962年，党的基本路线已经转向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警告在报刊、广播中反复宣传，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正在逐步升级，这一领域从建国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前哨和主战场。文艺界的批判已经全面展开。这种严峻形势的原因，在后来被有些国外学者评论为，是“许多知识分子提出来的理论和观点被毛泽东主义者看成是支配着党并实际上支配着整个中国社会的‘修正主义潮流在思想上的反映’”。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献珍又旧话重提。1962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东教室给学员们作了长篇报告《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他针对在实际生产中仍然普遍存在着的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再次发出抨击。他的观点不变：这仍然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产物。这样，他大讲辩证法的基本常识：“快与慢、级与急、劳与逸、苦战与休整，都是对立的统一，就是说，对立的双方都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抓住一头，丢掉一头，就是片面性，就是破坏了对立的统一的规律，同时也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就是在这一天，他在给学员的一份材料中，第一次提出“合而为一”概念，并说明道：“对立统一、合二而一，是一个意思。”在第二年4月3日，他在给学员的讲课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命题。

此后，“罪恶”生成了。如果说它最初是一场争论的话，那是杨献珍首先挑战的。然而，他立刻被人抓住把柄，争论变成了一场剧烈的批判。或许他的言论不合时宜，或许他的言论过于直截

了当,总之,在如此严峻的意识形态形势下,杨献珍的举动被认为是自投罗网。

当时,党校两位教师听了杨献珍的两次报告以后,深感有道理,强烈的共鸣促使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阐述杨献珍的理论观点。文章被推荐到《光明日报》,在5月29日发表。此事杨献珍本人全然不知。而在清样出来以后,康生和由关锋等人组成的“反修哲学小组”分别搞到一份。

关锋惊喜不已:

“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

在和康生商量以后,他立刻布置写反驳文章,于是,6月5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上出现黑体字为标题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署名项晴。

当晚八时,康生到人民大会堂出席现代京剧观摩汇演开幕式。他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与《“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两文转给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请您转给主席过目。”

6月8日,毛泽东作出了反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康生的指示很快传达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作为一场批判运动,还成立了领导小组,专门腾出一栋小楼作为临时办公室,下设材料组、调查组、批判组。

康生向《光明日报》社负责人面授机宜:“现在形成了学术争论的局面,很显然,‘合二而一’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辩证法的。不过,你们要先引发大家讲话,把观点都亮出来再说。”

又是“引蛇出洞”!

经过严密布置以后,1964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党校理论班学员的文章,先点了哲学教研室主任的名字,予以

痛斥。这立刻使党校几千人感到极度震惊，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但无人敢对此议论。“文章有来头”是人人心中有数。

“黑后台”——主要的批判对象杨献珍曝光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在康生的亲自安排下，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王中、郭佩衡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文章是经过艾思奇、范若愚等参加的中央理论小组反复讨论修改的。对此，康生的解释是：

“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

这就是“商榷”的真象。

屠场森严

屠刀砍下来了，杨献珍只有挨宰的份。

7月24日，康生在钓鱼台会议上，一口咬定杨献珍事先看了那两位教师的文章（指《“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他说：“现在有个动向，很值得警惕，有人想转移视线……我们要以‘合二而一’坐庄，举一反三，联系其他问题，在政治上一定要联系杨献珍1958年反三面红旗的言论和1962年的翻案问题、鼓吹单干风问题、办校方针问题、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要往政治上发展。”他指出，要把这场“争论”与“思维同一性讨论”等联系在一起。他下令各报刊一定要“从政治问题上批判”。

8月4日，中央党校召开全体学工大会，艾思奇认定，“杨献珍始终用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用矛盾调和论反对对立统一规律”。从8月17日起，范若愚向党校学工讲了三个半天，说：“1959年到1960年对杨献珍的批判不是过火了，而是不彻底。”这个报告的录音在北京的17级以上干部中广泛播放。事后，有

人谈体会说,这个报告“是一次极其生动的阶级斗争课,对当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反动哲学思想很有作用,报告用铁的事实,揭穿了杨献珍同志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丑恶面目,提高了政治嗅觉和阶级觉悟,认识了杨献珍反党反毛主席的反动本质”。

这次会议的结论是:“批判‘合二而一’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红旗》杂志要发挥作用,起草一篇指导全国性批判的重要文章。为此8月24日,在中央党校主楼会议室召集各路“诸侯”讨论,与会者除了《红旗》杂志编辑人员之外,还有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人,这实际上是一次批判会。

会上,有人揭发:“杨献珍恰恰在这个时候抛出他的‘合二而一’问题,决不是偶然的。他历来同党唱对台戏,同毛主席唱反调。他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遥相呼应,反对三面红旗,他是屡教不改!”

会议频频逼迫写《“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两位教员交出杨献珍改过的清样:

“为什么不把清样交出来?”

“为什么销赃灭迹?”

“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

会议持续到午夜,第二天晚上八点钟继续,还是要求揭发杨献珍的“反动”问题,会议又开到后半夜。

8月3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以“本刊报道员”名义,发表《哲学战线的新论战》,文章断言:

“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月23日,康生召集全国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这是把批判运动全面推向全国的步骤。他断言:从5月29日发表两位教师的文章以来,已经一百多天了,“看看各省市赞成‘合二而一’的是些什么人,”“杨献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党,我们批判‘合二而一’也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叫针锋相对。”

他特别强调说:“这次批判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包括的地区很广泛,从北京到穷乡僻壤,从首都到公社,没有一个省份没有这个问题的。范围从大学到小学,从文化界到工厂商店,从党、政、民,一直到军队……斗争很激烈,又很复杂。他们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主席的。今后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还会发生。”

于是,全国范围,各个战线都行动起来了。据统计,到1964年底的七个月时间内,各地主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达500篇,许多文章的作者是工农兵。各地党校、高校、共青团、人民团体、公社、报刊编辑举行座谈会,痛斥野心家、反党分子杨献珍。

中央党校的批判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各支部、各处、各教研室被分配专题,组织专人,搜集材料,写成发言稿,送校一级审查,审查时进行试讲、试演,以加强现场气氛和火力。

对杨献珍的面对面批判大会持续了整整七天,他被安排在后台体息室里,并不是为了照顾他,而是人们认定他不配坐在主席台上,也不配坐在会场上。会场上气氛极度紧张,各单位一律点名整队入场,按划分区域人坐,俨然如军队士兵开会。

杨献珍在这几个月个中经受着无休止的小会逼供、中会审讯、大会批判。只要有人踏进他的家门,一定是专案人员前来促他交代问题。

株连十族以上

到1965年3月1日,批判运动达到新的阶段。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向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结论是:“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其主要罪名是:

- 一、“反对毛泽东思想”;
- 二、“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
- 三、“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 四、“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
- 五、“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
- 六、“同彭德怀一道反党”;
- 七、“站在赫鲁晓夫一边”;
- 八、“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
- 九、“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
- 十、“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报告》提出撤销杨献珍的党校副校长和校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9月24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并同意撤销杨献珍的职务,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文革”开始后,杨献珍被扯进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再加上上述罪名,一齐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和“大叛徒”的帽子,被频繁揪出来批斗,“喷气式”、“下跪”、“戴高帽”等各种花样翻新的凌辱和折磨降临到他的头上。1967年5月18日,他被囚禁起来,四个月,由康

生亲自下令，正式逮捕入狱。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人，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8年，1975年出狱后又被流放到陕西潼关达3年之久！一共11年！

受杨献珍冤案之株连，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多人。其中，原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迫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身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投井自杀身亡。

那两位写《“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文章的教师，一位被遣返到吉林长春市，没有单位肯收留他，最后在菜站卖菜；另一位被发配到偏僻的山沟里。其他被“引出洞”的人，有研究班学员、普通班学员、理论班学员和教工，他们被定了各种罪名：“合二为一”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双料特务等，大部被赶出中央党校。对此，康生下令，要化整为零，不允许有两个人分在一起，以免勾结串连。

到最后，形成“合二为一”集团概念，把这些人统统网罗进去，像没有支持过“合二为一”的韩树英、早已调走的朱明以及一批不相干的行政干部也被划入其中。这些人和杨献珍一样，在“文革”中再次经受煎熬。

在全国，因为“合二为一”案受到迫害的人难以计数。这些大都是被引出“洞”的。当时，各报社有令，凡是赞成杨献珍“合二为一”论的文章和读者来信，要专门写出材料，列出作者地址、单位和文章题目。康生要各省列出这些赞成杨献珍观点文章的作者名单。各省都向报社索要，报社早已记录在案。这些作者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海军航校一教师写过一篇关于“合二为一”文章，寄给报社，报社竟将文章转回航校领导，此教师被打成杨献珍的“孝子贤孙”，不断被批斗，最后被开除军籍，赶到农村。

广东一作者寄给报社的稿子，被报社转回原单位，由此，他

变成“杨献珍的黑干将”，被关押许多年。

江苏有一“五好”战士，因写过同意“合二为一”论的文章，竟被判刑处死。

事过十六年，杨献珍劫后余生，悲愤地斥道：

“历史上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的学生。而‘合二为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为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这种大规模地株连，“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1980年9月4日，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为杨献珍彻底平反。

受尽凌辱：大经济学家孙冶方坐牢八年：

1964年8月10日，海城天津，酷暑达到极点，空气似乎一点即燃。市委会议室里，虽然电扇开到最大限度，但热气依然不散。

这里正在举行部分经济学者关于再生产问题的座谈会。这个会议是由《红旗》杂志编辑部召开的，参加者既有天津学者，也有北京来的学者。会议实际上是由总编辑陈伯达一手操纵，主要批判经济学家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

这时的孙冶方，虽然身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但已被扣上鼓吹“修正主义利润挂帅”、“修正主义企业自治”的帽子，日子很不好过。

对他的批判由陈伯达操纵，决不是偶然的。在1962年，陈伯达曾经起草过一个关于财经工作的《报告》(草案)。孙冶方认为其中有许多不妥当、不正确之处，就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指出，陈

的报告忽视了流通环节对促进生产的重要作用,过分强调生产环节作用,他还指出了《报告》(草案)中许多常识性的提法错误。陈伯达看到这份书面意见,亲自打电话给孙冶方,召他前来,说“这份意见提得好”,但在其内心深处,却因为被孙冶方无意揭穿了“理论权威”的底子而怀恨在心。

在天津座谈会上,孙冶方听着许多同行的发言,深感痛心。这些发言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平等的学术交流,不是扣帽子,就是打棍子,有的人恐怕连孙冶方的文章和理论观点还没有弄懂,就大放厥辞。孙冶方也不是不明白,这场批判本身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更不是纯粹的个人之间成见所致,而是严峻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所决定的。

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问题的调子被越提越高,学术界、理论界的气氛越来越恶劣。毛泽东和党中央一再发出《指示》、《批示》,提醒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形势,各主要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号召学术界、理论界人士行动起来,肃清所有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思潮的影响,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

而实际上,早在1961年,在康生、陈伯达等理论家的策划下,经济学界的批判已经开始了。孙冶方一贯主张的理论观点几乎都受到不点名的批判,起初是关于价值、利润、奖金、企业自治问题的专题批判,之后,调子越来越高。康生有次见到孙冶方,狡黠一笑,说:

“听说你在经济学方面有许多新的观点,可以打份报告嘛,我负责给你转上去。”可是,当孙冶方提出一系列研究报告以后,康生竟然说:“小小的一个经济所长,竟敢鼓吹利润挂帅!”

孙冶方是一位正直的理论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许多问题早有自己的看法,尤其在“大跃进”时期,他针对那种

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群众性生产运动极为不满。他公开表达自己的疑问。

有人回答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只要有了钢，亏损或盈利都无关紧要。”

他立刻反驳说：

“这是偏见！社会主义绝不是不讲价值。忽视价值是30年代苏联经济学中的自然经济论的流毒，这样干，不是把老本都要吃光嘛，不是坐吃山空嘛！”1959年，他下到农村调查，吃惊地发现集体食堂的严重浪费。他和一些同志交换过看法，发现许多人都有同样的认识，但是缄口不语，生怕提出疑问会被牵扯到对“三面红旗”的政治态度上，孙冶方却敢于直言，他支持经济所同志写报告书，并亲自上书中央，建议撤销集体食堂。

在1961年，他看到企业状况江河日下，不讲效益，便大声疾呼：“为利润恢复名誉！”

理所当然地，在全党反右倾运动中，他的言行受到极其严厉的批判。

这一次，他肯定在劫难逃了，但他剧烈抗辩：

“我主张赤裸裸地交代自己的观点，想了什么，就说什么。我不管有的同志一讲到资金利润率，就说是修正主义观点，这样就无法讨论下去。尽管人家在那儿给我敲警钟，提醒我，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但我要申明，我要的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要资本主义的……如果大家把我驳倒了，我坚决地、彻底地检讨，该戴什么帽子我自己戴……这对我来说是遭遇战，我应战！”

批判者的火力仍不减弱，并且不择手段，抓取孙冶方坚持“反动的修正主义观点”的证据，在激烈的辩论中，有人责问：

“那么，你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依据的是什么规律？”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孙冶方脱口而出。

责问者抓住了把柄，得意至极：“嘻嘻，恰恰相反，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起作用的偏偏不是价值规律，而是使用价值规律。”

孙冶方的“价值规律第一条”观点，连同他曾经递交过一系列研究报告，被综合起来，康生、陈伯达据此给他定了一顶吓人的帽子：

“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各种各样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连天津会议那一次，共达 39 次之多！

迫害又升级了，而且到了极其荒唐的地步：孙冶方为所长的经济研究所被下令停止日常研究和有关活动，全所人员统统下放农村，搞“四清”；与此同时，工作队进驻了经研所，对孙冶方“穷追猛打”。因为在庐山会议以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的“文臣”张闻天被撤职以后，名列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之职，批判者们又提出“孙冶方、张闻天反党联盟”的指控，发动人们揭发，把经济所的许多科研骨干打进这个“联盟”之中。

对这一切，孙冶方顽强抵制，坚决不从，之后，被戴上“态度恶劣”的帽子。1965 年秋，他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强制下放到北京郊区周口店韩继大队，接受劳动改造。

“文革”开始以后，“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帽子要让出来了，留作他人用，孙冶方被戴上“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还因为他在莫斯科留过学，被打成“王明小宗派”的成员。

1968 年 4 月 4 日夜。

春满人间，孙冶方锒铛入狱，被关进著名的秦城监狱，而且

“享受”单人牢房的待遇。不准看报，不准写字，除了审讯者和管教者之外，任何人不准见；他经常被在半夜里提出在受审，要他交代自己罪行，交代他人的罪行。

他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八年！

被放出来，又被警告说：“要老实做人！”

1976年，江青在大寨的讲话中，又点了孙冶方的名字，说这个人“又要翻案了！”

此案，于1979年以后才翻过来。这一年，党中央为孙冶方彻底平反。

含冤自尽：大历史学家翦伯赞挨斗百余次

六十年代上半期，意识形态的另一位著名牺牲品是历史学家翦伯赞。和批判杨献珍、孙冶方一样，这样的批判总被引伸到对被批判者涉足学科的“修正主义理论、观点”的清算和肃清。这几次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一起构成了当时学术界、理论界“左”倾思潮泛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学术、理论发展的窒息程度和对知识分子的压制程度，丝毫不亚于文艺界的情况。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的轩然大波还在扩散。12月，出现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署名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戚本禹。文章公开点名批判了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翦伯赞。序幕就此拉开了。

最引人注目的一幕是在第二年3月份出现的。又是这个戚本禹和林杰、阎长贵合写一篇文章，仿效毛泽东在1957年夏天的气势，标题为《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这篇文章在《红旗》杂志第4期和《人民日报》3月24日同时发表。这位历史学家被戴上的帽子是：

“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

也在这篇文章中，把翦伯赞在 1962 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 1964 年发表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翦伯赞被列出六大“罪状”：

“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因为他曾经主张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1962 年）；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因为他主张不要把农民战争领袖理想化（1961 年）；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因为他提出要正确看待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1959 年）；

“鼓吹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为他说过“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1951 年 2 月）；

“反对以论带史”，因为他提出“观点与史料的统一”（1962 年初），主张废除“以论带史”（1962 年）；

“反对古为今用”，因为他说过“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1952 年 9 月）。

这是一场真正的旧帐、新帐一起算的批判，不仅断章取义，强辞夺理，还振振有词要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观。

也就是这场批判，与“文革”的正式爆发紧紧联系在一起，翦伯赞因此被施加更疯狂的迫害和打击。

1966 年 6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又给翦伯赞扣上许多帽子：“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反共老手”、“蒋介石的走卒”。

1968年夏天，翦伯赞和老伴被赶出家门，拘留在蒋家胡同的一间黑屋子里。这些日子批斗他的，不再是大学里的同行、学生、领导，而是一群接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他整天被迫听着这些嘈杂的声音，脸上还必须装着十分虔诚、服从。

更大悲剧很快降临了，而且是一种骇人听闻方式出现的：1968年11月，驻北大工宣队、军宣队向这位教授宣布他被“解放”的消息，并安置夫妇俩到北大燕南园居住。但仅仅在四天以后，中央专案组一彪人马忽然杀到，对翦伯赞再次施以昼夜逼供。这次的主题却是他与刘少奇在1935年、1936年国共合作谈判过程中的问题，那次谈判被定为刘少奇勾结国民党特务，妄图取消苏区，消灭红军。翦伯赞为促成这些谈判多方奔走过。

原来，这位历史学家的“历史”也大有问题！

在经过半个月的抗争以后，翦伯赞与夫人一起含冤自杀身亡。

1968年12月18日，一个没有星光的寒夜。

这场学述界、理论界的大批判用著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中的一段话来表述，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这篇“社论”发表的这一天，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那一天！

●全面深挖农村修正主义根子

社教：大兵团作战

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总是出现在毛泽东、党中央的神经中枢中。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正是由于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毛泽东才率领中国共产党从农村的穷乡僻壤中走出来，夺取了全国的政权。毛泽东出身农家，以后又不断在农村中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对农村、农民付以的关注是极大的。正因为这样，在他喊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以后，他要求具体布署和展开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教育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

他对农村两极分化的警惕，使他的关注焦点一直在农村阶级问题上，这既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前提，也是必然的结果。

“大跃进”以后，农村形势极度严峻，毛泽东为此深为焦虑。困难形势过去以后，他的焦虑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变了一种。

1962年10月，他在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获知那里在1961年春、秋和1962年春、冬，出现了分田单干的风潮，有二万五千个生产队散伙，不再是集体的了。报告指出：“闹单干的，有地主分子，有富裕中农，也有贫农，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分户单干。”安徽省委也有类似的报告，那里第一批“改正”过来的生产队有六万多个。这些报告所做的结论完全是依照八中全会公报精神的：“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

‘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产生单干风的根本原因是地、富、反坏分子捣乱，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作怪。”

“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毛泽东早就有过这样精辟的人所共知的概括。

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巡视中，毛泽东大为不满，事后他回忆说：“跑了几个省，只有子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和延春（湖北省委书记）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

在毛泽东看来，农村形势的严峻和地方领导的疏忽，两者之间的程度差异实在太大了。这是难以容忍的。

第二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主题是城市“五反”问题、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中小学工作条例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起农村形势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手头有两份重要的经验报告，都是农村的，一份是湖南省委的。在那里，从1962起，就将“反单干”转向“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制‘黑风’。”

“湖南报告很好，各位都要好好研究。”毛泽东神色庄重地说道。

另一份经验报告来自河北省保定地区，其经验的可操作性则更强一等。从1963年2月起，那里普遍开展“四清”（清帐、清库、清工、清财），旨在检查纠正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铺张浪费、挪用公款、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行为，以整顿干部作风。这一做法大受农民欢迎。在具体做法上，经验列出了九大步骤：学习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干部检讨交代，查证清理，退赔，建立制度，巩固成果和检查验收。

如果说，湖南经验是针对阶级敌人的话，那么，保定经验注重的是在农村基层干部中狠抓阶级斗争，毛泽东也向会议大力推荐这份经验。他的结论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句名言不久就在全国男女老幼口中流传开来。

在会议上，毛泽东说道：“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如果我们不整风，那些县就要出修正主义。”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似乎没有想到过他后来反复提到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问题。他关注的是基层，是农村。

这次会议立刻作出响应。党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在农村展开“四清”运动，在城市展开“五反”运动。

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展开，毛泽东亲自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政策性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又称《前10条》），讲了十个大问题，其中断言：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企图复辟，打击贫下中农，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利用宗教和反动道门会欺骗群众，有的已经夺取了社队领导权；

（2）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3）商业上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

（4）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出现；

（5）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有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为非作歹

.....

这是毛泽东发出正式的阶级斗争严重化警告以后,对社会上阶级斗争情况做的最为详细的描述。据此,《决定》(草案)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是如此……要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开展‘四清’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决定》(草案)是在5月2日至12日制订出来的。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又称《后10条》)是在9月6日至27日的北京工作会议上通过的。

《后10条》规定了运动的五个要点:

即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其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基本的方针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5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11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这两个文件到全国城乡。于是,“四清”运动在农村就正式展开了。

在中央文件精神影响下,各地把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有的报告说:“现在有的单位虽然还挂着社会主义牌子,但实质上已经蜕化为资本主义了。”这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正当社教运动在农村轰轰烈烈全面推开之时,1964年6

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开始得出了结论:“根子在上面。”

对此,刘少奇表示赞同。7月2日,在河北省地委书记座谈会上,他说:“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然而,这两位党的领袖的想法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实际做法上有天壤之别。也就是在6月8日,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刘少奇附合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

同时,社教形势发展迅猛,8月16日,刘少奇给毛泽东一封信,提出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县委,在省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上万人,声势浩大。”

毛泽东批复赞成,授权刘少奇“统帅”“四清”和“五反”。随后,毛泽东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主持下写出的《桃园经验》上批示,建议推广。9月1日,中共中央把王光美报告转发全党,并在批语中对有些地方许多干部、工作队员有顾虑提出批评,提醒注意那些“四不清”干部及其保护者的抵抗,要及时粉碎。

之后,每个地区的社教都搞“大兵团作战”,集中上万人搞一个县,还展开夺权斗争,清除“烂掉了的”班子。从1964年下半年起,对基层干部的打击面大大地扩展,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四清，决不姑息

在狂热的“四清”浪潮中，许多基层干部、“出身不好”者，遭到灭顶之灾。各基层单位气氛之紧张，后人实在难以理喻。

刘孔炼，江西省都昌县大沙区党委委员、和合公社副书记、黎明大队党支部书记，在1964年初，被人告发到县，说他成份有问题。1965年初，又被告一次。3月，县委工作组进驻，偏听偏信，认定刘孔炼在解放前三年中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25%，定为“漏网富农”。一个基层干部，转眼之间成为阶级敌人，遭到批斗。

刘茂盛，四川重庆石桥公社生产队长，“四清”工作队进驻以后，到处捉“虱子”，抓“敌人”，结果，查到刘茂盛在解放前曾请过少量零工，加上生产队一头老牛在他爱人饲养时死掉了，便被扣上“破坏生产”罪名，成份“上升”为富农，这一程序由工作队下属的政法组私自就决定了。他被要求写“坦白书”，其他群众被强令揭发这个“反动富农分子”，并与之划清界限。他最后被逼无奈，跳塘自杀身亡。

成隆滚、成可学，分别是广东省连县点山塘公社马占大队支部书记和干部，1966年初“四清”运动中，被队里的两位曾经犯错误而遭到处分的人诬告，说成“结成反革命集团”，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工作组干部不辨真伪，轻率相信诬告，把成隆滚，成可学定为“阶级并已分子”，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并宣布其成份是“漏网地主”，对其子女视为“四类分子”进行监管。其后不久，两人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

王妈森，福建晋江县池店公社归国华侨，1965年由香港返乡，时值公社每个大队都进驻“四清”工作队。有人检举他有“历史问题”，“拉拢干部、搞和平演变”，参与抢劫，还有“特嫌”，因为他往返香港频繁，又有录音机、照相机。但都查无实证，工作组难以定案。不久，克服“四清”中的“右倾”活动展开了，他立刻被定

为“坏分子”，材料送呈社教分团，结果被批复定为“反革命分子，监督生产劳动”。一定就是12年又8个月！

……

诸如此类的荒唐做法，不胜枚举，在当时是抓阶级斗争，粉碎资本主义进攻的革命行动，不但得到政策方针的指导，还有具体步骤、方法的规定。工作队若抓不出或抓不多“四不清”分子和各种阶级敌人，则被定为“右倾”。于是，都在开始比赛谁更左，谁更革命，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查获阶级敌人的数量！

这股股“左”风同时也刮到了西藏高原，刮到了藏族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身上。下面就是一个真实、悲惨而又荒唐的故事：

1963年初，内地开始“四清”试点，年底，西藏工委派出工作组到山南地区加查等县调查摸底，结论是“西藏阶级斗争比内地还严重”，推翻了中央原定给西藏“稳定发展、休养生息”的政策。当时，派驻帮堆乡的工作组递交的报告显得调子比较低，没有突出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于是，西藏工委一位负责人亲自在11月底，下到帮堆检查工作。他不相信工作组和基层干部直接找群众了解情况，结果，乡党支部书记兼乡长巴珠被对他怀有成见者诬告七八条“罪行”，这位负责人偏听偏信，对工作组组长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大加斥责，断言：“坏人钻进了工作队肚子里……工作队上了坏人的当……应立即端正立场，彻底转盘子，做真正的革命派。”

很快，巴珠被定为“领主的代理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所有职务，并交由群众监管，财产被没收，全家七口人被赶到又臭又脏的小牛棚里居住，床上只有一条烂脏被子，大部分农具被没收，妻子索朗卓玛经受不住如此严重的打击，神经失常。

在被定性的大会上，巴珠悲忿至极，说：

“如果说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受到上级处分，我想得通，可是说我是领主代理人，我实在想不通啊！”言罢，泪水夺眶而出。

他的灾难牵连到其他七名乡干部，被看成是“巴珠狗腿子”、“左臂右膀”，隔离审查，分别撤职，劝退党，经济上被强令超额退赔。而巴珠上级的一些县、区干部，也因为过去支持过他的工作而招来横祸，被严厉批判。邦堆区副区长央金，因此而被开除公职、党籍，遗送回青海原籍。

自治区工委的这位负责人，以“巴珠案件”的处理作为经验，用正式文件形式，于12月10日，发往全区各处。文件断言：

“类似邦堆这样的所谓‘先进乡’，各地是有一批的。这种一帆风顺、各方面工作都出色、没有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所谓‘先进乡’，必然是先进的反面，一定是阶级敌人制造的假象！……这样的乡，刀把子在狼手里，刀刃在群众头上！”

随之，《西藏日报》以头版头条醒目位置，发表诬告巴珠的“群众来信”，并由区工委加编者按，号召：“把刀尖子对准敌人！”

这样，在西藏各地，揭开了一批又一批“假先进乡”的阶级斗争盖子，揪出许多巴珠式的“钻进干部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坏人”。

在帮堆乡，一些干部从“学习班”、“集训班”里被放出来以后，再也不肯当干部了，因为，巴珠就是前车之鉴！

巴珠在“四清”中被打倒时，仅有三十多岁，他被斥为“钻进羊群里来的狼”，“混进牛群里的狗！”严重的物质贫困和精神折磨，使他迅速垮了下去，头发很快变白了，背也驼了，原来就患有关节炎，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恶化成下肢瘫痪，走路离不开拐杖的支持。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还被当作靶子批斗，几乎死掉。

在“四清”中，巴珠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据说是依据下面

三条：一、巴珠父亲在民主改革前曾经担任过村“根保”（保长），父亲年迈以后，他曾代理过一年父亲的职务；二，他曾经管理过驿站，这里的土地分给五户“穷堆”（贫农）耕种，他是剥削者；三，巴珠在妻弟家里时，农忙时节因劳力少，雇过少量短工，并出租水磨版收取加工费。

1978年12月底，达孜县委为巴珠彻底平反。

第十二章

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酝酿风暴○康生面授机宜
●红卫兵狂飙突进○“红色恐怖万岁”○大串连：北上！南下！西进！东征○老红卫兵小将的反康●打倒一切当权派○万炮齐康：老干部们！老家伙们！走资派们○张春桥喊：夺权！夺权！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全部夺回来●中国正在进行“武化大革命”○江、陈号召“文攻武卫”○广西武斗日志片断○湖南道县放出杀人“卫星”●以“左”反右，越反越“左”○极“左”情结○“反击右倾翻案风”●劫难无所不在○经济崩溃，势难阻挡○教育战线，苦难无边○八万军人惨遭迫害○四域无外交○疯狂的文化围康○谢富治高喊：彻底砸烂公、检、法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有过这样全面、惨烈、深刻的大浩劫吗？一个人成为“上帝”，千万人坠入深渊。分明“左”得登峰造极，却还要以新的更“左”反对“极右”；直到人们活着，却没有生命的宇宙；直到天空荒芜，寻觅无望，深重的夜色中没有一点星光；直到残忍的大地上铺满虚假的欢笑，空气中飘满谎言无耻的绚丽；直到古大陆颠狂、危机成东方的神话；直到浩浩的沉默中，人民不再沉默；直到博大的喧响在地下奔突运行……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酝酿风暴

也许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过去的十数年中，每到夏季，神州大地就变得无比酷热，而在政治形势方面更是如此。1957年的夏季形势、1959年的夏季形势、1962年的夏季形势，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当代历史中的独特的政治气候。到了1966年的夏季，这“政治节令”又准时降临。全国的知识分子、干部、群众从1965年底姚文元的著名文章中，从不断升级的政治大批判中，从愈演愈烈的“四清”和“五反”中，已经感到，必然有一场大风暴来临。当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风暴最后使全国遭到空前的大浩劫。

其实，这场风暴在1966年初就开始酝酿了。早在1964年，为了指导全国的文化大批判、清除修正主义流毒，中央政治局设立了以彭真为首，陆定一为副，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五人小

组。但这一小组对当时浩大的批判运动的看法发生了严重分歧；在扩大会议上，有人主张注重“学术批判”，“不要过头”。会后，在2月4日，根据此次会议精神，拟成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主张“不要象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刘少奇、邓小平对这一《提纲》表示赞同，并派彭真等人亲赴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这时毛泽东在在外地巡视已有两个多月了！

他强烈反对这一《提纲》，并质问：

“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未直接作答。但回京以后，《提纲》被以正式文件形式转发至党，引起全国对吴晗《海瑞罢官》的“学术讨论”。毛泽东愤怒之根，在3月7日至23日的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之后，在多次谈话中，他指责《提纲》混淆阶级界限，颠倒是非。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已经决意要动“外科手术”了。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打成“反革命集团”。据陈伯达后来宣称，这是“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当时毛泽东未回北京，请刘少奇主持会议。与此同时，由张春桥、江青参与，5月8日在《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高炬的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5月10日，《文汇报》推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11日出版的《红旗》第十一期发表戚本禹的《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北京市委于5月13日被彻底改组。

正式的“文革”政策性文件在5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上说，这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其中有不少是毛泽东的亲笔：

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种形势估计和一九六二年的形势估计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更为严重，斗争目标更为具体。

这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五人小组”，重设“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毛泽东批示：这一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党委会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康生面授机宜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燃烧起来，首先点燃的是高校。前几年的“学术批判”已经使那里火药味很重，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对中央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必须从基层开始，这是一项重要的部署。于是康生派其夫人曹轶欧亲往北京大学，鼓励“造反”，从学校领导直到中央，都要造反。5月17日，在离北大南约四里处的西颐宾馆，曹轶欧召见了北大哲学系原总支副书记聂元梓，听

取她对北大情况的汇报和看法时，有如下两段重要插话：

“《五一六通知》是总纲，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

“可以写大字报。”

聂元梓心领神会，立刻回校布置。5月25日下午二时，是“文革”史上重要的时刻，北京大学大饭厅（也就是前几年老校长马寅初“放毒”和“挨批”的所在）出现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大字报直指北京市委，提出极为严厉的指责，声称：“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消灭一切鬼神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大字报一出，北京大学一片混乱，不明真相的干部、知识分子有的还贴出反驳大字报，指责聂元梓等人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

康生把大字报底稿直转在桂州的毛泽东，并在5月31日改组《人民日报》。第二天，便出现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晚上八点整，聂元梓的名字立刻传遍全国。之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进行狂热的鼓动与宣扬，全国各高校都积极行动起来，矛头直接对准本校的领导干部。55所高校、部分中专和中学把学校的第一、二把手揪出来，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了。

学生的动乱非同小可，这在1956年、1957年曾经引起过党中央的高度警惕，此次风潮来势汹汹，大有难以控制之势。刘少奇、邓小平飞往杭州，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大局。

毛泽东手一挥：

“我暂不回京，由你们相机处理吧。”

刘、邓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最后决定，根据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做法，向各基层单位（主要是高校）派驻工作组，替换被打烂的领导班子，指导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的秩序。决定传给毛泽东，毛泽东回复表示同意。

从6月5日开始，北京大部分学校都派驻了工作组。六月中旬，部分中央机关（如中宣部、中国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也派进工作组，其他单位也陆续成立类似机构。工作组依循过去的做法，对前一段时期“造反”的教师、干部、学生进行严厉的批判，又打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刘少奇显然是根据五七年反右的经验，指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但是，尽管工作组工作效率很高，仍遭到学生、教师的反击。群众与工作组的对抗在加剧。到6月下旬，20多天里，北京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而一些学校的工作组也被赶出来，被称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

7月18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突然驶回北京。他对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心中有数。第二天，刘少奇等奉命前去，毛泽东当即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我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急忙下令工作组，停止“反干挠”斗争，于是，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学生、教师获得了解放。这将是一股怎样的力量呢？26日，毛泽东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他下令撤回工作组。

紧接着于8月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距八届十中全会整整四年。有这样一种说法，在这次全会上，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4日,毛泽东指责道:

“在前清时代,以前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到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在中南海大院出现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署名:毛泽东。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正面的摊牌已经发生,“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论断不再是假设性的,两条路线斗争不但早就在进行,而且各有司令部在指挥……阶级斗争、走什么道路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已经直接爆发出来,是谁也回避不了的。他为自己多年以前的预感被证实而

感到充满自信。

8月8日，中央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同时，林彪接见中央文革成员时宣布：“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在头版头条皆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十六条》。

第二天，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向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天，《人民日报》以空前激动的笔调报道了群众向毛主席欢呼的场面：

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通过，宣布：“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红卫兵狂飚突进

“红色恐怖万岁”

早在1966年5月29日，在颐和园的一座小亭子间里，清华附中几位热血沸腾的中学生。商议怎样投入到已经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像毛主席前几年就强调过的，“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他们决定建立自己的组织。叫什么名称好呢？

“就叫‘红卫兵’吧。”高二学生张承志提议道：“意思是做毛

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

大家一致赞同。

于是，在世界学生运动史上永载史册的青年学生组织宣告诞生了！

到六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大附中、北矿附中、二十五中的学生纷纷成立类似组织，但是在随后的工作组进驻以后，这些组织被定性为：“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大批红卫兵成员遭到打击、迫害。被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所鼓动起的年轻人则针锋相对，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同时也招来更大的打击。地院附中和二十五中的红卫兵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于是《再论》、《三论》的大字报在7月4日和27日被贴出来，传遍北京，其中最著名的内容是第一次披露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与此同时，他们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支持。毛泽东早就指出过：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在八月一日，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那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

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红卫兵一夜之间从被打翻在地的现状中翻过身来，成为反工作组的英雄，成为“造反”英雄。在那时，还没有哪个群体、哪个组织有如此辉煌而不屈的战斗历史。

紧接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从8月18日起至11月16日，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达1100万之多。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用万众人头攒动、呼声雷动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

红卫兵为“文革”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证、也是为历史永远难忘的举动，是大规模的“破四旧”。这是“左”倾思潮的最直接的后果之一。

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著名的《人民日报》六一社论又一次提出；而刘少奇在6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

座谈会议上指出：“破四旧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太急。”但是，在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并号召“红卫兵小将们”立刻行动起来。就从这一天起，红卫兵开始了举世震惊的激烈行动。

这一行动先从“改名”运动开始，所有的商店、街道、工厂、学校、公社都必须有一个“红彤彤”的名字。

8月24日，40万红卫兵举行集会，把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街道由“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之后，“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上海《新民晚报》改名为《上海晚报》；天津“劝业场”改名为“人民商场”；杭州“张小泉”改名为“杭州剪刀店”。与此同时，人们的装束也必须加以改变，发动“五剪”运动，即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

8月23日，红卫兵将北京市文化局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在国子监大院中，点火焚烧。火光冲天，热浪扑面，更鼓起他们的战斗热情！

8月27日起，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到9月1日，仅仅三天，这个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为325人，被满门抄斩的有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者出生只有38天。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市，在破四旧中，死在红卫兵手下者有1000多人。

那些“封资修”的玩艺儿当然不能幸免，红卫兵开始了对古旧文物的毁灭性打击。

8月23日，下午，北京体院红卫兵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释迦牟尼塑像。

8月27日早晨,山东冠县红卫兵把武训墓砸得粉碎,挖出其尸体,抬尸游行,然后开审判尸体大会,最后将骨殖焚烧。

与此前后,海南岛上的海瑞墓地被砸烂,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佛像的头被砍掉。

进入九月以后,这场针对文明古物的“斗争”愈演愈烈。据统计,仅在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古迹,就有4922处遭到厄运。而该市各炼铜厂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达117吨之重,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达320多万吨,在各个抄查物资集中点里,挑拣出的字画有18.5万件,古旧图书达235.7万册,其他各类文物为538万件。

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红卫兵的心目中是“活着的四旧”,是“封资修”的“最大的代表人物”,所以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以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有100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民革中央委员31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达13人。这些民主党派在当天接到红卫兵的“最后通牒”,限72小时内全部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乖乖从命,停止办公。

抄家也是破四中的一项重大行动,伴随抄家的,常常是打骂、凌辱和扫地出门。八、九两月中,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轰回原籍者竟达85198人!被抄家者竟有33695户!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全市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教师1231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家者为64056户,抄走文物达17万件之多,那些被抄走的东西,很多并不是文物,而是家具、化妆品、鞋袜、衣服、电视机、钢琴等,堆积如山,最后被廉价变卖掉。至于那些宣扬“封资修”、“四旧”的图书统统在

火海里丧生。那些贵重物品的命运更是悲惨,仅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北京市在抄家过程中就抄出 10.31 万两黄金、34.52 万两白银,5545.99 万现金,61.36 万件文物和玉器。而这一统计是不完全的。据目睹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过后,天安门广场上一片狼籍,有鞋、帽、红宝书,而且竟然还有不少闪闪发亮的金银制品!同样在北京,私房有 52 万间被没收,在上海有 124 万平方米的私房也遭此厄运!

红卫兵的狂暴行动得到舆论宣传的大力支持,在破四旧不久的 8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向红卫兵致敬!》,社论中称: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过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之所以畅行无阻,也由于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的报告《严禁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江青则早在 7 月 28 日的一次会议上就说过:“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8 月 25 日,新华社播发一则新闻稿,详细报道了“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情况,其中被报道

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济南、南昌、郑州、合肥、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成都、南宁、宜阳、西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等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并声称，红卫兵的行动“受到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大串连：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大串连——这是红卫兵在极“左”思潮鼓动下又一次对社会的冲击，对“文革”的推向深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全国规模的内乱也由此而始。

8月16日，陈伯达在接见一部分外地来京的学生时，发出具有诱惑力的号召：

“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随着外地来京学生越来越多，中共中央、国务院索性在9月5日发出正式通知：《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中说：“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高校）、“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中等学校）”、“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支出”、“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从此，数千万人在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说：“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

顿时，各地交通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铁路运输不堪如此重负，每节车厢挤满了人，超员2—3倍，连厕所都挤进6、7个人，

车厢下的弹簧几乎到了断裂程度。

这种大串连当时被称为“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这些学生到北京以后，四处走动，或打探消息，或等候毛泽东的接见。随后他们返回原地，点燃本地区本单位的熊熊斗争烈火。最厉害的是从北京出发向外地串连的红卫兵，他们自诩为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丰功伟绩的“先锋”，每到一地，便以“革命代表”自居。最初，他们遭到那些地区的群众的围攻，像湖北省掀起了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动；在上海，北京学生受到昼夜围攻；在贵阳，数万群众对红卫兵实行包围。但是，局势很快就改观，中央的《通知》给红卫兵串连者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勇气，他们反过来号召当地群众对操纵围攻的当地党政领导展开无情的进攻。最重要的步骤是，他们和当地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声势极为浩大。这些“闯将”们每到一地，都颐指气使，指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现有的地方“破四旧”不彻底，便大打出手，再破一遍，弄得全国上下，鸡犬难宁。

除了批判之外，外出串连的北京红卫兵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发誓，要把全国变成“红色的海洋”。这一想法最初是由北航“红旗”战斗队想出来的，他们个个佩戴毛泽东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们组织各地红卫兵，在数天之内，把全国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统统涂上红油漆，写上大标语，连小胡同小巷建筑物的墙壁也不放过。在商店里、住房里，用红纸剪辑各种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标志，贴在墙壁上，大门也漆成红颜色。在农村则竖起红色大牌坊，那些在破四旧中已经改名的商店、工厂、街道、学校的名称书写，也非用红色不可。这种狂热使得毛泽东的个人迷信逐渐蔓延全国，以致于越演越烈。

到了10月份,新的花样又出现了。

10月25日,大连海院15名学生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旗帜,在风卷红旗的猎猎声中出发,经过近一个月,徒步二千余公里,抵达目的地北京城。《人民日报》立刻做出反应,于10月22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这样,一支支“长征队”组成了。有的队伍索性按着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再走一遍,以继承革命传统,锻炼自己的斗志,做新时代的“宣传队”、“播种机”。这种步行串联的目的地也开始多样化了,不仅仅是北京城,革命圣地都被列入“长征”的目的地:延安、井冈山、韶山、遵义、泸定桥……到11月份,有10万人挤到井冈山,10万人挤到大寨,上万人挤到韶山。时值严冬,寒风肃杀,粮食短缺,道路完全被堵塞。一些地方急电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委立刻动员部队连夜赶制大饼,派出直升飞机,送到大寨、井冈山等地,并空投衣服、毯子等急需品。

由于如此严峻的形势,也由于学生四处串联,有些单位本身的文化大革命显得冷冷清清,中央文革便动员串联师生回学校,参加本单位的运动。北京红卫兵立刻响应,11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誓师大会”上,通过了相应的倡议书。

1966年11月底、1967年2月、3月,中共中央再三发出停止大串联的通知,全国规模的大串联这才慢慢平息下来。

老红卫兵小将的反思

反思之一：

1966年8月是红卫兵的天下。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破四旧”运动。

在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战绩”有：

枪支 268 支，子弹 11,056 发，黄金 103,131 两，白银 345,212 两，现金 55,459,919 元，文物玉器 613,618 件。此外更改了数不清的旧街名、旧牌号……

枪支弹药也许可以算是某种战绩，但用抄家的方式抄来的黄金、现钞等物，无疑是借“革命”的名义对人民财产的非法掠夺。

使红卫兵的形象在世界的眼里变得狰狞起来的，还有对人权、人格的粗暴蹂躏——

8月23日下午，三点半，燥热，憋闷。一队腰扎皮带的女红卫兵，高唱《造反有理》歌，冲进了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先闯入编辑部，把稿子、刊物撕碎；又冲进文联会议室，一边嘴里嚷：“养尊处优”、“精神贵族”、“裴多菲俱乐部”，一边手里的剪刀挨个把一张张皮沙发戳上些大窟窿……紧接着，她们从文联、文化局两个门往外驱赶“牛鬼蛇神”，大院里，四十几个站成一圈，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老“牛”们一个个颈吊黑牌，弯腰九十度。二十几个女红卫兵则站在大圈外，手挥皮带往老“牛”们的脊背上暴风骤雨般地抽打，一下，五下，十下……因为竭尽全力而又力不可支，引起咻咻的喘气和眉梢处的阵阵悸动……一切青春的魅力，泯灭了！一切女性的特征，剥落了！活脱脱变成一台以皮带绞肉的机器。

当打到二十几下时，也站在圈里的老舍，皮开肉绽了，鲜血

淋漓了，两腿麦秸杆一样在那里摇颤。他的眼镜早打飞了，他分不清站在圈外的是人还是兽；分不清脊背上流的是血还是汗；他更分不清自己是在热爱了一辈子、也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还是在油锅滚滚、鬼影幢幢的炼狱……

下午四点半，老“牛”们被红卫兵押解到国子监街孔庙。那里已经堆满小山似的京剧行头——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红卫兵们手持舞台用的木刀，勒令他们将这堆行头一趟趟搬到院子中间。火点着后，红卫兵又要他们在浓烟中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往他们的脑袋上砍去。突然，不知哪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流血了，头破了，真他妈的太嫩！”被称作“老东西”的，正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额头，顺着脸颊，又流进脖子里……

老舍没有措去。过去，他用高度完美的语言，编织了那么多美好的愿望，今天，他以一片凝固的鲜血，为这些愿望赶织了一块猩红色的尸布。

25日下午，他死于太平湖。有人看见，老舍从24日早晨起，就坐在太平湖西岸边，直至下午，身子像是一尊雕塑，眼睛里溢出一股奇特、梦幻般的光。也许先生是在和叠影于湖面上的屈原、田横五百壮士对话；也许先生的心，随着《四世同堂》里被迫穿上白布红字坎肩的祁天佑，在古城漫游，尔后，一直跟着他走进了护城河……

1966年8月的这一场“破四旧”的“红色恐怖”，使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联合国也震惊了！

24日这一天，几十万红卫兵在苏联驻华使馆附近示威，“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九霄。红卫兵将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

几乎在同一时间，溃堤般的红卫兵冲进了教堂，在中央文革

和公安机关的支持下,驱逐了八名罗马修女……

· 联合国讲坛上,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惊惶万状地感叹:

“那种在红卫兵超乎常情、难以理解的制造惊慌和恐惧的活动中发泄的憎恨外国人的情绪,以及中国官方助长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和颠覆的政策和教条,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动乱、最扰乱人心的现象之一了。”

反思之二:

如果说,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揪“五·一六分子”,使“红卫兵”一词变得惨淡的话;那么,1968年春季开始,全国各地大规模进行的“三查”运动,即清理阶级队伍,继而工宣队进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则使“红卫兵”一词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剔除出中国的政治生活。

退潮和涨潮几乎同样快。

一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垮了,红卫兵的命运便注定了——

几千万红卫兵去了祖国的穷乡僻壤,少数的被投进了监狱……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不可测知。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蒿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见彼此都是同样褴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里再想起不久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往事,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

.....

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

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

你可悲,我也可悲。

你可笑,我也可笑。

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后的不安

——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初中的不能念到高中,高中的不能升上大学。因此,才有了1977年胡子拉碴、拖儿带女、空前绝后的一届大学生,才有了今天如走山阴道似的目不暇接的电大、业大、职大、函大、刊大……

——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专业是数学力学的大学毕业生,因为人长得武高武大,被分配去火葬场抬死人;学高能物理的高材生,因为是女的,蒙受了“照顾”,被“照顾”到商店里卖酱油……

——被剥夺了精神生活的自由。不能有歌声,不能有书声,不能用文字和色彩去表达另一种声音。本世纪60、70年代,正当一批又一批的文化、科学里潮,以强大的力量向全世界伸展时,中国的沉寂与桎梏,决不会亚于中世纪的黑暗。

——甚至被剥夺了爱情的自由。多少青年迫于出路不得不将贞操抵押给了魔鬼,多少青年为了生计不得不做起同床异梦的夫妻,多少青年陷于空虚,一边愚昧地去抓别人的“奸”,一边又粗鲁地放纵自己动物性的本能……无疑,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因,自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凑在一起,才有了今天如此众多的“陈士美”、“第三者”,才有了80年代高得叫道学先生们坐卧不安的离婚率。

一旦生命的根系插进了广袤、苦涩的土地,对自我的忏悔就必然延伸到对社会的反思。

一个老红卫兵，曾被江青一伙投入牢房，出狱后他又到祖国北部边陲过了九年艰苦的军营生活。他作这样的思考：

“……用八个字概括自己：虔诚，盲从，幼稚，狂热。好比‘TNT’炸药，好比超级雷管。一经煽风点火，就炸啦！红卫兵明明被人愚弄利用，却自信是绝对正确，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我们起初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最后变成了残酷斗争的牺牲品……”

卜大华，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之一，1967年2月，因“炮打中央文革”被投入囚笼。1968年7月，被下放到陕北插队。他作了这样的思考：

“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乱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最悲哀的莫过于不是所有觉醒了的红卫兵都有资格走向未来。

江南某省。曾任一个地区中学红卫兵司令部司令的黎莲，自1970年起，便对林彪有了怀疑，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抨击。她把自己的看法陆续写在信里，寄给了在部队服役的男朋友。在一次提干的前夕，此人“党性”战胜了“人情”，将这些信交给领导，部队紧接着转给了地方，黎莲以“恶攻”的“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当年她的上百名伙伴们在该地区进行声势颇为浩大的营救活动，1974年的“批林批孔”，使得这一营救有了结果，她与关在监狱里的一批“造反派”给放了出来。粉碎“四人帮”后，她因“打砸抢”的“旧账”，又随他们一起重新收监，在狱中，她散布了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满的“反动言论”，老账、新账一块算，1977年被判处死刑。

这是一笔历史的糊涂账——年青人总是罪人，几朝红人总是红人。

反思之三：

他们从天安门出发，踏过艰辛曲折的历程，又回归到天安门。成千上万当年的红卫兵，在1976年清明，在细雨绵绵的天安门广场，以花圈、挽幛的海洋，以诗歌、短文的滔滔长河，汇聚了自己的思考。

从小到大，人们用公式塑造了这一代人，他们从来都依据某些公式去作出判断与抉择的。等到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脖子上扛着的不是个留声机、复印机，一切活生生的结论都应该由自己去生活之树上采摘的时候，历史的那一场已经降下了帷幕……

于是，1976年10月，无论是处境还是心境，他们都是中国土地上一批最复杂、最独特的人——

一边为祖国与民族的新生唱着赞歌，一边为自己作了那个

时代陪葬的青春唱起挽歌！

他们几乎什么都失去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退回的房子、票子、位子、车子等着他们，他们找不到一条可以落实的政策。将近而立之年，或者已经而立之年，为了在生活中能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来不及喘一口气，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回忆恶梦般的过去，他们得比别人多双份的勇气；走向曙色中的未来，他们得比别人多几倍的辛劳！

（本小节取自胡平、张胜友《历史沉思录》一文。）

●打倒一切当权派

万炮齐轰：老干部们！老家伙们！老走资派们

早在工作组被否定，曾经被压制的群众、干部挥戈反击时，已经开始对各级干部（“当权派”）进行打击和批斗了，他们最初的罪名是“派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

8月23日，地院“东方红”组织一千多人步行到地质部，坚持要批斗曾任驻地院工作组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为此还静坐绝食，以示决心。随后在关锋的指使下，于10月9日，突然绑架了地质部常务副部长何长工。在这前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局长赵如璋、中央外办副主任张彦、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也遭到学生的威逼，要求批斗他们。这是以群众运动方式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最初的直接打击。对此，1966年9月17日出版的《红旗》第12期予以肯定。

“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就是十六条

中所说的第四类。”

在这前两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数十万红卫兵说：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似乎“一小撮”的判断占据上风。然而，事态的变化在瞬间就发生了。先是在湖南，造反派们喊出了惊人的口号。

“打倒一切当权派！”

9月8日，在长沙市“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上，提出的口号是：

“炮打九级司令部”（九级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

张春桥后来说，“全国……到9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到10月2日，著名的《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了，题目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一段话，对“文革”后来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这里的要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概念的正式提出，它意味着大批（而不是一小撮）老干部将被归到这一概念中去，党的

现行组织将遭到严重的破坏。随后,在10月份,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16日,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第一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红旗》第14期又出了一篇社论,题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检讨。而这之前,在张春桥的操纵下,北京街头已经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和口号,还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向毛主席、党中央表决心,要揭批刘、邓。

全国各地立刻掀起一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誓死捍卫“革命路线”的同时,要向“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在吉林省,“彻底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揪出省委内的走资派”口号喊得震天响;在广西,由南宁红卫兵总部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发起,在自治区体育场召集10万人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又是10万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上海,人民广场,四万人聚集在一起,愤怒声讨上海市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随即,疯狂的迫害就开始了:

1967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陈伯达突然宣布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打倒;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点名打倒;

1967年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内,死因不明;

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毒打致死,身上有32处伤……

1966年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在全市游斗示众;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批斗……

福建省的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的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的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的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的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的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

迫害还在升级。1968年7月,在江青和康生密谋以后,提出了一份拟定施以迫害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在194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除有病和死亡的31名之外,被诬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者竟达89名,再加上“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者7名,共96名,占中央委员总数的58.90%!据最后统计,在国家干部中被立案审查者占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副部(省)长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者达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被审查干部达29885人,占总数的16.30%!有11个单位,审查面达30%以上!在上海被立案审查干部占总数的18%!在天津这个数字为16%!

**张春桥喊:夺权!夺权!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
全部夺回来**

在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众批评运动面前,各地区的党的组织机构几乎全部瘫痪。下面摘录的是当时的几段情况汇报:

(1)“天津市党政核心处于瘫痪状态”(1966年12月10日《快报》);

(2)“到年末,仅半年时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

全部陷于瘫痪”(《黑龙江省四十年》)；

(3)“12月下旬,吉林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竟不得不在寒冷夜晚将代表们偷偷转移”(《中共吉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4)“12月底,华东局书记魏文伯要求周恩来请张春桥(此时在“中央文革”任副组长)回上海代理工作,因为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已经被打倒了”(1966年12月25日《快报》)；

(5)12月底,组建不到半年的北京新市委倒台……

也就是在1966年这个寒冷的冬天,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新的看法:“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

在1966年12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说道:

“祝展开全面内战!”

这一天正是他的七十三岁生日。看来,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把那些已经瘫痪的旧党组、旧政府组织统统打烂。

那么,接下去的是什么呢?这在《五一六通知》中早就提到过的:“夺权”!在《十六条》中又提出来:“夺走党内走资派的权”。但那时,只是指个别地区、个别人的权;如今,更高层次上的夺权时机已经成熟了;在中央,已经牢牢地把握住了权力;而在地方上,

尽管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组织已经被打倒了，但权还没有夺，这是一个危险的权力真空！

“全面夺权”的号角吹响了！

首先是在上海，那是毛泽东真正布置文化大革命、构思理想社会的地点。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于1967年1月4日和5日，首先夺权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这两个舆论阵地的占领，对于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应验了要夺取政权首先必须造舆论的英明论断。

过了两天，上海几大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进行整整五个小时，有10万人参加，并发出《第一号通令》，称：从今天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市长。原来人民政府的合法性就此被剥夺了。1月8日，毛泽东对这次夺权行动高度评价：“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一个星期以后，他正式批准这次夺权，赋予其“合法性”。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说：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

“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新生政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夺来的权终于有地方安置了。张春桥们在“公社成立宣言”中叫喊：

“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

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在这样热烈的形势下，各界群众全被卷入“文革”之中。原来因为对原有党政组织的态度的不同（有“保”、“有反”而分成若干派别），如今被要求联合起来，一致对“敌”，去全而夺权。这等于是聚集起一场更大的风暴，横扫一切！

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展开了严酷的夺权斗争，一些地方稍有反复（如广东、江苏、安徽、北京），但很快扭转局势，完成夺权。每一个地方夺权胜利，《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表示欢呼；夺一个，欢呼一个，再夺一个，再欢呼一个。这种欢呼声，从1967年2月2日开始，一直到1968年9月7日，在神州大地上响彻了一年半之久。

请看下面这份资料：

黑龙江省，1967年1月31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东北的新曙光》；

山东省，1967年2月3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上海市，1967年2月5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贵州省，1967年2月13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西南的春雷》；

山西省，1967年3月18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

北京市，1967年4月20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热

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青海省，1967年8月12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青海高原的凯歌》；

内蒙古自治区，1967年11月1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天津市，1967年12月6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海河两岸尽朝晖》；

江西省，1968年1月5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

甘肃省，1968年1月24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春风已到玉门关》；

河南省，1968年1月27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辽阔中原唱凯歌》；

河北省，1968年2月3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华北山河一片红》；

湖北省，1968年2月5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长江万里起宏图》；

广东省，1968年2月21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吉林省，1968年3月6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红日高照长白山》；

江苏省，1968年3月23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天翻地覆慨而慷》；

浙江省，1968年3月28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湖南省，1968年4月10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芙蓉国里尽朝晖》；

宁夏回族自治区,1968年4月12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不到长城非好汉》;

安徽省,1968年4月18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

陕西省,1968年5月1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辽宁省,1968年5月10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东北大地红灿烂》;

四川省,1968年5月13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

云南省,1968年8月13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福建省,1968年8月19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广西壮族自治区,1968年8月26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西藏自治区,1968年9月5日建立新政权,《社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68年9月5日建立新政权,《社论》同上。

祖国山河一片红!

据称,作为这场“大革命”发动者的毛泽东主席看到《人民日报》9·5社论发表的消息时,他安详地点燃一支烟,但并没有吸一口,陷入了沉思。他想到了什么?

那“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年代;

那呼吁《民众大联合》的年代;

那赞扬贫农为“大革命”的“先锋”和“元勋”的年代；
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年代；
那“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年代；
那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年代；

.....

多少艰辛，多少奋斗，就是为了这一时刻吗？

●中国正在进行“武化大革命”

江、陈号召“文攻武卫”

“文革”的烈火越烧越猛，由破“四旧”引起的暴力行动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但造反派们却欢呼这是“红色恐怖”。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便面对各种流血事件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一周以后《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这哪里抵得过在全国上下流传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歌声和吼声。随着“文革”运动的逐步失控，武斗事件和残杀无辜群众的事件不断扩大，神州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大武斗的惨剧，这与左倾的理论大批判一起，构成“文革”的两大主旋律，也是“左倾”达到极致的必然产物。

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发源地上海，就是“文革”的发源地，这构成了偶然的却又是必然的历史巧合。1966年12月30日凌晨，奉张春桥之命，由王洪文主持的“上海革命造反指挥部”调来十几万造反队员，向另一派被认为是“死保上海市委”的群众组织“赤卫队”发起冲击。武斗的地点在上海市市委办公地点

——康平路。战斗从凌晨两点开始，直到六点钟 2 万名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为止，其中 92 人受重伤。据目击者说，那些队员被打得浑身上下都是血。

这之后，武斗事件在全国各地出现，且愈演愈烈。而 1967 年 1 月 22 日和 9 月 5 日，江青、陈伯达则提出了“文攻武卫”口号，给各种暴力行动火上加油。之后，中央办公厅号召学习江青的讲话，全国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文攻武卫战斗队”，到处抢夺军用物资。著名的事件概要如下：

“石河子事件”：1967 年 1 月 25 日和 26 日，新疆石河子地区造反派 4000 余人，冲击武装部门，抢夺枪支。零点，双方发出枪声，造成 5 人死亡，6 人受伤；枪战在白天再一次发生，从武装部门一直打到公共汽车站。这一场战斗，双方共打死 24 人，打伤 74 人。事后，双方互抓对方的人员均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曝尸；

“成都 2 月镇反事件”：1967 年 2 月 17 日，成都工人和学生造反组织提出“砸烂成都军区司令部”的口号，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并不断冲击军区机关，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最后被强行逮捕者达数万人之多；

“青海赵永夫事件”：1967 年 2 月 28 日，西宁市群众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冲进报社，大搞打、砸、抢，活活打死几个人，还抓了不少人。最后发展到对驻报社支左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其中，群众死亡 169 人，伤 178 人；部队战士死亡 4 人，伤 46 人；

“宁夏青铜峡事件”：1967 年 8 月 16 日，康生把宁夏一派群众组织定为造反派，下令驻军对这一派予以支持，同时把另一派打成“保守派”。两派之间发生尖锐对立和冲突，至

8月28日,康生断定这是“反革命叛乱”,下令武装镇压,结果当场打死群众101人,打伤133人;

“西单商场武斗事件”:1967年8月,北京的财贸系统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相互大打出手,许多人员受伤,国家财产也蒙受重大损失;

“宜宾武斗事件”:1967年5月4日起,小规模武斗连绵不断,直到15日演变成大规模武斗,成都有上万人前来支援,伤亡惨重;

“重庆武斗事件”:1967年5月,两派群众组织运用各种常规武器,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嘉陵江飘尸不断;

“河北农大武斗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农业大学两派群众组织大打出手,结果死7人,伤250人;

“武汉武斗事件”:从1967年6月4日起,一直延续到6月30日,武斗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

“青海县武斗事件”:1967年5月4日,一天连续发生三起武斗,涉及人数达7000多人。

“清华百日大武斗事件”:1968年5月30日起,由荆大富指挥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对立的群众组织发动攻击。到7月5日,有3人被打死,4人受重伤。到7月27日,又被打死5人,受伤者达731人。整个学校成为“工事”,烽火连天,达百日之久;

“上海柴联司武斗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挥“工总司”组织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联司”)盘踞的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8时开始,运用弹弓、大铲车、高压水龙头、消防车、船只、云梯、敢死队,拼命进攻。到下午4时,攻下大楼。此仗死18人,伤983人,致残者121人,被押

拘者为 663 人,物资损失达 355 万元,致使该厂停工两个月之久;

“开封武斗事件”:1967 年 8 月,开封化肥厂发生严重武斗事件,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埋;

.....

广西武斗日志片断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祖国南陲,是多民族聚居地。但在“文革”中,武斗事件尤其频繁、惨烈,难以尽述。在此仅录部分日志。

1967 年 3 月 30 日,“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等共 16 个组织共 400 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4 月 23 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组织 400 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又发生武斗;

5 月 2 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又是一场混战;

5 月 25 日,“五·二五”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组织“四·二二”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武斗。到晚上八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 5000—6000 人,直到

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七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

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武斗，从上午7时一直打到下午4时，只是因暴雨忽至才被迫停止，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

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四·二二”派的领导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五时三十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6月13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要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四·二二”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支援，双方互扔石头、砖石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三天，直接经济损失五万多元，双方伤二、三百人，其中重伤住院者一二百人。这只是更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四·二二”组织与永宁公安分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8人重伤，所有户口簿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围攻“四·二二”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农民共600多人，围攻

“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到 2000 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 1000 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未克。

6 月 24 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四·二二”、“火种”大楼，当晚攻克，当场用钢叉叉死一人，有六名“四·二二”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

6 月 25 日，下午五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七时攻进京剧、桂剧、木偶三团。有 20 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四·二二”600 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7 月 12 日，北海市出现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 100 多人受伤，其中重伤 30 多人；

8 月 4 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四·二二”据点，遭到强烈还击，武斗中使用了钢叉、高压木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

8 月 21 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四·二二”派据点，结果，“联指”死 1 人，“四·二二”死 9 人。

8 月 23 日，“四·二二”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武力攻打，光是南宁地专“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十一点，枪声还响彻漆黑的天空；

11 月 29 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 月 22 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 月 24 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 年 1 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

性的大规模武斗；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达到开枪开炮地步，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五月一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抢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

5月20日，“四·二二”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两人，伤20多人，夺走700多支枪，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于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四·二二”码头时，请求炮火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三时多，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四二二”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催泪弹，致使二三百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两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计，仅“四·二二”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名居民被捕，后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三十三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总死亡人数

达 1470 人,被俘者为 8445 人;烧毁房屋 2820 多间,面积为 46 万平方米,使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 6000 万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这样的日志还远远没有终结;也不忍再列下去!

湖南道县放出杀人“卫星”

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

1967 年 8 月 26 日夜,黑漆漆的夜空,仿佛是巨大的黑洞,张着大口,随时要吞噬什么……

在湖南省道县,源山沟。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其他地方疯狂残杀无辜的消息,这里的人们一无所知。

周群,横岭中心小学教员,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哄着了孩子,也迷迷糊糊地要睡过去了。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未等她披衣起来,门被踢开,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冲进屋来:

“起来,起来,开会去!”他们吼道。

母亲只来得及对吓哭的大孩子说一句:“好好带好弟弟妹妹,妈妈去去就来。”就被簇拥着走了。

来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只见四周有数十名民兵把持着,火把熊熊,个个拿着马刀或鸟铳。已经被围在中间的地富及其子女,有 14 人,周群的爱人蒋汉正前一天被抓去,此刻也在这里。周群出身贫农,而丈夫则出身地主;“文革”初期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回老家劳动。

蒋汉正被粗铁丝紧紧地捆着,铁丝深深地勒进肉里。

该出发了。周群还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押到区里去。她

想,最多是办一个集中营,到那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人这里提醒支书说:“蒋汉正还有三个崽仔们。”这支书便又亲自到蒋家,连哄带骗,把孩子也拖到禾坪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不止。

这一群人上路了。他们中间有谁知道,这是在走向地狱!

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被捆着双手,三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

到了木枫山,唐兴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了,不许动。然后,他宣布:

“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们死刑!”

处决的方法是常人万万想不到的,即“丢硝眼”,就是把人推入那些布满山上的、深不见底的溶洞!

开始执行了。

支书唐兴浩点一个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牵过去……

“蒋汉正!”

一声吼叫。这是第三名“死囚”。立刻有两名民兵像抓鸡仔一样,拖起他,往硝眼边走。

“爸爸!爸爸!”

孩子们的呼喊,声声揪人,她想扑上去,但被民兵们恶狠狠地推开。

“蒋文凡!”又是一声吼叫。

这位60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地要讨口水喝。

“哪有水给你喝?”民兵答道。

“我临死前想喝口水不过分吧?从前砍脑壳,还要给三个热包子吃哩!”

民兵们没理他,一把将他推下硝眼。

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三个孩子“妈妈妈妈”地哭得极惨。她只得哄孩子说:“妈妈一会

就回来。”

在硝眼洞口，凉风嗖嗖，阴气逼人，什么也看不见。

这才是真正的黑洞！

“跪下！”两个民兵将周群按在地上，对准后脑门一根钢钎打下去，然后，飞起一脚，踢入无底的黑洞！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到有人叫“妈妈”，她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孩子连同另一个4岁女孩子一齐被扔下硝眼，因为已经扔了好多人，摔在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周群连忙低声说。她大女儿帮她解开了捆手的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也未死，凭着十七、八岁的精力，总算爬出坑去，但立刻碰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藏西躲，不敢去救坑下活着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原来周群和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底层。她惊异地发现她的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处满地尸体，但他们侥幸都活着。

这一家人团聚了？在这无底的“黑洞”！

这里又黑又冷，一家人要坐只能坐在死尸上，要睡觉也只能睡在死尸上。丈夫被铁丝捆住，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一个劲地喊口渴、喊肚子饿。周群听得五内俱焚。

蒋汉正已经精神失常了，他在尸体上不停地走来走去，口中喃喃说道：“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一下就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汉正，你清醒一点，哪来的什么高粱，这是在硝眼里面。”

他听了，立刻不作声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不知过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没有声响了。周群那才8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妈妈，妈妈，我怎么

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她的脸蛋只剩皮包骨头了。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把兄弟俩放在一起，紧紧抱住那已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已经无济于事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咽不下去，头一歪，就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周群一人了！

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把她救出硝眼，刚一出洞，就被炫目的阳光刺得昏了过去。她在“黑洞”里过了整整七天七夜，一身血痂子，头发夹子都生了锈，还不断遭到追捕……

根据湖南省两位记者披露的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证实，周群所在的湖南道县，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

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零陵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份者411人，占24.20%。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10天！

经查，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者达一万四千余人！

杀人手段有10种：

(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杆、三眼炮等；

- (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镰刀、菜刀、稿蹠等;
- (3)沉水,含沉塘、沉河(又称“放排”);
- (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 (5)投岩洞,一般辅以刀杀;
- (6)活埋,基本上埋在废窖里,又称“下窖”;
- (7)棍棒打,含锄头、月耙、扁担等;
- (8)绳勒,含勒死、吊死;
- (9)火烧,含熏死;
- (10)摔死,主要应用于未成年孩子。

据统计,类似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当时在全国有七大起,本文所述事件为其中最大的“卫星”。

●以“左”反右越反越“左”

极“左”情绪

在极“左”已经登峰造极的“文革”中,还连续不断地掀起反“右倾”浪潮。一切被认为有碍于运动发展,有碍于群众动员,有碍于批判斗争深入的言行,都被认为是右。

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极“左”的多棱镜下,什么都是右倾!

1967年2月的“大闹怀仁堂”,被斥为右,那些乘本单位领导成为“走资派”而靠边站之机,为自己前几年蒙受的不白之冤提出申诉的,也被斥为“右倾翻案”,如此等等。

全国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至少有两次。

1968年,各地夺权之风正烈,一些“革命委员会”牌子纷纷挂出以后,《人民日报》等报刊不断发表社论致贺。从4月份起,

字里行间就开始出现了反右的迹象。

4月10日，在祝贺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抹上一片红色的社论中，就有“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的字样；第三天，在另一篇祝贺社论中特别语气强硬地写道：

“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

以后，“反右倾”的声音不绝于耳，一直到五六月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文革”风暴涌起之时，全国各地全部行动起来，以红卫兵为先导，一大批群众性造反组织纷纷涌现，中央对红卫兵的支持，也自然引申出对其他群众组织的支持。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这些群众组织都是在造反的形势下出现的，但是，怎么造反，造谁的反，造反以后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上，矛盾、对立、冲突不断发生，以致于相互之间大打出手，甚至动枪动炮，武斗不止。

这种严峻局面，对“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一种不利因素，也不符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毛泽东一贯认为，在所有对立因素中，“权”是最核心的因素。所以，在他号召打碎旧的党政机器、建立新型机器的过程中，各群众组织，必须联合起来。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介入，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都是“大联合”的产物。但问题接着就出现了，因权力分配不均问题，又引发了更严重的冲突，从而导致了新一轮的武斗风潮，杀得天昏地暗。

毛泽东、党中央曾经号召过要反对“派性”、“求大同存小异”。当时各派群众都能朗朗上口的一条著名语录是：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但语录是语录，派仗是派仗；该打的，还得打下来，直到打得头破血流，尸横遍野。

196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用了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标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文中还传达了“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方法在这里的运用，意味着，已经掌权或进入各地革命委员会班子的某一派就是革命派，而其他派别就是非无产阶级派了。谁是谁非，如此明了。怎么去做，在社论中也指点得清清楚楚：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绝大部分群众组织或派别都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时间，文斗、武斗又起来了。这种派性的复萌，立刻导致一场声势浩大“反右倾”活动。其核心是，过去曾经对派性的抵制与批判被认为是“右”，是“右倾”；它还牵涉到对已经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和“当权派”怎样结合到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去，当然也涉及到怎样看待在“文革”烽火中崛起的造反派及其领袖，更涉及对“文革”的“大方向”的把握。

在随后的严酷的反右倾活动中，许多群众和派别组织受到严厉迫害和压制。上海发生的“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被称为“右派翻天”的佐证；四川曾经有一派群众组织喊出过“宁要李井泉，不要刘、张”的口号。李井泉是已经被打倒的西南局第一书记，刘

张是靠造反起家的刘结挺、张西挺，他们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已经进入新生政权：省革命委员会。这些群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认为是疯狂地“炮打中央”；在湖南长沙，著名造反组织“省无联”被认为对省革筹委会进行攻击，是死保湖南的黑线。实际上这一组织上提出过许多相当激进的口号和言论，却被认为是“形左实右”；在天津，一些为被打成“反革命右倾分子”的陈里宁抱不平的人，被认为是企图卷土重来，在北京也出现类似事件，统统被冠以“右倾”，被狠狠打击。

这场“反右倾”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军队领导机关。1968年3月，在江青一手策划下，制造出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打倒。随之，“要揪后台”、“再批二月逆流”的口号与铺天盖地，一些中央军委领导人的驻地，整天遭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围攻。接着，“中央军委常委会停止工作”，被林彪指名进京的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这个办事组一手取代了中央军委的工作，正像“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一手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一样。

在这样的“反右倾”形势面前，毛泽东对“文革”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定论。这表明，“文革”之“左”将达到更高阶段。毛泽东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反击右倾翻案风”

更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发生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从11月初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1974年，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被诬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在被囚禁八年以后，释放出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到1975年，他全面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开始对被“文革”风暴打得乱糟糟一团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与此同时，一大批曾经被打倒的老干部被用各种方式“解放”，有的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毛泽东称为“锦里藏针”的邓小平在许多讲话中，都提到过正确对待“文革”问题，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不要忘记把经济工作做好。

他的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就变了形了，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适时做了提醒：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批，刘少奇的路线不大提了。”

这位被林彪阴谋集团的败亡所震惊、精神受到沉重打击的八十多岁老人，一下子警觉起来。他在前不久批林时，就听人说，林彪是形“左”实右，应该着重批他的“左”；毛泽东则判定，林彪不是“左”的问题，也不是右的问题，而是极右的问题。

他一直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言论保持高度警觉。根据他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过好几次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这其中必须夹杂着对邓小平“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的批评。

毛泽东没有出席这些会议，但他为捍卫“文化大革命”的决

心是不可动摇的。

起初,这些批评还只是在高层内部进行,只是提到“翻案”问题。但是,形势很快就恶化了。起因是1975年夏天,清华大学四位校级干部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揭露靠造反起家的迟群、谢静宜各方面的严重问题。而这封信之所以能送达毛泽东,是因为邓小平批转的。

正面的交锋已经不可避免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迟群鼓动清华大学另一位干部给毛泽东写信,诬告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还说,他“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即“文革”成立的办事机构,全面管理全国的教育、科学工作)几年来的工作。”

对此,毛泽东让毛远新代为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但是,在随后召开的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所传达的,却是他的愤怒的声音: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于是,新的一场批右倾运动便告开始,它被定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

周荣鑫被责令检查,并在1300多人参加的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和全校大会上,遭到批判。与此同时,清华校园里大字报举目皆是,为了把这一火种撒布出去,还组织各单位的干部、群众、前

去参观。

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在《红旗》杂志第12期上发表的署名“梁效”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一文中指出的：

“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攻。”

这场运动当然也被认为是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运动，曾被称作“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对于邓小平如此迅速地遭到批判，对于全国社会政治形势如此急转直下，许多干部、群众深感不解，也感到不安。于是，在1975年下旬，大批老干部被召集起来，听“打招呼”。他们听到的招呼是：

党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所以，要对此展开“辩论”。

这一招呼很快传达到各地领导人那里。不久，他们又接到中共中央转发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断言：

“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在这一系列紧张的活动，毛远新及时地整理出《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由中共中央转交下去，为这场运动煽风加油。

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已感人到暮年，多年奋斗的“文化大革命”问题，还需要讲一讲，他在谆谆教导全国人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打招呼，就是为了让人们尽快转弯子，那些一下子转不过弯来的人，要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在2月份，一项项部署逐步展开了。3月3日，中共中央连续转发两份主要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以及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之后，邓小平遭到重重攻击：“是垄断资产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语言公司的总经理”、“国际资本家的总代理人”、“大汉奸”。

江青、张春桥号召：“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所谓“回击”、“反击”，在各个领域中展开了，经济、科技、卫

生、教育、军事、文化艺术、组织人事……无一不涉及到。最后，调子越唱越高，在3月10日，《人民日报》在题为《翻案不得人心》的社论中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张春桥则领着一批文人，从理论高度来总结邓小平现行行为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很快，这成为一种基本的适用原则，被用到几乎所有在民主革命时期起就投身革命的老干部身上，大批刚刚“解放”不久的老干部们，又被“打倒在地。”

这场“反击右倾”运动，使各地刚刚恢复的社会经济形势又陷于混乱之中，派性、武斗在一些地区重新出现，停工停产现象不断蔓延。到1976年四月初，便演变成一场悲剧性的“天安门事件”。那些悼念在当年1月8日去世的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受到百般阻挠，人们不断被提醒不要去天安门，以免上别有用心者的当，但是，前去天安门的群众还是络绎不绝。

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向窗外张望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

很快，“联合指挥部”就成立了，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以备镇压。到4月5日下午，万名民兵、3000名干警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奉命出动，带着木棍包围广场，对群众大打出手，当场有38人被逮捕。之后，仅在北京一地，又拘捕了88人。4月7日，中央政治局议定性，“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结果，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再度失去行动自由。

广大群众遭到严重迫害，被立案审查的“重点线索”有1984条，数万群众被变相审查，如办学习班、隔离审查等。

当时的舆论工具对这一事件进行大量的欺骗报道和宣传，从而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又一个高潮。

●劫难无所不在

经济崩溃，势难阻挡

“文化大革命”在全面推开以后，经济领域也被卷入其中，企业、农村和经济管理部门一片混乱：1967年，周恩来总理召集部分国务院领导人，却连部长、主任都到不齐，因为他们正在挨斗挨批。他痛心地流下了眼泪。

1968年首先是铁路交通受到大串联的冲击，超负荷运转，接送串连群众，以致正常的生产运输计划被严重打击，出现了中国铁路运输史上罕见的混乱。全面的恶果在1967年中期开始显露出来：1968年的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竟然无法制订。

在生产、流通、计划管理各个环节上的混乱，很快在生产统计中体现出来（仅以1967年、1968年两年为例）：

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近10%，1968年在此基础上又下降4.20%，仅为1966年86.6%；钢产量1967年比上年减产32.8%，1968年又减产12.1%；煤1967年比上年减产32.8%，1968年略有减产，但仅为1966年的87.3%，发电量1967年比上年减少6.2%；1968年又减少7.5%；铁路货运量1967年比上年下降21.60%，1968年又下降了2.3%，基本建设投资1967年比上年减少69.25亿元，1968年又减少27.11亿元；财政总收入1967年比上年减少25%，1968年又减少13.90%。据估算，这两年损

失工农业总产值达 1100 亿元！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经济上左倾冒进又出现了，起始于 1970 年 2 月的计划工作会议，各种指标，速度又被订得奇高，虽然本年度一些主要经济指标有所上升，但浪费巨大、经济效益持续下降，比如 1970 年，全国上马施工大中型项目 1409 个，后来全面建成投产仅有 235 个，投产率仅为 16.7%，同时，积累率却大幅度上升，从 23.20% 升到 32.9%，1971 年上升为 30.1%，造成全国人力、物力紧张。这种状况此后持续不断，使国民经济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最后滑到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各种各样的日常必需品都要凭票定量供应。

据最保守的估计，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直接、间接损失达 5000 亿人民币！

教育战线，苦难无边

在“文革”初期，工作组问题上的反复，已经使校园乱哄哄成一片，造反、串联，使学校无正常教学秩序可言。《人民日报》、《红旗》1967 年元旦社论还在鼓吹：“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不久，又号召学生“复课”，但是是为了“闹革命”。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深入下去，学校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这样，在 1968 年夏，往所有大中学校派进“工宣队”、“军宣队”，然而，事态并没有得到制止，社会上不断蔓延的武斗风，最后竟然也刮到神圣高等学府清华园中来了。

到了 1968 年，“教育革命”的口号提出来了，这年秋天，《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意见：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制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由此开端，学校多数教师被说成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或“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与此同时，学校体制、教材课程、教育方法等全面的改造开始了。到1971年，高校的撤并使数量从434所下降到328所。实际上，高校招生在1967年就已经停止了。“开门办学”、“厂带专业”、“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的口号，很快变成具体的“革命”行动。1971年，中共中央正式发文件，确认“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估计”，教育界被彻底翻了个。

1973年秋，又在教育界发起一场反“复辟回潮”、“反潮流”的斗争，接连出现的“黄帅日记事件”、“马振扶中学事件”、“《园丁之歌》事件”，批判连接不断，竟然还闹出张铁生“白卷”事件，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笼罩在教育界的抹不掉的阴影，连学生、教师以及教育制度本身存在的必要性，都成为疑问。这实为古今中外文明史上之奇闻！

八万军人惨遭迫害

1969年4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21名，其中12名为军人，再加上名列军委的军人，军队将领几乎占政治局席位的2/3；另一方面，从1967年3月起，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数百万军人一夜之间取代了相当部分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农村中被打倒的干部而成为革命“促进派”……这一切并不表明“文革”对军队是“特殊照顾”，恰恰相反，这座

“绿色长城”在那 10 年中阴雾久久不散，凶雷不断，遭到严重破坏，上述两个事实只不过表明，这种破坏是以极其荒唐的形式出现的，也说明“左”倾流毒之深之广。

“文革”是以对文艺界的批判为突破口的，而批判的重要武器，则是在林彪的支持下江青通过部队渠道制造出来的，那就是著名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又通过《解放军报》社论的形式公布于世，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则在“文革”爆发之前就被打翻在地，“文革”正式爆发以后，一大批军队领导干部被打成黑帮，在狂热的串联的 1966 年 11 月，进入北京的部队院校师生达 10 万，冲击国防部的事件频频发生。到 1967 年 1 月 10 日，王力等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矛头直指军队高级将领；之后在 2 月“怀仁堂碰头会”上，几位军委副主席和党政干部对“文革”的混乱提出严重质疑，就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涉及到四位元帅、三名副总理。同时，地方上军队领导也受到冲击，军权的夺取早在 1966 年底就被提出来了，先是“砸烂总政阎王殿”，致使 95% 以上的机关干部和直属单位干部被撵出去，极“左”倾向还在发展，到 1967 年 3 月，军队高级将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突然的莫须有罪名批臭。在康生列出的诬陷名单上有元帅 8 名、大将 7 名、上将 18 名。军队中也出现大批冤案，有 8 万多人遭到迫害，1169 人被迫害致死。

在“文革”后期，军队被江青等人“放火烧荒”，指责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连续布置批判经验主义，又声称要揭开“军队的阶级斗争盖子”。军队的训练战备被胡乱安排，恶果严重。

四域“无外交”

1967 年夏天，外交部长陈毅被点名批判，接着外交部党委、政治部被封闭，使外交工作陷入一片混乱，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

形象。

在“扫四旧”运动中，北京红卫兵把清真寺强行封闭，并赶走外国修女。在许多驻外使馆成立造反组织，在国外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竟然在使馆附近的墙上贴出大字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遭到驻在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在另一个驻外使馆，部分工作人员用霓虹灯制成“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的标语。驻在国官员对此提出质问，得到的回答却是：“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在某国援建工程人员在工地竖起标语“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当地政府不同意这样做，这些工作人员便集会表示愤怒的抗议，结果与维持秩序的外国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那些大使、参赞也被作为“当权派”而“靠边站”，有的被强令在使馆招待会上做招待员，扎着围裙，端菜上桌，使客人们目瞪口呆。那些国外群众也不时遭到“骚扰”，或在公共汽车上强行听朗读《毛主席语录》，或被强塞毛泽东“红宝书”和像章，若不接受，便招来一顿拳打脚踢。

最严重的是，在1967年8月22日，北外、北师大、中医大、清华、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造反派组成“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借口港英当局迫害中国驻港新闻工作者，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口，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名曰“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强令英国限期作出答复。得不到回信以后，便冲进代办处大院，大打出手，纵火焚烧了院内的汽车，最后连代办处办公楼也被点着了，火光熊熊，那些造反派还为这种“革命行动”拍手称快。

由于“文革”、“左”倾思潮的冲击，中国在国际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被指责为“不讲文明的国度”、“野蛮的民族”！

疯狂的文化围剿

六十年代初就遭到严厉批判的文艺界在“文革”中更是灾祸连连，江青策划炮制的《纪要》不仅否定了建国后的17年文艺成就，连30年代左翼文艺也遭到野蛮的否定。一大批作家遭受难以忍受的折磨以后，纷纷自杀，如老舍（剧作家）、杨朔（散文家）、闻捷（诗人）、傅雷（翻译家）、周瘦鹃（艺术家）、孙维世（剧作家）、上官云珠（演员），等等，被迫致死者有赵树理（小说家）、邵荃麟（评论家）、王任叔（评论家）等等，遭到批判者有周扬（评论家）、夏衍（剧作家）、林默涵（评论家）、巴金（小说家）等等，不计其数，这些人或是被拘押囚禁，或是被流放，或是被强制劳动，那些曾经在历次批判运动中遭到过批评的人物更是罪加一等，象丁玲（小说家）、冯雪峰（评论家）、萧军（小说家）、艾青（诗人），等等。

伴随着对这些文艺工作者的迫害的是极其凶猛的理论批判，以前被提出来的各种创作理论，不管过去是否遭到过批判，一律拿出来作为“黑靶子”，最著名的有“黑八论”，即：“写真实论”（胡风、冯雪峰主张）、“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主张）、“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秦兆阳主张）、“现实主义深化论”（邵荃麟主张）、“中间人物论”（邵荃麟主张）、“反题材决定论”（周扬、田汉、夏衍主张）、“离经叛道论”（夏衍主张）和“反火药味论”（周扬、夏衍主张）。

文艺界在“文革”中或为江青施展政治阴谋的发祥地和主要阵地。在严峻的“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形势下，文艺界人士无不噤若寒蝉，他们被不断算新帐算老帐。被批判的各种历次会议计有：“新侨黑会”（1962年2月）、“广州黑会”（1962年3月）、“翠明庄黑会”（1962年3月）、“大连黑会”（1963年8月）在高压政治面前，文艺界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创作和文化评论。最后，

在中国的舞台上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两个芭蕾舞剧，一个交响乐。在美术馆里只有一个泥塑（《收租院》）和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谢富治高喊：砸烂公、检、法

“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毫无法律秩序可言。荒唐的政治标准成为调节、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其中，“公、检、法”被砸烂，既是这种混乱现象结果，也是其原因。

和对其他领域里建国 17 年以来工作的诬陷一样，公检法工作被说成是“干尽了坏事”，“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东西”。1967 年 8 月 7 日，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却第一个公开喊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令层层下达。实际上，在此之前，全国各地的破四旧，串联、夺权、武斗、冲击机关等一系列活动，公检法无法从法律上对此加以控制和制止，此口号一出，全国各地立刻出现“砸烂公检法”的狂潮。这是有严重讽刺意味的，以维护正常法律秩序为天职的公检法，居然被不正常的无序状态所吞没！

公检法机关受到冲击！档案被抢夺！公检法人员遭到打击和迫害！

仅在公安部机关，就有 225 名干部、工人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47 人被捕入狱。部长级干部，除谢富治与另一名兼职副部长以外，全数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法院干警，遭受打击迫害者达 34400 多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者 1100 多人，打伤致残者 3600 多人！地方情况仅以陕西省为例，1968 年 4 月起，仅几个月，全省先后有 281 个公安机关、111 个检察院、61 个法院和法庭被砸，被抢走档案 141250 卷，枪支 5800 多支，子弹

50000 多发,有 11 个法院财产被抢一空。

公检法在“左”祸极致时期遭到空前破坏的另一方面是,它被用来作为推行“阶级斗争”的强制性工具,各种专案组遍布全国,非法拘禁、处刑现象到处可见。其集中的标志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规定》(即《公安六条》)在 1967 年 1 月 13 日,被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正式公布,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其中家喻户晓最著名的规定是: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第十三章

冤狱遍布中国

●“血统论”与遇罗克之死●
强者的怯懦○“文革”第一殉道者
○魂断龙潭湖○一个以死抗争家
庭的毁灭●囚后余生日，世上已
千年○将军跳楼，九死一生○民
可杀不可辱○谁来判他死刑●他
们没有活着走出来○共和国强一
要犯○被冤杀的警官○死不瞑目
者●刑场上的枪声○张志新在黎
明前死去○朱守中毁掉高歌去○
老红军临刑前的仰天长叹●天
大？冤大？○集团冤案连绵不断○
欲笑无声：五百“反共救国军”

还会再有这样的世纪吗？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冤狱。从百姓、将军，到堂堂共和国主席，幸免于难者，有几人软？一任时光沉落，无数亡灵依然嘶嘶不止，鸣冤声声：天大？冤大？张志新

为良知与真理代言死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那端庄美丽的身躯，竟被剔成一具白森森的骨架。许长家一家七口，不堪罕见的凌辱，全部悬梁自尽。身经百战的将军罗瑞卿，绝决抗争，跳楼折腿，却依然被扔进柳条筐，抬去进行万人批斗。刘少奇遗体被放在地下室地板上，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变了形……还有那无数制造悲剧者，也尽在悲剧中。可怜我们华夏民族，崩浪般的人造灾难，奔若山腾，凝固成了东方最历史的壁画。

我们，以生者的名义，请未来世界的文明记住——人类历史上有过怎样黑暗的一页！

不是有了枪弹，就可以杀害光明。

不是有了血浪，就可以淹没历史。

不是有了苦难，思想就会死去。

一切都在苏醒和萌动。那隆隆逼进的，正是新世纪的雷声。

●“血统论”与遇罗克之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已经被红工兵们搅得天翻地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出现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是用最简炼的语言表达了盛行多时的“阶级路线”的精髓：出身论（现在人们又把它称为“唯成份论”或“血统论”）。这幅对联一出现，立刻引起一场空前激烈的论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它最后把一位瘦弱、文静的 24 岁青年引向了秋风萧瑟的刑场。

这位青年叫遇罗克。

他当然不是红五类出身,也不是甘做“有问题的家庭出身”重负的牺牲品,这两者之中,只要他择一,就不会有激愤、有热情、有胆量来书写那篇震聋发聩的《出身论》。

1966年12月,北京的许多公共场所出现了题为《出身论》的油印材料,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其实,这个小组只有一人,他就是遇罗克。

在《出身论》中,这位青年抛却了他身边存在着的种种不合理现实的侵扰,也从他自己因为出身问题而遭到的种种劫难中超脱出来,居然沉浸在理论思辨的海洋中;他在据理力争,在旁人看来,似乎是螳臂挡车;他想用软的无力的理论去与严酷的现实相对抗。

他认定:“这幅对联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他认定:“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

他认定:“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这篇文章一公开,立刻引起广泛的反响,辗转传抄,传遍全国。之后,遇罗克又连续发表论述同一问题的文章,大反“出身论”。可是,灾祸已经逼近了。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要员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划定:

“《出身论》是反动的,代表了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

遇罗克显然不知深浅,他居然五次写信给毛泽东,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并要求有机会向中央汇报《出身论》的写作依据。

信一封封发出去,得到的“回音”是一群群陌生同龄人的围

攻,以及跟踪、邮件被拆和朋友被讯问。

这位青年显然也没有想到自己受到如此对待。他从小就立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如今却无用武之地。他虔诚地对一位同学说:“我向往党所领导的战争年代。”他想去轰轰烈烈的干一场,轰轰烈烈地去死一场。

但是,这种“壮烈的时刻”永远不会降临了。

1968年初,冰冷的手铐戴到了他瘦小的手腕上,囚车在寒风中悲鸣而去。

当晚,预审开始了。

遇罗克劈头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审讯者冷静地说:“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

在随后的针尖对麦芒式的较量中,遇罗克坦陈自己的观点,他甚至对当时红得发紫的大人物展开“攻击”:

“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他是一个左倾教条主义者。”

审讯者“嘭嘭”地拍起桌子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遇罗克报之以冷笑。

这第一次预审,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以后,这样的审讯达四十多次,他每次都在抗辩。

这样的态度是令人伤脑筋的。处罚也接近不断地落下来:背铐、重镣、蹲禁闭……

他忍受着极端痛苦的铐罚,只有吃饭时才能打开,被强扭的胳膊疼痛难忍,无法活动,每一口饭要递到嘴边都十分艰难,只好低头,尽可能地低俯下头,久而久之,这位青年背微微驼了,头

发也开始大片大片地脱落，脸色惨白，没有一丝一毫的青春光泽。

新一轮审讯又开始了，遇罗克身体极度虚弱，但声音高昂。

“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的头上，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

审讯员突然说道：

“遇罗克，你顽固透顶！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两分钟考虑后果！”

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两分钟？遇罗克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还没有等到他反应过来“这两分钟”对他人生的重要性，一群人冲进来，围着他坐了一圈，好象在进行“最后的劝导”。

“遇罗克，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他回答。

“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

遇罗克停了停说：

“值得，”他的声音颤抖起来，“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不是被社会歧视的。”

此刻，他想起了作为工程师的父亲和作为私方厂长的母亲，他们的结合已经使组成的家庭成为“有问题的”家庭，在1952年，他们还双双被划成右派，遇罗克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从十六层地狱，跌落到十八层地狱。沉重的出身压力使他在学校里万事难抬头，两次高考都因为“出身问题”而不得录取。这位青年的青春梦彻底破灭了。于是，他写出了《出身论》。

今天，他就要为这篇文章去赴死。他认为“值得”，但他心甘情愿吗？

遇罗克在生死线上斗争着。

终于，他向将要宣判他的法庭提出请求：

“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

他在等待回音。这也就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奋斗。

1970年3月5日，春光明媚的日子，遇罗克和其他囚犯一起被装上囚车，押往北京工人体育场。

八万双眼睛盯着入口处，

囚犯们被押进来了，全场一阵骚动。和其他囚犯一样，遇罗克被剃光头发，脖子上挂着大牌子。

高音喇叭里声声高呼口号：

“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八万嗓子也一起喊出声来，汇成一股宏大的声流，仿佛要吞没这些囚犯。

宣判开始了。

遇罗克身边的一些囚犯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时，不是耷拉下脑袋，就是浑身瘫软下去。

轮到遇罗克了。

他的罪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猖狂的反革命宣传……

遇罗克听清楚了最后几十个字：

“……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喇叭里的声音未落，遇罗克一下子昂起头来。刑警冲过来要押住他，但他拼命挣扎，拼命扭动身子，想摆脱他们，他的力量是

多么的微弱啊！

他被推着往前走，但他死不肯退步，脚上的镣铐锁住了他的双脚，他不肯走，就是不肯走，他不想走向死亡，实在不想啊！

遇罗克最后被拖上囚车。

在全场的激愤群众的狂呼乱喊声中，囚车驶出体育场……

遇罗克的耳边还一直汇集着那股宏大的声流，以致于他根本就没有听见枪响。

眼帘前，一道沉重的黑幕垂下来了，是那样的黑！

耳朵边，一切声响突然消失了，一下子变得那样静！

这位青年的身躯一下子扑倒在地……扑向生他养他的这片大地。

● 强者的怯弱

“文革”第一殉道者

1966年北京的夏天来得特别早，才进五月份，天气持续闷热，而京城的政治气候也变化异常。邓拓在枯坐良久以后，起身把窗子开得更大一些，仿佛要驱散心中的燥热，他清瘦的脸上，神情凝重。

这位前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长，因为某种原因，被派往北京市主管文教宣传。数十年的政治风云使他变得极为成熟，而学者的思维又往往使他把有些事情看待得过于理想化。眼下，他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去年11月，上海《文汇报》抛出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联系到六三年以后，意识形态上的不断批判运动，他知道，这是新的风暴的预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知道

姚文元是有极重要来头的。《海瑞罢官》作者吴晗曾到他那里，气愤地说：

“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沉默，以示抗议。”

邓拓看着这位兼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作家、史学家，只能默默地点点头。是啊，能怎么对他开口说呢？邓拓在许多会议上，反复强调“区别对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要维护党的路线。他对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的编辑说：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未必不知道，他的这种态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他义无反顾，真理总是真理。

很快，他的厄运临头了。

作为江青的“战略部署”，她先拿北京市委开刀，而最先遭殃的是邓拓和他的朋友们。作为执行中央精神，北京市委决定公开批判邓拓主笔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传达完中央精神以后，彭真派人转达他对邓拓的叮嘱，不要太紧张，要正确对待这次大批判，特别要注意保护身体，放下包袱，将来还要做工作。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闲居在家。他现在不是为老朋友仗义直言的问题，而是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连辩白的权利都没有。

进入五月，翻开报纸，整版都是批判邓拓的文字，举国上下，口诛笔伐，《坚决同邓拓斗争到底》之类的标题格外醒目。即使这样，他仍坚信党组织、坚信自己清白无辜。他对前来看他的老战友说过：

“我作了一年以后再弄清楚问题的准备。”

老朋友担心地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两三

年吧。”

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问题：“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紧接着，又作了回答：“他是一个叛徒。”

当邓拓看到这段文字时，双眼发黑，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党工作数十年，到头来竟“被查明”是一个“叛徒”。

我要申诉！要申诉！

他在内心里呼喊。

也就是片刻工夫，他突然沉静下来，陷入迷惘之中。邓拓在建国以前曾经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当时就向组织汇报了在牢狱中他没有出卖过任何机密和同志，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没有一个因为他的被捕而被捕。这是组织上早就审查定论的，档案上白纸黑字都写明的。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这样荒唐的指责呢？

这位忠心耿耿的党员想：也许是中央重新做了政治结论。不禁长叹起来。

妻子回家了，他也不抬头，只顾伏案疾书，他要给北京市委写一封信。

是申诉？是反省？是解释？

他自己也不知道，只顾写、写、写。夜深了，窗外宁静无比，但邓拓的心潮难以平静，他的笔端流出来的不是墨水，而是他的血、他的泪：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万

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给党组织的信是这样的激情，这样长，而给他妻子的信是那样的简短：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时间是1966年5月18日。

邓拓以自杀的方式表明了他的抗争、他的忠诚、他的无可奈何。

这是“文革”中第一起重要人物自杀案。

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为邓拓彻底平反。

魂断龙潭湖

1968年6月20日，国家体委大楼前空空荡荡，只见一位英俊的年轻人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出来，他脸上满布愁云，刚刚开完批判会，那不断的斥责声、口号声还在他的耳边响着：

“容国团！彻底交代你的历史问题！”

“容国团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他为祖国的体育事业，毅然从香港回到大陆，并为中国人争得了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今天居然落到这种地步。“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作为热血青年，他奋身投入进去，他和无数同龄人一样，对毛主席的绝对正确毫不怀疑，即使看到运动中一些荒唐现象，他也视为“暂时的”、“局部的。”

但是,现实是严酷的。

他亲眼目睹了随意抓人、斗人的现象,听说了肆意抄家的非法行为。特别令他震动的是,他一直熟悉、敬重的老领导、老朋友接连遭到厄运:

体委副主任荣高棠被戴上低潮的帽子,游街示众;

贺龙元帅成为“二月兵变”的“魁首”、“大土匪”;

他的队友傅其芳、姜永宁被逼得连续上吊身亡;

徐寅生则被关进了私设的拘留所……

他被这一切打懵了,不明白事情何以会变得如此糟糕。但他还想着,新一届世界乒乓锦标赛就要举行了,应该积极参加,便向中央写了建议书,喊出了“为祖国争取荣誉”的口号。

1968年5月12日,中央文件发下来,确定国家体委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的“独立王国”,过去17年执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于是,体委大院彻底沸腾了,被揪斗的人越来越多。在乒乓队,一些教练员神经高度紧张,随时准备被叫到台上揪斗一番。

容国团自认为清白,当他被通知要揭发他所熟悉的人的情况时,他坦然回答说:

“他们是好人,是热爱毛主席的。”

很快,他的“历史问题”被提了出来,有人振振有词地揭发:容国团当初从香港回到大陆,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更有大字报说“容国团是颠覆祖国的特务”。这使他的心灵受到沉重的打击。

批判会开完了,容国团的决心也下定了。他步履蹒跚地回到家。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家啊!贤慧的妻子、活泼的女儿,还有相依为命的老父。他实在舍不得这个家。

妻子回来了,晚饭端到他面前。

“今天的会有什么新情况?”妻子担心地问,她早已注意到丈

夫的脸色憔悴无比，仿佛换了个人似的。

容国团回答说：

“还不是老样子，总免不了要揪我。”他的神色有点茫然。

妻子安慰道：“你怕什么，事实总归是事实。”

“恐怕，恐怕以后没有什么干头了……”

容国团欲言不止，他眼前似乎又浮现出过去艰苦奋斗的场景，他13岁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而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为了生计，他做过搬运工，受尽老板的呵斥。经过惊人的苦练，他终于成为香港一名著名的乒乓球手，不少老板许以高薪，请他到球会打球，他都断然回绝。他的心在大陆。1957年11月1日，当他跨过罗湖桥归来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他把这视之为“新生活的开始”。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如今却面临着各种难以忍受的责骂、诬蔑、羞辱……他实在难以忍受下去。

他的心潮难以平静，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他要喊出声来了：

我还这么年轻啊！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默默地告别了妻子，怀中揣着一根尼龙绳。再看妻子最后一眼，他内心无法表达出的那种深情、哀伤和歉疚，都在这最后一眼里了！

夜色沉沉，容国团走向哪里？

在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他走啊、走啊、走啊……

这是他多么熟悉的地方！平时，他常在这里跑步锻炼，为的是为祖国争光，而今天，他来到这里，是为了……

第二天凌晨五时许，人们发现了一具悬挂着的尸体。在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场旁边，那棵槐树枝叶是那么茂盛，充满生机，而容国团则没有了一丝气息。

尸检证明，他是在凌晨两点半赴死的。整整五个小时，他就

在那里走啊、走啊，那是生与死在搏斗，是人的尊严与丑恶的诬陷在搏斗！

容国团死后，他的家被彻底清抄了一次，被翻了个底朝天。但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然而，容国团口袋里的遗书则无可隐藏。那白纸黑字，字字血泪：

“我历史清白！”

“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979年，国家体委宣布：为容国团彻底平反。

一个以死抗争家庭的毁灭

在“文革”中，以死抗争的普通百姓何止成千上万，他们是共和国大地上永远不会安宁的冤魂。

在祖国的北方城市旅大近郊农村，1968年的春天刚刚过去，一个阴谋在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的主持下，酝酿成形。在筹备七月份举行的“活学活用”讲用会时，他的敏锐的意识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材料。6月26日，这位副政委下令：“把许长家拉来，叫他交待问题。”

许长家是一个忠厚的农民，一辈子侍候庄稼活。被叫来交待问题，他还摸不着头脑，说：

“我是贫下中农，我没问题。”

反复问，他还是这两句话。

体息时，王副政委“启发”各位与会者：“要打态度、打威风，态度打不倒，问题就交待不了。”

于是，许老头被绑起来，被逼跪在地上，顷刻，棍子、条子，雨点般落下来，他疼痛难忍，不断哀号呼救。

“快说，快交待你女儿许连荣怎样使用‘美人计’与大队书记勾搭在一起。”

许长家连连喊冤，结果又招来一顿毒打。其子女许连祺、许连荣知道父亲蒙受不白之冤，四处上告，直到北京喊冤。但得到的答复是：“要相信新生的革委会”。他们还时常遭到毒打。一段日子下来，许连荣那俊俏的脸蛋变得十分消瘦。

迫害还在延续。许长家经不住逼供、诱供和不断的毒打，违心招认了那些人的指认，往自己的女儿身上泼脏水，审讯者终于获得了“成果”，但许老头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心里直喊冤，我该怎样表白自己呢？

又到提审时刻了，许长家双手捂着肚子，弓着腰、颤颤巍巍说：

“我昨天交待的，都是假的。这是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我没有黑心，我要向党、向毛主席、向贫下中农交红心……”

他说不下去了，疼痛使得他五官都挪了位。

只见他把两手掖住的衣襟一擦，露出了鲜血淋漓的肚皮！

原来他用玻璃把自己的心腹部割裂达十公分，以剖腹表忠心。

这还没有打动那些审讯者冷酷的心，他们冷笑一声：“你想给咱们施加压力，威胁我们，是不是？！”

他们用红布把老人的伤包了包，将他绑在大桩上，边打边问：“是不是要威胁我们？”

许长家很快人事不省了。拷打他的那帮人做出新决定：“赶紧整理材料，判了算了。只要宣判了，死就死了。”于是，第二天召开宣判大会，宣读由“栾家大队农代会”署名的判决书：“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许长家有期徒刑十年，监外执行，交群众管制生产劳动。”

厄恶还没有终结，许长家的女儿许连荣被诬施“美人计”。阴谋者们决定对她直接下手。

许连荣被带进会场，一句话也不说。突然，这群人首先大喊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质问姑娘：“你开不开口？”

第二次喊口号时，许连荣举起手来，跟着喊了，这引来一阵狂笑：

“哈哈！这回你可张口了吧！”

“你们要我交待什么？”许连荣问。

“你和大队支书的的关系！”随即是一阵淫荡的狂笑。见许连荣不招认，他们一拥而上，将她打翻在地，压住她挣扎的胳膊，用棍棒、条子使劲抽打……最后，姑娘挺不过，只好屈招。

回到家里，母亲见女儿遍体鳞伤，失声痛哭。

许连荣却说：“妈，您不要管了，反正我什么都承认了。”全家随即哭成一团。

夜色沉沉，何处伸冤？

许连荣对专案人员说：“我有好多话说，让我想一想，明天你们什么时候来叫我，我就什么时候来。”她的心里充满了悲愤，母亲也直愣愣地说不出话来。

许连荣搂着两个小侄，贴着脸，亲了又亲，流着眼泪说：“你们再也看不到爷爷奶奶，再也看不到叔叔姑姑了。”

这天是1968年7月15日。

第二天上午，几个民兵来提审许连荣时，惊叫起来：“哎呀妈呀！都死了！”

只见梁上并排着四个人，他们是许长家（57岁）、许连福（26岁）、许连祺（28岁）、许连荣（23岁），地上还躺着一具尸体，是许连玲（20岁），因为缢绳断了而掉在地上，炕上也有两具尸体，王朝臣（许妻，57岁）和许连清（18岁）。

屋内两扇门上写着：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墙上用笔写了两个大字：

“屈死”

柜面上整齐地放着一套《毛泽东选集》，用红纸覆盖着。

在许连荣的腰间发现了遗书：

“我要求把我的尸首送到医院检查……我们全家的死是走投无路啊！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全家屈啊，屈！屈！冤枉！冤枉！”

一家七口，一一签了名，盖上了手印，血红血红的。

1980年，许家一案得到彻底平反。

●囚后余生日 世上已千年

将军跳楼，九死一生

北京西郊，什坊院，一座神秘的小院，三米高墙上电网高架。在“文革”风暴骤起的年代里，这里囚禁着许多被斥为“走资派”的高级干部。往日，他们是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人物，今日被囚禁在这里，与世隔绝，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这是怎样严酷的场景啊！

这里便是著名的秦城监狱，以前这里曾经是侵华日军的司令部，而今关押着如此之多的领导人，一批一批，接连不断。他们被单独关押在各自的小号子里：

- 一号囚室：陆定一（前中宣部部长）
二号囚室：黄克诚（前解放军总参谋长）
三号囚室：谭政（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四号囚室：彭德怀（前国防部长）
五号囚室：孔原（前中央某部副部长）
六号囚室：彭真（前北京市市长）
七号囚室：马明方（前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八号囚室：王尚荣（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九号囚室：班禅大师（前政协副主席）
十号囚室：荣高棠（前体委副主任）
十一号囚室：孟用潜（前西北局组织部部长）
十二号囚室：万里（前北京市副市长）
十三号囚室：陈克寒（前北京市副市长）
十四号囚室：冯基平（前北京市委书记）
十五号囚室：罗瑞卿（前公安部部长）
十六号囚室：邓洁（前纺织部副部长）
十七号囚室：李井泉（前西南局第一书记）
十八号囚室：赵健民（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书记）
十九号囚室：贺龙（前中央军委副主席）
二十号囚室：刘仁（前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二十一号囚室：陈再道（前武汉军区司令员）
二十二号囚室：郑天翔（前北京市副市长）
二十三号囚室：赵凡（前重工业部副部长）
二十四号囚室：林枫（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还有二十五号囚室、二十六号囚室……

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作“罗长子”的罗瑞卿大将，是在“文革”

正式爆发前就被打倒的“黑帮分子”。1965年12月，他被突然召到上海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遭到无情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怔了好一阵子。随即他被一架专机送走，从此失去了自由。

上海会议上回荡的声音一直响在耳边：“林彪同志揭发你，今年2月你让刘亚楼转告叶群，提出逼林彪下台的四条意见。”当时，他差一点拍案而起，怒斥这谎言。但是，他忍住了。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机会已经失去了，从他与林彪开始疏远并抵制林彪的一些做法时，这种机会已经不存在了。

他实在想不通，他的倔强秉性使他更难以忍气吞声。他最后决然作了选择，登上阁楼，纵身一跃……

死神没有收留他，手术以后，左小随以下三分之一被切除，永久地残废了。这是1966年3月18日。

1966年，严寒中的12月24日，不能行走的罗大将被放到柳条筐里抬到首都体育馆的批判大会会场，接受对他的“打倒”、“火烧”、“油炸”。当时，他就是直接从什坊院那个院子里被抬出来的。

在这个院子里，他和其他囚徒一样，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专政对象。忠于职守的看守和专案组成员，对这位身残的老人施以最恶毒的惩罚：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不让他解手，甚至用烟来熏呛他。

将军愤怒又无可奈何地质问：“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党的政策的！”

得到的回答却是：“对于反革命，我们从来不施仁政。”

罗瑞卿语塞了。

在所有囚犯中，他是行动最不便的人，却经常被提审，要他交代问题，交代“顶头上司”的黑线。他毕竟是经历过风雨磨难的

公安部长，不畏惧审讯者的淫威，常常以闭目养神来对付他们。他的反驳是简短的、低声的，却总使对方哑口无言。

罗瑞卿觉得自己生活在地狱之中，小院里经常充斥着令人心碎的呻吟、低沉的毒打声以及逼供的狂喊……这些声音起初是那样的令人恐怖，那样揪心，渐渐也听惯了，最终他听了整整八年。

他不是一个等死的人，行动不便，却时时想着充实自己。经他再三请求，拿来了《马恩选集》。他读着、思考着，也想到自己与林彪的斗争，想着这个秃顶的阴谋家何以能在政治舞台上折腾。他坚信，林彪总有倒台的一天。突然，有一天，监门被踢开了，专案组的头头拿着一张报纸，扔到罗瑞卿面前，说：

“你还不知道吧，在党的九大上，林副主席正式成为我们党的接班人啦，你要老老实实交代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

罗瑞卿默默看了看报纸，又扔还给他。

那位头头居然喊道：“笑，你给我笑！笑！笑！”

得到的是冰冷的回答：“这些年来，我已经不会笑了。”

牢狱里的日子是无限的漫长，罗瑞卿曾经担心自己挺不过来。但最后，他还是活着出来了，那是在1975年。

1979年，中共中央为罗瑞卿平反。

民可杀不可辱

1966年9月的一天，骄阳依然烧烤着大地，陈仲彬接到通知，要她去州医药站小会议室开会。这位中等身材的妇女，根本就没有提防什么，便前去赴会。

会议开始了，有人在台前领呼口号：“打倒刘少奇！”

陈仲彬既没有举手，也没有跟着喊。立刻有人尖叫道：“陈仲彬不呼口号！”

“把她揪出来！”

话音未落，一伙人蜂拥而上，扯她的头发，扭她的胳膊，把她拖到台前，令她跪下。

“打倒刘少奇！”又有人呼口号，

她还是没有喊。

随即，响亮的耳光就抽过来，拳头、军用皮鞭一齐下，打得她眼冒金星。

有人质问：“你呼不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陈仲彬大声呼道：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又是一顿毒打。如此反复多次，她没有喊一声，也没有流一滴眼泪。

这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医药站的普通干部，曾经是“社教”队员，真诚地要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贡献力量。“文革”开始以后，他的爱人被勒令反省，被罚着拉板车。局势的发展不容她只顾个人的经历与遭遇。她看到的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干部被打倒，被用红颜色在名字上打“×”。她感到极度困惑。于是，她找来《毛泽东选集》，彻夜通读。她知道，刘少奇在我党历史上建立过丰功伟绩，毛主席始终信任与器重他。肯定是有坏人在捣乱。

陈仲彬开始拒绝参加群众组织，每逢开会喊打倒刘少奇和党政军负责同志的口号，她不举手。这在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举动，有人问：“为什么打倒刘少奇你不举手？”

她坦然答道：“很简单，不是敌人就不能打倒。”

她的命运就此注定了。

她先被停职反省，勒令交代问题，她回答说：

“我交代什么？我没有罪。”

“你保刘少奇没罪？”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她平静地回答。

陈仲彬被拉到大街上游斗，经受着无数次审问、拷打，背部严重受伤，无法睡觉，瘦成皮包骨。被送进医院以后，还没有躲过审问。

1968年的冬天，迫害升级了。陈仲彬被关进了“治安指挥部”。不久，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刘少奇被正式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有人逼她念全会公报，被她严辞拒绝，她愤愤地说：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审讯又开始了。

“刘少奇是什么人？”审讯员问。

陈仲彬立刻回答：

“刘少奇是人民的勤务员。”

再问一次，还是这个回答，如此反复。她抓过笔来，在白纸上写道：

“刘少奇是人民的勤务员”，过后，又在刘少奇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两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审讯者。

这换来的是，被吊在屋梁上。

1969年3月，陈仲彬以“死保刘少奇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之罪名，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强制遣送到边远的大庸县红土坪公社尚峰大队全家生产队管制劳动。

几块破板壁围成一个住房，三块石头架了一口锅，几块猪楼板铺了一架床。这就是陈仲彬的新居。

这是多大的牢狱啊！此处春天泥烂路滑、夏天干旱无雨、秋天狂风怒吼，冬天冰雪盖地。

精神上的压抑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糠菜为食的艰苦

生活,使陈仲彬患上了严重的水肿病,苦苦在死亡线上挣扎。

不少人为她担心,还好心劝她:“你才憨呐,只要你对刘少奇的问题有了认识,上级就收你回去当干部。”

她的回答是明确的:“我认识不上去,我不能欺骗组织,我如果欺骗了组织,将来我想到这些,就会心里难过的。”

她的爱人也多次前来劝她,不行;又派她姐姐来劝她,不行;她的侄女、侄儿前来劝她,也不行。更大的悲剧发生了。她爱人认定她得了精神病,便将她骗到永顺精神病医院。

陈仲彬对迷惑不解的医生说:

“我没有精神病。”

扭头折回了她的寒舍。

家庭的破裂无可挽回了,她爱人提出离婚要求。她毫不犹豫地签了字,她的儿子被下放到桃源县农村,不慎跌断了腿;也因为她的问题,儿子与儿媳离了婚,孙子被送了人。只有陈仲彬和她的女儿还在这边远的村庄里,受着煎熬。陈仲彬忍受着这一切,她总在等待着什么,盼望着什么,她活下来了。人的生命力有时间为什么竟会这样的顽强?

1980年4月10日,自治州党委为陈仲彬平反。

谁来判他死刑

他出生在淮海战役获胜的那一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获得了新的生命。进学校以后,他品学兼优。1966年时,他是淮北市一中的学生会主席、高三年级团支部书记兼班长,还是党员发展对象。“文革”开始,这位热血青年被鼓动往北京串连了一趟,居然赶上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回来以后,他便扯旗造反,组织了对市委当权派的炮轰,揪斗干部,他称之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这些干部在“文革”初期曾经把许多学生

和老师打成“反革命”，揪斗了他们。

这位叱咤风云的青年人，姓李名跃和。

然而，1969年9月18日傍晚，一辆囚车把他带走了，一去就是10年。

他被蒙住双眼，五花大绑，关押到一间空屋子里。他蜷缩在墙角里。他知道他是因为两年前的一桩惨案被捕的。在那一天，他们把淮北市委书记、副书记、矿务局党委副书记绑架了，进行了残酷的审讯，施以酷刑，结果，三人中死了两位，另一位被打断肋骨。这就是“九·二九惨案”。李跃和便是事件的主要组织者。

这位年轻人心想，自己不知该落到怎样的地步。

他想得太简单了，专案组认定“九·二九惨案”虽然是一中红卫兵干的，但必定背后有黑手，有“阶级敌人”。于是，捕人高潮一再掀起，在李跃和被捕前后的3个月内，有72人被铐上手铐。

审讯开始了。李跃和否认受人指使，审讯员有的是办法。他们对李跃和的“幕后者”市委秘书长邹云龙施以酷刑，“坐老虎凳”，还用老虎钳拔掉他的两颗牙。他的声声惨叫，清晰地传到李跃和的耳朵里，再让他看看他的另一位“幕后者”，遍体鳞伤的副市长杨杰，随后是饥饿战术。

李跃和被饥饿折磨得浑身无力，烧鸡、狗肉、口子酒、热炒，就放在他面前，只要他招供，承认他受那几位“长胡子者”的指使，就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了。

李跃和强咽着口水，他摇摇头。

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整整三年，他每天狱中的伙食标准是九分钱……

这位年轻人的拒供并不能救那些“黑帮分子”。他被关在狱中，失去了自由。“九·二九惨案”的结案是在1970年4月17日。淮北市革委会在给上级安徽省革委会的结案报告中认定：

杨杰、邹云龙、朱布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杀害高心泰、王振林两同志，是“九·二九严重谋杀事件”的首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因此，依法判处杨杰、邹云龙死刑，立即执行。依法判处朱布无期徒刑。

这些“首犯”已经被剃光了头发，拍摄了“执行枪决”时验明正身的照片，而事件的真正当事人却被关押着，没有任何结论，也不释放。但是，他也听到了市革委会主任的声音：

“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在我们淮北打响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放风，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菅人命。屁话！这是屁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草菅，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我，是打仗出身的，杀人从不手软。告诉同志们！杨杰他们的头，杀定了！我们杀定了！”

李跃和感到自己像被放在砧板上，不知什么时候，斧头就会落下来，他想申诉，又不敢申诉。

已经有两个人替死了，再杀他一个，手是不会软的。

“黑后台”杀完了，李跃和这个前台人物倒被放在一边，关押着，无人理睬。

岁月流逝，青春已过……

李跃和感到自己的过去经历像噩梦一样，窗外蓝天是多么纯净，而他自己则被永远玷污了，这是他自己所造成的。

可悲的是，他被不带任何罪名地关押了10年。

人不杀，也不放。

那荒唐的岁月终于过去了。

1986年，李跃和因“杀人罪”被判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江华

院长建议，改判死缓。

●他们没有活着走出来

共和国第一要犯

在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出来的那个月（1966年8月）里，刘少奇已经从第二号人物，降到第七号人物，他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毛泽东的严厉指责，使他感到无比痛苦，神州大地已经掀起的批判浪潮，使得他忧心如焚。他极为焦虑，但是无可奈何，针对他的各种攻击、谩骂，铺天盖地而来。他利用自己还有的权利，向毛泽东写信，驳斥对自己的各种造谣诽谤。同时，他不得不奉命写出“答辩”，他总是为自己、为历史辩诬，但谁还能听他的呢？

他对那冲进他的办公室、贴大字报的造反派喊道：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1967年7月18日，陈伯达、康生组织几十万群众，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整个会议期间，不许他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想掏出手绢擦汗，被狠狠一拳……

此时，刘少奇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但他在会后就被隔离了，加派了岗哨，不许乱走乱动，不许和亲人会面。

8月5日，又是一次长达两小时的批斗。会上，他的每次答辩，都被狂乱的口号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使他无法再讲下去。他被硬按着头向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脚上的

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被押回到办公室后，刘少奇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两天以后，他给毛泽东写信：

“我已失去自由。”

信如牛入泥海。

刘少奇的日常活动遭到监视，以前他为党为人民日夜工作的办公室，如今成了他的囚室。

经受非人的摧残以后，他的腰直不起来了，打伤的右腿一痛一瘸地拖着，只能双手扶着走廊的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

也就在一夜之间，他的前院（办公室所在地）与后院之间，筑起一堵高墙，他不再被允许出门到后院了，那里住着他的亲人。

几个军人闯进来，奉命搜查刘少奇的房间，并命令他把皮带解下来。他高声抗议，但立刻被按倒在地上，皮带强行被抽去了。年届七十的老人，气得浑身发颤，好半天爬不起来。

迟群代表中央给警卫人员训话：

“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

刘少奇的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彻夜无法入眠，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莫名的沉思状态。他的身体完全垮了。

奉命前来为他治癩的大夫，一边检查病情，一边还要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还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到1968年夏天，刘少奇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垂危，大夫前来抢救，他们得到的指示是：

“现在快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待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刘少奇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 24 天以后，即 1968 年 11 月 24 日，他的 70 岁生日这一天得到那份“决议”的。他清清楚楚地看到：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双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

刘少奇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大口地呕吐，血压陡然升高，达 260/130，体温升到 40℃……

1969 年 10 月 17 日夜，重病之中的刘少奇被遣往河南开封，当他被担架抬上飞机时，鼻子里插着饲管，喉咙里通着呼吸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到目的地，他被关进一所电网密布、高墙耸立的特别监狱。

随后，他连续发烧，呕吐厉害，却被上报说：“一切均好。”

11 月 5 日，又一次发烧，连续两天进行抢救。他无法说话，但神志还清醒。几天以后，再度病危，但不让送医院抢救。

1969年10月8日凌晨六点四十五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他的遗体被放在地下室的地板上，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都变形了……

刘少奇至死都不知道，中央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他立案审查的。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

被冤杀的警官

他戴着一副眼镜，貌似一个温和的中学教师。他是天津公安局的干部，李良。在公安战线上，这是代表智慧、忠诚、勇敢和荣誉的名字。

1968年的初春，李良正在汇报工作，有个陌生人走进来，将他叫走，单独宣布说，今后不许再与党组织联系了，他特别强调说：“你的问题也要审查，要先写揭发公检法的材料。”不做任何解释，那人便走了。

李良被一下子搞糊涂了。

他哪里知道，就在2月21日，江青、陈伯达等人发表了一个讲话，要“大揭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要以天津为突破口”！一场风暴马上就要袭来了。

过了几天，又有几个人冲进他家，蛮横地要他立正，不许乱动，还追问他为什么不写材料，见李良不予理睬，那些人就开始做“思想动员”：首长“二·二一”讲话要贯彻，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要站出来揭发公安局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他明确回答说，并指出，“对我的审查，必须经过公安局党组织明确通知我以后，才能写材料，没有党的批准，我一个字也不能写！这是对党的负责！”

有人吼道：“党已经瘫痪了，已经烂掉了，一切权力归我们！”

李良厉声驳斥：“党是不会烂的！”

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深夜一时，那些人气急败坏，强令：“不写材料就站着！”

一连几天，他遭到轮番围攻、辱骂和毒打，但他一个字的材料也没有写。相反，他写信给公安部、局领导，报告情况，但信件全部被扣发了。在这种情况下，李良宣布绝食。

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下来，他的身体极端虚弱。他被捆起来，强行输液、灌奶。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些人在输液、灌奶时掺了大量的盐，给李良造成极度干渴，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坚持不让步。

他的公安制服被剥掉了，手脚被捆住，他们揪住他的头发，每天两次强行灌食。李良的态度使那些迫害者认定，这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堡垒”，一定要攻克，不久，李良被秘密转移，囚禁起来。

他们拿来材料，一个陷害干部的讲话，一字不漏地念给他听，要他改变态度。

得到的是沉默。

他们又播放江青、陈伯达的“二·二一”讲话录音。

他还是沉默。

审讯员直截了当地说道：“首长讲的变色龙就是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干部，你要老实交代他给你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你是怎样干的。公安部所有的副部长都是黑帮，你的工作是谁批准的？”

李良突然开口了：“谁授权你们这样干的？”

“我们有权利这样做，实话对你说吧，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过是个小的，中央还有大个的。你不过是个执行者，只要揭发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马上释放你！”

李良义正辞严：“这是党的机密，没有党的批准，我没有权利告诉你们！”

迫害升级了。4月22日上午，李良被拖到“砸烂公检法大会”上，被扣以“与公安部和公安局的走资派阴谋勾结，背叛投敌”的罪名，宣布逮捕，投入死囚牢房。

一连数天，有7次群众批斗会和13次小组突击审讯，企图迫使他认罪，而李良乘势向与会群众高声喊道：

“同志们，你们受了蒙骗，这样干，是亲痛仇快的事！”

在狱中，他再次绝食抗议，以死相争。他还给中央写了大量信件，揭发目前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

“在大揭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中，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几十名处长都被扣上了‘变色龙’或‘小爬虫’的帽子，受到审查和批斗。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出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现象又在重演了！”

“在运动作法上，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否定一切，无限上纲的现象，我看到不少。而诡辩、武斗、体罚、逼供信等法西斯方式，我也多次亲身尝受。”

“我就是被害者。我的被捕，从社会主义民主讲，是压制不同意见；从社会主义法制讲，是未经核实罪名、事实，就随意捕人。”

“我相信我这个‘反革命分子’是带引号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最后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见青天的。”

牢狱中的斗争使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到1969年2月，他生命垂危，双目紧闭，两唇肿烂，身体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狱医提出赶快送医院抢救，提了三次，都被无情地拒绝了。

2月27日，在349天的绝食斗争以后，李良终于告别了这不平的人世。

在他的遗物中有一首诗，最后两句是：

“我们要永远满怀虔诚，一瓣心香，

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他一个字的材料、一句口供也没有留下。

同年10月，他被定为“洋奴、汉奸、死反革命分子”，永远开除出党。

1978年6月，天津市公安局为李良彻底平反。

死不瞑目者

张国土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先后当过联校校长、区长、副科长、科长、处长，1958年调任山西长治市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所以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是一个标准的当权派。1967年7月，他被造反派当作“走资派”揪回公司进行审查。主谋者是他的同事、原公司党委副书记，两人在工作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对立情绪十分严重。故而，张国土请求市委暂借调他到另一单位工作。没想到，他被揪回来了。

当时，晋东南的派性斗争演变成大规模的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3月才平息下来。但对张国土的审查升级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被突然抓，关进囚室，随即审讯开始了。

“说！你是不是富农分子？”

“不是！”

“你是不是国民党！”

“不是”。张国土的回答很干脆。

审讯者见他态度强硬，无计可施，说了一句：“走着瞧。”又把他推回囚室时里去。

他们派人到张国土的家乡武乡县索取“富农分子”证明，但得到的回答是：

“张国土家庭成份是上中农，根本不是富农。”

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们最后在县敌伪档案中找到一个在押犯的供词，而这供词早已被证明是假供。但对要置于张国士死地的人来说，有供词就足够了。

张国士又被押过来，被要求交代参加国民党的时间、地点和介绍人。张国士理所当然地予以否定。

这使迫害者们极为恼火，他们凑在一起商量：“张国士不说，你们就叫上几个人美美地收拾他一顿，不给他加点压力是撬不开口的。”

晚上，张国士被架到市建公司俱乐部的舞台受审。

又是恶狠狠的质问：

“张国士，你什么时间参加的国民党？介绍人是谁？”

“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张国士还是那句话。

于是，毒打开始了，几个人抡起木棒和钢筋棍对他轮番猛抽。

张国士身上旧伤未愈，新的创痛几乎使他昏过去，但他一直咬牙挺着，站着。

一个审讯者高高举起钢筋棒照准张国士的右小腿猛力抽下去。

“啪”一声，张国士跌摔在舞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随即，他被拖回囚室，又遭到一顿毒打。

几个打手见张国士没有任何反应，身子软绵绵的，一摸心口，已经没有心跳了，才慌张起来。

这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他已经被关押了三个月。

经过一阵紧张的密谋以后，他们伪造了张国士悬梁自尽的场面，第二天，叫来公安局法医进行假验尸，以自杀定论。

中午时分，市建公司院内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阵吼声：

“国民党、富农分子张国士畏罪上吊自杀，死了活该！”

“走资派张国土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相同内容的标语很快出现在公司大院和长治市街道上。

随之，《张国土罪行展览》拚凑开张了，更为恶毒的是，张国土的爱人和年幼的独生儿子被强行遣返武乡县农村，以防他们申诉。

通过各种渠道，全市群众也得到警告：“为国民党、富农分子张国土鸣冤叫屈，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1975年4月，张国土案件复审，开棺验尸报告写道：

“左右肩胛骨各有四十至五十毫米长的裂纹一道，右小腿腓骨膝关节以下五公分处有三公分长的斜形断面，并有两块小散骨，形成粉碎性骨折”。

1978年，长治市委为张国土彻底平反。

●刑场上的枪声

张志新在黎明前死去

这是一位党的普通宣传干部，举止娴静秀美。她曾经被“文革”的浪潮卷入进去，曾经以激昂的热情批判“走资派”。然而很快，她被满目的混乱惊呆了。1967年1月，在东北工学院校园发生了万人大武斗，随即蔓延到全市。美丽的南湖树林突然冒出许许多多的新坟头，那里躺着的是曾经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耳边枪声不断，城内硝烟弥漫；她所敬仰的省委书记被挂起牌子、戴上帽子，搞喷气式，残酷揪斗。

会议刚完，浓烈的斗争气氛还没有消散，就传来这位女党员的失声痛哭声：

“我想不通啊？老干部总是为党做过一些好事，有些人犯了

些错误,是否应该打倒?这里面有名堂!中央文革里有名堂!我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对林彪就是不信任!”

这些话是她与同志们谈心时说的,毫不隐瞒,随后,她随着大批干部一起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她的这类言论越来越多,她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回避些人。她说:

“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也可以揭么。”

“现在天天搞什么‘宣誓’,搞这个形式主义干什么?他不忠于毛主席,就是做那些事也不行。”

好心的同志私下劝她:“张志新啊,你不能再讲下去了,这是‘反革命言论’啊!”

但她的回答是坚定的:

“这个闸我不能刹!你看看我们伟大的党被践踏成什么样子,看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

张志新的言论早就被注意了。随后在“整党”过程中,她被排除在外。她哪里知道,她因言而被立案审查了。

1969年9月,毛远新亲笔签发了对张志新的逮捕令。9月24日,秋风萧瑟,人们被召到广场,心中惴惴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志新被两个大汉抓住头发,双臂背扭,但她神色坦然平静地听完宣布,挣脱开揪她的人,跨前一步,毅然伸出双手。镣铐“咔”地戴上了,她是以“现行反革命犯”罪名被逮捕的。会场边停看的那辆草绿色吉普车将把她带往哪里呢?

在审判室,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问:到这儿来以后,有什么想法。对个人问题怎样认识?

答:9月24日批斗后逮捕我,我没有构成犯罪,我想不通。

问:你始终不认罪,劲儿到底在哪里?

答:我说的都是事实,是真理。我没有向任何人乱讲,包括我的爱人。我是按照组织原则向党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

码的权利,怎么会是犯罪?

一来一往,针锋相对,最后审判员写下如下结论:“张志新纯属思想问题,构不成犯罪,无法判刑。”

于是,新的审判员就出现了:

问:你为什么这样嚣张地攻击林副主席?

答:这是我的看法,不是反革命行为。

问: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答:我哪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你回答我!

问:你犯了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罪行!

答:我不是攻击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党的原则的!

问:你拒不认罪!要考虑个人前途!

答:离开党,谈不上个人的前途!我没有什么考虑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变成一场“本末倒置”的审讯。

严厉的刑罚临加到这位女共产党员身上了,她被指定扎鞋口,每天定额是1200双;她被戴着背铐达一年半之久;她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旁观死囚的枪决……

但是,她的意志没有垮。她在学《毛选》笔记中写道:“两个家庭加起来21个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

在狱中度过了数个春秋,到了1975年这个严酷的春天。毛远新看到张志新的材料,说道:“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捣乱一天,杀了算了。”这位省委书记下令法院办理加刑手续,走过场的审判结束了。张志新被从15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而且不给上诉期,第二天就执行。

1975年4月4日,上午,张志新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几条大汉突然扑了过去,将她按倒在地,雪白的手术刀无情割断了她的喉管,鲜血涌了出来。被匆匆包扎以后,张志新被推上囚车,呼啸着向市郊牛官屯刑场驶去。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张志新无法开口说话,但她的内心在呼喊:

“今天来问罪,谁应是领罪的人?今天来问罪,我是无罪的人!”

枪声响了。

张志新缓缓地、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

她的秀丽的双眼没有闭上,也永远不会闭上。

她的遗体被肢碎,肌肉从骨骼上剔尽,留下一具骨架,做成了医学标本。

1979年3月31日,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

朱守中戴镣高歌去

寒星闪烁,是最严寒的季节,银川市郊外的文教农场里,正在召开批斗大会,会场里热气腾腾。

这是1968年12月15日晚。

朱守中,宁夏中卫县一中的普通教师,站在被批斗的位置上,但侃侃而谈,不像被批斗,而像在教课。他说:

“我对有两个司令部的提法一直是不同意的。党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很多事不能叫刘少奇同志负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事先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现在摘引的刘少奇的话,是断章取义……”

立刻有人打断他的话,质问道:“你交代,什么地方断章取义”?

回答依旧从容不迫：“比如说，少奇同志从来没有提过‘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刘少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别人上的纲。”

质问者哑口无言。

见文斗不胜，便来武攻，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拳八脚将朱守中打翻在地，又马上提起来，架成“喷气式”：“说！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朱守中嘴角流着血，回答说：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又招来一阵毒打狠揍。

这时，有人喊：“叫他把这话写出来！”

朱守中从容地擦净双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六个大字：

“刘少奇是党员”

这位中学教师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教师，在1958年，被以“在反右斗争中动摇退却，隐瞒家庭出身情况”为由，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作为支边人员，发配到宁夏。面对这些不白之冤，他一次又一次地抗争、上诉。他的家庭早已解体。1968年初，他又回到上海要求澄清自己的错案。然而，满目皆非：抄家、挂牌、武斗、游街、隔离、逮捕、流放、殴打……已经遍布上海。他要找的那些证人，不是被批判就是失踪，或是自身不保，不肯出面。朱守中目睹这一切，默默地撕掉了自己的申诉材料，国家乱到这种地步，个人的冤屈算什么？

他陷入了沉思。

回到宁夏，他边劳动，边和其他同志交换自己的所思所想，他忧心忡忡：

“我对刘少奇主席及中央首长和各级领导被百般丑化、揪斗、毒打等野蛮做法，深为不满”；

答：没有，只能说少了！

问（停顿了一会）：朱守中，为什么给你最后一个改造机会你都不愿意呢？

答：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满不在乎，我，就是顽固到底了！

回到牢房，他陷入了沉思，随之翻身立起，以铐击节，戴镣起舞，引吭高歌：“以牢为家高枕卧，美曲新歌由我语，杀头枪毙算个啥？视死如归不在乎！”歌声悲壮，响彻牢狱的走廊。

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戴着镣铐，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上名字，又重重地按了个血红的手印。

1970年2月21日朱守中被执行死刑。

1979年，宁夏自治区党委为朱守中平反。

老红军临刑前的仰天长叹

蔡铁根的名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名册上被除去，是在1959年4月。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大校军衔，被撤销军事战史教授会主任等职，工资降为15级，被分配到江苏常州市工业局工作。对强加给他的帽子，他从未承认过，到“文革”前，先后七次申诉，但石沉大海。

这位前军官做梦也没有想到，“文革”风暴会把他深深地卷进去。

1966年8月27日，蔡铁根所在单位人保科长、派出所人员偕同红卫兵，冲进他的家门，一气翻箱倒柜，名曰“扫四旧”。结果，当场搜出40多本日记和一把在“抗战”时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指挥刀。

蔡铁根正色对搜查人员说道：

“这日记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你们把内容扩散了我不负责！”

但是，搜查者如获至宝，将日记席卷而去。其实，蔡铁根早就

被人出卖。一个以前和他过从甚密的人已经交出蔡铁根给他的十多封私人信件。公安局据此来收集进一步的材料。

在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自己对被划为右派的牢骚,对国民经济生活、党内政治生活和一些政策的不满,还有一些批评毛泽东主席的言语,不用说,蔡铁根在劫难逃了。

第二天开始,他被公开游街示众,脖子上挂着子弹,从早到晚,直到口吐白沫,昏厥在自己的家门口。

对他的无端迫害被认为是“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出卖他的人又一次提供长篇材料,题名是《蔡铁根是只蜷伏在阴暗角落里妄图颠覆人民江山的反革命野心狼》,其中极尽诬陷之能事:

蔡铁根和朋友的来往,被说成是“搞反革命组织活动”;

蔡铁根谈论打游击,被说成是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要推翻共产党政权;

蔡铁根游览“善卷洞”被说成是为打游击看地形……

于是,在1966年8月19日,这份荒唐至极的诬陷材料,居然作为《蔡铁根案件情况专报》正式上报了。过了不到一个月,常州市党委即成立“蔡铁根专案办公室”,与他有过来往的同事、朋友先后遭到逮捕,定名为“蔡铁根黑帮分子”。据不完全统计,一类对象有7人,二类有8人,三类有32人。

蔡铁根终于被戴上镣铐,银铛入狱。但他坚决不屈服。在第一次审讯时,他大声说:

“我根本不是犯人,犯罪的是你。根据十六条,我够上哪一条?要我考虑什么?把我关了十几天有什么根据?依什么法律?”

审讯员忍不住了,吼道:

“是你讲还是我讲?这里是看守所!”

蔡铁根没降低声调:

“我也要讲,你就是要我来讲的;你们用反革命的框框,要把

我往框框里装,我决不会承认。”

这位曾经在中央军委核心部门工作的老红军,为了抗议对他的逮捕,先后三次绝食;曾经试图越狱申诉,结果被事先察觉,于是,罪加一等,还钉上了镣铐。

长夜漫漫……

蔡铁根的手脚被铐住,但他的思想却在自由地驰骋,他甚至想好了出去以后申诉的每句话,他在期盼着,期盼着……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案子被严重地升级了。到1969年11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把有关涉及人员集中到一起,深挖狠追。名曰办“学习班”,但空气极度紧张,所有窗户被用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得半点风,每天搞威吓、批斗、诱供、串供。被押来的15名“蔡铁根分子”最后连同蔡铁根本人,一起被用“喷气式”押上台。为此,专门调来100名民兵,把会场包围起来。

1970年3月,宣判决书下达了,认定“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判处蔡铁根、李业舫两人死刑、立即执行。

3月11日早晨五点,最后的时刻到了。蔡铁根被用麻绳紧紧地捆捆了起来。然后被带到一所房间里。

先宣读的是“逮捕证”!

蔡铁根嘴角现出一丝苦笑:被关押了6年多,要处决了,才宣布逮捕!天下奇冤!

当他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他狂喊起来:

“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

宣判者蛮横斥道:

“不准上诉!”

“不可思议!”

他喟然长叹,“我革命几十年……”话还未说完,脖子上的麻绳被实然抽紧了,他再也发不出声音了,要说的话只说了半句。

同案的吴翼知道蔡铁根想要说什么,在等候判决时,他说过:“活着,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1970年3月11日上午9时40分,常州西门外的西公墓,沉闷的枪声响了……

当天晚上,常州市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掩没了这位老红军的血迹。

1980年1月8日,常州市委为蔡铁根平反。

●天大?冤大?

集团冤案连绵不断

在极度混乱的形势下,林彪、江青等人开始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进行更加残酷的打击,一方面攻击其现行言行,一方面组织、挑动群众“深挖狠揭”历史问题,由此而制造出一大批冤案。其中最令人咋舌的是揪不完的一个又一个“集团案”,妄图以此来实现“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一时间,神州大地,“集团案”横生,往往殃及从上到下一大批干部和普通群众。

在今天看来,这些“集团案”的立案、获证和定案都何其荒唐,但当时,却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迫害狂潮。

案一:“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

1968年初,辽宁一群众造反组织,编造谎言,称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42人,在1946年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释放张学良回东北,以密谋策划在国民党向东北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杀林彪。毛远新立刻决定立案审查。到本年底,先后监护拘捕了陈先舟(原辽宁省副省长)、赵承全(原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还看管了许多嫌疑分子,开展“深挖”运

动,搞刑讯逼供。第二年1月,便使编造出“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共90名,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12名,部厅局级干部36名,全国政协委员7名,省政协委员17名。这些人被分别定为“特务分子”、“叛徒”、“叛、特嫌疑分子”等,称之为“东北帮”,是“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的”敌人,遭到关押,迫害。

1978年11月,辽宁省委决定彻底推翻这一假案,为所有遭迫害者平反。

案二：“内人党”案

1968年2月初,康生在听取内蒙古革委会核心组汇报时,诬陷在20年代被批准过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至今还在地下活动。他下令:“一定要揪,开始揪得宽点,不要怕。”这样,“内人党”案就成立了。自治区革委会立刻行动,电台广播,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3天之内(后延期至10天)到各级革委会登记,否则,一律按敌我矛盾处理。许多不明真相的原内人党党员真的登记了。事情还不完,在康生的指使下,许多基层党组织被说成是“内人党”支部。第二年2月4日,康生又发奇想,说道:“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要把它搞掉。”结果,涉及的人越来越多;内蒙古全区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经统计,涉“内人党案”受诬陷者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1979年3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为“内人党案”彻底平反。

案三：“新疆叛徒集团”

1967年初,康生旧事重提,把在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张治中协助而从新疆军阀盛世才狱中获释的马明方、张子意、杨之

华、方志纯等一百多名党的干部，诬为“投敌叛变”，是一个“叛徒集团”。对其中健在的50人立案审查，投入牢狱，其中20多人被迫害致死。

1975年5月，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此案平反。

案四：冀东“叛徒党”

1967年12月26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唐山的一次讲话中，大放厥词：“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作用。”他突然袭击，点名诬陷杨远（唐山市委第一书记）、白芸（原唐山市市长）、张达、吴良俊、方飞等，说他们是“叛徒党”的核心。很快，“杨白反党集团”立案，一边上追根子，涉及“冀东党问题”，一边下挖社会基础，在全省展开“肃反动流派运动”。还组织了280人参加的“冀东案组”，历时两年，内查外调，涉及中央29个部、29个省市的干部，共1604名，其中737人被定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殃及普通群众，受到迫害的达八万四千余人，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死亡，七百六十三人致残。

1980年，河北省委为这一冤案平反。

案五：“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66年9月16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样，当初由中央决定被拘押的安子文、薄一波等61人办理出狱手续以求被释、参加革命工作的旧事，被完全推翻，转眼之间变成一个“叛徒集团案”。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

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认定：当时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康生就此一箭三雕：既涉及到刘少奇的罪行，也打倒一大批高级干部，又动员起群众展开更广泛的“揭发叛徒”运动。这成为中共党史上最重大的冤案之一，并进而涉及到建国前所有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和党员，衍生出 31 件“叛徒集团案”，涉及到数十万人，大批干部涉嫌被投入监狱。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予以彻底平反。

案六：“广东地下党”案

1969 年 5 月，林彪针对叶剑英等同志对其作为的抗争，横生毒心，他提出“要调查广东地下党的问题”、“广东党的组织问题很多，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弄不清楚。”10 月 12 日，黄永胜（时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闻讯而动，大笔一挥：追查华南地下党问题。不久，成立“一〇九专案组”（即审查广东地下党专案组），由江青直接操纵，到 1968 年 3 月，黄永胜直接出任组长，加快迫害、诬陷的步伐。他们乱捕党的干部，搞刑讯逼供、诱供、迫使承认广东地下党是“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又要挖后台，揪黑手。因此案受到迫害者，前后达 7200 多人，其中 85 人被迫害致死，包括广东省副省长林锵云以及彭湃烈士的许多亲属。

1979 年 4 月 27 日，广东省委决定，为“广东地下党案”彻底平反。

案七：“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1967 年 10 月 3 日，北京出现一份奇特的传单，落款是“中

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真实的作者是一位煤厂青工。但陈伯达、谢富治咬定：这其中必有后台。1968年4月和8月，陈伯达强调说：“后台不是一般人”、“可能有一个组织。”谢富治说：“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8月24日，正式制定了《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在京的作战方案》他们对中国科学院一名实习研究员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而得了到了一份有20多人的“黑后台”名单；之后，他们步步紧逼，不断诱供；被审讯者神志恍惚，胡说出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名单涉及到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高级党政军领导人。陈伯达认定，这个“党”里通外国，要搞军事政变，还成立了“起义行为委员会”。由于编造的情节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陈伯达不敢向毛泽东汇报。

1969年“九大”以后，朱德、陈毅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由谢富治操纵的公安部只能将这“莫须有”案件搁置一边。

案八：“上海地下党”案

1967年，张春桥、王洪文出于全面夺取上海控制权的需要，对一大批市领导干部施展阴谋，欲置死地。他们在许多公开场合称：“上海地下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叛徒集团”。并为审查“上海地下党”，专门设立了39个中心专案组，845个卫星专案组。对凡在建国以前在上海工作过的党员干部逐个审查，被审查对象高达3600多人。他们以各种罪名，实施迫害，如把打入敌人内部的党员，诬为“红皮白心”特务；把撤往解放区的党员，诬为“受敌人派遣”，把曾经被捕过的党员，诬为“叛徒”；把设有被捕过的党员，诬为“被敌人秘密策反”。结果“文革”前在上海市、县、局以上领导岗位上的99名原上海地下党员全部被打倒，其中65名被拘留、隔离审查，4名被迫害致死。

1980年5月，上海市委为“上海地下党”案彻底平反。

案九：“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

这是“文革”酝酿时期的第一个集团冤案，

彭真在1965年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又被戴上“搞独立王国”、“包庇反共知识分子”、“搞修正主义纲领”罪名；罗瑞卿坚决反对林彪的“突出政治”等做法，被戴上“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有篡权野心”罪名；陆定一被指责为中宣部“阎王殿”的“大阎王”、“猖狂反对毛主席”的罪名；杨尚昆被戴上“窃听毛主席讲话”、“泄露党的机密”的罪名。这四人分别在1965年被打倒。他们之间并无组织性活动，但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林彪定为“四人反党集团”，“有共同点”。他诬陷四人分别把持军权、书记处、文化战线、机要情报部门。随之这四人被撤销所有党外职务。第二天，即1966年5月14日，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这个“反党集团”进行的审查，一直延续了十几年。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宣布，为“彭罗陆杨集团”彻底平反。

案十：“三家村反党集团”案

从1961年10月开始，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北京晚报》上开设“三家村札记”专栏，写作各类杂文，随感，影响很大。出于攻击北京市委的需要，江青等人对《三家村札记》大打出手。经过周密准备，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评“三家村”》一文，认定：写这些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公开指出，要“揪后台”。由此，全国上下一致声讨，“三家村反党集团”就这样被定案了。在三位作者中有两位被迫害自杀身亡，廖沫沙关进苦牢，身心受

到极大摧残。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依此模式,也展开了抓“三家村”、“四家店”的运动,殃及全国各地大批作家和群众。北京市委因此遭到毁灭性打击,最后被改组。

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案彻底平反。

欲笑无声:五百“反共救国军”

1968年冬,在陕西焦坪矿区,寒风呼啸,一间单身宿舍里,正开着“深挖”批斗会。

有声音高声大喊:

“你这个兵痞!老实交待你的罪行!”

被批斗的老工人解放前当过伪军,此刻被迫低头、弯腰,还举着手以示投降。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喝水了,干裂的嘴唇合不上,张不开。

质问声还在响着。

“水……”老工人嘴里只发出这一个音节。

审讯员端过来一碗凉开水:“交待吧?交待了不但叫喝水,还有泡好的茉莉热茶咧!”说着,把水泼在地上。

除了死之外,只有“交待”一条路了。

老工人终于开口了,颤抖着声音,低低地说:“我……交代,我……参加了……反共救国军。”

终于有战果了。组织上迅速行动,不断捕人,很快关押了数百人,有党员、群众、干部,有煤矿的,也有农村的,地区范围越来越大,涉及到铜川、宜君、黄陵、西安……

案子报到省里,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亲自赶来,下达三条指示:(1)专人负责;(2)对正副司令、骨干分子隔离审查;(3)打击骨干,打击首恶!

战斗方案制订出来了——“分兵合击”、“重点突破”！

动员大会召开了——“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

学习班办起来了——“六个深挖”、“遍地开花”！

专案组成立了——“侦破反共救国军联合专案组”！

人们在深夜能常常听到急促地砸门声、翻箱倒柜声、挖抗掘墙声……这是在搜集证据。最后共搜出骨干分子 38 人，一般成员 472 名。其中，焦坪矿 4 名矿级干部，34 名科级干部，18 名一般干部，78 名工人，都参加了“反共救国军”。

据称，这个“救国军”要抢劫枪支、弹药、银行，释放囚犯，攻占宜群县城，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查清这个案子，审讯人员又押来那位老工人。据称，他是“副司令”。

在审讯中，他突然喊起来：“我交待！我说实话！假的！我交待的反共救国军，是假的！”

“那你为什么说假话？”复审员问道。

“他们打我、烤我，我不说，老命早就完了！”

“那你是怎样编出个反共救国军呢？”

“他们要我交待现行的、大的，我想，只有反对共产党罪恶最大。我从前听人说过有个什么‘反共救国军’，就随口说了出来。”

又提审一名“要犯”，自称是伪郑州警备区少将，姓杨。他供出了“反共救国军”的“金锁四将”：“中将师长王景义、少将师长张同绪、少将旅长鹿异又、少将旅长董云亮。”最后，经查实，王“中将”是一个小贩；张“少将”是卖豆腐的，鹿“少将”是编筐为生的；董“少将”是卖茶水的。

这杨“少将”何以如此胡乱指供呢？在别人的交待中，原来没有他的名字，他以为自己平安无事。不料，学习班负责人因为他有“历史问题”（当过伪中尉军需），一口咬定他必定是“反共救国

军”成员，予以“重点突破”。

杨“少将”亲眼目睹过学习班的残酷刑罚：什么“鸭子游水”、“凤凰展翅”，什么“烤炉子”、“跪炉渣”，什么“喷气式”、“大修理”……早就学乖了，要省去这皮肉之苦。

他被揪到屋子当中，聆听学习班负责人的启发：“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杀一千个人也是杀人犯，交待大的可以立大功。”

于是，他张口了。可是，怎么也说不全，又有“启发了”：“你们有党，有政，一定还有军罗？”

“嗯……啊……有！叫‘工农联盟军’。”

“不对吧，怎么没有‘反共’两个字？”

“……对，对！……叫……反共联盟军？”

“还不对，再想想？”

杨“少将”又说了几个名称，负责人直摇头，直到说到“反共救国军”，他拍着杨“少将”的肩头，高兴地说：“看这有多干脆！”

过了几天，他被要求交出“反共救国军”名单。他撕下糊窗户的牛皮纸，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编出了一本名单。

在被揪出的500多名“反共救国军”成员中，有8人“畏罪”自杀；余下的，有的惊恐而死，有的被囚禁在牛棚里，有的不断遭到毒打，要其交代罪行……

在另一边，那位省革委会副主任还在说：

“铜川地区，敌情复杂，什么‘联合党’、‘反共救国军’，很多，旧公检法就是没有发觉！”

同时，省报发表社论《砸烂旧公检法》，号召：一定要彻底砸烂。

“焦坪山大沟深老虎多”的说法，在全省四处传扬。

1978年11月9日，铜川市委为“反共救国军”案彻底平反。

第十四章

不散的阴魂

●结束了？还是又开始○两个“凡是”出笼○邓小平的严正批评●神州“洋跃进”，天地终无情○日昏鼓声急○跃进！再跃进○顺天者兴，逆天者败●“姓资姓社”之争○张、姚是否再世○重温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

难道，只有苦难深重，才能警醒炎黄子孙？

如果连这样的不幸，都不能夔然唤醒不幸的民族，那么，这样的民族又怎能送走“左”祸瘟神？瘟神不送，国难民灾何日方休？

是走出悲剧的时候了。

是走出变形的自己的时候了。

是骨质里多一点钙的时候了。

为了曾经是孩子的我们和我们孩子的幸福不再断送，为了科学、民主、法制和人的生存尊严，为了十亿人的国度不被遗忘于太阳系这颗最壮丽的行星，让我们像山脉与山

脉相挽，像星座与星座相连，走出悲剧，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结束了？还是又在开始

两个“凡是”出笼

1977年8月12日，面容敦厚、操着浓重山西口音的华国锋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对着主席台下近1500名代表，对着3500万中共党员，对着9亿中国人民，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被中共十一大宣告终结。只是，这是形式上的终结，还是实质上的终结，人们都关注着这一问题。

得到的信号是不祥的：

《新闻公报》称：“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经历了空前的灾祸以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全新的面貌来展开。是继续坚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真正的、认真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拓新的局面？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场斗争早在“十一大”开始之前就开始了。

围绕着怎样揭批“四人帮”和怎样处理以反对邓小平为宗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问题，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展开了一场较量。

当时的党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双箭齐发”，口号是“抓纲治

国”。纲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在全国全面部署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位党中央领导人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小平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我们要警惕，有人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样，就成为一个连环套：邓小平的案不能翻——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支持邓小平的群众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大批被打倒的党和国家、地方干部的错案冤案假案不能翻——无数普通百姓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能翻！

另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以过去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思路展开，1977年2月，《人民日报》登出一篇文章，提出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揭批与清查过程中的反复与曲折、障碍，都以阶级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定性。大搞“群众运动”，大打“革命战役”。

这场揭批被牢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准揭“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准提“文革”以前的若干次左倾错误。华国锋、汪东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还振振有辞地列举了“四人帮”形式上“左”的诸多根源。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名义是批“四人帮”的理论实质，但未真正指出其“左”的本质，甚至有的领导人说：

“‘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

围绕着对张春桥、姚文元1974年的两篇文章（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公开批判，引发了一场斗争。1977年初，一些报刊开始不指名地批判两篇



文章中的观点,《红旗》杂志给中央领导人写了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

2月4日,批复下来了: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随后,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囑其执行。

问题的关键开始显露出来了!

过了三天,即2月7日,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与决定,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向全党全国提出严正的声明: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此时的毛泽东正躺在暂时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水晶棺里,面容安详。在他的晚年,他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带着他那理想社会的雄图,带着某种遗憾走的。他的思想和幻想对全党的指导方针、路线政策的制订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怕是他去世以后。他代表了一个时代,要超过一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早在半个月以前,在一篇讲话稿中,华国锋就有这样的警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便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当时被称为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第一次是刘少奇,第二次是林彪,第三次是王洪文,第四次是华国锋——而且是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众多的语录中,有一条很著名的就是关

于他的，那是毛泽东逝世前不久，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写的一段话：“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文革前是毛泽东故乡湖南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地位的急剧上升时期正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期。

面对全国全党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要求为一切受冤者昭雪的强烈呼声，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

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谈到“天安门事件”，他强调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打成“反革命集团”；1977年1月8日，又有一名青年因为贴大字报批评一位中央领导，当即被捕关押；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下令追查；为此，中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文件，要求进行“坚决逮捕或镇压”，于是，各地又冒出一大批冤案错案。辽宁锦西县高中校长董冷石从1957年起就蒙冤，1978年10月他进京上访，要求平反，被转回县里，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再次被捕；1976年12月19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

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一些中央领导人依循“两个凡是”,说毛主席说过这个人(指邓)右倾,一贯不听我的话。反对邓小平复出。在党内党外强大的压力下,一些人提出有条件地为邓小平平反,即要邓小平先写个文件,明确说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刊登了一些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被斥为“反毛主席”,并下令扣压《中国青年》杂志,不准发行。

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重重“左”的阻碍几乎使这项工作陷于停顿之中,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心灰意冷,茫然无措。

1977年10月7日,在胡耀邦支持下,《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首次提出平反问题。在一个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达万余封之多,表示热烈赞同。但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

在局部平反活动开始以后,由中央主要负责人把握的、曾经在“文革”中锋芒毕露的中央专案组,依旧扣压各种申诉案件,不许平反。

有位负责人破口大骂:“胡耀邦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啦!”

在平反过程中,由于长期以来干部和群众受到“左”的思想禁锢,显得顾虑重重,历次“左祸”翻来覆去翻烙饼一样,把他们弄得不知东西,平反者生怕被扣上“为坏人翻案”的帽子,被平反者生怕被指斥为“贼心不死”,一些与冤假错案有牵连的干部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威信”、一些清白无辜者则生怕“会挫伤那些运

动中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否定‘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等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如此等等。

就这样，在上下两重障碍面前，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极其缓慢。

邓小平的严正批评

“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已经激起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强烈反对。最终的坚冰必定要打破。1978年，在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论战：“真理标准的讨论”。

这一讨论又遭到重重阻碍。

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国报刊的理论性、政策性论文逐渐接触到“拨乱反正”问题，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左”倾错误）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平反冤假错案之类问题之外，还涉及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意识形态政策问题等等，一些社会舆论直接间接地提到了对“文革”、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对此，当时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大加斥责，再三下令，这个不许讨论，那个不许讨论，这种禁锢政策反过来促使一些不甚正确的社会思潮泛滥，加剧了人们的思想混乱。

但是，局势已非那些受“左”甚深的人所能控制住了。

1978年5月11日，经10次修改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播、转发，一时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

《人民日报》在转载当天晚上接到电话，被告知，“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

紧接着，“左”的反击就开始了。

5月17日，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怒气冲冲，骂道：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

责问马上就发出了：

“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这位负责人把新闻单位骂得狗血喷头，说他们“不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负责人是“没有党性”，接着就布置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

最后扔下的一句话是：“下不为例。”

第二天，当时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奉命在钓鱼台召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提醒各位说：

“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最后他叮嘱各地代表团团长回省以后要向省委常委汇报“中央的这个看法”。

过了不到两个月，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到山东省视察，把《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他对省委负责人说：

“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弯；”

“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在这场大争论中，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表态至关重要。于是，华国锋对一些已经表态的地方领导人一顿训斥，而那些还犹

豫观望的领导人则被要求“不表态”、“不卷入”。

从1958年起,在中国舆论界占据重要地位的《红旗》杂志,被一些“左”倾领导人牢牢控制住,在全国各报刊热烈大讨论的五月份,居然没有发表一篇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到10月份,《红旗》杂志还被某些领导人鼓励说:“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

《红旗》杂志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汇报了党内外群众对《红旗》“死猪”现象的强烈批评。他被告知:

“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鉴于《红旗》是有的巨大影响,它的这种态度对许多地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批判“左”的错误,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迟滞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在某一个市,许多基层单位纷纷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主管思想理论和文化的宣传部长则说:“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

这从侧面表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相当部分单位及其领导人受到“左”的思想框架的紧紧束缚,顽固地倒行逆施。

在邓小平于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以后,“左”倾势力依然在顽抗。

6月15日,中央一位负责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再一次地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不过是敢点名了。这种做法仍然影响到基层,有人公开攻击最初刊登这篇文章的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10日刊)说:“‘四人帮’时有‘两校’(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现在是党校。”

为了反驳“左”倾领导人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责难,胡耀邦再次组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门最基本原则》,但是,该文无法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直接发表,只能先

由《解放军报》刊登，各报再予以转载。

7月21日，邓小平召来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严正指出：

“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神州“洋跃进” 天地终无情

日昏鼓声急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的经济领域在“文革”乃至“大跃进”时期，受到重大摧残，国力大损。“文革”宣告结束以后，这一领域再次遭到严重的打击，同样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同样是“急于求成”，同样是“好心办坏事”！

1976年12月，在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席台上再也没有江青那傲慢的声音了，在一年多以前，她曾经在这里和邓小平的“右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擅自把讲话录音转发全国。

室外寒风凛冽，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声音则充满热情：

“到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的县，要建成大寨县！”

“到1980年，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达到《纲要》指标！”

“到1980年，全国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洋跃进”战鼓实际上已经擂得“咚咚”作响了。

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报告要点是：

在1980年，要尽最大努力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使全国农村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

这意味着,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必须增长 66%;化肥增长必须超过 100%以上!

还是 1958 年“大跃进”的语言,报告强调指出:“这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对于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对缩小三大差别,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接着,各省、市、自治区被要求尽快建立健全“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10 月 30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

全国各地都紧急动员起来,农村的土坯墙随处可见用粗体字刷上的大标语:

“为 1980 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而奋斗”!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全党动手,实现农业机械化”。

各大报刊的机器也转动起来,给予有力的支持。

到第二年初,全国第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北京召开,由国务院主持。会上,有些同志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但是,会议否决了这种看法,坚持原有目标。并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

《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祝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召开》(1 月 5 日);

《做农业机械化大于快上的促进派》(2 月 1 日)。

在农业战线行动起来的同时,又举行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从 1977 年 4 月 20 日开到 5 月 13 日,从大庆开到北京,先后有 7000 多人参加。又是中共中央主席在会议上指出: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 年)期间,全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

“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要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步伐”！

他最后充满信心地指出：

“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局面”！

197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各部门转发、国务院提出的《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断言，上半年工业生产有较快速度回升，这是“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局面正在出现”的征兆。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他指出：

“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

在这次会议上，国家计委提出的经济增长建设计划被批评为“太保守”。于是，只好拿回去加码，各省、市、自治区也如法炮制，各种高指标一抬再抬，相互攀比速度……

“咚咚咚！”另一面战鼓——工业“洋跃进”的战鼓也被擂得山响。

跃进！再跃进

政治运动模式的经济建设高潮再一次降临在中国大地，时距1958年整整20年，在历史的河流中，这20年是太长？抑或是太短？

各地区、各部门的“宏伟跃进计划”纷纷出笼，热得烫手：

煤炭工业：1977年10月29日，煤炭部领导向中央政治局拍胸脯：

“要拿下前所未有的高速度”！

“1980年总产量达到6.3亿吨，‘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增长5000万吨，到1985年，总产量要达到8.8亿吨，1987年赶上美国，突破10亿吨大关，到本世纪末，再翻一倍，达到20亿吨”！

冶金工业：1977年11月9日，冶金部领导在中央政治局面前指天发誓：

“到1980年，钢产量达到3500万吨，1985年，达到6000万吨，力争7000万吨，平均每年增加500—600万吨；到1990年，钢产量突破亿吨大关；到本世纪末，超过美国，达到16000万吨以上”！

国家计委：1977年7月8日，把一份出奇大胆的“引进”计划递交给国务院：

在“五五”计划后三年和“六五”计划期间，除抓紧1973年批准的43亿美元进口方案中在建项目尽快建设投产以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其中有：2套大型化肥装置，2套化肥关键设备，4套中间体原料装置；3套大型石油化肥成套设备，1套30万吨乙稀综合利用工程，4套化纤成套和关键设备，2套年产量200—300万平方米的合成革装置，3套合成洗涤用品原料生产装置；大批石油勘探设备，1套年产1000万吨露天煤矿成套设备，1套60万千瓦或90万千瓦原子能电站，1套年产1200万吨采矿设备……以上各项目，8年内共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基建投资需要400亿元。

……

且慢！更进一步宏伟的跃进计划很快就制订出来了。1977年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还开了半个月的预备会议，以示郑重。

依照政策制订程序。会后，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到第2年2月5日政治局将上述《汇报要点》和《1978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要求贯彻执行。

这是一份怎样的宏伟计划呢？

请看：

在今后 23 年内,在经济建设战线要组织若干大战役,分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战役战场有两个: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作为铺垫;

第二阶段,在“六五”期间,各项建设达到新的水平,到 1985 年,钢产量要达到 6000 万吨,原油产量达到 2.5 亿吨,为此,必须展开一场宏大的基本建设战役,在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 120 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30 个大电站、8 个大型煤炭基地、10 个大型油气田、10 个大型钢铁基地、9 个大型有色金属基地、10 个大型化纤厂、10 个大型石油化工厂、10 个大型化肥厂、六条铁路干线、若干大型港口;

第三阶段,即在 20 世纪结束时,中国要全面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到那时,粮食总产量要达到 13000 亿—15000 亿斤,钢产量过 1.3 亿吨—1.5 亿吨,赶上和超过某些工业发达国家”。

在如此宏大的工业发展计划面前,农业原有的计划和指标显得落后了,有点像“小脚老太太”。于是,“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召开了。会后,中共中央将会议提出的“农业实现更大的跃进”意见转发全国,要贯彻执行。

在这次会议上,“农业生产新跃进的形势正在到来”的判断获得赞同,随之,计划进行修订:

到 1980 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 7000 亿斤,棉花产量达到 6000—6750 万担,为此,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确保按时实现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公社制度,又强调要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到生产大队过渡,各地党委要为此积极创造条件,确定,在 1977 年冬和 1978 年春,全国 100% 的大队要实行生产大队核算。

总体的跃进计划呼之欲出了!

1978年2月,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在这个《纲要》中,一些指标又被抬高:

“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2.5亿吨,从1978年至1985年的八年期间,要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基建投资总额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在农业方面,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农业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85%以上,建设12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

事后,国家计委承认,《纲要》中许多项目并没有经过综合平衡,是草率定下来的,但是,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跃进的步伐并没有缓下来,反而进一步加快。

1978年7月6日和9月9日,国务院连续两次召开会议,集中研究加快“四化”建设速度问题,“组织新的大跃进”的思想正式提出来,跃进的鼓点更加密集、更加响亮。

在这个月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对今后两年的跃进计划进行确定和部署,大致要点是:

在1979年、1980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12%,工农业主要产品每年平均增加的指标是:300亿斤(粮食)、500万担(棉花)、300万吨(钢)、4000万吨(原煤)、600—1000万吨(原油)!

顺天者兴,逆天者败

这些惊人的指标、惊人的速度,使不少人又想起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在提交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前,李先念对《规划》提出意见,“要研究清楚以后再说”,但被不予理睬;在随后的一系列会议上,各部门、各单位有一些同志,面对这些指标,有苦难言,不敢要,于是,指标就被层层下压。

“拿不动，就是背也要背回去。”一位主管经济的领导人如是说。

国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把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的这一次经济领域内的大冒进，形象地称之为“洋跃进”。相对而言，1958年的“大跃进”便是“土跃进”，“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土洋结合”，“大干快上”；而这一次则强调“机械化”、“现代化”要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在本质上，没有任何的不同，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又称苦日子）、“文化大革命”这一连串灾难教育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狂热和幼稚了。

这一规划后来被中断执行，但两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阵阵战鼓催促之下，全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

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列举一组似乎有些枯燥的数字：

(1)基建投资比例为：农业 10.6%，轻工业 5.8%，重工业 48.7%；1978年各项总产值为：农业 27.8%；轻工来 31.1%，重工业 41.10%。

——结论是：农轻重比例失调！

(2)1978年，基建投资 479.3 亿元，比 1977年多 114.9 亿，增长率高达 31.5%，占当年国民收入的 15.9%和财政收入的 40.7%，另外，当年在建大中型项目，达到 1700 多个，比 1977年多出 300 多个。

——结论是：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国家物力和财力的可能！

(3)积累率，1976年为 31%，第二年达 32.3%，1978年又升至 36.6%，为建国以来第三个高峰年。在投资方向上，1978年，生产性投资 82.6%，生活性投资仅为 17.4%。

——结论是：积累过高，积累、消费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问题日益严重！

(4)在引进项目方面，1978年一下子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合同，共78亿美元，且全要现汇支付，再加上未签完的合同，总金额达50亿美元。结果，大规模借用外债，达51亿美元之多，造成随后几年国存收支严重逆差，到1980年逆差达13亿美元。

——结论是：盲目引进！

悠悠万事，上不可逆天意，下不要违民意，追往思今，不堪其忧。我们写就此文，旨在自警自醒。愿荒唐的中国“左”祸，从此一去不返。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可再折腾不起了！

●“姓资姓社”之争

张、姚是否再世

1990年到1991年，东欧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1991年12月25日，除夕之夜，苏联解体，飘扬了74年的红星镰斧旗，悄悄地飘落在地。

这一连串事变使中国十一亿人感到极度震惊，特别是在这之前不久，他们刚刚经历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大动乱。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显然具有了多重意义。

有人想起了1956年的国际形势在中国引起的连锁反应和可怕的后果。

那么，这一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中国人，不论你是党和政府的高

级领导人，还是普遍的基层干部，不论你是企业家、理论家、学者，还是工人、农民、个体户，不论你是生活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港、澳同胞，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同样的关切程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一位大报总编辑，对青年谆谆教导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怎样看待中国的“穷”，他提出了3条：

- 一、“要用全面的和阶级分析的观点看”；
- 二、“要用历史的观点看”；
- 三、“要用发展的观点看”。

得到的答案是：别看别人富，终究要完蛋；别看我们“穷”，终究要胜利！

一位重要刊物的负责人在“社会主义若干问题讲座”上，着重讲“新时期的阶级斗争”，讲“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讲“阶级斗争观念不能没有，阶级分析方法不能丢掉”。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来，历史的车轮向前行驶了十余个年头，现在，是不是又要转回来呢？这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连篇累牍的理论文章出现在人们面前，充满战斗精神，要高举红旗，要捍卫阵地，要砥柱中流，要研究当代思潮，要分析目前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种种新生事物和种种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的社会现象。

每一个中国人都被慢慢地，然而又是不知不觉地拎到这样一个巨大的问号面前：

“这些东西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

在经济领域里，“倒退”现象出现了！这更使得人们感到无所适从。

前几年,经过试点后开始普及的企业厂长(经理)责任制,不知什么时候演化为“以厂长(经理)为中心,以党委领导为核心”的提法,原来赋予厂长(经理)的一些重要的权力,开始往回收。

前几年逐步展开的合同制试点,不知什么时候,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要充分体现”的口号下,又开始大批招收非合同工:“铁饭碗”给你,要不要?当然要!尽管谁都明白“铁饭碗”弊端太多,但吃了几十年大锅饭的中国人,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谁都觉得端着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心里踏实。

前几年为保障集体经济而制订的一些政策、法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失去权威性,“平调风”又刮了过来,几乎席卷全国城乡,甚至有些地区借口“壮大集体经济”,又要收回通过“联产承包制”的方式承包给农民的土地。《农民日报》为此刊出了广大农民兄弟发出的疑问:“是不是党的政策又要变了,又要搞过去人民公社那一套?”

理论领域左倾思潮的回复更加气势猛烈。有人断言:“理论上的含混不清必然带来思想行动上的混乱”,“在思想理论方面,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消除影响,理顺情绪,提高人们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能力,铲除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决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

但是,就是在短时期内,各种各样的“帽子”已经编织好了,各种各样的棍子已经制造好了。这些“帽子”和“棍子”打击和批判的对象几乎包含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出现的所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使人们不禁由此回想起已经结束了14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人们的心头又悚然而惊地掠过一个巨大的问号:

“是不是张春桥、姚文元又在写大批判文章了?”

重温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

关于 1991 年开始的这场“姓资姓社”之争，著名理论家孙长江同志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摆事实、讲道理，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对于人们了解和认识这场“姓资姓社”之争的表像、背景和实质大有益处。现全文照录，以飨读者。

论“问一问‘姓资姓社’？”

读报的记录

1991 年，中国北京的一些著名报纸和刊物，相当集中地连续发表文章，讨论“问一问姓资姓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所谓“改革开放不要问姓资姓社”的“论者”，进行一场上纲的抨击。

我所看到的有：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载于《当代思潮》1991 年第 2 期（4 月 20 日出版）。

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

“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

“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重提“姓社”与“姓资”》。载《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7期(7月11日出版)。

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改革不问‘姓社姓资’，其前途是危险的。”

“一切不愿作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载于《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3期。《光明日报》1991年8月7日转载。

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社还是姓资’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和两种改革。”

“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且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一是究竟哪些社会现象有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二是对那些有‘姓’的现象，该不该分清它到底姓什么。不问不知道，问过见分晓。”

“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载《求是》1991年第16期。《光明日报》8月13日转载。

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不久有的论者提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以后，又有论者提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否定对‘姓社姓资’的‘无理诘难’。”

“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

《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载《当代思潮》1991年第4期（8月20日出版）。

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改革的新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是新还是旧，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要求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人民日报》1991年9月20日社论）9月1日晚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预播“明天人民日报社论”摘要。在很少的几句话里面，有一句是：“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姓社姓资’”。9月2日早，中央广播电台

播放的和《人民日报》刊载的当天社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都没有“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姓社姓资’”这一句话。

《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载《人民日报》1991年9月2日（原载《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8期）。

文章说：“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在我们党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历史地得到基本的解决。”

“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

“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煞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载《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10期（10月11日出版）。

文章说：“这里所说的庸俗生产力观点，即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指的是那种轻视、贬低甚至否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社会意识、精神的反作用，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简单地、庸俗地夸大为生产力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意义上都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物质利益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发展的唯一动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检验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经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就会好，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为了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说法，就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所宣扬的‘庸俗生产力’的翻版,只不过有点新特点而已。”

“这样一来,势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混乱,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物质利益的追求,甚至使经济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成‘经济社会主义’;使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趋同’成‘社会改良主义’,使社会主义面临畸形发展和变质的危险。”

《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班工作》。载于《求是》1991年第22期。

文章说:“我们有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载《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6期。

文章说:“首先是经济方面。在一个时期,这方面几乎成了一个禁区,清理精神污染也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都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怎么讲,怎么做都行,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误观点。这个阴魂是不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就没有了呢?我看不一定。有的报刊来势很猛,几篇文章突出一个观点,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不问姓社姓资行吗?你姓资的那一套怎么行?鼓吹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

以上是我所读到的,1991年北京几家著名报纸和刊物发表的一些文章的摘录。恰巧是十篇,不算少了。这里谈的

是关于“问一问‘姓资姓社’”的问题。把文章的题目和出处标出来,目的是把实事摆到读者面前,免得发生诸如“造谣”、“歪曲”、“断章取义”一类的纠缠。同时,把一个时期内,几家重要报刊对某个问题的议论,排列下来,放到眼底,一口气读下去,还会收到一种自然而然的效应。这就是看到共性、重复性,体验到规律性的东西。有利于人们去比较、分析、思考。根据实事,去进行求是。这样看来,抄了这么多报刊,占去这么多篇幅,看似浪费,实际还是有益的。

提出的问题

从上述文章摘录中,可以看到一些什么观点呢?

第一,要不要问“姓社姓资”问题,被看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改革开放不问“姓资姓社”,就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两条道路的斗争”,被看成并非只是一种观念,而是“客观实际”。“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这“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且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现实”;“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第三,因此,改革开放问一问“姓资姓社问题”,是“群众的责任和权利”,不问“姓资姓社”就是“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

看了上述文章摘录(如果觉得意犹未尽,请照标明的出处去看全文),这三个问题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按照这些观点,眼前摆着的是性质相当严重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实际上,一些人也是按照这种规格对待的。他们把“纲”上得很高,针对性很强,几家著名报刊观点一致、步伐一致,没有出现一点不同的声音。这是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严肃的问题,所有的文章,都不指明批评的对象是谁,都不交代出处。不交代出处,又怕人看不明白,于是采用曲折的办法,用加引号,断句子的曲笔,勾描他们所批评的“论者”。如:“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有的则在时间上指明:“在前不久有的论者……”;“这个阴魂是不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就没有了呢?我看不一定。有的报刊来势很猛,几篇文章突出一个观点”。这就很明白了。他们批评的是上海《解放日报》刊载的署名皇甫平的几篇评论。这些评论发表在1991年3月2日、3月22日和4月22日。所以,北京的批评文章,起于4月而持续到整个1991年。皇甫平发表的这三篇评论,其中《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在1991年3月22日《解放日报》)一文中,有这样两段话:“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点,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八十年代上海的开放,虽然成绩很大,但是步子还不够快,胆子还不够大,这与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有着直接的关系。”

“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又如

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越超不前,难成大事。”

皇甫平的三篇评论,只有这两大段文字里,提到了‘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但是,从这两段文字中,怎么能够得出“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呢?从前面我所摘录的北京的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批判者的逻辑是这样的:改革开放每走一步,必须先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不问“姓社姓资”,就是不问改革开放的方向;不问方向,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然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前所述,按照一些人的看法,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观念“逻辑”,而且是现实“历史”了。

如果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只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就可以解决,那真是太方便啦。大家都来“问”就是啦。未经理论家、未经过实践,就得先问“姓社姓资”。实际上,一些号称为理论家的人,坚持的是什么理论呢?他们脱离实际,不问客观情况的发展,死抱着僵硬的教条。这种教条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和限制甚至葬送改革开放的事业。有的人,连起码的唯物史观都不要了。改革开放先要问“姓社姓资”,问谁?问这号“理论家”?这真是天在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一套“逻辑”,纯属臆造。

何况,皇甫平并没有说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而是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仍然”者,依然如旧也;“囿”者,局限也、拘泥也,反盘问也;“难”者,非难也。把这句话和上下文衔接起来

读,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还和过去那样,拘泥、局限于老的成见,把旧观念旧模式当作划分‘姓社姓资’的标准,一看到改革开放有什么新尝试、新步子,就用‘姓资’?‘姓社’?来追问、盘问、非议、责难(如评论中举出的大量事例那样)。那就什么步子也迈不开了。改革开放寸步难行,只有坐失良机。”什么大逆不道之处?惹得衮衮诸公,如此煞有介事地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

错误的答案

看来,问题的疙瘩,不在问,而在答。请看皇甫平评论所举的事例吧,这些,都是有过答案的:国际饭店楼顶闪亮外商的广告,“姓资姓社”?

让外国商人在我们的国土上,居高临下,耀武扬威,同旧上海有何区别?“姓资!”

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姓资姓社”?

不要忘记旧上海的“租界”!现在还搞“租让”?“姓资”!

那末,搞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造就“社会主义香港”、开发浦东,姓什么呢?因为这类问题过去多有答案,所以“评论”要呼吁:为了不再丧失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为了改革开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为了中国的前途,请换一换脑筋,别再按照旧的观念、旧的模式,像以前那样思考问题、回答问题了。

有的文章说,改革开放问“姓资姓社”是“不问不知道,问过见分晓”。事实上,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在“问”,也不断地在“答”。只是并没有“见分晓”。或者说,每一问,每一答,自以为“见分晓”了,而实际都是屡“问”屡

“答”，屡答屡错。只有冲破一个错误答案的阻碍，才能前进一步。

十几年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农村最大的改革便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叫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姓社姓资？问过吗？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虽然不敢问，答案却十分响亮：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姓资”！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生气勃勃。乡镇企业姓资姓社？答案是：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是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姓资”！

城市企业改革，搞厂长负责制，“姓资姓社”？答案是：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姓资”！

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条件，需要多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姓资姓社”？答案是：这是私有制潜行，会改革社会主义性质。“姓资”！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要多利用点外资，“姓资姓社”？答案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姓资”！

划出一块地方包给外商承包开发，“姓资姓社”？答案是：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这就不仅是“姓资”的问题了，简直就是“卖国贼”，“姓贼”啦！

市场经济，“姓资姓社”？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姓资”！

这类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正如有人概括的：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最基

本、最实质的东西，都难于逃脱被说成“姓资”的厄运。

实践证明，这些答案，都是错误的。

得到的启迪(之一)——“左”已形成一种习惯势力

我们国家，四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也有的失误。这失误，最大的便是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及时地、坚定地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正如邓小平同志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0页）。这个失误，是明确地写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面的。但是，一些号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却置党的决议于不顾，屡次三番要改写这段历史。要重新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却被奉为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的模式，来衡量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实践。他们自己裹在僵化观念的套子里，与历史潮流格格不入，却指责别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把阻碍改革开放，当作坚持党的原则。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而能奏效。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怪现象：一方面是包括批判“两个凡是”、重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与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党的决议，不得阳奉阴违，党内斗争不允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的“三不主义”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

“抓党内走资派”、“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等错误和误解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直至重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等等内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另一方面是，一些理论家、政治家虚张声势的“大帽子”。

两个方面摆在一起，一个是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科学地概括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人民利益，取得了人民拥护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议；一个是个别人固守僵化模式、抵制党的路线、自以为是、别搞一套、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大帽子”。

二者相比，一个是重如泰山，明若日月；一个是轻如鸿毛，晦若鬼火。孰是孰非，本是再清楚不过的。

为什么偏偏有一些人要避重趋轻，弃明投晦，置党的一系列重大决议于不顾，置数亿人民改革开放的实践于不顾，宁愿坚信“大帽子”，不惜把自己的信念、命运系之于彼？！

为什么这许多首都的著名报刊，这许多党的报刊，一时间也都忘却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决议，而紧紧跟随着“大帽子”？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为什么有人竟会在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重要时刻，来制造这种“大帽子”？

是不是因为这几年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就要重新考虑党的这一系列决议呢？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讲得十分明白。

他说：“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改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十三大以来》）第 538、541 页）早在 1989 年 9 月，小平同志在接见李政道时就说：“经过动乱以后，新的领导班子将坚持过去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然，其中不会没有曲折、没有缺点。但我们相信，坚持这个方针政策的人，最终将取得胜利。”（1989. 9. 16. 新华社讯）

1991 年舆论界出现的一些现象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雄辩地说明：

“根深蒂固的是‘左’的东西。”（《南巡讲话》）

“‘左’的根子根深。”（《邓小平文选》第 334 页）

“‘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上第 28 页》）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南巡讲话》）

“左”的思潮，“左”的势力如果不认真消除，改革开放的阻力将会源源而来，弄得不好，改革开放就会夭折。

得到的启迪(之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经学

改革开放每走一步，就要先问一问“姓资姓社”。据说，只有这样，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叫做：“不问不知道，问过见分晓”。一事当前，先虔诚恭敬地拱手请问：“姓资姓社”？乞求赐给一个“社会主义”的封号。于是，便“正名”了，便“正统”了。这是多么冠冕堂皇而又省心乖巧的捷径。这些人开口闭口，自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在糟蹋马克思主义。他们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变成封建主义的

经学。用对待经学的方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但是，这个“名”，究竟是什么意思，孔夫子没有说清楚。汉代著名经学家马融注“正名”为：“正百事之名。”（《论语集解》）。董仲舒对“正名”则作了详细明确的解释。他说：“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名号都是表达天意的。就是说，这“名”要由“天”来“正”。可是，“天何言哉？”天是不会说话的，人们怎么知道它的“意”是什么呢？“天意”由谁来“达”呢？董仲舒说：“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春秋繁露》卷十）原来，这“天意”是由“圣人”来掌握的。儒学到了汉代，上升到“独尊”的地位，成为经学。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说：“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经学历史》）“经”，就是天经地义。在空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时间为万世之准则。它是超时空的。先有“经”，后有世界。不是“经”随着世界运转，而是世界按照“经”的微言大义运转。如果发生矛盾或者不一致，那肯定是世界运转错了，“经”是不能错的。

但是，《六经》虽然神圣，毕竟只有那几本死书。而世界却是无限丰富不断发展的。以《六经》之狭小，何以包容世界之宏大？这就要靠注经家的本事啦。他可以一字不变，而能应付万变。清代末年，中国思想界有过一场争论。一些接受西方科学技术教育的人责问孔孟教徒，“孔夫子见过飞机潜艇吗？《六经》能够解释飞机潜艇吗？”当时一个熟读经书的人，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有何难？《易》曰：‘飞龙在天’，又曰

‘潜龙在田’。这飞龙便是飞机，潜龙便是潜艇矣。”经学的弊病，不仅在于它僵死、拘泥、束缚人的思想，更在于这种“固守”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任意解释甚至伪造。表面上无限崇拜，其实呢，“六经皆我注脚”；“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部中国思想史，把这个问题，揭示得很彻底了。随着历史的前进，经学也就灭亡了。经学虽然已经灭亡，它的这套读经、解经的思想模式的影响，却深深地遗留了下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不是把它当作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而是用它来限制甚至破坏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还要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牢牢垄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便是这种经学思维模式的还魂。这个传统（当然是一种极坏的传统），在共产党内，渊源颇深。王明如此，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无不如此。人们不会忘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年月里，也问过姓资姓社的。那时的经典答案便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先给“草”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封号。然后论证：因为“草”姓“社”，虽然是“草”，我们还是要的；因为“苗”姓“资”，尽管是“苗”，我们也不要！何等豪迈的语言！何等顽强的愚蠢！只是肚皮却不答应了。老百姓说，如果社会主义是草，资本主义是苗，我们宁愿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能够批判这是方向错误吗？这不是老百姓的错误，而是答案颠倒了是非。终于千百万个人的肚皮，战胜了少数人的头脑。把被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草”不是社会主义，发出这种语言的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它（他）是假冒的。

事实生动地说明，一些理论家、政治家，他们拿出吓唬人的大帽子，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使用的方法是陈腐已极的封建主义注经、解经、制造伪经的方法。所以，他们就要死

死垄断这个解释权。在中国，“左”为什么根深蒂固，难以克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正确的答案

改革开放，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过不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只长草的假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说得好，“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4页）小平同志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上第52页）

邓小平提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南巡讲话》）根据这个标准，小平同志明确回答：“特区姓‘社’不姓‘资’。”

这是正确的回答。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这是邓小平讲的，而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了的。按照同样的标准，本文第三部分列举的那一串被颠倒了错误的答案，都应该再颠倒过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都姓‘社’而不姓‘资’。当然，真理的获得，并非一次完成的，还要继续经受实践的检验，不断丰富和完善。

坚持社会主义是这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这一点，小平同志也说得十分清楚：“世界形势，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克思主

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1989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

历史的回声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革命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在‘四人帮’曾经篡夺一个时期的宣传大权,把理论问题搞得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是14年前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几段话。不知怎地,现在读起来,特别感到有味。就是这样一些普通的道理,当时都遭受了上纲到“砍旗”、“丢刀子”、“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严厉的指责。这项“大帽子”也是很吓唬人的。除掉这项大帽子的人,就是邓小平同志。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终于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没

有拿掉这顶“大帽子”，而是把它当作真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末，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下去，改革开放更无从谈起。正如当时一位老同志所说，如果照“两个凡是”办事，“四人帮”等于没有粉碎。那样，历史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小平同志对这场讨论，讲过一段十分精彩，十分深刻，深入人心的话。他说：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这是历史的回声，是真理之声，也是历史的结论。她是常青的。



主要参考文献书目

本书资料来源除大量的历史档案、人物传记、回忆录、事件材料之外，还有如下公开出版物：

- 1、戴向青，《论“AB团”和“富田事变”》
- 2、蒋伯英，《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案”》
- 3、赵云山，《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始末》
- 4、中央党史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
- 5、中国文史出版社，《革命史资料》
- 6、各省党史征集委员会的各地党史资料
- 7、河南人民出版社，《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
- 8、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汇编》
- 9、华夏出版社《历史在这里沉思》丛书
- 10、《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
- 11、王蒙等，《防“左”备忘录》